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Neofunctionalism and after

人文与社会译丛

新功能主义及其后

J.C. Alexander

[美国]J.C. 亚历山大 著 彭牧 史建华 杨渝东 译

译林出版社

刘东 主编 彭刚 副主编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人文与社会译丛

新功能主义及其后

责任编辑 李瑞华 封面设计 胡 苨

ISBN 7-80657-580-4



ISBN 7-80657-580-4
I·437 定价:15.80元

新功能主义及其后

[美国]J.C.亚历山大 著 彭牧 史建华 杨渝东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功能主义及其后／（美）亚历山大（Alexander,J.C.）著;彭牧,史建华,杨渝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10
（人文与社会译丛）
书名原文: Neofunctionalism and After
ISBN 7-80657-580-4

Ⅰ.新… Ⅱ.①亚… ②彭… ③史… ④杨… Ⅲ.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研究 Ⅳ.C9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44595号

登记号 图字:10-1997-57号

书　　名　新功能主义及其后
作　　者　［美国］J.C.亚历山大
译　　者　彭　牧　史建华　杨渝东
责任编辑　李瑞华
原文出版　Blackwell Publishers,1998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9.875
插　　页　2
字　　数　212千
版　　次　2003年10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580-4/I·437
定　　价　15.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编的话

刘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柏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圈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

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决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逐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前　言

本书第二章至第八章完成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的十年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充满了合作的理论研究设想。如果没有我第一个博士生科洛米的激励，我也许不会提出这个新的理论设想；他后来成了我的同事，并给我不断的鼓励，使这个设想最终成为现实。而苏里也是一个重要的合作者，他和我私交甚好，并在自己的文章中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例。

我的德国同事和朋友蒙克在整个时期内也是一个密切的合作者。他不仅给我以思想的启发，而且还证实这个理论性的修正运动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斯梅尔塞、艾森斯塔德和巴伯是我忠实的良师益友，他们也做出了创造性的工作，使我有关新功能主义的设想得以成形。

在我致力于新功能主义的理论设想时，一开始，我详尽阐释了它的理论潜力，但后来，我意识到了它的局限性。在整个过程中，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私人感情方面，我都从我的瑞典同事艾尔曼的友谊中获益良多。最后，我必须对莱默特表示深深的谢意。查尔斯不顾我们两人理论倾向上的差异——同时也正是因为我们两人理论倾向上的差异——他从一开始就肯定了我的学术探

索。作为本书最合适的编者，在本书的形成过程中，他扮演了重要的批评性角色。

杰弗里·C.亚历山大
墨西哥城

目　录

一

理论设想的起源

1
从功能主义到新功能主义：在社会理论领域中的定位

收集于本书的文章，除了前言和结论，都写成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这并不是我在这段时期所写的全部理论文章，但它们事实上包括了我探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全部论文。它们代表了我构筑并深入探讨的新功能主义理论设想的主要文章，该理论设想由美国和欧洲的一小群志同道合的同事们完成，在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中曾引起广泛的关注。

就社会学学科和更广义的社会理论而言，新功能主义被理解为一场思想运动，如果把福柯的一个术语和来自三角学的一个概念结合起来说，它标志着在预设的知识/权力斜面上的转向。面对八十年代新功能主义的出现，在六十年代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理论家们——那是一个激进的社会学业已彻底抛弃帕森斯思想的时代——认为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成功回归"，新功能主义是"对当代理论的重大冲击"。六十年代之后，年轻一代的理论家则把新功能主义的出现视为对前一代人始终坚持的所谓科学发展呈线性前进的假设的有力驳斥。其中一位理论家这样评论道："帕森斯学派的复兴是八十年代社会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它意味着一种"循环发展的模式"，其特征是对帕森斯理论的扬弃（replacement），而不是全盘抛弃（displacement），它表明"不同思想流派随着时间的流逝，轮流支配着我们的注意

力"，并且"那些在各种理论传统中领导潮流者都遵循这同一模式"[1]。最近，在当代社会学理论尝试为新功能主义定位的努力中，莫泽利斯(1995，第81页)以一种类似的方式描述了他称之为"对帕森斯学派宏大理论的当下情感"。莫泽利斯通过考察"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遭到全面否定之后，八九十年代又经历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复兴"，从而得出结论，"考虑到帕森斯学派理论建构的严密性与深刻性，社会学理论的当前任务是不应该对它进行全盘否定，而应该对它的缺陷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整"。

作为一种改变学科内部分野的发展以及一场更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思想运动，新功能主义已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新功能主义所努力改变的，不仅是学科的结构，而且是当代社会理论的话语与自我意识。实际上，它已经完成了自己最初设立的目标。从这一点来看，如果不参考帕森斯著作中的某些重要论题，事实上，我们无法就当代社会建立任何社会学理论。例如，帕森斯有关结构分化的观点以更完善的形式继承了涂尔干和斯宾塞的早期观点；[2] 他对包容(inclusion)的看法，是建立在韦伯关于理性化与友爱以及涂尔干关于团结等观点的基础之上；[3] 还有他关于文化的思考，把韦伯关注的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转化

---

① 这些有关新功能主义产生背景及其他的一些评论，参见第三章第一部分。

② 参见亚历山大和科洛米(1990)致力于社会分化的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文章。卢曼著作中对普遍化的进一步分析，与帕森斯关于分化的理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然，这并不包括他后来著作中向沟通与自我形成的发展。还必须提及蒙克一系列有关"相互渗透"的文章与著作(1983)。"相互渗透"的概念明显地来自于帕森斯分析分化问题时的特殊方法。

③ 参见英—澳社会学家特纳的著作(1986，1992)及梅休的作品(1990，1997)。

成了一种更为普遍的道德制度化的理论；[4] 他对于人格和社会结构之间必然存在相互作用的看法，则建立在弗洛伊德和米德的理论基础之上。[5]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早期，许多有影响的社会学家认为，上述论题和其他一些论题只能按照"帕森斯的"思想来理解。但今天，几乎没有人再坚持这种观点。另一方面，八十年代初，在新功能主义运动出现之前，很多当今世界比较有影响的思想家都相信，目前已经完全可以撇开帕森斯的观点来考察上述论题了。而到了现在，只有极少数人还坚持这一观点。"帕森斯"已经从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知识力量，变成了一种被许多重要的社会理论家质疑其真正意义的对象，变成了一种当代知识生活中的"经典"形象。[6]

帕森斯贡献的重要性现在已经得到人们的承认，尽管他的理论体系不再那么受到欢迎。这个悖论只是表面上如此。在当代社会科学家中，即使有人继承了韦伯研究社会的详细计划，这样的人也寥寥无几。在这个意义上，也不存在什么"涂尔干主义 4

---

[4] 参见艾森斯塔德有关文明的文章(1988)、罗伯特森关于全球化的论述(1990)以及李普塞特对美国和加拿大的比较(1990)。

[5] 参见乔多罗(1978)对女性主义的探讨，他深受帕森斯早期著作中关于性与性别和后期著作中关于社会化的不对称性的思想的影响。约翰逊(1988)对这场争论的贡献可被解读为针对帕森斯这些方法的激进的女性主义重构，亦可参考最近与精神分析有关的社会学文集中对帕森斯理论的不断引用(如普拉格和拉斯廷，1996)。

[6] 在国际社会学会第八次大会上，图伦在他的大会演讲中提及"社会学的经典奠基人，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齐美尔和帕森斯"。我所使用的"经典"一词是在一种构成派(constructivist)的意义上，对此我有详细的说明(1987c)。根据这种定义，这意味着一个学术形象的名称作为一个浓缩的速写式象征，可以代表一整套复杂的观点来发挥交流的功能。在使用加了引号的"帕森斯"时，我指的就是这种构建出来的形象，而不仅是指帕森斯本人的著作。

者"或"齐美尔主义者",但这些早期的经典形象依然存在着巨大影响。他们被认为是特定思维方式的典范,为特定的研究领域提供了特定的范式,并为评论家们提供了辩论的焦点,从而使建立或否定更为广阔的知识联系成为可能。目前,帕森斯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正是如此。在当代生活中,作为一个理论形象,他的学术声誉不免会有升有降;但作为一个历史形象,在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的发展史上,他的地位在目前来看是确定无疑的,其著作和生平也已日益成为社会学史的重要资料。[7]

对我来说,无论就理论的意义、职业的意义还是个人的意义而言,新功能主义都是一个重要的设想。我已成功地帮助建立了或曰重建了帕森斯一些核心观点的合法性,就此而言,我认为这个设想业已成为现实。正是这种完成促使我把我自己对社会理论的理解从帕森斯的理解中区分出来,得以超越帕森斯,去思考"帕森斯之后"是什么,从而能够不仅仅在"帕森斯"基础之上,而且也在其他传统和当代研究的基础之上,建立一种与之不同的社会理论。同时,新功能主义之后的一切仍然要深深地受益于它。我认为,这一点之所以确定无疑,不仅仅是因为我自己的学术发展,甚至也不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其他当代思想家直接受到帕森斯的思想影响,而且是因为大部分,当然并非全部的社会学理论,是帕森斯思想的当代表达。[8]

---

⑦ 关于正在撰写的有关帕森斯与社会学、社会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的严肃历史学论著,请参看卡米克(1991和下面第六章)、沃恩(1989)、巴克斯顿(1985)、温策尔(1990)、尼尔森(1991)、约特森诺业(1996)、斯金蒂罗(1993)和杰哈德(1993)的著作。目前,在社会科学的历史中,对帕森斯的生平所做的研究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

⑧ 吉登斯改变他和新功能主义传统的关系可以揭示这一点。吉登斯在他系统地阐述结构化理论的论著(1984)的序言中承认,他的理论化旨在整合迄今为止理

我在撰写收于本书中的文章的那段时期里，也写了一些其他主题的东西。重读韦伯时，我特别关注他的理论中对现代社会的厌恶（亚历山大，1987a）以及他的理性化理论和涂尔干后期著作中提出的社会象征基础之间的关系（亚历山大，1992a）。我致力于行动的微观社会学研究（亚历山大等，1987）和意义的符号学及后结构主义分析（亚历山大，1990）。我还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了我以前对帕森斯的行动和价值理论的不同看法（1987b），并开始批判性地考察当代民主制度的问题（1991a），从而发展出一种市民社会的社会学模式（1992b）。根据上述考察，我发表了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证性文章（包括著作）。应该承认，如果用严格的新功能主义标准来衡量这些论著，必须从更广泛的角度把它们看做我称之为"新理论运动"的那种更为宏大的当代思想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参见第八章）。在本书的结论部分，即题为"新功能主义之后：行动、文化和市民社会"的第九章中，我涉及到了我思想中的这些发展历程以及它们与新功能主义的关系。 5

这种新理论运动可以视做战后社会学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从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期，帕森斯的理论具有一定的霸权地位。所谓霸权当然是相对的，与其说是一种支配性影响，不如说是一种压倒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只是取代而绝不妨碍其他传统的进一步发展。这种霸权统治结束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各执一词的理论层出不穷的时期，这些理论建立在批评帕森

论研究独立的派别，但他故意避免了从卢曼、蒙克和我本人的著作中体现出来的功能主义思想的复兴里获得任何借鉴。可是在他九十年代有关"后现代性"的富有创造性的著作中，吉登斯把他大部分的经验主义思想建筑于贝克引入的有关风险社会的观点之上，而贝克的观点则明显地改造了卢曼有关系统分化和行动是对不确定性的简化的看法。吉登斯还吸收了与帕森斯的现代化研究中许多现代和传统社会二分的观点。关于对早期帕森斯简单性的过分依赖的批评，参见亚历山大（1996）。

斯理论的基础之上，其目标是以行动或秩序的一个特殊要素来取代帕森斯所努力建立的综合理论。[9] 但是在七十年代的一段时期中，出现了一种不同理论重点的端倪，它试图整合不同的思想方法，超越以前的单方面的论争。那些形成这场运动的主导思想的理论家使用的概念反映了不同的侧重点和兴趣，对他们的大部分著作，我曾在不同场合提出尖锐的批评。部分批评性评论在本书的文章中有所体现，其他的则出现在我以前的一些论文集中(1988a,1989)。正是在这些分歧的基础之上，我在结论部分对社会理论新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然而，尽管存在深刻的分歧，我仍然坚信我自己的观点和我所批评的理论一起，构成了同样广泛但又与众不同的当代社会学思想的理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思潮中的每一种主要理论倾向都构成了共同主题的各种变化。

通过运用科洛米和我在对科学中知识积累与竞争的考察时发展出的一些术语(见第二章)，人们也许可以理解那些过去是、现在依然是这场新的社会学理论运动的特色。这是一个可以用来勾勒本书其他论文的普遍模式。首先，那些现在被认为是这场新理论运动的代表人物者——其中包括吉登斯、哈贝马斯、卢曼、蒙克、布迪厄、博尔坦斯基和泰弗诺、科林斯和我——旨在修6 正我们从帕森斯和他的批评者那里继承下来的观点。我们的目的在于超越后帕森斯学派思想中最具破坏性的部分和缺陷。在此，我想到的是这样一些著作：吉登斯的《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理论》(1971)、哈贝马斯的《走向理性社会》(1971)、科林斯的《冲突社会学》(1975)、布迪厄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早期著作(1970)和他有关教育的再生产的中期著作(1973)，以及我自己的《社会学

---

[9] 有关这种历史发展的探讨，参见亚历山大(1987d)

的理论逻辑》(1982—83)。

但是这些早期的诚挚努力很快让位于对前两个理论发展阶段继承下来的观点的强有力挑战，让位于对其不充分性的深刻体察，这种体察使我们的工作并不是走向一种修正，而是对早期思想方法的充分发展与重建。例如吉登斯的《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1976)和《社会理论的主要问题》(1979)，还有收在哈贝马斯的《交往与社会进化》(1979)中的文章，科林斯八十年代初有关"互动仪式链"的著作，以及我编的文集《新功能主义》(1985)。[①] 但对于这场新理论运动的一些参与者来说，甚至这种重建的雄心最终看上去也是有其局限性的。他们不再仅仅致力于修正乃至重建，而是要发展出一种全新的、有他们自己独创性的立场和观点。例如吉登斯的《社会的构成》(1984)、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1977)、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1984)，

① 尽管这些著作都恰好以着力于在微观与宏观之间建立桥梁为特点，我还是必须指出，这些理论家在学术倾向上都是宏观的。我不知道当代有哪一种希望建立普遍社会理论的努力有明显的微观倾向。但是，在战后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出现的微观传统中，却很难发现我们那种修正和重新建构的冲动，尽管在这些微观传统中也明显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变化，如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变化。科洛米和布朗(1992)曾把这种变化和功能主义的兴起明确地联结起来。谈话分析法当然可以被看成对常人方法学的修正，但这种修正并不指向一个更为综合的微观—宏观的目标。虽然谈话分析法已发展出较为制度化的一派(如博登和齐默尔曼，1990)，但总体而言，这一派不仅没有试图与文化分析或制度分析建立起系统的关联(关于最近一个例外，参见罗斯，1995)，恰恰相反，它始终坚持与之相对。以科莱曼的《社会理论的基础》(1990)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交换理论，是惟一参与造成了第三阶段系统化的某些成果的微观传统。但这里有两点保留。交换理论是通过转向一个宏观的理论化水平，同时又坚决地(埃尔斯特，1992)保持一种单方面的理论倾向，而并不融入到"向外扩展"(outreach)的时代潮流中来完成它的参与的。但在今天，占主导地位的普遍性理论即以"向外扩展"为特质。关于科莱曼这方面著作的更详细的评述，参见亚历山大(1992c)。

还有博尔坦斯基和泰弗诺的《论正当化》(1991)。[1] 我也开始明了八十年代后期我自己在理论重点和论调上所发生的一些微妙却显著的变化。除了上面提到的文章,我特别想到了我对帕森斯研究分化(亚历山大,1988b)和文化(亚历山大,1987b,1990)的思路所做的极其尖锐的批评。

同时,必须承认,卷入了重建工作的其他理论家抵制住了发展新理论或使理论重心发生重大转折的诱惑。例如持韦伯观点的社会学家希望以一种"韦伯学说"的方式吸收新的理论发展,从而重构最初的范式(例如施卢赫特,1981,1989)。谈话分析学者则声称他们仅仅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实践着"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此种保持传统一致性的努力有时对更为激进的重构采取一种对抗的方式。有人认为必须保持第二阶段

---

[1] 关于最后一本书,我想指出,尽管所选的时间和国家的背景都不同,但我们发现,在法国,针对布迪厄和图伦的理论遗产,在第二代的理论化过程中,最近也发展出一种类似的从修正、重新建构理论到理论创造的运动。博尔坦斯基在他仍然带有布迪厄色彩的著作《骨干:一个社会团体的形成》中,比他的老师更富于实用性与建设性。在与泰弗诺合作的《论正当化》一书中,他的创造超越了他的重新建构。在这本书中,他与布迪厄彻底决裂,综合进了话语理论、实用主义与多元论。而针对图伦的同样的决裂,可以在迪贝重要的《经验社会学》一书中看到。

这场新的理论运动在各个国家中的种种变化具有明显的重要意义。如在法国,帕森斯学派就从未取得过霸主地位。除了古尔维奇制度性的影响,具有明显主导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在此背景之下,布迪厄、图伦、布东、克罗济埃的思想可以被看做创造第二阶段的努力。这种创造不仅受到了来自美国的第二阶段理论化的决定性影响,而且受到了为美国传统奠定了一定根基的欧洲传统的影响。这些法国理论家没有一个是微观社会学家,但他们每个人都代表了一种相当明确的"以机构为中心"(agency-centered)的思想。图伦的一些思想,特别是布迪厄思想中的一些因素,可以被看做代表了第二阶段的运动,试图创造出更具综合性的理论模型。但博尔坦斯基和泰弗诺(1991)以及迪贝最近极富原创性的努力,则以相当不同的方式代表了这种综合性的理论创造,我认为他们这种更具普遍性的方式是最终也是更有效的方式。

理论的纯粹性（如波尔纳，1991）。[12]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理论的领域就在我们的脚下发生变化，这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我们可以说正处于一个社会学理论的后经典阶段中。[13] 第一

7

---

[12] 科林斯题为《韦伯学派的社会学理论》（1986）的文集，汇集了有关探讨历史和比较的文章。该书代表了另外一种变化。科林斯选择以一个经典形象来定义他的文集，却不用已被公认的"冲突理论"来定义，而他也曾花过很大精力去细致阐述"冲突理论"这个第二阶段出现的术语。换句话说，科林斯表现出了更具综合性的理论倾向。他的第三阶段，微观—宏观之链已明确地取代了第二阶段的术语，科林斯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科林斯，1990）。

[13] 这种与战后社会学论争中两极分化的二分法相关的新理论自由，与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理论和更广泛的后学科或非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理论之间的界限模糊是彼此一致的，这一点并不令人吃惊。要超越战后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事实上必须要超越二种关系，这不仅仅是和帕森斯的关系，还包括和他的理论对手，乃至和特定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所有理论家们的关系。如果说第二阶段重新建构的努力是试图打破社会学理论中的界线——帕森斯与其对手间的以及对手们之间的——来创造出新的综合体，那么，第三阶段重新建构社会学传统的努力，则希望能打破社会学和其他学科间的理论界限。这些理论不仅包括社会科学的，也包括文学理论和哲学理论。在这方面，创造一种真正的新的社会学理论的第三阶段甚至走得更远，它系统地吸收了符号学、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地理学、阐释学、实用主义、象征人类学、修辞学、博弈论、言语行为理论等许多理论的观点。

尽管本章中关于社会学理论的讨论完全是一种内部讨论，但这些发展肯定受到了思想界更为普遍的运动和更广泛的社会变迁的深刻影响（参见亚历山大，1995）。因此，旨在重新建构和创造理论的第三阶段的运动，过去是、现在也还是被那些新的具有政治色彩的理论所激发的，比如女性主义、多元文化论、市民社会、后殖民主义之类。因为这些另类的"新理论运动"本身并没有一个学科的重点——尽管它们事实上也受到了我这里所讨论的各种学科发展的影响。因此，对于社会学中理论建构和创造方面所进行的使界限模糊的尝试，它们也做出了有益的贡献。约阿斯的《行动的创造性》（1996）就是最近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他第三阶段的创造理论的尝试中，约阿斯主要从美国（实用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那里获得灵感，来反对他所谓的标准的反表现的倾向。他认为，一方面，卢曼和哈贝马斯具备这种倾向，另一方面，帕森斯和美国的新功能主义者也具备这种倾向。关于对社会学理论与更广泛的社会理论的关系的历史性转向的深入探讨，特别是有关哲学和文学研究中的理论发展，参见亚历山大（即将出版）。

次，在一代人中，各种新的、非常不同的社会理论正在产生。

事实上，从一开始，新功能主义就试图把帕森斯与不同形式的传统的和当代的成就联系起来。在讲述新功能主义的历史时，介绍一些我自己的生平似乎算不上离题，特别是因为新功能主义，至少就其在英美世界里的表现形式而言，常常与我的名字相联。[1] 在第二章，科洛米和我特别论及了从功能主义到新功能主义的这场运动，而本书的其他大部分章节可以理解为这场运动和这一主题的表达。但是，正像帕森斯已获得了他的“经典”地位一样，新功能主义的历史也正趋于结束。叙述从而远离过去而转向未来，走向一场从内到外超越新功能主义的运动。在我的结论部分，我将论及新功能主义以后的发展趋势。

在哈佛大学的最后一年，即 1968 至 1969 年期间，我开始对帕森斯的思想产生兴趣。那时，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上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正是这种对帕森斯的兴趣使我的学术发展与当时和我在思想上同属一代的美国“青年激进分子”的学

---

[1] 科洛米(1990a)已清楚地提出了德国新功能主义的发展轨迹与我们的理论虽有关联但很不相同，这个问题仍值得进一步广泛探讨。一些德国新功能主义者越来越明显地不愿意承认他们的理论重构和帕森斯早期思想的关系，这使科洛米所提出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除了卢曼自己坚决否认他受益于经典思想本身之外，蒙克近来(如 1991，1993)也试图让他和他的德国同行与《美国社会学》拉开距离。我批评了这种主张的错误之处以及蒙克的无缘无故地强调地缘政治学(见亚历山大，1995b)。蒙克的回应(1995)及进一步的争论，参见随后一期的《瑞士社会学杂志》(*Revue suisse de sociologie*)。该刊重新发表了国际社会学学会社会学理论研究委员会通讯《理论》上首次发表的对话。国家意识形态的问题与此密切相关——正如关于这一点最近的、最有历史意义的论证(赫丝，1997)所证明的，英美新功能主义与德国新功能主义在理论方面的主要不同在于，后者并不需要穿越由对传统的帕森斯思想的微观和宏观批评所构成的宽阔地带就能前进。其结果是，在德国思想中，帕森斯的一些核心思想如进化论和系统论具有更多的连续性，而不像美国新的功能主义那样强调偶然性、权力、冲突、团体利益与制度构建。

术道路相背离。在这种背离中，我尤其受到了帕森斯最后一位出色的学生古尔德的激励。他坚持认为，正如马克思把他的理论建筑于黑格尔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基础之上一样，当代的激进理论也必须建筑于帕森斯的基础之上。1969 至 1970 年间，我在伯克利读研究生的第一年，当我开始更深地介入到当代马克思主义错综复杂的思想中时，我始终铭记着这一建议。比如，我曾认真听过斯梅尔塞的课，他是对帕森斯理论作出了最具新意的结构性调整的帕氏学生。我还记得第一年结束时，我回到麻省坎布里奇，古尔德重申了他对我的"忠告"(参见古尔德，1981)，就像那个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家金蒂斯一样。金蒂斯曾在他有关福利经济学的博士论文中，高度创造性地运用了帕森斯的观点。这篇论文被他正式题献给帕森斯和马克思。

我听从了我的年轻顾问的建议，同意帕森斯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不仅仅是一个有影响的人。从我对帕森斯感兴趣的那一刻起，就试图将其观点和其他那些在不同体系中的思想家的观点结合起来，最初是和马克思的，然后是和我在第一年之后开始进一步系统阅读的涂尔干和韦伯的思想。我的学术抱负 8 是要建立一种更具综合性的社会理论，我认为帕森斯不是终点而恰是一个起点。我发现帕森斯的理论是一种我可以用来思考的东西，但它从来都不是我惟一用来思考的东西。帕森斯坚持声称他自己的理论是直接建立在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思想基础之上，但是，当他成熟起来的时候，他变得越来越对运用这些人的思想来发展自己的理论感兴趣。不过，我和我的德国新功能主义同行蒙克，都不认为能把帕森斯的思想纳入到这样一种线性的、进化的发展道路中去。我们宁愿认为他的思想不仅提供了一条回归传统的途径，而且最终也导向了当代。事实上，帕森斯思想中最为关键的是他的综合性目标和视界。因为他的

目的在于创立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一种方法、一种哲学、一种宏观社会学模式乃至一种新的道德。这激励着我和我的新功能主义同道们也能兼收并蓄地去思考。

在这本书中，这样一种创造普遍性综合理论体系的雄心呈现出既有理论分析又有实证研究的形式。例如，本书的各章旨在把各种通常是对抗性的当代和经典思想的组成部分整合起来，使之相互关联，这一目标是十分清楚的。在这种努力中，对于许多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理论的片面性，我使用的批评标准——有时很明显但更多的时候并不明显——是我在我的第一本著作中提出的“理论逻辑”。然而，考虑到我早期著作高度的“分析性”，我必须强调，从一开始，我也是非常明确地以一种政治化和道德化的方式实践着帕森斯创造综合理论体系的雄心。我在伯克利读研究生的初期，正好碰到了政治上的新左派的列宁主义转向。六十年代激进的学生运动所强调的公开性和参与性的民主制度，正日渐为暗箱操作和政治上的独裁主义所取代。一些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有关的校园运动，与毛泽东思想和斯大林主义的支持者们发生冲突，随之开始提倡革命的暴力。我希望通过读帕森斯和韦伯的著作，能在有关民主社会变迁的论述中找到认为暴力只不过是例外而不是定则的理论。在他们的著作中我发现，他们认为民主社会不仅承认批评和反独裁的可能性，而且鼓励这种可能性。帕森斯著作中这种意识形态的民主性和多元论的维度，从形式上独立于他对理论的整合性和多维度的分析，而这种意识形态的观念帕森斯自己从未意识到。9 当然，帕森斯的这种分析倾向，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对我来说都很重要，我也是有选择地接受它们（参见霍尔顿和特纳，1986）。

在我发表的第一篇有关帕森斯的文章《塔尔科特·帕森斯

著作中形式意志论与实质意志论——一种理论的和意识形态的再阐释》(亚历山大，1978)中[15]，充满了希望把这种批判的多元主义意识形态和综合性的分析理论相结合的努力。早年的这篇文章，反映出我在伯克利写的博士论文的思想，即认为经过一些重大的但不是根本性的调整，帕森斯的理论模型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合适的理论系统来重新整合经典的思想并产生出新的、真正综合性的理论视角。但是当我1976年离开研究生院、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从事第一份教职的时候，我的思路开始发生变化。我意识到我所评论的帕森斯应该被作为"帕森斯"来理解，我对他的看法是阐释性的而不仅仅是描述性的。

从1976年到1980年，我着手修改我的博士论文。这时，我开始面对加州洛杉矶分校强有力的微观社会学的潮流和社会科学界普遍出现新的文化主义的理论运动。我认识到，为了建构"帕森斯"而不仅仅是帕森斯个人的思想，必须对他的理论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建构。其结果是，在这些年间，我发觉自己与帕森斯本人，与许多公认的、老资格的帕森斯学派的代表，以及大部分帕森斯后来的学生——尽管绝不是全部，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在我出版的《社会学的理论逻辑》中，我在第一卷中致力于发展出有关社会科学的连续的话语模型(discursive model)，而帕森斯在他自己的理论中提出的科学的自我意识(self-understanding)就是我的模型挑战的对象之一。[16] 第四卷(1983)我全部用来评述帕森斯的思想，花了整整一半的篇幅用来批评他的

[15] 这种对分析性和实质性的修正以及对批评多元论的强调，有力地抬高了新功能主义者苏里(1992)和梅休(1990，1997)的著作，苏里的目的显然在于创造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理论"，而梅休则利用帕森斯有关社会共同体的理论，就哈贝马斯对公共空间的探讨提出了一种批评性的替代物。

[16] 这种话语模式在第二章有详细、具体的阐述。

原创性工作，并仔细地甄别了对他作出修正的帕氏学生的论述，以期从他杰出的但又充满了漏洞的出发点上清理出新的发展思路。

在有关《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的评论最初出现时我才发现，以前我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我与原初传统的距离有多大。但与此同时，这种距离并不意味着一种批评传统的断裂。作为对被误解的反应，我提出“新功能主义”这个概念（亚历山大，1985）。由于“功能主义”概念的内涵相对较小，我使用了“新功能主义”的概念，并希望这种用法能够与创造了新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构成某种比照。关于这种修正，科洛米和我后来称之为重建。

新功能主义的标签成功地为我和我志同道合的同事们提供了一个理论空间。它允许我们在对帕森斯的理论做出根本批判的同时，又与他的一些基本观点保持联系。我们认为，公开地表达出对帕森斯的不满，限制了对早期的、更传统的帕森斯学派的著作的充分理解，并最终导致了对它们的低估，这一点恰恰是非常错误的。我们明确地指出，我们的理论与帕森斯的原创性理论的异同，就好像卢卡奇与葛兰西的理论跟马克思的理论的异同一样。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也可以与卢卡奇和葛兰西在重要性上相媲美。

正如我和科洛米在第三章所描述的：在关于结构和文化融合而不是分化的历史与比较性探讨中，在以女性主义分析父系统治下的社会化而不是理性自我的形成时，乃至在有关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对继续弥漫在民主生活中的剥削和统治的考察中，在所有这些新功能主义所论及的宽广领域中，都充溢着这种重新建构的雄心。[1]

---

[1] 最系统、最详细地体现了这种思想的新功能主义文集是科洛米1990年(b)

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开始系统地重新思索那些我以前认为与这种综合性的理论设想、与帕森斯学派和新功能主义者的著作相对立的理论传统。对于那些我以前不太同意的理论，如微观社会学家戈夫曼、霍曼斯和加芬克尔，冲突理论家雷克斯，以及批判理论家哈贝马斯与沃尔泽的著作，我开始持有更多的赞同。在我坚持上述这些不同的传统也难以令人满意的同时，我逐渐意识到"帕森斯"也必须和它们一样进行根本的调整。在《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1987d)一书中，我指出，只有一种奠基于帕森斯的一些基本观点之上，但在具体的和一般的方面都有别于他的理论的新的综合性模型，才能解决那些挑战者们在帕森斯的著作中发现的问题。我逐渐认识到，在帕森斯的理论中存在着根本性的内在困境。这种认识不仅体现在我为有关微观联结的集体著作所写的文章中——这项研究也是在同一个时期我帮助组织的(亚历山大等，1987)——而且，正如上面我已指出的，这种认识也同时构成了我对于帕森斯分化理论所持有的乐观主义(亚历山大，1988b)和那种削弱了他的文化"价值"理论的简化论的批评基础。

正是在这些年中，我渐渐不仅对帕森斯原初的观点，而且对帕森斯学派对这些观点和其它更广泛的论题的看法感到厌倦。[⑬]在八十年代末的一次国际性会议上，一位老一代的帕森斯 11

和1992年(a)编的。科洛米为上述二书所做的序言(1990c，1992b)以及他为配套的关于功能主义传统的一本书做的序言(科洛米，1990b)，细致、完整地论述了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两种传统之间的关系。这些论述也代表了我和科洛米在第二章所探讨的科学发展的理论模型的最初个案研究。这种模型科洛米和布朗也曾论及(科洛米和布朗，1992)。

⑬ 我后来的两篇纪念巴伯和艾森斯塔德退休的论文(1991b，1992d)，揭示了我对帕森斯的看法在这段时期的转变。在我早期的修正性的讨论中(1979和1983，第277—8页)，我提及巴伯和艾森斯塔德时，强调了他们与帕森斯观点的连续性，甚至不管他们对帕森斯理论的漏洞的批评。而在我后来的论述中，我则强调了他们的

学派的理论家问我，是否有过关于帕森斯的一些肯定性的评价。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尽管它绝对不公正。我开始认识到，尽管我承认是在捍卫帕森斯基础理论的完整性与杰出性，尽管我极力支持新功能主义著作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新思路，对我来说，新功能主义对于帕森斯的理论遗产的重新建构还远未完成。在以下的第二至第七章中，当我面对批评者们而捍卫"帕森斯"时，我的目的是在维护他的体系的完整性，而不是维护他的观点本身。我希望能避免对他的思想的根本误解。[31]如果这种误解流行开来，就会助长那种认为当代建构的理论可以避开对帕森斯思想的系统研究的错误观点。正如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所警告的，这样"绕过帕森斯"将会减少就当代世界创造一个真正复杂的批评理论模型的可能性。

新功能主义成功地使帕森斯成为了一个经典形象。有关这

著作与帕森斯观点的距离。我试图突出他们近来的一些思考方式，因为这些思考方式有助于解决许多经典的和当代著作中的问题

[31] 尽管第一编中的所有文章都是关于传统与竞争这种科学知识的积累与反积累的普遍模型的，这些文章还是以不同的方式详细阐述了这个观点，而关于"传统与竞争"的模型，科洛米和我在第二章中有深入的讨论。第二章《今日新功能主义：重建一种理论传统》，则代表了一个广义地运用这个模型的个案研究，体现了对新功能主义的发展的一般看法，并对它进行了分析。这种发展与帕森斯的基础理论和当代理论的进展都有关联。相比之下，第四至第七章则与对帕森斯早期著作的争论直接相关。在《论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在美国社会学中的地位》一章中，我把对《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阐释的变化与当代理论论争的前沿中不断发生的历史性转变以及今日的社会学理论联系起来。第五、六章当然也同样致力于把《结构》及其他早期著作和当代的关注点联系起来，但它们更关注帕森斯著作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意义。这些章节彼此密切相关，因为它们都是对莱文和卡米克（帕氏的学生）提出的主张的回应。他们两人主张，帕森斯旨在综合的早期作品的颇有争议的片面性，反而被那些没能纳入他的综合体的理论揭示出来。由于努力按照它们自己的文本的和历史的方式来论述这些主张，这两章的意义，当然——再一次地——是理论性的和当代的（莱文对第五章的回应请看莱文，1989；卡米克对第六章的回应请看卡米克，

种新的重要地位的一个证据就是理论家们从帕森斯许许多多的、通常是矛盾的理论中挑挑拣拣,却不必为把其他的弃之不用而抱歉。最近,帕森斯中期著作的最早也是最激烈的批评家之一洛克伍德(1992),不仅运用帕森斯第一本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中所预设的理论框架批评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中的决定论思想,而且恰恰用它批评了涂尔干有关团结的理论,而帕森斯自己还认为他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对这种团结做了进一步的阐发。[20]莫泽利斯(1995)则抛弃了帕森斯有关发展的历史、文化和心理学之类的理论,在帕森斯分析分化的实体性理论和他的AGIL功能模式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他自己的关于微观与宏观之链的更加制度化的方法。[21]哈贝马斯一派中最重要的两位当代政治理论家,科恩和阿拉托(1992;参见亚历山大,1994),也深受帕森斯有关社会分化和社会共同体的观点的影响,从中独创性地吸收了许多东西,重新建构了哈贝马斯有关交往和当代公共空间的观点,而哈贝马斯自己则认为他这些观点已根本取代了帕森斯的观点。另一个有关帕森斯的新的重要地位的证据在于,他的著作的许多片断,为一系列具体领域中的当

1996)。《结构、价值、行动》(第七章)是对新近发表的以前未出版的帕森斯早期手稿的回应,这部手稿是有关制度和组织的、有很重要的价值。该章的三个部分:"历史学家的主张"、"解释性论争"和"今日理论",轮廓鲜明地反映了第二编中的所有文章试图均衡着力的各个关注点。

⑳ 参看史密斯(1994)对洛克伍德著作的尖锐评论,他不仅批评洛克伍德未能正确地理解涂尔干学派后期框架的复杂性,而且指出一个惊人的悖论:洛克伍德未能意识到他为了批评标准的新功能主义而建立的框架,恰恰深深地受益于帕森斯的早期著作。

㉑ 莫泽利斯的基本理论(1995,第7页)相当准确地反映了我这里所暗示的新的、实用主义的折衷主义:"因为从未做过帕森斯的追随者,我的理论策略的目的更多地在于重构而不是超越功能主义……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我们必须把今日理论社会学中所发生的现象与帕森斯学派的基础性贡献相连。"

代研究与理论工作提供了范例(可参见科洛米 1992 a 中辑录的
12 文稿;罗伯特森和特纳 1991 年的著作),这些作者很少会觉得有必要把他们的论述纳入广义的帕森斯学派的框架中,更不会认为他们是新功能主义的。

最后,也最充满悖论的是,出于一种相对不易引起争议但却意味着一种反常的尊重的方式,帕森斯的著作再次被用来作为当代学者希望反对的理论上和经验上的思想方式。例如,当霍姆伍德和斯图尔特(1991)就我在上文所探讨的综合性倾向提出争论时,他们针对的不仅是我的著作,而且包括了布迪厄、吉登斯、科林斯和哈贝马斯的著作。他们批评这些著作不仅"像"帕森斯学派的,而且深受帕森斯学派的启发。与此同时他们建议,如果清醒、冷静一点,一种有关帕森斯的更真实的看法事实上将超越这种困境。而在他们看来,这正是建构新的综合性理论的浪潮制造出来的困境。类似地,迪马乔和鲍威尔(1991)在建构组织研究的新制度研究法(neo-institutional approach)的思想谱系时,通过与帕森斯和塞尔兹尼克对于制度生活中价值和合理性的原初理解相对照,突出了他们自己当代传统的特征。至于正是帕森斯本人第一个认为制度化和合理性的能力一致,以及塞尔兹尼克认为他的著述是对帕森斯观点的批评性反应这些方面,迪马乔和鲍威尔都认为没有必要成为论点。而约阿斯(1996)在力图证明创造力和表现力位于普通社会学理论的中心时,他不仅与帕森斯学派对立,而且与新功能主义思想相对立。

这种评价上的众说纷纭,正是那些在社会科学界取得了经典地位的人物的命运。它意味着一个历史上的显赫位置而不是当代的霸权。当然,这样一种地位并不是帕森斯及其追随者头脑中所希望的。每一个伟大的、雄心勃勃的体系性思想家都追求其在当代的重要性,但最终,任何社会科学思想家所能达到的

只是历史上的显赫一时。在当代的研究中，今日的新功能主义是一种重要的潮流。作为新理论运动中强有力的一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它的名下还会继续出现富有创造性的、重要的社会学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在创造性的思想运动中，这种辩证法也是不能被忽视的。新功能主义的真正成功也在于超越它本身。[13]

参考文献

Alexander, J. C. 1978, Formal and substantive voluntarism in the work of Talcott Parsons: a theoretical and ideological reinterpret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 pp. 177—98.

——1979, Paradigm revision and "Parsonianism."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 pp. 343—57.

——1982—83, *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 4 vol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ed.), *Neofunctionalism*. Beverly Hills: Sage.

——1987a, The dialectic of individu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Weber's rationalization theory and beyond. In S. Whimster and S. Lash(eds), *Max Weber and Rationalit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pp. 185—206.

——1987b, Action and its environments. In J. C. Alexander et al.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89—318.

——1987c, On the centrality of the classics. In A. Giddens and J. Turner (eds), *Sociological Theory Today*, London: Macmillan, pp. 11—57.

——1987d, *Twenty Lectures: 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a, *Action and its Environments: Towards a New Synthe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b, Durkheim's problem and differentiation theory today. In J. C.

Alexander, *Action and its Environmen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49—77.

——1989, *Structure and Meaning: Relinking Classical Soci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Introduction: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ve autonomy of culture." In J. C. Alexander and S. Seidman (eds), *Culture and Society: Contemporary Deb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5—39.

——1991a, Bringing democracy back in: universalistic solidarity and the civil sphere. In C. Lemert (ed.),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Social Theory in a Changing World*, Beverly Hills: Sage, pp. 157—76.

——1991b, Must we choose between criticism and faith? Reflections on the later work of Bernard Barber. *Sociological Theory*, 9(1), pp. 124—30.

——1992a, Durkheimian sociol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today. In J. C. Alexander (ed.) *Durkheimian Sociology: Cultural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21.

——1992b, Citizen and enemy as symbolic classification: on the polarizing discourse of civil society. In M. Fournier and M. Lamont (eds), *Where Culture Talks: Exclusion and the Making of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289—308

——1992c, Shaky foundations: the presuppositions and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James Coleman's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Theory and Society*, 21, pp. 203—17.

——1992d, The fragility of progres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turn toward meaning in Eisenstadt's later work. *Acta Sociologica*, 35, pp. 85—94.

——1994,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Contemporary Socioloy*, 27, pp. 797—803.

——1995a, Modern, ante, post and neo: how intellectuals have tried to understand the "Crisis of our time." *New Left Review*, 210, pp. 63—102.

——1995b, How "national" is social theory? Citical notes on some worrying

trends in the recent theorizing of Richard Munch. *Revue suisse de sociologie*, 21(3), pp. 541—6. Expanded version in *Sociologia*, 24(2—3), pp. 120—38.

——1996, review of Giddens et al.,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3, no. 4, pp. 133—8.

——forthcoming, Sociology, theories of.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Alexander, J. C., and Colomy, P. (eds) 1990,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lexander, J. C., Giesen, B., Munch, R., and Smelser, N. (eds) 1987, *The Micro - Macro Link*.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oden, D., and Zimmerman, D. (eds) 1990, *Talk and Social Structure: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and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mbridge: Polity.

Bohanski, L. 1982, *Les cadres: la formation d'un groupe social*. Paris: Minuit.

Boltanski, L., and Thevenot L. 1991, *De la justification*. Paris: Gallimard.

Bourdieu, P. 1970, La Maison Kabyle ou le monde renversé. In J. Pouillion and P. Maranda (eds), *Echanges et Communications: Melanges offertes a Claude Levi-Strauss*. Paris and Hague: Mouton, pp. 739—58.

——1973,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n R. Brown (ed.),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London: Tavistock, pp. 71—112.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xton, W. 1985, *Talcott Parsons and the Capitalist Nation-State: Political*

Sociology as a Strategic Voc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Camic, C. 1991, Talcott Parsons before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In C. Camic(ed.), *Talcott Parsons: The Early Essay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ix—lxiix.

——1996, Alexander's antisociology. *Sociological Theory*, 14(2), pp. 172—86.

Chodorow, N. 1978,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hen, J., and Arato, A. 1992,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Boston: MIT Press.

Coleman, J.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llins, R. 1975, *Conflict Soci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6, *Weberian Sociolog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onflict theory and the advance of macro-historical sociology. In G. Ritzer (ed.), *Frontier of Social Theory: The New Synthes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68—87.

Colomy, P. 1990a, Revisions and progress in differentiation theory. In J. C. Alexander and P. Colomy (eds),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465—95.

——1990b (ed.), *Neofunctionalist Sociology*,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0c, Introduction: the neofunctionalist movement. In P. Colomy (ed.), *Neofunctionlist sociology*,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pp. xi—xlii.

——1990d, Introduction: the functionalist tradition. In P. Colomy(ed.), *Functionalist sociology*,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pp. xiii—lxii.

——1992a (ed.) , *The Dynamic of Social System*. London: Sage.

——1992b, Introduction. In P. Colomy (ed) *The Dynamic of Social System*. London: Sage, pp. 1—35.

Colomy, P. , and Brown, J. D. 1992, Elaboration, revision, polemic, and Progress in the second Chicago school. In G. A. Fine(ed.), *The Second Chicago School*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imaggio, P. J. , and Powell, W. W. 1991, Introduction. In P. J. Dimaggio and W. W. Powell(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1—40.

Dubet, F. 1994, *Sociologie de l'experience*. Paris: Seuil.

Eisenstadt, S. N. 1988, Transcendental vision, center formation, and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In L Greenfeld and M. Martin(eds), *Center: Ideas and Instit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96—109.

Elster, J. 1992, *The Cement of Society: A Study of Social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erhardt, U. 1993, *Talcott Parsons on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Adline de Gruyter.

Giddens, A. 1971,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ies*. Lonon: Polity.

Gould, M. 1981. Parsons versus Marx: an earnest warning. *Sociological Inquiry*. 51(3—4), pp. 197—218.

Habermas, J. 1973, *Theory and Practice*.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979, *Communci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1984,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I. Boston, MA: Beacon-

Press.

Hess, A. 1997, Future's past revisited: a critique of Richard Munch's attempt to nationalise social theory.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 15(1).

Holmwood, J., and Stewart, A. 1991, *Explanation and Social Theo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Holton, R J, and Turner, B. S. 1986, Against nostalgia: Talcott Parsons and sociology for the modern world. In R. J. Holton and B. S. Turner, *Talcott Parsons on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p. 207--34.

Joas, H. 1996, *The Creativity of Action*, London: Polity.

Johnson, M. M. 1988, *Strong Mothers, Weak Wives: the Search for Gender Equli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outsenoja, M. 1996, *The Calling of Sociology: Early Talcott Parsons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sciplinary Ship*. Finland; University of Lapland Press.

Levine, D. N. 1989, Parsons' Structure (and Simmel) revisited. *Sociological Theory*, 7(1), pp. 110—17.

Lipset, S. M. 1990, *Continental Divide: The Values and I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New York: Routledge.

Lockwood, D. 1992, *Solidarity and Schism: The "Problem of Disorder" in Durkheimian and Marxist Soci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uhmann, N. 1990, The paradox of system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In J. C. Alexander and P. Colomy (eds),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409—40.

Mayhew, L. 1990,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solidary public. In J. C. Alexander and P. Colomy (eds),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294—322.

1997, *The New Publi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uzelis, N. 1995, *Sociological Theory: What Went Wrong? Diagnoses and Remedies*. London: Routledge.

Munch, R. 1983,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fferentiation or interpenet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24, pp. 157—75.

——1991, American and European social theory: cultural identities and social forms of theory productio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34(1), pp. 313—35.

——1993, The contribution of German social theory to European sociology. In B. Nedelmann and P. Sztompka (eds), *Sociology in Europe: In Search of Identity*,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pp. 45—66.

——1995, Geopolitics in the guise of universalistic rhetoric. *Revue suisse de sociologie*, 21(3), pp. 547—55.

Neilson, J. K 1991, The political orientation of Talcott Parsons: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its aftermath. In R. Robertson and B. S. Turner(eds), *Talcott Parsons: Theorist of Modernity*, London: Sage.

Prager, J., and Rustin, M. (eds) 1996, *Psychoanalytic Sociology*. vols 1and 2. London: Edward Elgar Press.

Pollner, M. 1991, Left of ethnomethodolog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radical reflexiv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pp. 370—80.

Robertson, R. 1990, Globality, Global culture, and images of world order. In H. Haferkamp and N. J. Smelser(eds), *Social Change and Moderni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395—411.

Robertson, R., and Turner, B. (eds) 1991, *Talcott Parsons: Theorist of Modernity*. London: Sage.

Roth, A. L. 1995, "Men wearing masks": issues of description in the analysis of ritual. *Sociological Theory*, 13(3), pp. 301—27.

Schluchter, W. 1981, *The Rise of Western Rationlism: Max Weber's Developmental The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Rationlism, Religion, and Domination: A Weberian Perspectiv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ciortino, G. 1993, Un capitolo medito de La Struttura dell'azione sociale.

Teoria Sociologica, 1, pp. 13 –41.

Sciulli, D. 1992, *Theory of Societal Constitu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mith, P. 1994, Review of David Lockwood, *Solidarity and schism*.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3(5), pp. 758—60.

Turner, B. 1986, *Citizenship and Capital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92, Citizenship, social change, and the neofunctionalist paradigm. In P. Colomy(ed.), *The Dynamics of Social Systems*. London: Sage, pp. 214—37.

Wearne, B. C. 1989, *The Theory and Scholarship of Talcott Parsons to 195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nzel, H. 1990, *Die ordnung des Handelns: Talcott Parsons' Theorie des allgemeinen Handlungssystems*. Frankfurt: Suhrkamp.

2

传统与竞争：后实证主义知识积累观导言

（与保罗·科洛米合著）

社会学一度追求成为一种积累性的科学。社会学的实践者曾经追求发展并不断地扩展有关社会模式、社会过程及其背后的因果动力的可以被检验的知识。大约三十年前，社会学家们还坚信，这样一种科学知识的积累只要求学者能经受得住“刻苦工作”这块试金石的考验（克雷西，转引自劳布，1983；塞特贝里，1955）。这种劳动密集型努力的结果就是范式、模型、概念以及事实上有关社会生活每一个可以想像得出的方面的经验性考察的过剩。就像它所仿效的自然科学一样，社会学似乎取得了无可置疑的进步（斯庭奇库姆，1968）。

今天，对许多而且是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来说，这种进步只不过是一个幻象。上一代人对科学进步的可能性的执着信念与当代同伴们对社会科学研究最终结果的极度怀疑的对比，不仅十分明显而且富有戏剧性。怀疑主义取代了忠诚，萎靡不振、悲观主义、解体、幻灭之类的词汇使当代社会学的话语日益染上悲观的色彩（J. 特纳，1989a；B. 特纳，1989；科林斯，1986）。

解释这种变化当然很重要，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探讨能够提供一种解释的概要，它能为已有的解释做出某些补充（例如威利，1979，1985；科林斯，1986；J. 特纳，1989a；S. 特纳和 J. 特纳，25 1990）。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的主要关注点。本章并不是对社会

学正统的科学信条士气低落的一种解释，而是一种回应。我们主张，一种有效的回应要求提供一种替代性的框架来理解社会科学的性质。社会科学知识的消长必须按照一种新的、比正统做法更精细的标准来进行评估。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以一个后实证主义的(postpositivist)模型为基础来判断和解释社会学知识的进步与退步。这种模型基于对理论与事实关系的不同看法，提出了一种反直觉的假设：它假定，在评价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时，社会学传统是批判性分析的单元。在这样一个以传统为界限的框架的基础之上，我们勾勒出了社会科学发展的几种不同模式，并用一些古典和当代理论与经验互相转变的重要个案来展示我们研究方法的生命力。

社会科学中有关知识积累的理论回顾

目前，社会学被两种相反方向的有关知识消长的理论所驱动：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是“硬科学”，亦即社会学是“准自然科学”的正统观念的翻版；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像文学和人文研究一样，它不过是社会学是“软科学”一说的改写。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争论围绕着社会科学和其他学科的界限而展开。

在颇引人注目的一组文章中，杰里恩等人(杰里恩，1983；杰里恩等，1985)提出，致力于界定工作的科学家是想建立和巩固科学的积极的公共形象，但是，他们把科学和“非科学”的智力活动相对比来进行论述往往令人反感。杰里恩表明，界定工作是一种证明学科的职业权威性并获得其所需的有形资源的策略，从而得出结论，对科学和非科学所做的划分是非常偶然的，且往往反映出历史环境的变化。

杰里恩做了个比喻，认为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界线是来回

摆动的。这个比喻直接指向我们所关注的社会学目前的状况。26 但是有一点必须强调，这种摆动的界线不仅有着认识的重要性，而且有着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我们更关注前者。进而言之，相邻的边界往往是多重的而不是单一的，常常有人根据社会科学与两个或更多学科的边界来形成他们的论点。最后，界定边界的工作可以是肯定性的，也可以是否定性的。杰里恩主要关注否定性的界定工作，试图把科学从非科学中区分出来。他的工作带给我们一些启迪，特别是考虑到在社会科学中，肯定性的界定工作表明它试图把一个系列的智力活动与另一个系列有力地联系起来，杰里恩的方法也是有道理的。

《实证主义》(图尔明，1953；J. 特纳，1992)一书是社会学准自然科学观的哲学基础。直到最近，实证主义不仅为社会学中知识如何消长提供基本的理论，而且事实上，它直接地表现在所有的社会科学实践中。它的支持者试图使社会学与自然科学建立起高度的一致性，因此他们断言，即使在社会科学和硬科学中存在一种界限，这种界限也是微不足道的。社会学家被迫接受了更为成熟的科学的方法论工具和程序，并且本着一种客观的态度来考察“社会事实”。这种客观性与“硬”科学家们研究物理事实时所持有的不带偏见的客观性是一样的(涂尔干，[1894]1938)

发明“社会学”这个词的法国人孔德坚决主张把关于社会的科学与思辩哲学区分开来，认为社会学之缺乏形而上学主旨就好像自然科学缺乏形而上学主旨一样。这种被孔德称为“实证科学”的学科，完全由命题、定律和因果关系的陈述组成，解释和价值判断不会侵入它的领地。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如富克斯和特纳，1986)，试图使初出茅庐的社会学与更为成熟的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努力，部分地表明了一种明确的策略：在已确立的学

科共同体和更广泛的公众中全力谋求合法的地位和物质资源。但是"观念的"兴趣也同样很重要,而且从长远来看,这些兴趣(与马林斯 1973 相反)甚至更为重要。

在一个世纪的社会学发展过程中(艾森斯塔德和库雷拉鲁,1976;希尔斯,1970;S. 特纳和 J. 特纳,1990),这种看法以不同方式得到考察,各种观点都得到了详尽的阐述。但是,一种广义的"实证主义观"(亚历山大,1982a)继续为社会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信条,即便它还不十分清晰有力。这种见解基于一系列的假设,其今日的追随者继续以之为基础。首先它假定,在经验性的观察和非经验性的表述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漏洞。这样,理论与事实相比就有着质的不同。其次,实证主义主张概括性太强的思想命题对一种倾向于经验的学科实践没有重要意义。在其最近的发展中,这种主张认为"元理论"(metatheoretical)的探讨和争论消耗了智力的能量,而这些能量本可以在"真正的"科学工作中发挥更大的效用(参见 J. 特纳,1985,1989b;① 与瑞泽尔 1988,1990a,1990b 以及富尔曼和斯尼热克 1990 的观点不同)。第三,实证主义主张,对非经验性事物的排除是自然科学的区别性特质,因此,一种真正科学的社会学如果希望达到同等的科学高度,它就必须追随自然科学(斯庭奇库姆,1968)。第四,它主张,只有与经验性观察联系起来时,普遍理论的性质问题才能得到充分的表述。还有随之而来的一些问题,如关于社会理论的系统阐述。实证主义主张,其过程应该是从观察而来的归纳和概括,或者是运用假设进行详尽的演绎,批评性经验的证实和证

27

① J. 特纳(1990)不再那么反感元理论,提出"如果其目标是产生科学的社会学的话",那么,元理论也是有用的(第 50 页)。但是,对于按他的观点不能使社会学发展成为科学的其他形式的元理论,他仍极力批评。

伪则被奉为理论论争最终的裁决者。最后，实证主义主张科学争执是普遍的、不断发展的结构化类型(structured types)，它不存在一个逻辑的基础。

自然科学的革命性发展给予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主张以巨大的推动。在人类思想历史更早的阶段中，对自然的解释深深地植根于形而上学和思辩的主题中。在物理学之前，有自然哲学；在天文学之前，有宇宙论。正如巴恩斯和贝克尔曾经追问的(1952)，如果思考能够自然导致向理性化和实证经验主义的转向，那么，为什么不思考一下社会呢？实际上，涂尔干([1894]1938)颇有影响的方法论方案就预设这种转向已经发生了。在二十世纪，由于自然科学不断增长的权力、声望与自信，它甚至把社会科学朝这个方向推得更远。随着战后直接从自然科学中借鉴来的完善的方法论的发展，这种实证主义的梦想似乎正在成为现实(如布莱洛克，1976)。

28

但是，在最近几年中，自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发展(如图尔明，1953，1972；库恩，1970)，已日渐对这种实证主义主张提出质疑。这些广泛的思想发展，使自然科学和人文研究之间的实际联系更难保持始终一致与清晰可辨。尽管在这场反实证主义的运动中，强调的重点各有很大的不同，但在有一点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那就是科学理论和客观现实的切合比实证主义者所想像的问题要大得多。实际上，反实证主义者认为理论必然包括推测和极具争论性的阐释。这些考察强调了非经验的、概括性的因素对最受人尊敬的科学研究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对那些以硬科学为认识与合法性范例(参看古尔德纳，1970)的学科共同体(如社会学)来说，有着如此众多的派别对实证主义提出一针见血的批评，这毫不令人吃惊。如果实证主义不能完全解释自然科学中知识的增长，那么它又如何能解释在那种几乎与自

然科学的严密、精确及无人为因素无法相比的科学中的知识增长？如果实证主义不能对自然科学中的知识积累做出充分解释，那么，它的原则如何能够被社会科学实践所接受，并继续奉为有效的信条呢？

在社会学中，实证主义仍然有强有力的热情捍卫者（如J.特纳，1985，1990，1992；科林斯，1975，1988，1992），它也继续对当代社会学研究起着调整作用。但是，即便是它的捍卫者也清楚地知道，社会学对正统的实证主义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度被轻易认定的社会学研究的性质，如果不是成了十足的笑柄，也已成为怀疑的对象（J.特纳，1989a；吉登斯和特纳，1988）。

对于实证主义日益增长的怀疑，反映了当前社会学的萎靡不振，这种怀疑也应该在此背景下去理解。社会学从一个单一范式的科学向多重范式的科学的明显转型（瑞泽尔，1975），加剧了伴随着实证主义自信的消失而来的相对主义和自我怀疑。明显地互不关联的业领域的激增（J.特纳，1989a；多甘和帕尔，1989；科林斯，1986）以及理论研究和一大批各种各样的实质性领域（J.特纳，1989b，1990；B.特纳，1989）之间的明显分裂，与实证主义的联盟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这种联盟也并不稳固。该联盟以前是以功能主义理论和量化方法为特点的。 29

与实证主义相反，另外一种有关社会科学知识积累的较有影响的看法，则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持否定态度，主张社会科学与所谓的“人文科学”有一种积极的关系。尽管这一立场在整个二十世纪都可以见到，但除了德国之外，它从未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追随者构成严重的思想威胁。近年来，这一立场地位日益提高、听众日益增多的状况必须被置于实证主义走向衰落和社会学出现断裂的背景下来理解。

与孔德相对立，德国哲学家狄尔泰(1976)主张人文研究和自然科学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狄尔泰更有建设性的思想是试图在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阐释之间建立起强有力的关联。根据他所讲的阐释学的立场，社会科学由解释和描述的模型组成，在尝试进行因果关系的论述时，这些论述只能来自于社会科学家自己的主观经验世界。

按照这种观点，社会科学的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活动。社会科学的考察对象——"社会事实"——或者是精神状态，或者是与精神状态互相渗透的条件。那么，为了构建社会科学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者必须依赖他们自己的生命体验，必须依赖他们自己对其他人的理解。这样一来，不仅鼓励了观察和测量，而且鼓励了想像和思辨的思想实验。而一旦把这些社会科学的对象概念化地构建起来，就很难对从这些对象中概括出来的社会科学理论进行明确的证实或证伪；因为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和价值标准注定是不同的，在社会科学中引入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不同的个人情感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

人文研究的立场向社会知识积累的可能性提出了严重的、不可回避的挑战(弗里德里克斯，1970)。阐释学方法的支持者们主张社会研究的主要目标应该是理解(understanding)而不是解释(explanation)。不太严格的阐释学(吉登斯，1984)仍然允许普遍化，尽管它会告诫说这种普遍化比自然科学中的普遍化具有更多的根本性的不确定。而严格的阐释学则宣称，一种普遍的、客观的、概括性的科学纯粹是虚幻的，人文研究应该或局限于从道德角度进行的批评分析(古尔德纳，1970；哈恩等人，1983)，或局限于对独特的、独一无二的事件的描述(温奇，1958)。

对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的这种替代使社会科学知识积累的论题处于疑问之中。由于研究和理论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研究者的解释技巧，社会研究的动力被看成主要是个人的特性而根本未被结构化。其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庆祝主观性与相对主义（霍林格，1985）的成功，而放弃对普遍规律的研究，这些普遍规律对于有利于追求“深描”（格尔茨，1973）和道德阐释的广泛现象（弗里德里克斯，1970；哈恩等人，1983）都是适用的。我们对这种看法持有异议。

后实证主义知识积累观

尽管阐释学、人文研究的方法对正统的实证主义提出了根本的修正，但是，它们的方法依然接受了实证主义的框架，而我们认为社会科学必须谨慎对待这种框架。在哲学上（亚历山大，1990a，1992；图尔明，1972），这种道路导向一种极易受攻击的相对主义形式；在社会学上（亚历山大，1990b），它会导向对理性本身的一种危险的、削弱性的不信任。② 如果社会学要避免上述两种观点的困境，就必须提出一种既超越实证主义极端又超越反实证主义极端的替代性范式。

与上述两种方法相反，我们提出一种根本不同的模型来考察社会学知识的进步与退步。这种观点既回应了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对正统实证主义的有力批评（如库恩，1970；拉卡托斯，1968，1970；图尔明，1953），也回应了人文研究方法强加于社会知识积累的尝试上的严重限制。它指出，与人文研究不同，社会

② 这种更深刻的结果在本章的结论部分有一个简要的讨论，更详细的论述请参见科洛米和布朗（1992）。

科学知识可以增长，而且从长期来看，它已经增长了。与此同时，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前进与后退所具有的特点与传统的实证主义观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后实证主义方案基于以下四个基31 本假设：

首先，我们认为，把社会学研究假定为一项沿着科学连续体(scientific continuum)而进行的工作是有益的。这个科学连续体的一端是抽象的、概括性的、形而上学的因素，另一端则是具体的、经验性的、事实性要素(图尔明，1953；亚历山大，1982a)，而科学话语的其他要素，包括意识形态、模型、概念、定律、命题、方法论假设和观察性陈述等，则位于这两端之间。尽管这个科学连续体的整体形式可能会更突出其中某一个要素的特点，但每一个社会科学陈述都包含对科学连续体中其他各要素的性质或含蓄或明确的承认。社会科学论争的性质和类型被这些要素的不同特点所限制，推动了专业发展的探讨和论争更关注某些特殊的要素，强调某些特定的话语。

其次，构成社会学基础的这些基本要素，不能以无限变化的方式来进行系统阐述。虽然社会科学家常常会接受某种阐述，而不需要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过硬的、绝对的证据，但是，他们不接受在思想观念上缺乏证据和强有力尝试的立场。从指向普遍标准的意义上来说，这些尝试是理性的，而且它们最终必然要由开放的、自发的论争来证明(哈贝马斯，1984)。实际上，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于，重要的社会科学论争主要是关于价值判断的标准的，这些标准则是不同层次的话语所固有的(例如关于预先假设、意识形态、模型和方法的标准)。

第三——在此我们借鉴了实用主义者强调实践经验的重要性的观点(如杜威，1996[1916]，第139—51页)——在社会学思想的历史中，在每一个话语层次上，选择的可能性都受到了很大

的限制。例如,按照对人性的预先假定,社会学系的学生总是被预先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人们的行为或按照工具理性(instrumentally rational)的方式,或依据道德准则或情感需要(帕森斯,1937;伊凯,1974;亚历山大,1987a;斯庭奇库姆,1986)。意识形态话语的选择更受到历史的限制(古尔德纳,1970),但在现代,至少能看到相对来说一贯保守的自由主义话语与激进话语的论争持续进行。至于有关社会模型(参见艾森斯塔德和库雷拉鲁,1976)争论的核心,则一方面是相对的偶然性或系统一致性,另一方面是系统中的相对动态与均衡倾向的对立。阐释方法与因果方法之间的冲突已制约了普遍方法论的论争。 32

第四,从原则上讲,虽然排列在科学连续体上的不同要素之间没有一种内在的关系,但是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由于某些约定(commitments),它们可以聚集在一起。这样一来,就没有经验主义的或逻辑上强制性的理论原因把解释性方法论和这些约定结合起来,以达到对行动的非理性或非标准的理解。但是,对理论逻辑的"结构的"考虑绝不能被历史和经验的可能的"偶然性"所迷惑。在社会思想的历史中,不同的科学层次所做的约定并不是随机地相互关联的。用韦伯的一个术语来说就是,在一些理论约定之间,常常会出现"选择性亲和"(艾森斯塔德和库雷拉鲁,1976;古尔德纳,1970)。例如,社会冲突模式对激进的思想家比对保守的思想家更具吸引力,而自由主义思想家又比保守思想家更具备理性主义预先假定的特色。但是,有一种甚至更有力的偶然性因素我们必须考虑到,那就是:在不同的层次上,无论选择之间内在亲和(与选择性亲和相比)的纯粹逻辑可能性有多大,从事实践的社会科学家们通常都坚信确实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其原因就是社会科学实践在强有力的理论传统的表述中逐渐显露出来,而每一种传统都保证要使理论要素

之间的关系处于严格的界定之中（蒂尔亚基扬，1979、1986；希尔斯，1970；威利，1979；莱德曼，1983）。

我们认为，社会学的各种形式被传统所推进，这些形式一般被称为“学派”。[③] 事实上，我们将把社会学定义为一套多层次的有关社会及其组成单位的理性—实用主义话语，其话语的模式和方向则被学科的支配性传统所控制。此定义的各要素形成一个悖论，但是它们并不矛盾。传统当然是被遵循的感知和行为模式，但是传统之所以被遵循，首先并不是因为它们内在的理性，也不是因为它们有“已被证明的价值”，而是因为它们是从过去承继而来的。社会科学学派的传统状态给了它们声望与权威，而这种声望和权威又往往由于被有组织的权力和物质资源所支撑而得到了加强（马林斯，1973；富克斯和特纳，1986）。但是，这些因素并不会削弱社会科学的理论抱负，它的那些已清晰界定的论争结构，以及它超乎寻常的接近和理解社会现实的实践能力。

33

与其他传统一样，社会科学的理性运动也是由思想上的“卡里斯马”人物所奠定的，其追随者相信，他们强烈的吸引力来源于他们令人敬畏的杰出的科学才华。在一个学科的开创阶段，这些伟大的思想人物被看做是经典的奠基人（亚历山大，1987b），但后来，他们只获得了准经典的地位，而仅被简单地当做强有力的学科传统的奠基人。这种体制性因素从另一个角度表明，社会科学实践为什么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科学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对抗。社会现实从不是面对它自身的，因为感知是被传统的话语约定所传递的，社会科学研究也被一种相对标准

③ 这一部分详尽阐述了一个我们在别处已提出的观点（亚历山大和科洛米，1990b）。

的、范式化的形式所引导。社会科学家的栖居之地不必是一个单一的传统或一个完整的东西，但无论自知与否，他们必须栖居某处。

虽然传统主义意味着习惯性行为，但它并不一定意味着停滞或缺乏变化。在社会科学中，这种对于变化的开放态度被制度化标准的普遍性所强化，制度化的标准支配了非个人的理性，并反对一种传统主义回应的特殊主义（默顿，[1942]1973）。社会科学传统通过标出理论核心来界定自身，这些核心是很难变化的，但围绕核心的广大领域却不断地变化着（拉卡托斯，1968，1970；库恩，1970）。按照"理想类型"，传统的边缘领域中发生的变化可以被看成以三种方式进行：阐发（elaboration）、衍化（proliferation）和修正（revision）（瓦格纳，1984；瓦格纳和贝格尔，1985；贝格尔等，1989；亚历山大 1979；科洛米，1986，1990）。尽管这些发展的方式都把自己表现得忠实地实践了传统的约定，但在完成这项任务的创造性方面，它们却各有不同。这是因为阐发性和衍化性的社会学研究从这样一个假定出发，即原初的传统是内在一致和相对完整的，它们的目的主要在于进行细致的改进和扩大范围。修正性的工作则相反，它更强调已确立的传统的弱点，在忠实的具体阐述的外表之下，它常常会含蓄地指出那些张力，并提供一种解决方案（亚历山大，1979；科洛米，1986，1990）。

在传统的历史中，阐发、衍化与修正是周期性发生的具体阐述的方式，它们不仅发生在紧随"卡里斯马"人物奠基之后的惯例化阶段，而且也会发生在一个要保持传统完整就必然要出现强有力的改造的阶段中。正是这后一种可能性表明了理论变化的第四种理想类型。在此情况下，这些理论核心本身已经历了大量的变化，但仍未放弃它们与传统的一贯联系，因此这里产生 34

的理论活动就可以被称为重新建构(亚历山大和科洛米,1990b)。重新建构与阐发、衍化和修正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明确地承认了与传统奠基人的不同,而且它打通了与其他传统的清晰的沟通渠道。重新建构可以复兴一种理论传统,甚至能创造出一种超越其所产生的传统的发展机会(如哈贝马斯,1979)。

科学变化的影响最为深远的方式是把重新建构的冲动推至足够远,甚至把我们带回到社会学传统的循环始端,从而产生思想的"卡里斯马"奠基人。创造传统(tradition-creation)必须围绕历史上与众不同的核心组织起新的学派。创造传统的实质在于,它要从许多已经存在且常常是竞争性的思想范式中吸取要素进行综合,其目的是产生一个新的学派的理论核心。马克思从黑格尔主义、启蒙运动、法国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中吸取要素进行的重新构建,已被证明是科学变化的形式的最好例证(亚历山大,1982b)。

大家应注意不要把这些概念——阐发、衍化、修正、重新建构和创造传统看成或者代表了一个必然的历史顺序,或者是一种理论意义的标准。至于顺序,下面会给出一个重要的例外,不同类型的变化在社会学史和每个特定传统的历史过程中进进出出、迂回前进。说到意义,社会科学中大多数最伟大的思想从来没有完成从重新建构到创造传统的转变,而许多想完成这种转变的人反而变得更加糟糕,冯·维泽的著作已被人们长时间地遗忘,而葛兰西、卢卡奇、曼海姆和莫斯的著作却仍继续被人专心地探究。

传统也能被破坏(即解构传统,tradition-deconstruction),这倒不是因为在狭义上证伪了核心的与边缘的约定。它是由于从科学共同体的角度看,这些约定已失去了合法性。合法性的消失则会导致对核心约定的不信任。只有在核心约定被抛弃之

后，才能理解为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证伪。即使在这种状况下，传统也并未彻底消失而只是变成了潜在的，它们再次复兴的可能性总是存在（参见艾森斯塔德和库雷拉鲁，1976）。

阐发、衍化、修正、重新建构、创造传统以及解构传统描绘出了原初的传统与随后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但必须强调它们并未描绘出真正的科学发展的程度。比如阐发——套用格尔茨（1973）民族志的标准——就可深可浅。传统可以被我们已指出的这些理论变化的过程所丰富和加强，但一旦剥夺了传统中最强大的学术因素，掠去了它们最为有力的思想支撑物，那么，传统也会枯竭和简单化。如果说社会科学的变化可以是一种进步，那么，它当然也可以是一种退步。

从长期来看，传统在学科共同体中动态的变化（参见希尔斯，1970）——它的理论地位上下起伏的命运——既不是由各种立场的理论效果和复杂性所决定，也不是由传统的客观经验领域所决定。一个学科中"科学敏感性"（scientific sensibility）（亚历山大，1986）的转变，往往是由重要的社会乃至全球的发展所促成的（例如，反越战运动、民权运动和东欧的民主化进程）。这些转变在根底上提出了不同的问题，它们重视不同的话语模式的创造。实际上，通常只有在对新方法做出高度概括性的话语约定（如古尔德纳，1970）后，才会出现理论的复杂性增加和经验领域的扩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能更少提到社会科学"发展"而不是社会科学"运动"。学科（与默顿 1968 相对）不能被理解为主要由经验的考察对象所定义的特质所组成（即默顿中层理论中的领域，如越轨、政治社会学和分层制）。一个学科的深层结构（图尔明，1972），由经验对象、发展的传统和新的学科运动之间的联系所产生的网络及其全部的文献所构成。

传统和竞争

在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与减少中，竞争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批评性角色。实际上，根据我们的模型，社会科学的发展既不是简单地出于理解经验现实的需要，也不是单凭经验知识的扩展或概念领域的扩大就可以衡量的。社会科学变化的主要动力是实用主义的——传统内部与传统之间的冲突和竞争。衡量科学发展主要的标准是由传统之间的关系和特定的传统本身内在的路标所确立的 人们不说理论或经验本身进步了，而必须说，针对其自己的传统或与之竞争的传统，取得了一种相对的解释性和理论上的成功(B.特纳，1989)。

36

每一种知识积累与减少的理想类型的模式都是被竞争所驱动的。每一种科学陈述在某些问题上，都或含蓄或明确地声称比以前的研究更深刻、更令人信服。因此，潜在贡献的大小总是部分地与以前的尝试进行比较的结果。

竞争既在话语的类型中产生，也在传统内部和传统之间产生。在普遍性话语(generalized discourse)的层面上，竞争通过一系列以传统为中心的论争进行。这些论争涉及传统残留的范畴、它的分析和经验的广度、解释典型事例时的理论敏锐度、公开或含蓄的意识形态立场、对时代中支配性论题和社会运动的反应、通过概念性主题所表现出的逻辑一致性或一致性的缺乏，以及它在经验考察上的作用。在研究方案的层面上，则围绕着与试图解释学科关注的经验结构和过程的对手们组织竞争。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当一种传统的看法被认为较具有可比性的其他学派的研究相对出色时，就认为这一传统进步了。

在任何特定的时代，传统竞争的领域都是按等级制组成的。[1] 传统被不公平地加以比较，一个小小的子传统有时会得到很高的声望。在学术判断力的断断续续的展示中，这样的承认只是偶尔为之。那些与显赫传统相联系者优势自然会增多（如更多的出版机会，出版物有更多的读者），这种优势无疑能促进第一流研究的出现。但与此同时，越是有名的学派，它的研究成果就越易于受到严格的仔细检查。某种传统特别杰出的学科评价会鼓励那些竞争性的学派，以向支配性的方法提出批评性替代物的方式来构建它们的探讨。而那些较少被看重的范式的支持者，则被迫突出它们与占霸权地位的范式相对抗的理论和经验力量，来显示其传统的相对价值。近来对芝加哥学派的"第二代"（即大多是 1945—60 年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获得博士学位的社会学家）的贡献的讨论，就表明芝加哥社会学学派的普遍性话语及其研究方案都代表了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功能主义传统的批评性回应（科洛米和布朗，1992）。他们的普遍性话语和研究方案包括角色理论、越轨、社会问题、职业、正式组织、集体行为以及社会运动等。

37

当传统受到挑战，特别是这种挑战被视为合法的且值得赞赏时，传统的支持者被迫做出回应。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往往会采取一种保守狭隘的策略，只提出一些偶然的、草率的辩驳，或者实际上只把外部的批评视为未成气候和毫无根据的。从短期来看，保守狭隘的策略可以维持稳定和思想的某种进步，这主要是通过阐发和衍化来实现的。但从长期来看，保守狭隘易于

[1] 进一步说，竞争受到传统中的物质和符号资源分布不平等的影响，而这种竞争决定着社会学话语的产生与接受。这些论题科洛米和布朗（1992）有详细的考察。

从学科共同体的角度取消该传统的合法性，并最终导致它的崩溃。

竞争激励着不完全或刚形成的传统设计出更全面的规划，那些仍未设计出补充性普遍化话语的研究方案非常容易受到元理论上的责难。批评它作为前提的那些不明确也常常是限制性的假设。因为尽管"地位获得"(status attainment)的研究方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验性进展，但由于它没能发展出一种明晰的元理论合理性，导致有些人指责它为反理论的(如布洛维，1977；科塞，1975)，另一些人则提出引发这个研究方案的普遍性话语问题已陷入一场"地位获得"的研究危机(科尔克拉夫和霍兰，1983)。[5] 对这种指责的最有效反击，当然是清晰有力地捍卫该研究方案的分析根据。类似地，批评家也常常攻击那些刚刚形成的传统强调普遍性话语，而明显地忽视了经验研究。比如吉登斯分析性的、颇有新意而且精致复杂的结构化理论也被非难为没有设计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研究方案(格雷格森，1989；穆勒，1990)。同样地，最可行的反驳是在一些具体的研究领域提出研究方案，以此来显示该传统在经验方面富有成效。而且，如果这种新的研究方案能证明它比这个长期存在的传统的现有方案都要优越的话，这样的反驳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如萨克斯(1983)就指责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韦伯学派的人，说他们继续依赖于话语攻击的遗产，这种话语攻击针对的是早期的功能主义者和互动理论家对待职业的方式，而他们却不能设计出一套他们自己的、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案。对已确立的传统来说，竞争对手的

38

⑤ 霍兰(1978)提出，"地位获得"的研究方案是非理论的。他坚决主张这种研究方案的前提是一个功能主义的社会结构概念，认为这一前提在分析上存在局限性，因此在话语领域中易受到批评。

批评和替代性的解释模型组成了一个概念性的研究程式,而成为焦点的学派则可以通过对普遍性话语和研究方案两方面的阐发、衍化、修正和/或重新建构来完成这个程式。例如,近来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案对社会变迁的修正,就自觉地把自己看做是对理论层面的批评的反驳(科洛米,1986;亚历山大和科洛米,1990a)。

因为已确立的传统不断地变化,新的学派又不断地出现,连结与区分范式的边界往往易于被重新估价。传统之间的界定工作——无论是在符号互动论与常人方法学之间(齐默尔曼和维德尔,1970;加朗和克莱因曼,1983),还是在新功能主义与结构化理论之间(穆勒,1990),或是在女性主义与帕森斯理论之间(约翰逊,1988,1989),或是在马克思主义与韦伯学派的理论之间(安东尼奥和格拉斯曼,1985;威利,1987),以及在后现代主义和批评理论之间(哈贝马斯,1981,1987;凯尔纳,1989)——无论这种传统之间的界定工作属于哪一种,它总是典型地被置于竞争性学派之间的异同讨论中,并且常常达到了普遍性话语的水平。[6] 而且,这些传统之间的界定工作,可以阐明和巩固现有的划分,在一个或多个传统的核心思想中引入替代物,同时/或者,在曾经认为是基本上不可调和的方法之间,通过突出以前未被承认的共性而奠定对可变的领域进行综合的基础。

---

[6] 传统间的界定工作也在研究方案的层面上出现。如汉德尔(1979)就曾把功能主义和互动理论在社会角色的结构和动力方面的探讨进行了综合。但这一研究和其他许多希望整合彼此竞争的研究方案的尝试一样,是通过详细补充每个研究方案的普遍性话语逻辑来完成其综合的。类似地,试图突出竞争性研究方案的不同点——如科林斯(1971)比较了功能主义和冲突理论关于教育的研究——指向每一个研究方案所基于的假设的不同。关键在于普遍性话语明显地包括了大多数传统间的界定工作,甚至当特殊的研究方案之间的联系与差异是主要的关注点时也是如此。

如上所述，传统并不是固步自封的，传统之间的竞争在普遍性话语和研究方案两个层次上都会产生一些趋同。当互相竞争的学派的成员提出一个相似的问题，并依靠同样的思想资源来解决它时，其理论化和研究在继续保持差异的同时，彼此也常常显示出一致来，例如瑞泽尔(1990c)就突出了许多相互竞争的学者在研究方法上的共同主题，发现在微观—宏观的问题上，有一种朝着综合方向发展的扩散性的、穿越传统的运动。共性也能在"征用"(expropriation)的情况下出现。当一种特定方法的支持者公开地"征用"竞争对手发展出的观点以扩展本派的传统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当然，这种"征用"常常会对这个观点做出重大的改变。比如科林斯(1985，1988)就根据新功能主义"多维性"(multidimensionality)的观点提出了一种范围更广泛的冲突理论。

39

随着时间的变化，竞争使学科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已确立的、颇受重视的传统备受指责，有时甚至消失了；而地位较低的学派则取得了显赫地位，新的范式不断出现。这种更替反映了学派不同的反应能力，这是一种对竞争性的传统提出的批评与全球、全社会性转换引起的学科敏感性的变化做出令人信服的反应的能力。对这些不断出现的挑战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困难当然很大，因此大多数传统经历过危机甚或产生不久就期满卸任毫不令人吃惊。为了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传统必须发生变化，而那些持续了一代以上的传统总是经历了实质性的修正与重新建构。安东尼奥(1990)指出，马克思主义曾经周期性地宣布思想的破产，结果却使自己重组更新，使自己在学科舞台上涅槃新生。我们要补充的只是，安东尼奥指出的情况适用于每一个不朽的社会科学传统。

迄今为止的讨论都基于每一个传统仿佛是一个思想的共识

共同体(consensual community)。通过定义，一个学派的追随者中具有了相当多的共识，但这并不能阻碍严重分歧的产生。事实上，大多数学派包含两个或更多的传统的分支[7]，虽然这些分支隶属于同样的基础性框架，并宣誓对同样的经典先驱(们)效忠，但在科学连续体的一个或更多层次上，它们仍然会做出根本不同的约定。个人的思考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否能得到资源，如稳定的工作、学生、资金以及出版渠道，也依然会有强有力的实际作用。产生分支的错误路线和以前支持这些分支的思想领域，最容易被理解为在有关学派的普遍性话语和研究方案的问题上抱有根本的分歧。例如梅尔策和彼得拉斯(梅尔策和彼得拉斯，1970；梅尔策等，1975；布班，1986；雷诺兹，1990)坚持，尽管(老)爱荷华和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论在社会行动、秩序方面有许多共同的前提假设，并都公认米德是该学派的奠基人，但是它们在方法论、决定论以及自我的性质等前提上的冲突，还是引起了不同的传统分支的形成。 40

事实上，每一个不朽的传统都会产生竞争性的传统分支，一个学派持续的时间越长，它产生的分支就越多。也许没有一个社会科学传统能够声称比马克思主义还长寿，也几乎没有一个传统产生了像它那么多的分支，其分支的不同变体已几乎遍及了科学连续体上的每一点(如亚历山大，1982b，第328—70页；博特莫尔，1975，1978，1988；博特莫尔和古德，1978；安德森，1976，1983；安东尼奥，1990；阿伦森，1985)。

传统的分支之间的关系总是竞争性的，但这种竞争从友好

⑦ 传统的分支的说法来自布歇和斯特劳斯(1961)对专业分支的探讨。他们的分析突出了专业中的多样性与冲突，并指出分支之间的竞争是专业共同体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的、互相丰富的形式到颇具分裂性的形式都存在，这种分裂性的形式会陷入充满仇恨的公开决裂，甚至形成极端对立的分支。但即便是后一种情况，分支之间的竞争也符合最有活力的学术交流模式，会对每一种类型的知识积累做出重要的贡献。这是因为所有的分支都很熟悉传统的普遍性话语和研究方案，都熟知该学派在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上的弱点，争论者可以做出敏锐的批评，回答也是同样的机敏。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分支的追随者会采用保守的策略来回应别人的挑战，但是在竞争性的分支之间甚至比竞争性的传统之间更难维持这种保守狭隘。

在传统的分支中，按等级来组织学科领域的倾向也再次出现了。根据一个学派中竞争性分支数量的多少，倾向于把一个或两个分支置于明星的地位，而把其他的分支放在不起眼的位置上。这种令人反感的划分把思想论证的重担交给了后一个阵营。反抗性的分支为了展示它们相对杰出的科学才华，可能会强调它们的贡献如何有助于解释那些更为巩固的分支不能解释的异常情况。

随后分裂成互相竞争的派系的传统的那些奠基人通常与该学派最为卓越的分支相连。只要这位奠基人仍然可以创造，挑战者就不大可能取代他或她的分支所具有的特权地位。[8] 成功的挑战性分支一般出现在这样的时候：或是奠基人去世之后，或在学科敏感性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之时。

作为一个整体，学科共同体倾向于尽量减少竞争性分支之间的差别，把一种特殊的方法看做单一的、或多或少相连贯的整41 体。梅纳德和克莱曼(1991)指出，尽管常人方法学中有些尖锐

⑧ 当一个分裂后的分支团体平等地(或接近平等地)与奠基人竞争时，这通常是因为反抗的分支本身已围绕着一个思想上的卡里斯马型挑战者组织起来了。

的冲突，评论者总是把它看做一个统一的观点。除了思想的共性和私人的关系可能使竞争性分支的信徒联合起来以外，这样的学科观念也产生了一种外在的压力，使他们有种共命运的感觉，从而鼓励了各种形式的与更大的学科相对抗的所谓传统团队工作（戈夫曼，1959）的出现。这种团队工作表现为形成学术组织、促成官方认可传统的重要领域、投身于集体出版的冒险事业以及通过反对来自竞争性传统的信徒的批评来捍卫分支的研究。

最后，必须认识到，尽管竞争产生了胜负双方[⑩]，但对知识进步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确实可靠的机制。学派内部和学派之间的竞争既是一个社会学的过程也是一个认识论的过程，推动它的实际动力可能会妨碍真正的知识积累。坦率地说，社会科学中获胜的传统或其分支并不总是提出了最好的论点。这种动态的方式有时明显地包括进了新传统的迅速走红。流行的学派也不会免于批评——学术团体中充满了批评家，但至少从短期来看，对新方法的批评给学科共同体对它的评价造成的冲击力很小。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认为失败的传统或其分支在提出可靠的论点方面就进步最小。观点之间的竞争的批评性效果被大大地低估了，如同对研究方案中的工作起激励和构架作用的普遍性话语的作用也被低估了一样。

---

⑩　竞争也会产生僵局。通过关注彼此竞争的研究方案，瓦格纳（1984）指出，由于竞争者在以下问题上持有异议：(a)评估竞争性理论的适当标准；(b)如何运用那些认为是适当的标准；(c)现有数据的意义，以及(d)公认有意义的数据该如何解释。同时，因为对于竞争性理论的比较倾向于退化为无法解决的元理论论争，因此，"竞争并不是一种很有效的理论增长的形式"（第75页）。必须指出，在随后的著作中，瓦格纳系统地做了更全面的论述，主张在争论性的理论研究方案的背景之下，竞争可以使社会科学知识得到发展（瓦格纳和贝格尔，1985；瓦格纳，1984，第104—105页）。

一旦社会科学再次成为合法的公共活动，这场信任危机——其实质不亚于对理性自身的信任的危机（亚历山大，1992）——就必须得到解决。我们的看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实际上在社会科学中，进步存在一种可靠的认识论和道德基础。但是，要坚持这种有关进步的实质性观点，实证主义必须从根本上加以重新建构，用一种新的社会科学增长模型取而代之。 42

参考文献

Alexander, J. C. 1979. Paradigm revision and "Parsonianism."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 pp. 343—57.

——1982a, *Positivism, Presuppositions, and Current Controvers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b. *The Antinomies of Classical Thought: Marx and Durkhei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Science, sense, and sensibility. *Theory and Society*, 15, pp. 443—63.

——1987a. Action and its environments. In J. C. Alexander, B. Giesen, R. Munch, and N. J. Smelser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39—318.

——1987b, On the centrality of the classics. In A. Giddens and J. Turner (eds), *Social Theory Today*, London: Polity Press, pp. 11—57.

——1990a. Beyond the epistemological dilemma: gener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mode. *Sociological Forum*, 5(4), pp. 531—44.

——1990b, Between progress and apocalypse: social theory and the dream of reas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J. Alexander and P. Sztompka (eds), *Rethinking Progress*, London: Unwin Hyman, pp. 15—38.

——1992, General theory in the postpositivist mode: the "epistemological dilemma" and the search for present reason, In S. Seidman and D. Wagner (eds), *Postmodernism and General Social Theory*, New York: Basil Black

well, pp. 322—67.

Alexander, J. C. , and Colomy, P. (eds) 1990a,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b, Neofunctionalism today: re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tradition. In G. Ritzer (ed.), *Frontiers of Social Theory: The New Synthes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33—67.

Anderson, P. 1976,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LB.

—— 1983, *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Verso.

Antonio, R. J. 1990, The decline of the grand narrative of emancipatory modernity: crisis or renewal in neo-Marxian theory. In G. Ritzer (ed.) *Frontiers of Social Theory: The New Synthes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86—116.

Antonio, R. J. , and Glassman, R. M. (eds) 1985, *A Weber-Marx Dialogue*.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Aronson, R. 1985,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swer to Marxism's crisis. *New Left Review* 152, pp. 74—94.

Barnes, H. E. , and Becker, H. 1952, *Social Thought from Lore to Science*, 2nd edn. Washington, DC: Harran Press.

Berger, J. , Wagner, D. G. , and Zelditch, M. Jr. 1989, Theory growth, social processes and metatheory. In J. Turner (ed.), *Theory Building in Sociology*, Newbury Park, CA: Sage, pp. 19—42.

Blalock, H. 1976, Implicit theories underlying macro-level data analysis: Measurement errors and omitted variables. In T. Bottomore and R. Nisbet (eds), *New Directions in Sociology*, Newton Abbot: David & Charles, pp. 76—100.

Bottomore, T. 1975, *Marxist Sociology*,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78, Marxism and sociology. In T. Bottomore and R. Nisbet (eds), *A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 New York: Basic Books, pp. 118—48.

——(ed.) 1988, *Interpretations of Marx*. Oxford: Basil Blackwell.

Bottomore, T., and Goode, P. (eds) 1978, *Austro-Marxism*. Oxford: Clarendon.

Buban, S. L. 1986, Studying social process: the Chicago and Iowa schools revisited.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2(Suppl.), pp. 25—38.

Bucher, R. and Strauss, A. 1961, Professions in proc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pp. 325—34.

Buroway, M. 1977, Social structure, homogeniz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status attai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pp. 618—29.

Colclough, G., and Horan, P. M. 1983, The status attainment paradigm: an application of a Kuhnian perspective.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4, pp. 25—42.

Collins, R. 1971, Functional and conflict theories of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 pp. 1002—19.

——1975, *Conflict Soci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5, Jeffrey Alexander and the search for multi dimensional theory. *Theory and Society*, 14, pp. 877—92.

——1986, Is 1980s sociology in the doldrum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pp. 1336—51.

——1988, *Theore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2, The confusion of the modes of sociology. In S. Seidman and D. Wagner (eds), *Postmodern and General Social Theory*,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pp. 179—98.

Colomy, P. 1986,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functionalist approach to change. *Sociological Focus*, 19, pp. 139—58.

——1990, Revisions and progress in differentiation theory. In J. C. Alexander and P. Colomy (eds)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465—95.

Colomy, P., and Brown, J. D. 1992, Elaboration, revision, polemic, and

progress in the Second Chicago School. In G. A. Fine (ed.), *The Second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7—81.

Coser, L. A. 1975, Presidential address: two methods in search of a subst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0, pp. 691—700.

Dewey, J. 1996[1916],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Dilthey, W. 1976,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uman study. In H. P. Richman (ed.), *Dilthey: Selected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59–67.

Dogan M. and Pahre, R. 1989, Fragmentation and recombin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4, pp. 1—18.

Durkheim, E 1938[1894],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New York: Free Press.

Eisenstadt, S. N. and Curelaru, M. 1976, *The Forms of Sociology: Paradigms and Crises*. New York: John Wiley.

Ekeh, P. K. 1974, *Social Exchange Theory: The Two Tradi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riedrichs, R. W. 1970, *A Sociology of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Fuchs, S. and Turner, J. H. 1986, What makes a science mature? Organization control in scientific produc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4, pp. 143—50.

Fuhrman, E. and Snizek, W. 1990, Neither proscience nor antiscience: metasociology as dialogue, *Sociological Forum*, 5, pp. 17—31.

Gallant, M. J. and Kleinman, S. 1983,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versus ethnomethodology. *Symbolic Interaction*, 6, pp. 1—18.

Geertz, C. 1973, 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 In C.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pp. 3—30.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ies*. Oxford: Polity Press.

Giddens, A. and J. Turner, 1988, Introduction. In A. Giddens and J. Turner (eds), *Social Theory Today*, Oxford : Polity Press, pp. 1—10.

Gieryn, T. F. 1983, Boundary-work and the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 : strains and interests in professional ideologies of scientis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pp. 781—95.

Gieryn T. F., Bevin G. M., and Zehr, S. C. 1985, Profess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public science in the creation/evolution tria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 pp. 392—409.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New York: Doubleday.

Gouldner, A. 1970,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Gregson, N. 1989, On the (ir)relevance of structuration theory to empirical research. In D. Held and J. B. Thompson (eds) *Social Theory of Modern Societies: Anthony Giddens and His Cr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35—48.

Haan, N., Bellah, R. N., Rabinow, P., and Sullivan, W. N. 1983, *Social Science as Moral Inqui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abermas J. 1979, Toward the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J. Habermas (ed.),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pp. 130—77.

——1981, 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 *New German Critique*, 22, pp 3--14.

——1984,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Boston : Beacon Press.

——1987,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A : MIT Press.

Handel, W. 1979, Normative expectations and the emergence of meaning as solutions to problems : convergence of structural and interactionist view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 pp. 855--81.

Hollinger, R. (ed.) 1985, *Hermeneutics and Practice*, South Bend, IN: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

Horan, P. M. 1988, Is status attainment researcher atheorctica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 pp. 534—41.

Johnson, M. M., *Strong Mothers, Weak Wiv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Feminism and the theories of Talcott Parsons. In R. Wallace (ed.), *Feminism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Newbury Park, CA: Sage, pp. 101—18.

Kellner. D. 1989, *Critical Theory, Marxism,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and Baltimore: Polity Press an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0, The postmodern turn. In G. Ritzer (ed.), *Frontiers of Social Theory: The New Synthes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255—86.

Kuhn, T.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atos, I. 1968, Criticism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s.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69, pp. 149—86.

—— 1970, Fa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s. In I. Lakatos and A. Musgrave (ed.),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91—196.

Laub, J. L. 1983, Interview with Donald R. Cressey. In J. L. Laub, *Criminology in the Making*, Bo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p. 131—65.

Maynard, D. W., and Clayman, S. E. 1991, The diversity of ethnomethod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 pp. 385—419.

Meltxer, B. N. and Petras, J. W. 1970, The Chicago and Iowa schools of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In T. Shibutani(ed.), *Human Nature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p. 3—17.

Meltzer, B. N., Petras, J. W., and Reynolds, L. T. 1975, *Symbolic In-*

teractionism : Genesis, Varieties, and Critic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Merton, R. K. 1968. On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 In R.K. Mertan (ed.) .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enlarged edn.). New York: Free press, pp. 39—72.

——1973[1942], 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science. In N W. Storer (ed.),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267—78.

Muller, H. 1990, Neofunctionalism or structuration theo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Madrid, Spain, July 11

Mullins, N. 1973, *Theories and Theory Group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olog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3, Theories and theory groups revisited. *Sociological Theory*, 1, pp. 319—37.

Parsons, T. 1937.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Reynolds, L. T. 1990, *Interactionism: Exposition and Critique*. Dix Hills, NY : General Hall.

Ritzer, G. 1975, *Sociology : A Multiple Paradigm Science*. Boston: Allyn & Bacon.

——1988, Sociological metatheory : a defense of a subfield by a delineation of its parameters. *Sociological Theory*, 6, pp. 187—200.

——1990a, (ed.), *Frontiers of Social Theory : The New Synthes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b, Metatheorizing in sociology. *Sociological Forum*, 5, pp.3—15.

——1990c, Micro-macro linkage in sociological theory: applying a metatheoretical tool. In G. Ritzer (ed.), *Frontiers of Social Theory: The New Synthes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347—70.

Saks, M. 1983, Removing the blinkers? A critique of recent contributions to

the sociology of professions. *Sociological Review*, 31, pp. 1—21.

Seidman, S. 1983, *Liber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Social The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hils, E. 1970, Tradition, ecolog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history of sociology. *Daedalus*, 99, pp. 760—825.

Stinchcombe, A. L. 1968, *Constructing Social Theories*. New York :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6, Reason and rationality. *Sociological Theory*, 4, Pp. 151—66.

Tiryakian, E. A. 1979, The significance of school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 ciology. In W. E. Snizek, E. R. Fuhrman, and M.K. Miller(eds),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Westport ,CT: Greenwood. pp. 211—23.

——1986, Hegemonic schoo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the discipline, In R. Monk(ed.), *Structures of Knowing*,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pp. 417—41.

Toulmin, S. 1953,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Human Understanding*, vol. 1:The Collective Use and Evolution of Concep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urner,B. 1989, Some reflections on cumulative theorizing in sociology. In J. H . Turner (ed.). *Theory Building in Sociology*, Newbury Park, CA: Sage, pp. 131—47.

Turner, J. H. 1985, In defense of positivism. *Sociological Theory*, 3, pp. 24—30.

——1989a, The disintegration of American sociolog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2, pp. 419—33.

——1989b, Can sociology be a cumulative science? In J. H. Turner(ed.), *Theory Building in Sociology*, Newbury Park, CA : Sage, pp. 8—18.

——1990, The misuse and use of metatheory. *Sociological Forum*, 5, pp. 37—53.

——1991, *The Structure of Sociological Theory*, 5th edn. Belmont, CA: Wadsworth.

——1992, The promise of positivism. In S. Seidman and D. Wagner(eds), *Postmodernism and General Social Theory*,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pp. 101—53.

Turner, S. P. 1988, The strange life and hard times of the concept of general theory in sociology: a short history of hop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lbany Conference on General Social Theory and its Critics: Contemporary Debates. Albany NY, April 15 and 16.

Turner, S. P., and Turner, J. H. 1990, *The Impossible Science: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American Sociology*. Newbury Park, CA: Sage.

Wagner, D. G. 1984, *The Growth of Sociological Theori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Wagner, D. G., and Berger, J. 1985, Do sociological theories grow?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 pp. 697—728.

Wiley, N, 1979, The rise and fall of dominating theories in American sociology. In W. E. Snizek, E. R. Fuhrman, and M. K. Miller (eds),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Westport, CT: Greenwood, pp. 47—79.

——1985, The current interregnum in American sociology. *Social Research*, 51, pp. 179—207.

——(ed.) 1987, *The Marx-Weber Debate*. Newbury Park, CA: S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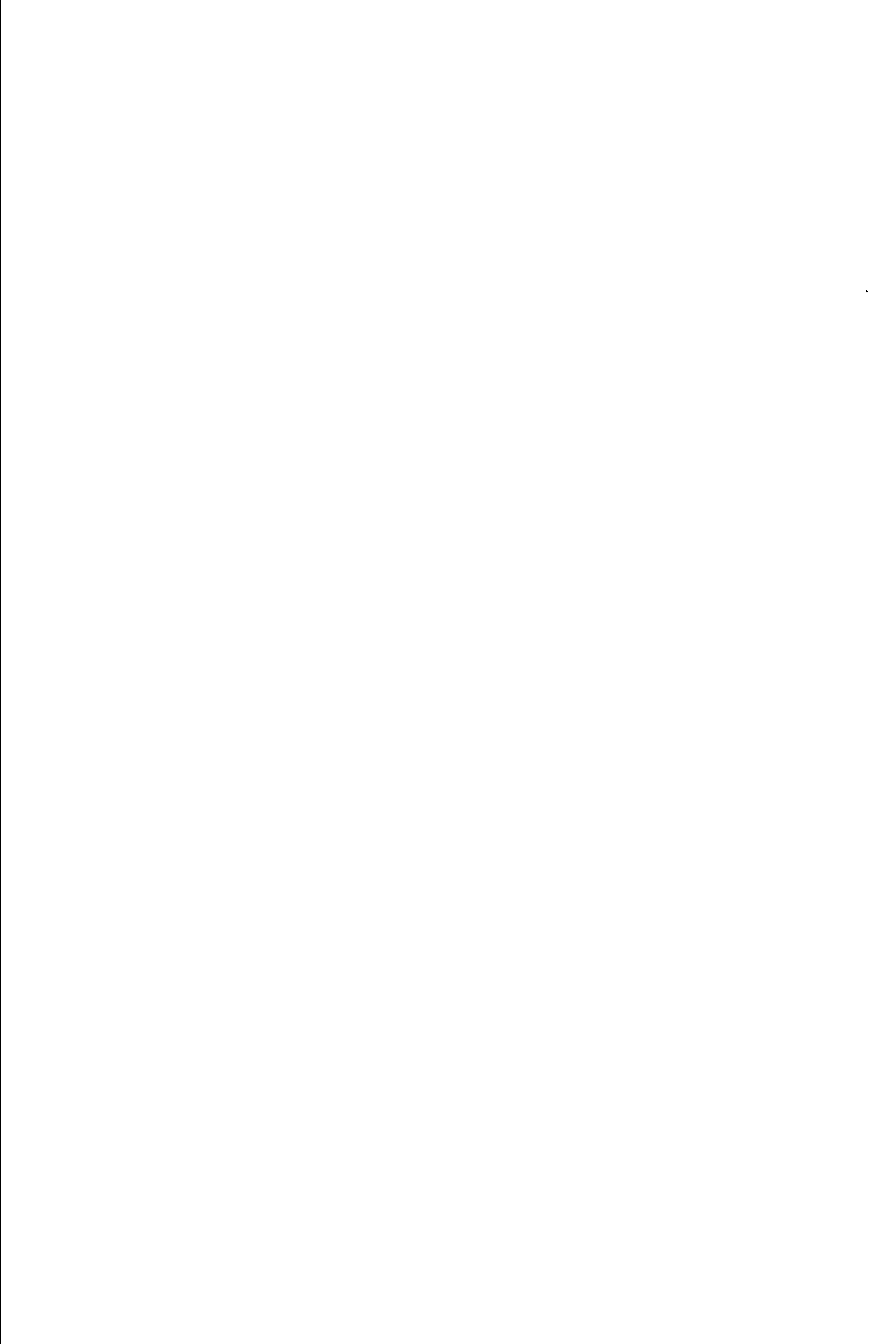
Winch, P. 1958, *The Idea of Social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Zetterberg, H. 1955, *On Theory and Verification in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Zimmerman, D. H., and L. Wieder. 1970, Ethnomethod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order. Comment on Denzin. In J. Douglas(ed.), *Understanding Everyday Life*, Chicago: Aldine, pp. 287—95.

二

再造帕森斯：重建他的传统



3

今日新功能主义：重建一种理论传统

（与保罗·科洛米合著）

1979年，亚历山大承认，“尽管帕森斯对社会学传统产生了不朽的影响，但现在就决定他的理论遗产的最终命运还为时过早”，似乎存在一种可能，即“帕森斯的综合将彻底崩溃”，但也有另一种可能，有一天会出现一种“定义更为自由的、更少派系的功能主义理论”（亚历山大，1979a，第355页）。在本章中，我们将试图表明，事实上，恰恰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恰恰是这种出现新的功能主义的可能性已经成为现实。

当1982年《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的首卷开始出版时（亚历山大，1982a，1982b，1983a，1983b），它并未受到一致的称赞，怀疑、惊愕甚至愤怒都明显地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者、人道主义者、构成派成员（constructivist）、实证主义理论家，乃至于一位较年长的帕森斯派理论家都写出了否定性的评论，警告同行远离这种他们认为是倒退性的发展。这些批评家都同意一种观点，即《社会学的理论逻辑》中的帕森斯基础，代表了过去的遗留物，而不是代表了当代社会学思想的新发展。

这些最初的反应源于对一种理论倾向的自我理解，这种理论倾向形成于一场反结构功能思想的斗争中。实证主义、冲突理论、马克思主义、交换理论、符号互动论、现象学都曾经是帕森斯理论大厦的顽强挑战者。到1980年，可以这样说——略带些

夸张——它们是胜利者。它们不仅仅是挑战者，而且是新的、内
53 部已经分化了的理论创建中的主导者。确实，如果社会学的进步还有意义的话，帕森斯的方法就不能复兴。但是，恰恰是这些观点存在的理由，决定了不能进行这样的取舍。

在1988年1月号的《当代社会学》上，奥鲁把他所评论的著作描述为具有一种"对帕森斯社会学的热情的重新评价"。他提出了一种角度来评论这些著作，而这种角度恰恰指出了这些著作的存在对社会科学发展的线性观点提出了质疑。

> 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希望有关社会的理论以一种线性的方式发展，每一种理论以另一种理论为基础。但更多的时候，我们观察到的则是一种循环的模式。按照这种循环的模式，不同学派的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轮流支配着我们的注意力。各种理论传统中的领导人物也遵循这同一模式。（奥鲁，1988，第155页）

只有指出了一种更具循环性的模式的正确性之后，奥鲁才能做出结论，"帕森斯思想的复兴是八十年代社会学有区别性的特质之一"。

如果奥鲁关于帕森斯思想复兴的令人瞩目的重要性的说法是对的——我们认为他确实是对的，那么，在过去的五六年间，社会学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现在回想起来，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社会学的理论逻辑》并不是回应了反帕森斯地震的最后余震。事实上，正如本章后面将要指出的，它根本不是要复兴早期的、正统的帕森斯理论，与其说它是一种对帕森斯定向的中心信条的挑战，不如说它是以一种激进的、后帕森斯的方式对它进行修正的尝试。这样，我们不如把它看做一个前震，一

个即将发生的事件的预兆。现在想来，《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的出现一点也不奇怪。事实上，前一年，哈贝马斯以一种颇为类似的方式，直截了当地要求恢复帕森斯理论的合法性，而蒙克则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十分有力的系列文章。[①]

当亚历山大(1985a)随后引入“新功能主义”这一术语时，其目的旨在强调连续性与内在的批评性这种双重性。这种强调可以从他与新马克思主义所做的类比中揭示出来。当前的帕森斯式社会学与早期正统的帕森斯的关系就好像新马克思主义与它的正统的早期变体的关系一样。新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综合二十世纪社会思想最重要的进展，来克服其早期的机械与僵化。新功能主义与那些挑战早期帕森斯理论的传统之间的关系，就与之基本相同。 54

公开主张帕森斯传统持续的生命力再一次导致了明显的复杂反应。在《脚注》(*Footnotes*)杂志上，政界元老佩奇(1985)就有关功能主义复苏的危险写了一封公开信警告他的同事。一个年轻的理论家卡米克(1986)在他对《新功能主义》的评论中再次向读者保证，这些尝试复兴的人没有从对帕森斯的批评中吸取什么教训，在他们的理论中，人们找不到什么新东西。当代另一个理论家瑞泽尔(1985)强调了这种怀疑，但也提出愿意再等等看。

今天，虽然对新功能主义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的根本怀疑并没有消失，但学科界已渐渐达成协议，承认社会学舞台上已出现了一些新的东西。奥鲁的观察证实了这种观点。吉登斯和特纳(1987，第3

① 当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第二卷译成英文出版时(1987)，他与帕森斯相遭遇的严肃性明显地表现出来。事实上，我们主张，可以把哈贝马斯贯穿这两卷书的框架看作是帕森斯概念的新马克思主义版本。

页)在《今日社会理论》一书的序言中,也论及帕森斯思想近来“重要的复兴”。当代社会学理论的教科书(如瑞泽尔,1988;科林斯,1988a)也做了改动,以反映出理论界的这种变化。[2]

在二十世纪里,新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和同情者常常会这样问:“马克思主义者会怎么看待它呢?”这个问题反映出批评的范围已经背离了原初的形式。特纳和马里扬斯基在《新功能主义是真正的功能主义吗?》(1988)一文中,对近来的新功能主义研究也提出了同样的怀疑。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特纳和马里扬斯基有理由抱怨。因为新功能主义与正统的帕森斯思想有着明确的且常常是根本的不同,以至于新功能主义虽然质疑了学科对于早期功能主义的评价,但是,它自己也没有接受其早期思想的一些核心取向;尽管它坚持与帕森斯的早期著作有着根本的关联,但是它也没有把自己看做是正在试图复兴一种旧的正统观念。当然,新功能主义的原创性是否因为它继续扎根于帕森斯思想中就会被削弱,我们仍然可以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但是,我们主张,新功能主义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社会学中惟一出现的新理论运动。[3]

---

② 但照我们的观点看来,还修正得不够彻底。例如瑞泽尔(1988)仅简单地把“新功能主义”置于“功能主义”的结论性部分,而跟在后面的部分则是冲突理论之类。我们在下文将会主张,新功能主义的活力在于使人们怀疑理论文本的这种传统划分。新功能主义的方针是向社会冲突和偶然性互动开放。那么,就目前它所做的来看,“冲突理论”和“常人方法学”当然不能被看做代表了对当代功能主义研究的反应。这些具体的划分在理论上从来都不是精确的(亚历山大,1982a),但它们至少确实代表了本专业在下面我们所说的战后社会学第二阶段中的自我意识。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相信,它们甚至根本没有想要那么做。社会学开始了战后第三阶段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就是要废弃这些教科书所作的划分。

③ 提出这种主张后,我们想马上强调,新功能主义作为一个真正的思想运动,并不是一种整合的理论。在那些被我们纳入这一名称的人中,存在着许多分歧,而事实上有些人并不欢迎这种概括性的名称。下文我们会更坦率地谈及这种尚未成形、仍在自然发展的特点。

本章中我们的目标之一在于指出这一新的社会学理论运动的主旨——它的普遍的话语结构，它对于经典的解释，它的研究 55 方案的范围，以及它和该领域中其他理论话语和研究方案的关系。这一目的将包括对目前正在展开的各种研究工作的批评性考察，但是，我们愿意首先从解释这场始料未及的复兴发生的一些原因开始。在这一点上表明目前新功能主义内在的重要性是不中肯的。它们的出现正是对社会学中潜在的发展的一种反应。我们主张，新功能主义仅仅是整个社会学领域中深刻的立场改变的表现之一。要理解它在当代舞台上的意义，人们必须理解今天正在出现的新的、不同的理论局面。

战后社会学第三阶段的出现

二战之后，西方社会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现在正在进入第三个阶段。在持续到六十年代的第一阶段中，以帕森斯和默顿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可以说是主导力量。姑且不论它的意识形态弱点，它的反经验主义姿态，它对于均衡的幼稚的信心——这些我们将会在下文谈及。功能主义承诺要做出一种综合，这一点看上去是不可否认的。它所指的综合是对帕森斯所说的“战时学派”（warring schools）社会学思想的综合。这种进行理论整合和综合的倾向，在那场始自六十年代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初期并取得胜利的对功能主义的反叛中，也是受害者之一。

我们可以划出两个主要的阵线，一边是微观社会学以创造性和个体自由的名义用偶然行动来反对社会结构；而另一边，冲突理论坚持社会变迁只能通过强调物质的而不是观念的力量来得到解释。这些主张否认了帕森斯著作中的核心观念。因此，

随着戈夫曼、霍曼斯和加芬克尔的理论日益获得权威，对社会化和人格结构的兴趣相应地降低了。而随着雷克斯、洛克伍德和达伦道夫成为中心人物，以及科林斯、吉登斯、赖特和斯科克波尔随后的取而代之，宏观社会学对文化和符号的合法性的兴趣显著地降低了。

但是，当这些杰出的挑战者已成为新的权威，甚至社会学中"多重范式"的性质已经历了从大胆的预言（如弗里德里克斯，1970）到一般常识的演变时，这些理论运动的充满活力与创造性的阶段也正趋于结束。由微观和宏观的传统的过早终结所激发，一个新的阶段正在开始，其标志就是要试图在行动与秩序、冲突与稳定、结构与文化的理论之间重新建立起联系。这些尝试存在于新的主导性理论传统内部，也存在于微观—宏观的根本分界线两端。而在综合理论新的发展方向中，这些尝试也是最明显的特征。彼此对抗的旧界线已被怀疑，复归综合的运动再次出现。我们确信，正是这种发展标志着战后社会学第三阶段的开始。

56

在符号互动论中，以布鲁默为首，有一大批研究者挑战了对个人主义的偶然性的强调，这标志着该传统早期的发展。戈夫曼（1974）关于框架的分析和贝克尔（1982）关于艺术的社会组织的文章可以被看做标志着他们与以前的、更具协商倾向（negotiation-oriented）的研究的背离。斯特赖克（1980）呼吁重新综合互动理论与系统理论，刘易斯和史密斯（1980）主张米德是集体主义者，而法恩则转向了对文化和组织的研究。

在交换理论的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家（如科莱曼，1986a，1986b，1987；维普勒和林登贝格，1987）日益反对那种把个体/结构的关系看做是无关联的经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观点。因为经验存在着共时性，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结必须被

看做是由更大的系统过程所维持的分析性联系。而这种分析性联系可以通过对个体行动采取所谓的“转换规则”（transformation rules）的办法，如投票过程来获得。在古德、布劳和科莱曼等理论家的著作中，结构性的解释，如关于宪法规则（如科莱曼，1987）、组织的动力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布劳，1977）以及声誉的分配系统（古德，1978）已开始取代效用的观点。

而在常人方法学中，人们可以从西考莱尔的著作中看到一种相似的发展，他近来提倡与宏观社会学的研究（克诺尔和西考莱尔，1981）联系起来。莫洛托奇（1985）和谢格洛夫（1987）近来的著作就表明，话语实践是如何被组织化的背景和权力的分配所结构化的，即使它们仍然保持着分析的自主性。类似地，赫里蒂奇和格雷特巴奇（1986）有关政治传统（political convention）的研究也希望确立微观—宏观的联结。 57

当人们去考察结构或冲突理论的立场时，人们也会发现一种类似的努力，希望克服第二阶段的零碎性。穆尔（1978）从客观的不公正转向了主观的不公正；斯科克波尔和芬戈尔德（1982）提高了宗教作为社会政策和政治变迁的独立原因的可能性；休厄尔（1980，1985）以前是蒂里忠实的学生，和达恩顿（1982）——一度是一个代表性的“编年史家”（Annaliste）——目前在社会变迁和历史方面都提倡文化的方法。卡尔霍恩（1982）和普拉格（1986）已出版了颇具争议性的反结构的历史社会学著作。梅耶和斯科特（1983）则把组织与文化结构而不是技术结构相联。我们相信，宏观社会学中这种向文化的转向有助于一个新的学科领域——文化社会学——的出现，而文化社会学现已成为美国社会学会最新的组成部分。那些与这一领域密切相关的理论家富有启发性地指出，文化不能按照我们第二阶段的所谓二分法来理解。武特诺（1988）主张文化毋需被个人主义地乃

至主观地理解，斯威德勒(1986)则认为文化应对偶然性开放，阿切尔(1988)坚持文化对变迁的敏感性，艾森斯塔德(1986)则肯定文化与物质力量和制度生活的联系

在综合理论中，同样也出现了一场强大的运动，希望离开早期理论研究中各执一词的争论。吉登斯(1971)的早期著作部分带有冲突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化性质。在最近的十年中，他已开始追求把偶然性、物质结构和标准规则综合起来。科林斯(1975)早期的著作是冲突社会学的典范，而近年来，他反而接受了微观社会学(1981)、后期涂尔干学派对仪式的强调(1987，1988b)，乃至于多维度的框架性概念(1988a)。同样，哈贝马斯开始他的学术生涯时，强调现代生活的资本主义危害性，这是典型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作风。但最近，他(1984)对那些突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宏观结构的标准微观过程进行了理论化，使这些文化力量成为"同等但又有区别的"子系统，虽然这些微观过程也常常反对资本主义宏观结构。④

上文我们指出过，过早的理论终结是形成第二阶段最终局面的思想原因。强调某一方面的理论是争论的有效工具，但当它们必须凭自身的力量成为理论内聚力的源泉而不是学科整合的源泉时，很显然，它们并不太成功。出现这种局面，与社会和制度因素也有关系，且与美国和欧洲政治气候的变化肯定相关。在许多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眼中看来，团结工会之类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启示，说明马克思主义本身在道德上已"不合法"了，所以革命性的社会运动也逐渐消失了。

---

④ 我们把讨论仅限于那种美国社会学家认为在他们的学科栖居地上进行的发展之中。在此之外，当然也有第一阶段的发展极端重要的表现。例如在法国，我们可以指出后结构主义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文化的结构——话语形成(福科，1984)、文化资本(布迪厄)以及政治叙事(利奥塔，1984)已替代了物质的结构。

那些曾经激发了后帕森斯话语的微观和宏观形式的意识形态动力，以及曾为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而辩护的意识形态动力已经基本消耗殆尽。于是，出现了一种关于社会变迁的新实在论甚至是悲观主义，它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方面，许多后现代思想引退了，甚至是宿命地带着一种怀旧回到了地方主义（利奥塔，1984），抛弃了一种更为理性的社会生活的可能性（福科，1984）。另一方面，则是在寻求制度化理性的不太具有启示性的方式，寻求那些关注保持政治民主的困难的方法，而不是关注某些社会转换极小的或许也是不必要的可能性的方法（勒福尔，1986；亚历山大，1988a）。

帕森斯在当代的新意义

新功能主义在这样一种充满变化的社会和学科背景下繁荣起来是否是个奇迹？帕森斯原创性的著作中包含着许多理论观点，这些观点有时甚至互相矛盾。尽管如此，他的主体思想的核心部分仍为第三阶段做出了补充。新功能主义是在反对第二阶段的局限性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对帕森斯思想的“自然关注点”（natural concerns）的解释也体现了其思想的补充作用。新功能主义者主张，帕森斯思想的“自然关注点”，为战后社会学新的研究阶段关注点的提出，提供了批评的理论资源。

也许，新功能主义最明显的还是表现为一种典型的理论综合形式。不管怎样，恰恰是帕森斯在理论整合方面原创性的、有缺陷的尝试——这曾被看做其理论整合天生的弱点，促使微观和宏观的理论家发展出了各执一词的理论，但现在他们自己也对此开始日渐怀疑。因此，当代理论家在回到理论综合时，常常又回到了帕森斯早期思想的一些核心要素，这一点也不令人感 59

到惊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回归也体现在那些以前从未和帕森斯思想有什么联系的理论家的著作中。这里的动力是理论的逻辑，而不是个人的意愿。

没有什么例子比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1975)更清楚地体现了这种理论的压力。哈贝马斯离开冲突理论的避风港，希望在他的经济模式中整合一些彼此矛盾的因素，比如人格气质，价值承诺(value commitments)的普遍主义潜力，乃至由政治和法律的表面平等造成的反资本主义的潜在压力。事实上而不是理论上，他最终运用的还是帕森斯的AGIL模式及他对文化、人格和社会系统的划分。在最近的许多理论著作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例子。当施卢赫特(1979,1981)想就韦伯有关文明的著作提出一个新的综合性观点时，他也是把帕森斯的分化理论做了进一步衍化和发展，而当科林斯(1988b)把他有关社会仪式的"冲突—涂尔干式"(Conflict-Durkheimian)理论扩大到民主政治的领域时，他被迫承认了帕森斯的政治支持多维度理论的重要性。在霍尔顿(1986)试图超越市场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方法时，他亦求助于帕森斯和斯梅尔塞的经济—社会关系模型中丰富的概念遗产。为了巩固西方社会系统多元论精致而又与众不同的特点，特纳(1986a,1986b,1987)扩展了帕森斯社会变迁理论中的概念：包容、公民资格和价值普遍化。在我们自己为构建一个有关微观和宏观之链的模型来对正统的功能主义进行根本挑战的尝试中(亚历山大和吉森,1987;亚历山大,1987a;科洛米和罗德斯,1988)，我们发现，帕森斯的分析模型为新的综合提供了惟一可行的基础。

帕森斯思想的新意义也可以在复兴的建立文化和社会的理论中看到。在这一点上，帕森斯过去的学生和合作者在宏观文化研究的复兴中占据了中心位置一点也不偶然。格尔茨(1973)

在六十年代用其文章发动的这场"文化革命"，完全是基于帕森斯对文化领域分析自主性的坚持。贝拉（1970，1973）关于符号实在论与民主的社会整合的关系的观点也可以追溯到帕森斯范式性著作中的重要主题。艾森斯塔德（1986）批评当代结构主义 60 者，认为就文学和社会关系而言，他们对待历史和当代社会学的方法是本体论的而不是分析性的，他这里所依赖的也正是帕森斯价值制度化的理论。阿切尔（1985，1988）有关文化的雄心勃勃的元理论，亦始自帕森斯对文化、行动和社会系统所做的区分。罗伯特森（1987）关于全球文化的著作中的批评着眼点，也是从帕森斯价值普遍化和社会共同体的概念中产生的（罗伯特森，1982；比较罗伯特森，1988）。在亚历山大（1982b，第211—296页；1984，1988b）试图构建文化的结构和过程模式时，他也是从社会和人格体系的迫切要求中产生的分析性符号分化模式开始的。

这里，我们已经表明了标志着目前第二阶段的社会学思想的旨趣与帕森斯早期著作的一些关注点之间的共同之处。我们也已表明，这种一致反映出理论综合的趋势和建立文化理论的新尝试。第二阶段的第三个要素——社会学意识形态氛围的明显变化，将在下文对新功能主义的研究做系统探讨的语境中进行论述。至此，我们已指明了新功能主义的发展与理论领域中更为普遍的运动之间的共同之处，但我们并未考察具体的主张或试图描绘新的学术分野的细节。在着手这些任务之前，我们需要一个框架，以便思考学科冲突和变化的论题。

作为话语和研究方案的社会科学[5]

要正确理解有关理论倾向的出现与衰落的论题，我们必须意识到，社会科学既不是如经验主义者所描绘的以事实为界(fact-bound)的研究，也不是他们所描绘的中层(middle level)研究。社会科学是由传统来组织的，而无论传统的理论抱负是什么，都由"卡里斯马"人物所奠定。在一个学科的开创阶段，这些伟大的思想人物被看做是经典的奠基人(亚历山大，1987b)，但后来，他们只获得了准经典的地位，仅仅被简单地当做强有力的学派奠基人。然而，社会现实从来不是自为的或面对它自身的存在。因为知觉是被传统的话语约定所传递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也被一种相对标准的、范式化的形式所引导。社会科学家的栖居之地不必是一个单一的传统或一个完整的东西，但无论自知与否，他们必须栖居某处。

虽然传统主义(traditionlism)意味着习惯性行为，但它并不一定意味着停滞或缺乏变化。在社会科学中，这种对于变化的开放性被制度化标准的普遍性所加强，而制度化的标准支配了非个人的理性，并反对一种传统第一反应的特殊主义。社会科学传统通过标出理论核心来界定自身，这些核心是很难变化的。但是，围绕核心的广大领域却倾向于不断变化。按照"理想类型"，传统的边缘领域中发生的变化可以被看成以两种方式进行："阐发"和"修正"。尽管这两种发展方式都使自己显示出忠实地实践了传统的约定，但在完成这项任务的创造性方面，它们却各有不同。因为阐发性的社会学研究从以下假定出发，即原

[5] 下面两页我们以精练概括的形式表述了我们在第二章第33—42页的论证。

初的传统是内在一致和相对完整的，它们的目的主要在于进行细致的改进和扩大范围。修正性的研究则相反，它更强调已确立的传统的弱点，在忠实的具体阐述的外表之下，常常会含蓄地指出那些张力，并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参见亚历山大，1979a；科洛米，1986）。

在传统的历史中，阐发和修正是周期性发生的具体阐述方式。它们不仅在紧随"卡里斯马"人物奠基之后的惯例化阶段出现，而且出现在一个有力的改造阶段。它是一个传统要保持完整就必然会出现的阶段。[⑥] 正是这后一种可能性表明了理论变化的第三种理想类型。在此情况下，这些理论核心本身已经历了大量的变化，但仍未放弃它们与传统的一贯联系，因此这里出现的理论活动可以被称为"重新建构"。重新建构与阐发和修正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明确地承认了它与传统奠基人的不同，而且打通了与其他传统清晰的沟通渠道。重新建构可以复兴一种理论传统，甚至创造出一种超越其所产生的传统的发展机会。[⑦] 最后，传统当然也能被破坏。这倒不是因为核心与边缘的约定被证伪，而是因为从科学共同体的角度看，这些约定已失去了合法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也并未彻底消失，而只是变成了潜

---

⑥ 在马克思之后，有阐发和修正的理论家，如恩格斯、考茨基、鲍尔、拉布里奥拉等人。但这些阐述被更为激进的、一战那一代人的重新建构的尝试打断了，那代理论家包括列宁、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人。随后的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常常出现在那种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之中——列宁马克思主义、葛兰西马克思主义、卢卡奇马克思主义等等，而且不论这种重新建构是否得到明确的承认。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中，萨特、阿尔都塞、E. P. 汤普森以及与法兰克福学派有关的思想家又引入了新一轮的、更为激进的改造。

⑦ 这样，那些创造了新传统的理论家们，在早期往往是他们自己的新理论从中形成的传统的重要重构者。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他是"青年黑格尔派"，那是一个激进的、准宗教的运动。在此运动中，黑格尔最后的

62 在的。而且，它们再次复兴的可能性总是存在。[8]

那么，根据这一模型，社会科学的发展既不是简单地出于理解经验现实的需要，也不是用经验知识的扩展或概念领域的扩大就可以衡量。社会科学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传统之间的冲突和竞争。衡量科学发展的主要标准是由传统之间的关系和特定传统本身内在的路线所确立的。并不是说理论或经验本身进步了，而是针对其自身的传统或与之竞争的传统，取得了一种相对的解释性的理论成功。[9]

阐发、修正和重新建构是描绘原初的理论传统与随后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所具有的密切关系的概念。但它们并未描绘出科学发展的真正程度。比如阐发——套用格尔兹的民族志的标准——就可深可浅。传统可以被这些理论变化的过程所丰富和加强，但一旦剥夺了传统中最强大的学术因素，掠去它们最为

学生把其主宰者的理论向启蒙运动的批评性分支乃至社会主义思想重新开放。当马克思接触到政治经济学时，他觉得他必须放弃做黑格尔的信徒而创造历史唯物主义。帕森斯可以与之做一个有趣的比较。在他学术生涯的第一个十年中，出版《社会行动的结构》时，他似乎还在致力于重新建构经典社会学的传统。只是在他学术生涯的后期，他才变得较为雄心勃勃。大家应注意不要把这些理想类型的次序——阐发、修正、重新建构、创造传统，看作是判断理论贡献的标准。比如说，社会科学中大多数最伟大的思想，就从未完成从重新建构到创造传统的转变，而许多想完成这种转变的人反而变得更加糟糕。冯·维泽的著作已被人们长时间地遗忘，而葛兰西、卢卡奇、曼海姆和莫斯的著作却仍继续被人热情地探究。

⑧ 维科的著作代表了经典传统中的这种例子，而斯宾塞则代表了社会学中的例子。

⑨ 从类似角度所作的出色探讨，参见B.特纳对理论积累的尝试所做的详尽的批评。该文是美国社会学学会小型会议的论文，后收入J.特纳(1989)的《社会学理论构建》。B.特纳(1989，第132页)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社会学中，看来我们有更多的分散、零碎的方法而不是积累和有组织的增长，这些理论的碎片源于制度性的断裂以及为了争取听众和庇护而导致的知识分子之间的竞争……在二十世纪社会学的历史中，一个明显的面貌就是处处是分析性的裂缝而不是理论的积累。"

有力的思想支撑物，传统也会枯竭，甚至简单化。[10] 如果说社会科学的变化可以是一种进步，那么，它当然也可以是一种退步。但是，理论发展纯粹是进步或退步的情况十分罕见。

一个学科共同体从一种理论立场向另一种理论立场的转变，既不是由各种立场的理论效果和复杂度所决定的，也不是由传统的客观经验领域所决定的。确切地说，它常常是被所谓的学科界的"科学敏感性"的重大变化所推动的。[11] 学科敏感性的变化，在底限上提出了不同的问题，它们重视不同的话语模式的发展。实际上，通常只有在对方法有了新的话语约定之后，才会出现理论复杂性的增加和经验领域的扩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能更少提到社会科学"发展"而不是社会科学"运动"。学科不能被理解为主要由经验的考察对象所定义的特性所组成，即默顿中层理论中的领域，如越轨、分层制和政治社会学。一个学科的深层结构，由经验对象、发展的传统和新的学科运动之间的联系所产生的网络及其全部的文献构成。

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回到新功能主义的有关话题。在帕森斯的创建性工作之后的惯例化阶段中，功能主义表现为一个统一的日益完善的理论，阐发和修正是当时的正常情况。在战后社会学的第二阶段中，学科敏感性的转换取消了这些尝试的合法性，而功能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传统几乎濒临灭绝。在正出现的第三阶段中，科学敏感性再次转向，在一种变化了的理论和历史气候中，新的问题被提了出来，这些问题表明了出现戏剧性 63

---

⑩ 在这里请想一下庸俗马克思主义。它事实上包括了对大部分被合法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或是对涂尔干和韦伯的机械简化运用，这都是他们的一些最忠实的追随者所做的。更不必说帕森斯的功能主义也有它自己大量的简化形式。

⑪ 关于一位重要的当代理论家在考察约定的转换时突出了"敏感性"的概念，参见亚历山大(1996)的讨论。

的学科转换的可能。作为反应，功能主义传统进入了重新建构的阶段，新功能主义就是其结果。

彻底地阐发发生在功能主义传统中的变化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因为人们必须考察科学连续体每一层次上的发展。这种探讨可以通过考察两类基本过程，即普遍性话语和研究方案而得到简化。所谓普遍性话语，指的是有关预先假设、本体论、认识论、社会学观点的意识形态和形而上学含义及其广阔的历史基础的探讨。与之相反，在研究方案的考察中，这种普遍性论题被认为相对不成问题，而真正有问题且推动这种科学研究方式发展的，是对具体经验结构和过程提出解释或说明的需要。

话语/研究方案的区分绝不可和上面引入的其他区分相混淆，例如，它和核心与边缘关注点的区分就有所不同。研究方案追求的具体承诺可能被传统的核心看得至关重要，而普遍性话语却常常指向边缘性的要素。因此，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与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它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先决条件看做其核心的一部分，而不是把向唯心主义的转换看做威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质。至于我们的科学发展模型，以及所指明的阐发、修正和重新建构的过程，则可以发生在话语和研究方案两种类型中。在实践中，通常是有关更为普遍性论题的话语宣告并引入了一个重新建构的阶段。因为只有普遍性的论题才能提供一个框架，在此框架中，更为具体的解释性关注点才可能设想出来。[12] 事实上，我们对新功能主义的思考，将主要集中于那些挑战了核心的新的普遍性话语。此后，我们将对追

64

[12] 但事情绝不总是这样。伯恩斯坦对占优势的马克思主义有关利润率下降的主张做出了经验性的挑战。这个论题就是一个研究方案而不是普遍性话语。伯恩斯坦的挑战冲击了该传统的核心，在马克思主义中导致了一种后来被称为"社会民主"的重新建构的倾向，但是这个倾向却伴随着大量的普遍性话语。

随其余波的研究方案做一简略的总评。

新功能主义的普遍性话语

普遍性话语既有阐释性的方式,也有说明性的方式。在阐释中,理论家把传统奠基人和其他主要人物的著作看做艰深的、有问题的文本,阐释也对其他传统中主要的和从属性的文本以及本传统中的从属性文献发起挑战。而说明性的方式则与之相反,话语针对它自己的术语,提出普遍规律,确立比较的框架。尽管普遍性话语的这些方式可能被不同的理论家或同一个理论家在同一种讨论中以不同的着眼点提出,但是这些方式也彼此密切相联。不论阐释的学术性多么清楚,更广泛的学科论争的背景也保证这些文本将不会仅仅因为理论家自己的缘故而被考虑。有关不同文本的意义和合法性的主张代表了进行实质性的理论争论的一种选择方式,有时候,这是一种最有效的方式。

普遍性话语的论证根据预先假设、模型、元方法论约定和世界观构建框架,并在此框架中进行。尽管我们认为帕森斯在每一个要素上都持有明确的立场,但作为新功能主义者,我们仍然主张,在每一个层面上,帕森斯的倾向都是模棱两可的(亚历山大,1983b)。在有关行动的问题上,帕森斯致力于一种物质的综合和唯心主义的预先假设,但他始终以一种唯心主义的方式偏离了这一学术目标。在秩序方面,他的目标是把个体行动和社会结构联系起来,但出于一种集体主义的立场,他从未尝试对偶然性进行理论化。按照帕森斯的理论模型,功能和系统是描绘一种各部分既互相关联又相对独立的社会的术语。上述这些概念中没有一个被看成是主导性的,而均衡则被看做是评价社会系统的分析性标准,而不是对社会系统的经验性描述。但是,当 65

帕森斯把这种模型转向控制论的系统时，他却倾向于强调社会系统规范性的那一部分，并把它提升到了超越物质性的社会系统的位置。更进一步，在维持他的模型的分析性时，帕森斯也碰到了很大的困难，常常难于把均衡的理想概念和经验社会的状况综合起来。最后，在帕森斯的意识形态或世界观中，存在着极其严重的模棱两可倾向。在他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的意识形态观念从批评性转向了维持现状的自由主义。三四十年代，他怀有的是有希望的悲观主义，而到了五六十年代，却转变成了彻底的乐观主义。作为献身于建构总的普遍性规律的社会科学家，帕森斯否认了事实和价值之间的联系。加上他对现代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日益增长的信心，也使他的研究明显地对现代性更为阴暗的层面，以及当代生活中广泛的不可否认的沉闷事实不太敏感。

在社会学传统的阐发和修正的最初阶段中，也许最有特色的就是它们不会出现话语性的方式。如果我们考察三四十本帕森斯学生的著作，其中的大部分，无论是阐发性的还是修正性的，都带有研究方案的性质。这里，只要想想贝拉的《德川宗教》(1957)和《超越信仰》(1970)、斯梅尔塞的《工业革命的社会变迁》(1959)和《集体行为理论》(1962)，以及艾森斯塔德的《帝国的政治体制》(1963)，就会明了这一点。这些著作都对传统中模棱两可的核心要素(亚历山大，1979a，1983b)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但这种挑战都表现为对解释机制做含蓄的修正，而不是对普遍性话语的框架进行修正。[13]

[13] 贝拉有关"符号实在论"(symbolic realism)的文章在这点上是个例外：它们是话语性的普遍的主张，尽管它们也保持着修正的特点。贝拉认为，不应该批评帕森斯的文化理论，符号实在论就是它的一种明确表达。

当普遍性话语确实出现在这种最初阶段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其目的都在于向学生或外人解释某个艰深的文本的错综复杂性。这种偶然的普遍性话语的一个佐证就是德弗罗(1961)和威廉斯(1961)的文章，他们的文章被收入布莱克编的关于帕森斯的一本书中。另外，在一度流行的约翰逊(1960)的介绍性教科书的各部分中，乃至上文提及的帕森斯学生的创新性著作的最初章节中，也存在这种普遍性话语。只有在功能主义开始衰落的时候，在帕森斯日益受到攻击的时候，普遍性话语的一致运用才出现了。利兹(1970，1972)对瑟兹曼斯基(1970a，1970b，1972)攻击帕森斯理论价值过剩(value-laden)的反驳，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利兹第一次明确地确立了帕森斯著作的元方法论基础。他的反驳对帕森斯价值中立的立场做了出色的阐发性捍卫，其反驳的理由都严格地取自技术理论内部。自由出版社两卷帕森斯纪念文集中各部分的编者导言也可以用基本相同的方式来看待，可以把它们看成是最后一代"真正帕森斯学派"的学者提出一种普遍性话语，以便巩固、阐发和修正奠基人的著作的最后尝试(卢贝斯等，1976)。 66

新功能主义可以因它试图重新建构帕森斯传统的核心而与功能主义严格地区分开来。实际上，阐发和修正的尝试依然保持着，重新建构的尝试的出现又赋予了这些温和的、内在的发展方式以新的合法性。但正是重新建构，才确立了现阶段"新的"功能主义的框架。事实上，在与这场运动松散相联的各种尝试中，没有一种尝试希望回到以前的研究方案或是话语中去。令人吃惊地，早期的边缘性批评中的大部分都被接受了，正如核心本身也以相应的方式被重新塑造了一样。从这一点来看，新功能主义是后帕森斯学派。它的目的不仅是要超越战后社会学的第一、第二阶段，而且要在每一阶段的贡献的基础上，构建出一

种新的综合。

那么，与功能主义理论化的早期阶段不同，普遍性话语成为新功能主义研究的发展中心是不应感到奇怪的。这主要是因为它有助于重新建构有关核心的观点，但它也出现在更具肯定性的修正乃至阐发的实践中。亚历山大(1983b)的著作明确地攻击了帕森斯分析行动的方法中的唯心主义倾向，认为这种简化要为帕森斯著作中的许多缺陷负责，比如他以一种目的论的方式看待变迁，相对地忽视了经济报偿和政治高压等倾向。古尔德在一系列文章和具指导意义的论文中，也致力于重新强调物质因素，其目的亦是想重新建构一个真正的多维度的传统。相对于其更具体的解释性工作(古尔德，1987)而言，古尔德对帕森斯的明确挑战仍是有所保留的。在这种更为普遍的领域中，他选择了修正，主张帕森斯曾提出一个"严重警告"来批评对物质领域的忽视(古尔德，1981)。

在新功能主义的开创阶段，秩序的问题看上去不太重要。67 但这里也明确出现了强有力的重新建构性的话语。亚历山大(1988c)尖锐地批评了帕森斯没能把偶然性建构在他的有关集体秩序的理论中。作为对这种个体行动的"黑箱"的反应，亚历山大提出了一种方案，即把模型建立在个体交换、阐释和实际经验的理论之上。作为一种补充，科洛米(1985，1990a，1990b)反对功能主义对变迁的理解，认为它忽视了无穷尽的团体过程。在一系列有关理论和历史的论文中，他发展出一套系统理论，用分析社会分化的结构方法来整合对集体行为的研究。被一种类似的、把个体整合进功能主义研究的兴趣所激励，苏里(1986，1988)提出，早期和后期的帕森斯对唯意志论的理解强调了其变化多端和个体的性质。他有力地批评了帕森斯在其中期阶段著作中对社会化的强调，并且提议把布鲁默对公共协商的理解和

新功能主义公共政治生活的理论统一起来。最后，虽然蒙克(1981,1982)在其早期有关帕森斯的新康德主义核心的文章中，字里行间隐含着肯定性的修正而不是重新建构，[14] 但这些文章仍可以被看做一种有力的尝试，希望把个人的努力和个体的意志整合进功能主义研究的中心。

这里，在功能理论的模型层面上，也存在着一个有关普遍性话语的、通常是颇具争论性的探讨的全盛期。亚历山大(1983b)对帕森斯著作中功能主义的具体化和系统推理做了一系列的批评。他也批评了希望把AGIL模型的划分与当代社会经验性的分化拼凑起来的做法。因为正是这种颇成问题的运用该模型的方法，使它很难避免把功能主义与停滞和拼凑等同起来的指责。亚历山大呼吁回到帕森斯的更为具体、更具团体倾向的早期和中期著作中。在那里，特殊的社会系统的制度性内容已从它的抽象机制中清楚地分化出来。

而在德国，实际上是施卢赫特的功能主义化的韦伯主义和哈贝马斯的帕森斯式的马克思主义最为接近这种理想。德国的新功能主义者也明显地改变了帕森斯的模型。[15] 卢曼(1982)，也指责帕森斯把系统分析具体化为四重子系统而减弱了它的推

---

[14] 在这方面，蒙克这一时期的文章和他后来的一些著作，与亚历山大(1978)早期对帕森斯的话语的捍卫十分相似。虽然亚历山大明显地致力于修正，但他并没有选择以一种重新建构的方式来对待帕森斯的理论。七十年代末，战后理论化的第二阶段仍处在朝气蓬勃的上升之中，帕森斯传统的同情者们，正是在那个时代弥漫的争论精神中面对着对他的批评。也许是1979年帕森斯的去世，以及理论和政治气候的变化，才使得不太保守而更具重新建构性的情形得以呈现。

[15] 事实上，引入"征用"(expropriation)这个概念也许是有用的。这个概念指的是一个传统为了阐发、修正、重新建构其传统本身，综合进了对立传统的核心要素。因此，尽管施卢赫特和哈贝马斯坚决反对功能主义，在理论化的第三阶段，他们也以富有创造性的、相当彻底的方式"征用"了帕森斯的理论。"征用"是一个传统扩展阶段的标志。

动力，他坚决强调系统内外环境之间的张力，从而发展出一种更具适应性和动态的模型。[16] 蒙克(1987a,1988)也有力地改变了这一模型，以强调偶然性、意识形态和理性沟通的文化规则的方式重新命名了这四个子系统。

68

对帕森斯系统模型有力的补充性挑战来自古尔德和科洛米。在对帕森斯雄心勃勃的挑战中，古尔德(1985)主张，功能主义的模型从系统论或有机体理论中进行借鉴是必要的但也是有局限的，还必须借鉴发展的模型，即要达到特定层次的发展，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必须经历的阶段所进行的理论概括。最后，与亚历山大对拼凑的批评相对应，古尔德坚持这些模型中的任何一个也不能被历史上社会的实际结构所迷惑。这种实际结构可以由特定时期特定制度和团体的关系的“结构”模型来获得。而科洛米(1985)则尝试以一种新功能主义的方式来改变帕森斯的分化理论，他提出分化应该被看做轮廓鲜明的界定性模型，它是一个“主要的趋势”(master trend)而不是一种事实上的经验性描绘，更不是对于变迁的解释。根据这个调整了的框架，科洛米就社会变迁的结构和过程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模型。

在意识形态领域，与正统功能主义最根本的决裂在于简单地使该传统的意识形态维度变得清晰可见。尽管赞成帕森斯著作取得的总的进步和人道主义的跃进，但亚历山大也同意帕森斯的许多批评者对其保守性的批判。他自己追求把功能主义政治化，并把它和今日的规范性论题相关联。在他发表在《新共

---

[16] 卢曼的问题完全不同：他并没有发展出有关制度、团体和具体互动的理论。在第一章，主要讨论的话题就是卢曼和蒙克著作的差别以及英美新功能主义的差别。很有可能，与其说这种差别源自民族传统的不同，不如说它更多地来自学科出现的环境的不同。在德国，无论是冲突理论还是微观社会学都从未被强有力地制度化。

和》上赞颂帕森斯的有关文章中，亚历山大(1979b)把帕森斯描绘成为自由主义者提供了一种社会学，强调了帕森斯包容、分化和价值普遍化等概念的规范性和批评潜力。从那时起，亚历山大就试图推动新功能主义向左倾但并不激进的方向发展。在这方面，其他人也做出了各自的贡献，科洛米(1990c)在"批评性现代主义"(Critical modernism)的口号下，探讨了这种新功能主义的倾向。梅休(1982，1984，1990)有关公众在民主政治中的中心地位的研究，也详尽地阐述了一种类似的规范和经验性(normative-cum-empirical)的主张，而罗伯特森(1988)则发展出了全球化的理论，在主张新的全球范围的世界主义的同时，强调对民族之间的差异更加宽容，而这种差异，正是帕森斯自己的现代化理论所忽略的

69

苏里和古尔德提出了更激进的意识形态主张。苏里(1989)在他对帕森斯的宏观社会学进行唯意志论的阐释所提供的空间中，发展出了一种经验性标准来评估他的"全社会立宪政体"(societal constitutionalism)理论中的民主化。苏里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一方面被政治和经济的寡头所威胁，另一方面被静默的公民所威胁。他在帕森斯对学院的自治社区的日益强调中，发现了一种与之相抗衡的力量。古尔德(1987，1985)甚至接受了一个更具限制性和批评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概念，他还重新建构了一个当代社会的模型，其紧张关系只能通过财产关系的转换才可以缓解。

最为雄心勃勃、希望改变学科对于功能主义世界观的看法的尝试，则体现在霍尔顿和特纳的著作中(1986)。他们把帕森斯描绘为这样一位重要的理论家：惟一一位他所植根的社会未经历过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转换之重创的理论家。他们认为他也是惟一一位把进步而稳定的现代性的积极可能性加以概念

化的理论家，与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相比，帕森斯避开了怀旧，因为他看到了法理社会(Gesellschaft)道德和多元论的可能性。

> 另一种选择是考虑法理社会允许真正价值表达的可能性，而不是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阐述者所判断的那样，仅仅是意识的"虚伪的"或"偶像化"的形式。不仅如此，法理社会中的价值多元论既不能被看做是要逃避公共领域——系列自恋的世界，也不能被看做一场不能平息的与尼采的唯意志论的战斗。相反，可把它看做是为多元论和多样性的有序分解奠定了规范的基础。(霍尔顿和特纳，1986，第215—216页)

在战后第二阶段的话语中，帕森斯是保守的，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激进分子。霍尔顿和特纳反对把帕森斯描绘为"经济上极端个人主义的卫道士，这种个人主义往往是用来支撑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反的，他们把帕森斯的乐观主义描绘为反映了"与自由民主价值深刻的道德和政治认同"(第216—7页)。在他们眼中，正是帕森斯，而不是第二阶段中他的批评者们，占据了更高的道德位置。

70

> 在与他的批评者的大多数对抗中，帕森斯在道德上表现得既投入又敢于承担政治义务。他不是资本主义的卫道士，而是反精英统治、反乌托邦的社会理论家。这种立足点使我们得以超越经典社会学家对现代性抱有的那种既爱又恨的情感。在所有这些方面，帕森斯宣告了社会学思想古典阶段的终结。(霍尔顿和特纳，1986，第218页)

在本章的前面部分，我们提到了在产生当代第三阶段的社会学研究方面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的作用。对新功能主义来说，霍尔顿和特纳把这种环境变化的结果有力地确定下来。实际上，他们的主张在以前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提出，尽管他们所做的只是对原初传统的肯定性阐发与修正而不是重新建构。他们的主张能占据这个位置仅仅因为它是新功能主义的，而不是正统的、目前为帕森斯学派提供话语框架的理论。[17] 在他们对帕森斯的描绘中，这种重新建构有助于复兴批评性的现代主义，而这种现代主义是改革和维持一个自由主义民主社会所必须的。

普遍性话语的阐释性方式与我们刚才讨论过的说明性方式密切相联。我们曾经指出，正统帕森斯学派的学者对其奠基人的文本的阐发与修正具有肯定的性质。也许更为有趣的，则是他们对本派传统之外的其他经典文本的态度。当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中强调"近期欧洲作者群"的著作中的统一性时，他定下了这一基调。但帕森斯通过有力的阐释来建构他自己的统一性这一点从未被承认过；至于他们都是统一于帕森斯的自然社会理论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理论这一重要的事实，则更未被承认过。帕森斯在发展其理论的过程中，常常会重新思考涂尔干、韦伯和弗洛伊德。他需要从他们的著作中整合新的要素，但他只有在他们与他自己的新要素统一时，才能完成这

---

[17] "自从塔尔科特·帕森斯1979年在慕尼黑去世，很明显，对帕森斯的社会学和他对现代社会学的影响做出重要的重新评价正在很好地进行……本书……也就恰好可以被看做是这种重新评价的新浪潮的一部分。"(霍尔顿和特纳，1986，第1页)这一运动已超越了肯定性的修正，这一点可以由莱希尼尔(1988)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对霍尔顿和特纳此书的评论得到证明。莱希尼尔——重新建构运动中一位活跃的理论家——认为这本书对帕森斯做了过多的肯定。

种整合。在那些被他纳入社会学经典的理论家中间，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这种表现为阐发和修正的肯定性的阐释，在帕森斯及其同伴的《社会理论》(1961)中达到了顶点。它把整个社会思想历史的描绘统一在行动理论上，这要么是过分天真，要么是不太真诚。

71

但是，在功能主义的正统阶段中，阐释性话语并不比说明性话语繁荣多少。而且当帕森斯学派致力于阐释时，他们把自己的讨论置于帕森斯的统一模型之上。贝拉(1959)早期有关涂尔干是一个分化理论家的文章就是一个例子，那篇文章确实是一针见血的。斯梅尔塞眼中(1973)的马克思，艾森斯塔德眼中的(1971)韦伯以及利兹兄弟(1976)对皮亚杰的分析也是同样有力的证明。

相反，在当代阶段中，阐释表现为更重要的、更有进取心的重新建构。上面我们已指出帕森斯自己的著作如何成为一些新功能主义者批评的对象。在对本传统之外的经典著作进行探讨时，新功能主义者明确地采取了一种非帕森斯的方式。他们更强调分歧而不是统一性，因为他们需要超越本传统之外的理论资源。

我们将首先从新功能主义与宏观社会学经典的对话开始。在帕森斯不仅仅是忽视而且实际上是试图抑制马克思的地方，亚历山大(1982b)却使马克思成为物质和工具理论的范式，并批评帕森斯忽视了这些理论。他(1983a)还以与此类似的方式用韦伯来反对帕森斯，认为帕森斯冲淡了在韦伯看来是必要的个体化基础的客观化。同样的，亚历山大(1988b)还强调涂尔干的符号和文化要素，以此来反对正统的功能主义者在“价值”关注中忽略文化的倾向。古尔德(1987)也用类似的方式来对待马克思、黑格尔、凯恩斯和皮亚杰。首先，他强调他们与帕森斯的距

离；其次强调整合他们的"反功能主义"的必要性。他的进化理论和激进的集体行为理论就产生于这种重新建构的混合体。对苏里(1985)来说，阐释绝不可忽视哈贝马斯。尽管他以修正的方式强调了帕森斯和哈贝马斯的共同之处，但他以揭示帕森斯正统著作的自我局限性的方式对哈贝马斯进行了阐释。苏里还以同样的方式阐释了法律理论家富勒的有关思想。哈贝马斯和富勒都为苏里(1989，1990)的全社会立宪政体的新功能主义理论提供了批评的资源。

在新功能主义的阐释中，也出现了与微观社会学传统的重要文本进行的对话，这些对话颇有意义。由于帕森斯没有认识 72 到偶然行动的问题，那么，他与这些传统的关系从未超越把它们与自身的统一性进行例行评价是毫不奇怪的。相反，对新功能主义来说，要发展出理论资源来使新功能主义按我们上面所讨论的方式向偶然性开放，那么，理解微观社会学与正统传统之间的分歧之所在就是很重要的。

例如，亚历山大(1985b，1987c，第195—280页)强调，米德、皮尔斯和戈夫曼的理论，胡塞尔和舒茨的现象学理论以及早期加芬克尔的理论构成了一种集体飞跃，而他们的理论资源却基本上被这些传统的当代阐释者忽视了。相反的，蒙克(1986，1987b)和苏里(1988)在他们对互动理论的阐释中并没有从这种理论飞跃中借鉴什么。但这三位理论家都同意，要综合有关偶然性和唯意志论的思考必须依赖这些传统。由于认为这些传统不仅有助于弥补正统观念公认的缺陷，而且还是捍卫新功能主义向更具原创性、更有活力与综合性的目标发展的有力武器，所以他们公开提出把它们作为理论的支援。

在战后第三阶段的新环境中，针对新的普遍性话语产生的机会与刺激，有关新功能主义的研究大量涌现。从其广义而不

是狭义来说，这些研究可以被称为研究方案。以前的功能主义研究被一种巩固性的策略所引导，设想出了一个单一的、包揽一切的概念主题，这个概念主题能把具体的研究领域联结成紧密而精练的整体。与之相反，新功能主义的经验性研究所指向的，则是一个围绕普遍逻辑松散地组织的整体，该整体在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经验领域中，拥有许多相当独立的“衍化”与“变体”（瓦格纳，1984；瓦格纳和贝格尔，1985）。

新功能主义研究方案总评

在前面的部分，我们描绘了新功能主义的出现，把它看做是战后社会学第三阶段的主要特色，并指明了它复苏的思想与社会政治原因。新功能主义的话语性要素——它的预先假设、本体论、认识论和意识形态含义，已被勾勒了出来。但新功能主义不仅仅是普遍性话语，它也谋求解释社会生活的具体方面。

73

大多数新功能主义者提出的研究方案涉及下列领域：社会变迁、文化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大众传播、女性研究、职业和经济社会学。由于不能对这些方案做一个详细的考察，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总评力图突出这些研究最鲜明的轮廓。[13]

大部分新功能主义的研究制定了明确的修正路线。比如结构分化的研究，就以四种方式修正了正统功能主义分析变迁的方法。首先，他们通过发展出固定化的模式来背离日渐向具体的制度发展的“主要趋势”，从而补充了对这种“主要趋向”的描绘（如亚历山大，1981；莱希尼尔，1984，1985，1990；蒂尔亚基扬，

[13] 有关这些研究方案最为详尽仔细的一种讨论，参见亚历山大和科洛米（1988）对艾森斯塔德的探讨。

1985，1990；钱帕基，1990；科洛米，1985，1990a，1990b；亨德里克，1990；苏拉奇，1982；斯梅尔塞，1985，1990；科洛米和陶西希，1988）。其次，他们超越了对分化进行纯粹系统性和演化性的解释，朝着强调偶然性、具体团体、冲突、社会运动和集体行为等原因的方向发展（如艾森斯塔德，1982；科洛米，1985，1990a，1990b；科洛米和罗德斯，1988；科洛米和陶西希，1988；罗德斯，1990；梅休，1990；亚历山大，1980；斯梅尔塞，1985）。第三，他们认识到正统观念所强调的适应性提升（adaptive upgrading）、包容和价值普遍化只代表了社会分化更为广泛的大量可能性中的一种结构（如卢曼，1982，1990a，1990b；亚历山大，1978，1983b，1984；埃德尔，1990；罗德斯，1990；蒙克，1981，1982，1983，1987a，1988，1990a，1990b；苏里，1985，1990；梅休，1984，1990）。第四，他们用批评性现代主义替代了有关分化过程和后果的盲目的自由乐观主义，这种批评性现代主义更适合于对与分化必然相联的阴暗面的阐释（如苏里，1990；梅休，1984，1990；蒙克，1987a，1988；科洛米，1990c）。[19]

传统的功能主义对文化—社会关系的研究也被批评和修正了。正统观点假定文化系统通过价值得以在社会系统中巧妙地制度化，而价值则是人格被社会化所内化的产物。阿切尔（1985，1988）认为这个模型的错误在于"向下综合"（downward conflation），因为它让整合的文化系统吞没了社会和人格系统。 74
亚历山大（1984）指出这种分析制度化的传统方法——他称之为文化具体化模型，仅仅代表了可以设想出的文化—社会关系的

---

[19] 关于分化理论近来的发展的详细分析，参见科洛米（1986、1990c）。关于把分化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和理论背景之下的讨论，参见吉森（1988，1990）和亚历山大（1988d）。

一种形式，他提出了另外两种方式。在文化折射中，彼此冲突的社会团体和功能会产生对抗性亚文化，这些亚文化仍然依靠价值系统，而这个价值系统又在文化的层面上整合了起来。但文化的纵向方面则相反。在社会和文化的系统中，都存在着根本的对抗性，利益集团之间没有达成一致共识，产生了真正对抗性的政治文化集团。[20]

在发展出广泛的新功能主义女性社会学的尝试中，米丽亚姆·约翰逊和她的同事（约翰逊，1975，1977，1981，1982，1988a，1988b；约翰逊等，1975，1981；吉尔等，1987；斯托卡德和约翰逊，1979）重新运用并修正了帕森斯遗产中被其他人所忽视的要素。他们对以下方面做了重新概念化：工具性与表现性之间传统的区别、家庭的结构分化模型、社会化，以及帕森斯用文化、社会和人格模型对性别不平等的起源和再生产所做的解释。孤立地看，他们的每一个概念化都明显地具有修正的特点，但如果把它们综合在一起，更为明显的则是重新建构的目标推动了这个研究方案的进行。其目的不是要描绘家庭如何"生产"出能够在复杂分化的社会中承担成人角色的人格——一种正统帕森斯学派的论题——而在于解释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文化和社会系统如何使特定阶层的人格服从和扭曲。

约翰逊和她的同事不仅修正和重新建构了帕森斯，而且把他们对正统功能主义的重新建构和其他的思想传统，特别是心理分析和女性主义的传统结合了起来。普拉格（1986）以相似的

[20] 我们的讨论仅着眼于文化—社会边界关系的产生问题。但是，一旦承认这一边界关系可能被淡化，对文化系统的理解就可更为内化而较少受社会的限制。亚历山大试图整合符号学和阐释学模型，力图阐发"晚期涂尔干"文化研究的种种方法。近来他把研究转向了这个方向（亚历山大，1988b），参见埃德斯（1988）、兰博和尚（1990）。

方式扩展并修正了功能主义对待政治社会学的方式，他依靠帕森斯对分化的社会共同体的探讨来提出了新功能主义的公共空间的概念。他把结构的概念和更为具体的、过程性的符号互动论的方法联系起来，这种方法强调实际的公共话语的内容、动力与结果。在功能主义和互动论之间有力的理论关联下，普拉格对爱尔兰民主运动的考察，不仅揭示了民主制度是如何运转的，而且首先揭示了它们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75

除了在重新建构和修正方面的飞跃，新功能主义研究方案也包含着阐发性的方面。例如，罗伯特森（1985，1986，1987，1990）、罗伯特森和基里科（1985）、罗伯特森和莱希尼尔（1985）对全球化与文化变迁的关系所做的分析把帕森斯价值普遍化的主题提高到社会系统的水平。与此同时，由于罗伯特森对全球化导致的丰富多样的文化反应十分敏感，他修正了帕森斯的观点，抛弃了那种认为这些变迁仅仅相当于文化具体化和规范性整合的全球性视角。

最近，这种阐发性的研究方案较少反对正统功能主义以前的背景，而更多地致力于与迅速发展的新功能主义理论本身联系起来。罗滕比勒（1986a，1986b，1987，1988a，1988b，1988c，1989；彼得斯和罗滕比勒，1988）不仅利用新功能主义基本的立场，而且利用新功能主义分析文化的方式，在大众传播方面提出了印象深刻的研究方案。根据新功能主义微观—宏观之链高度抽象的讨论，科洛米和罗德斯（1988）发展出一系列理想类型的模型和因果假设，来解释十九世纪末美国教育的变迁。类似地，莱曼（1988）用亚历山大关于行动和秩序的分析前提，在政治权力和国家方面，提出了新的、更为复杂的经验性研究方案。兰博（1988）的经济政治学著作详尽地阐述了新功能主义对文化的分析，而埃德斯（1988）则利用同样的新功能主义文献来分析西班

牙的市民宗教及其近来向民主的转型。

总之，虽然新功能主义的实践主要是在普遍性理论的层面上进行的，它仍然存在着补充性的、迅速增长的、更具经验倾向的研究方案。这种研究对正统功能主义做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正，不仅补充了新功能主义元理论方面重新建构性的飞跃，而且已开始对新功能主义普遍理论本身进行阐发。

结　论

在本章中，我们的任务是展示新功能主义正在表达它所许诺的种种基调。今天，新功能主义已不仅仅是个承诺。它已成[76]为一个充满了热烈的理论话语和日益增长的经验考察的领域。我们用第二章中所阐发的社会科学知识积累的模型为框架，完成了这种展示。因为社会学知识由传统产生，判断科学进步最令人信服的标准就是比较：把特定传统的生命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以及彼此竞争的传统进行比较。通过这些比较，我们可以衡量社会科学的进步。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进步是后实证主义意义上的进步。

本章中，我们评价新功能主义的进步主要是把它和旧的正统观念进行比较。为此，我们使用了一些术语——重新建构、征用、修正和阐发。我们主张，相对于传统以前的衍进，新功能主义在话语和经验的两种水平上都表现出重大进步。我们试图表明，构成新功能主义的重新建构、修正与阐发都明确地导向正统传统的那些领域，即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批评者以前都认为是理论的或经验的领域。如果新功能主义代表了理论的进步——我们认为确实如此——那么，这反映出它能够产生令人满意的重新建构和修正，以应对那种一度威胁要彻底消灭功能

主义传统的批评。

当然，理论进步不能只根据内在的基础来判断。比较也必须在彼此竞争的传统之间进行。功能主义的批评者们一定会提出新的尖锐的反驳。有些人企图忽视新功能主义所引发的巨大变化，而其他人将会承认，所发生的根本转换终将改造他们批评的性质。我们焦急地等待着这些改造的来临。传统的论争已停滞而渐趋枯竭，我们正身处社会学理论翻天覆地的变化之中，旧的联盟正在解体，新的构造正在诞生。“新功能主义”决不能被塞回旧框框之中。 77

参考文献

Alexander, J. C. 1978, Formal and substantive voluntarism in the work of Talcott Parsons: a theoretical and ideological reinterpret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 pp. 177—98.

——1979a, Paradigm revision and "Parsonianism."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 pp. 343—57.

——1979b, Sociology for liberals. *The New Republic* (June 2), pp. 10—12.

——1980, Core solidarity, ethnic outgroups, and social differentiation: a multi dimensional model of inclusion in modern societies. In J. Dofny and A. Akiwowo (eds). *National and Ethnic Movements*. Beverly Hills: Sage, pp. 5—28.

——1981, The mass media in systemic,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E. Katz and T. Szecsko (eds), *Mass Media and Social Change*. Beverly Hills: Sage, pp. 17—51.

——1982a, *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 vol. 1: *Positivism, Presuppositions, and Current Controvers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b, *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 vol. 2: *The Antinomies of Classical Thought: Marx and Durkhei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a, *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 vol. 3: *The Classical Attempt at Theoretical Synthesis: Max Web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b, *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 vol. 4: *The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Classical Thought: Talcott Pars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Three models of culture and society relations: toward an analysis of Watergate. *Sociological Theory*, 2, pp. 290 -314.

——1985a, Introduction. In J. Alexander(ed.), *Neofunctionalism*. Beverly Hills: Sage, pp. 7—8.

——1985b, The individualist dilemma in phenomenology and interactionism: toward a synthesis with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 S. N. Eisenstadt and H. J. Helle (eds), *Perspectives on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1 Beverly Hills: Sage, pp. 25--57.

——1986, Science, sense, and sensibility. *Theory and Society*. 15, pp. 443—63.

——1987a, Action and its environments. In J. C. Alexander, B. Giesen, R. Munch, and N. J. Smelser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89—318.

——1987b, On the centrality of the classics. In A. Giddens and J. Turner (eds). *Social Theory Today*. London: Polity Press, pp. 11—57.

——1987c, *Twenty Lectur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a, Between progress and apocalypse: social theory and the dream of reas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Social Progress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Movements, Forces, and Ideas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Krakow, Poland.

——1988b, Culture and political Crisis: Watergate and Durkheimian sociology. In J. C. Alexander(ed.), *Durkheimian Sociology: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187—224.

——1988c, *Action and its Environmen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d, Durkheim's problem and differentiation theory today. In J. C. Alexander, *Action and its Environmen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49—77.

——1995, General Theory in the Postpositivist mode: the "epistemological dilemma" and the search for present reason In J Alexander, *Fin De Siècle Social Theory*. New York: Verso, pp. 90—127.

Alexander, J. C., and Colomy, P. 1988, Social differentiation and collective behaviour. In J. C. Alexander, *Action and its Environmen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lexander, J. C., and Giesen, B. 1987, From reduction to linkage: The long view of the Micro-Macro debate. In J. C. Alexander, B. Giesen, B. Munch, and N. J. Smelser (eds), *The Micro Macro Lin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44.

Archer, M. S. 1985, The myth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6, pp. 333—53.

——1988, *Culture and Agency: The Place of Culture i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cker, H. 1982, *Art Worl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llah, R. N. 1957, *Tokugawa Religion: The Values of Pre-Industrial Japan*.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9, Durkheim and hist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 pp. 447—61.

——1970, *Beyond Belief*.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3, Introduction. In R. N. Bellah (ed.), *Emile Durkheim: On Morality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ix—lv.

Blau, P. M. 1977, *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A Primitiv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Calhoun, C. 1982, *The Question of Class Struggle: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pular Radicalism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mic, C. 1986. The return of the functionalists.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5, pp. 692—5.

Champagne, D, 1990, Culture, differentiation, and environment: social change in Tlingit Society. In J. C. Alexander and P. Colomy (eds),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52-·87.

Coleman, J. S. 1986a, Social theory ,social research, and a theory of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pp. 1309—35.

——1986b, *Individual Interes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Microfoundations and macrosocial behavior. In J. C. Alexander, B. Giesen, R. Munch, and N. J. Smelser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p . 153—73.

Collins, R. 1975, *Conflict Sociology: Toward an Explanatory Scienc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pp. 984—1014.

——1987,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ower and property : the micro-macro connection as an empirically based theoretical problem. In J. C. Alexander, B. Giesen, R. Munch and N. J. Smelser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93—206.

——1988a, *Theoretical Sociology*.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8b, The Durkheimian tradititon in conflict sociology. In J. C. Alexander (ed.), *Durkheimian Sociology: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07—28.

Colomy, P. 1985. Uneven 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 : toward a comparative approach. In J C. Alexander (ed.), *Neofunctionalism*. Beverly Hills: Sage, pp. 131—56.

——1986,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functionalist approach to change. *Sociological Focus*, 19, pp. 139—58.

—— 1990a. Uneven differentiation and incomplete institutionalization: politic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early American nation. In J. C. Alexander and P. Colomy (eds),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119—62.

——1990b, Strategic groups and political differentiation in the antebellum United States. In J. C. Alexander and P. Colomy (eds),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222—64.

——1990c, Revisions and progress in differentiation theory. In J. C. Alexander and P. Colomy (eds),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465—95.

Colomy, P., and Rhoades, G. 1988, Specifying the micro-macro link: an application of general theory to the study of 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tlanta, Georgia.

Colomy, P., and Tausig, M. 1988, The differentiation of applied sociology: prospects and problems. Manuscript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Applied Sociology, 1987.

Darnton, R. 1982, *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evereux, E. C., Jr. 1961, Parsons' sociological theory. In M. Black (ed.), *The Social Theories of Talcott Parsons*.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pp. 1—63

Eder, K. 1990, Contradictions and social evolution. In H. Haferkamp and N. J. Smelser (eds), *Social Change and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320—49.

Edles, L. D. 1988,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Spain.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Eisenstadt, S. N. 1963,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Introduction. In S. N. Eisenstadt (ed.), *Weber On Charisma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ix—lvi.

——1980, Cultural orientations,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and social change: comparative analyses of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 pp. 840—69.

——1986, Cul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 pp. 297—320.

Fine, G. A. 1984, Negotiated orders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0, pp. 239—62.

——1988,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in the post-Blumerian age. In G. Ritzer (ed), *Frontiers of Soci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117—57.

Foucault, M. 1984, *The Foucault Reader* (ed.), Paul Rabinow. New York: Pantheon.

Friedrichs, P. 1970, *A Sociology of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Geertz, G.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Giddens, A. 1971,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iddens, A., and Turner, J. (eds) 1987, *Social Theory Today*. London: Polity Press.

Giesen, B. 1988, The autonomy of social chang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0, The change in "Change": an evolution theoretical view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ncept. In H. Haferkamp and N. J. Smelser (eds), *Social Change and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ill. S., Stockard, J., Johnson, M., and Willams, S 1987, Measuring gender differences: the expressive dimension and critique of androgyny scales. *Sex Roles*, 17, pp. 375—400.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Goode, W. 1978, *The Celebration of Heroes: Prestige as a Social Control Syst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ould M 1981, Parsons versus Marx: an earnest warning. *Sociological Inquiry*, 51, 197—218.

——1985, 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theory of societal crisis, in J. C. Alexander (ed.), *Neofunctionalism*. Beverly Hills: Sage, pp. 51—71.

——1987, *Revolu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bermas, J. 1975, *Legitimation Crisis*, tr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Reason and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tr,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7,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tr.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Heritage, J, and Greatbatch D. 1986, Generating applause: a study of rhetoric and response at party political confere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 pp. 110—57.

Holton, R. J. 1986, Talcott Parsons and the theory of economy and society. In R. J. Holton and B.S. Turner, *Talcott Parsons: On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p. 25—105.

Holton, R. J., and Turner, B. S. 1986, *Talcott Parsons: On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Hondrich, K. Otto 1990, World society versus niche societies: paradoxes of undirectional evolution, in H. Haferkamp and N. J. Smelser (eds), *Social Change and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350—66.

Johnson, H. M. 1960, *Sociology: A Systematic Introduc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hnson, M. M. 1975, Fathers, mothers, and sex typing. *Sociological Inquiry*, 45, pp. 15—26.

——1977, Androgyny and the maternal principle. *School Review*, 86, pp. 50—69.

——1981, Heterosexuality, male dominance, and the father image. *Sociological Inquiry*, 51, pp. 129—39.

——1982, Fathers and femininity in daughters: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67, pp. 1—17.

——1988a, *Strong Mothers, Weak Wives: The Search for Gender Equal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b, Feminism and the theories of Talcott Pars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meeting, Atlanta, GA.

Johnson, M. M., Stockard, J., Acker, J., and Naffziger, C. 1975, Expressiveness reevaluated. *School Review*, 83, pp. 617—44.

Johnson, M. M., Stockard, J., Rothbart, M. K. and Friedman, L. 1981, Sexual preference, feminism, and women's perceptions of their parents. *Sex Roles*, 7, pp. 1—18.

Knorr-Cetina, K., and Cicourel, A. V. (eds) 1981, *Advances in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Toward an Integration of Micro- and Macro-Sociologies*.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echner, F. 1984, Ethnicity and revitaliza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Sociological Focus, 17, pp. 243—56.

——1985, 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 In J. C. Alexander (ed.), *Neo-functionalism*. Beverly Hills: Sage, pp. 157—76.

——1988, Review of Holton and Turner, *Talcott Parsons: On Economy and Socie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no. 2), pp. 404—5.

——1990, Fundamentalism as path away from differentiation. In J. C. Alexander and P. Colomy (eds),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88—118.

Lefort, C. 1986, *The Political Forms of Modern Society: Bureaucracy, Democracy, Totalitarianism*, 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ohn B. Thomps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Lehman, E. W. 1988, The theory of the state versus the state of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 pp. 807—23.

Lewis, D, J., and Smith, R. L. 1980, *American Sociology and Pragmatism: Mead, Chicago Sociology, and Symbolic Intera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idz, C. W. and Lidz, V. M. 1976, Piaget's psychology of intelligence and the theory of action. In J. Loubser et al. (eds), *Explorations in General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Free Press, pp. 195—239.

Lidz. V. 1970, Values in sociology: a critique of Szymanski, *Sociological Inquiry*, 40, pp. 13—20.

——1972, On the construction of objective theory: rejoinder to Syzmanski, *Sociological Inquiry*, 42, pp. 51—64.

Loubser, J. J., Baum R. C., Effrat, A., and Lidz, V. M. (eds) 1976, *Explorations in General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vols 1 and 2. New York: Free Press.

Luhmann, N. 1982,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 tr. Stephen Holmes and Charles Larmo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a, The paradox of system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In J. C. Alexander and P. Colomy (eds),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409–40.

——1990b, The direction of evolution. In H. Haferkamp and N. J. Smelser (eds), *Social Change and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79—93.

Lyotard, J. F.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ayhew, L. (ed.) 1982, *Talcott Parsons: On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In defense of modernity: Talcott Parsons and the utilitarian tradi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9, pp. 1273—1305.

——1990,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solidary public. In J. C. Alexander and P. Colomy (eds),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294—322.

Meyer, J. W. and Scott, W. R. 1983,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 Ritual and Rationality*. Beverly Hills: Sage.

Molotch, H. L., and Boden, D. 1985, Talking social structure: discourse, domination and the Watergate hearing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 pp. 273—88

Moore, B. Jr. 1978, *Injustice: The Social Base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 New York: Pantheon.

Munch, R. 1981, Talcott Parsons and the theory of action I: the Structure of Kantian lor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pp. 709—49.

——1982, Talctt Parsons and the theory of action II: the continuity of develop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 pp. 771—826.

——1983,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differentiation of interpenet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24, pp. 157—75.

——1986. The American creed in sociological theory. *Sociology Theory*, 4, pp. 41—60.

——1987a, *Theory of Ac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7b, The interpenetration of microinteraction and macrostructures in a complex and contingent institutional order. In J. C. Alexander, B. Giesen, R. Munch, and N. J. Smelser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319—36.

——1988, *Understanding Modernity*. London :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90a, Social change in the United States : the system of equality and inequality. In H. Haferkamp and N. J. Smelser (eds), *Social Change and Modernity*.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47—76.

——1990b, Differentiation, rationalization, interpretation :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society . In J. C. Alexander and P. Colomy (eds),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 :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441—64.

Orru, M., 1988, Review of *Talcott Parsons: On Economy and Society* (by Robert J. Holton and Bryan S. Turner)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The Marshall Lectur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53).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7, pp. 115—17.

Page, C H. 1985, On neofunctionalism. *Footnotes*, 13, p. 10.

Parsons, T. 1937,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Parsons, T., Shills, E., Naegele, K. D., and Pitts, J. R. (eds) 1961, *Theories of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Peters, J. D., and Rothenbuhler, E. W. 1988, The reality of construction. In H. Simons (ed.), *Perspectives on the Rhetoric of the Human Sciences*. London: Sage, pp. 11—27.

Prager, J. 1986, *Building Democracy in Ireland: Political Order and Cul-*

tural Integration in a Newly Independent N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ambo, E. 1988, Economic cultur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Rambo, E., and Chan, K. 1990, Text, structure and action in cultur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19, pp. 635—48.

Rhoades, G. 1990,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 J. C. Alexander and P. Colomy (eds),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187—221.

Ritzer, G. 1975, *Sociology: A Multiple Paradigm Science*.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85, The rise of micro-sociologic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3, pp. 88—98.

——1988, *Sociological Theory*, 2nd edn. New York: Knopf.

Robertson, R. 1982, Parsons on the 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of American religion. *Sociological Analysis*, 43, pp. 307—26.

——1985, The sacred and the world-system. In P. Hammond (ed.), *The Sacred in a Post-Secular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347—58.

——1986,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images of world order: a working pap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d Germ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Berkeley, California.

——1987, Globalization theory and civilizational analysis.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Review*, 17, pp. 20—30.

——1988, The soc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culture: some general consideration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5, pp. 3—23.

——1990, Globality, global culture and images of world order. In H. Hafer-

kamp and N. Smelser (eds), *Social Change and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395—411

Robertson, R., and Chirico, J. 1985. Humanity, globalization and worldwide religious resurgence. *Sociological Analysis*, 46, pp. 219—42.

Robertson, R., and Lechner, F. 1985, Modern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culture in world-systems theor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 pp. 103—18.

Rothenbuhler, E. W. 1986a.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al conflict.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St Petersburg Beach, Florida.

——1986b, Media events and social solidarity: an updated report on the living room celebration of the Olympic Game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hicago.

——1987, Neofunctio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In M. Gurevitch and M. R. Levy (eds), *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Yearbook*, vol. 6. Newbury Park, Cal.: Sage, pp. 67—85.

——1988a, Live broadcasting, media events, telecommunication, an social form. In D. R. Maines and C. Couch (ed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Springfield, IL.: Charles C. Thomas, pp. 231—43.

——1988b, The liminal flight: mass strikes as ritual and interpretation. In J. C. Alexander (ed.), *Durkheimian Soci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66—89.

——1988c, The living room celebration of the Olympic Gam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8 (no. 4), pp 61—82.

——1989, Values and symbols in public orientations to the Olympic media event.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6 (no. 2), pp. 138—58.

——n.d. Collective 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Pape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Iowa.

Schegloff, E. A. 1987. Between macro and micro: context and other connections. In J. C. Alexander, B. Giesen, R. Munch, and N. J. Smelser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07—34.

Schluchter, W. 1979, The paradox of rationalization. In G. Roth and W. Schluchter, *Max Weber's Vision of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1—64.

——1981, *The Rise of Western Rationalism: Max Weber's Developmental History*. (Translated by Guenther Ro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ciulli, D. 1985, The practical groundwork of critical theory: bringing Parsons to Habermas (and vice versa). In J. Alexander (ed.), *Neofunctionalism*. Beverly Hills: Sage, pp. 21—50.

——1986, Voluntaristic a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pp. 734—67.

——1988, Reconsidering interactionism's corrective against the excesses of functionalism. *Symbolic Interaction*, 11, pp. 69—84.

——1989, Theory of societal constitutionalism: foundations of a nonmarxist critical theory. Manuscript.

——1990, Differentiation and collegial formations: implications of societal constitutionalism. In J. C. Alexander and P. Colomy (eds),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367—405.

Sewell, W. Jr. 1980,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Structure and Mobility: The Men and Women of Marseilles, 1820—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kocpol, T. and Finegold, K. 1982, State capacity and economic interven

tion in the early new deal.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7, pp.255—78.

Smelser, N. J. 1959, *Social Chang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 New York: Free Press.

——(ed.) 1973, *Karl Marx: On Society and Societal Chan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Evaluating the model of 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 in relation to educational chang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J.C. Alexander (ed.), *Neo-functionalism*. Beverly Hills: Sage, pp. 113 -29.

—— 1990, The contest between family and schooling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In J.C. Alexander and P. Colomy (eds),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165—86.

Stockard, J., and Johnson, M. M. 1979, The social origins of male dominance. *Sex Roles*, 5, pp. 199—218.

Stryker, S. 1980,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 Social Structural Version*. Menlo Park, CA: Benjamin Cummings.

Surace, S. 1982, Incomplete differentiation. In P. Colomy (ed.), *Dynamics of Social Systems*, pp. 93—119.

Swidler, A. 1986, Culture in a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pp. 273--86.

Syzmanski, A. 1970a, Toward a radical sociology. *Sociological Inquiry*, 40, pp. 3—13.

——1970b, The value of sociology: an answer to Lidz. *Sociological Inquiry*, 40, pp.21—5.

——1972, Dialectical functionalism: a further answer to Lidz. *Sociological Inquiry*, 42, pp. 145—53.

Tiryakian, E. A. 1985, On the significance of dedifferentiation. In S. N. Eisenstadt and H. J. Helle (eds), *Macro-Sociological Theory: Perspectives*

on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1, Beverly Hills: Sage, pp. 118—34.

——1990, Dialectics of modernity: Reenchantment and dedifferentiation as counter processes In H. Haferkamp and N. J. Smelser (eds), *Social Change and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78—94.

Turner, B. S. 1986a, *Citizenship and Capital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6b, Personhood and citizenship.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3, pp. 1--16.

——1987, Marx, Weber, and the coherence of capitalism. In N. Wiley (ed.), *The Marx-Weber Debate* Beverly Hills: Sage, pp. 169--204.

——1989, Commentary: some reflections on cumulative theorizing in sociology. In J. H. Turner (ed.), *Theory Building in Sociology*.

Turner, J. H. (ed.) 1989, *Theory Building in Sociology*. Beverly Hills: Sage.

Turner, J. H., and Maryanski, A. 1988, Is "Neofunctionalism" really functional? *Sociological Theory*, 6, pp. 110—21.

Wagner, D. G. 1984, *The Growth of Sociological Theories*. Beverly Hills: Sage.

Wagner, D. G., and Berger, J. 1985, Do sociological theories grow?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 pp. 697—728.

Williams, R. M., Jr. 1961, The sociological theory of Talcott Parsons. In M. Black (ed.), *The Social Theories of Talcott Parsons*.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pp. 64—99.

Wippler, R., and Lindenberg, S. 1987, Collective phenomena and rational choice. In J. C. Alexander, B. Giesen, R. Munch, and N. J. Smelser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35—52.

Wuthnow, R 1988, *Meaning and Moral Order: Explorations in Cultural Analy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在美国社会学中的地位

在美国社会学学会1987年的年会上，召开了纪念《社会行动的结构》(以下简称《结构》)出版五十周年的会议，这个纪念会吸引了一大批充满兴趣的听众。如果这个纪念会早二十年召开，很有可能它将完全被《结构》本身的框架所限制。发言人将会把这本书看做是综合理论中的一种实践，看做是为经验社会学提供解释性框架的成功尝试。他们将会评价自1937年它出版以来，在经验和理论方面"进步"的程度，会提到该领域"近来的发展"，而且也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在这里、那里也会有严重的分歧)：在它出版二十年后，出现了重要的积累和阐发。换句话说，《结构》在那时会被看做是一个具有相对共识的首创性学科中的基础。甚至在六十年代中期，《结构》仍然被看成是帕森斯首先提出的框架：一种理论知识积累的框架，而只有在此框架的基础上，才能做出预言，并把它和社会科学家随后发现的经验现实(顺利地)进行比较。

与此相反，七十年代末，这样一个纪念会根本就不会存在。那时，本专业正卷入一场大规模的推翻《结构》的运动中。人们当时认为，这样做就能把本专业从功能主义致命的思想影响中解放出来。《结构》仍然被看做是综合性解释理论的实践——尽管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文献，如果说以前它还是符合经验现实

的模型，那么在当时，它已被广泛地认为不再适合于大多数的经验现实。那些领导这场战斗的理论家们——如古尔德纳、加芬克尔、布鲁默、吉登斯、科林斯等坚信，《结构》中清晰阐述的理论是社会科学应该并可能将会安全地丢弃的东西。 92

然而，到了九十年代末期，我们仍然要谈到《结构》，并且事实上是在纪念它。宣告《结构》的死亡确实为时过早，正如宣告帕森斯的死亡也过早了一样。实际上，除了哈贝马斯之外，在今日的欧美，很可能没有一个后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家比帕森斯更经常地被人谈起，尽管这种谈论比六十年代末的谈论肯定要更加深思熟虑、更有选择性。既然我提到了哈贝马斯，就让我说得清楚一点。如果不理解帕森斯的著作，谁能够明白哈贝马斯究竟说了什么？最近十年中，哈贝马斯认定，帕森斯不仅是他的黑格尔，而且是他的李嘉图，如果他的批判理论想要自由飞翔的话，他恰恰必须很好地吸收并质疑帕森斯的观点。

为什么现在要这样呢？为什么现在仍然要这样？要纪念《结构》——帕森斯第一本也是最好的一本专著——我们就必须回答这些问题。第一个答案相当明显：我们发现社会学家们谈论的经验问题仍然和《结构》中首次提出的问题明显相关，这种关系既有肯定性的，也有否定性的。1987年专题研讨会时我的一个同伴J.特纳，在1988年出版了《社会互动的结构》一书。他出版这本著作并不是偶然的，它标志着特纳用新作来反对他所认为的帕森斯分析行动的方法中表现出的一元论偏见。而且，特纳坚信，帕森斯1937年出版的著作依然很有名，这样他的文字游戏就会马上得到承认。在加芬克尔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同样的证据，表明《结构》在当代仍然很有影响。加芬克尔也是我在美国社会学学会纪念会讲台上的另一位伙伴。正如他（1988）所证明的，如果不理解常人方法学是从与帕森斯早期著作的对话中发展而来的，就

不能理解它的理论意义。实际上，加芬克尔仍然坚持，为了正确理解社会秩序的微观基础，我们必须理解为什么《结构》对它的解释是错误的。在本章的稍后我还将指出，大量其他的当代著作继续以同样的方式提出和证实他们的观点。

但是，帕森斯的早期著作在当代仍然具有意义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这不仅因为它仍然是重要的议题，而且与《结构》的早期概念有关。同时，我们现在对《结构》的影响的理解也更为成熟和准确。有了这些后经验主义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的武器，我们对理论化的理解与过去完全不同。我们不再倾向于认为理论是用来实际地检测经验目标的，这些目标被理所当然地看做是社会现实。相反，我们现在意识到，理论在解释对象的同时，也在创造对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93

在两次把《结构》中的概念等同于社会本身的超越阶段之后，我们开始同意，正是《结构》本身帮助发明了而不是简单地发现了经验宇宙，而这个宇宙，正是战后社会学所生活的、且大体上至今仍生活于其中的宇宙。因此，社会学并没有因为反对《结构》的预先假设、概念乃至它的思想历史而逃离《结构》。其原因在于，社会学至今所做的大部分工作依然处于同一个参照性框架之中，而在这个框架的构成中，《结构》占了很大一部分。如果说当代社会学是一种语言游戏，无论它有多少理性和科学的抱负，这种语言最重要的一些词汇却恰恰是《结构》所给予的。

凭借它的内在力量和外在的思想影响，《结构》在构建当代社会学的基本术语方面起了重要的甚或是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在二战后之间的这一时期，当代的"现代"社会学才开始起步。《结构》出版在古典阶段终结与战后之间的空白点上，它既是一个分水岭，又是一座沟通的桥梁。它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首先，通过选择和解释，它构建了经典的遗产，那是随

后的理论和经验社会学都要借鉴的。其次,它把"经典"转换成了一套特定的概念化的词汇,这套词汇大部分至今仍然有效。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结构》现在仍然是一本有活力的重要理论著作。其实,它本身也成了经典著作。①

我将依次指出这些上升为经典的途径。我将从把以前的理论化转换成新的、最终无所不在的理论词汇开始。这种以前的理论化,《结构》称之为"经典性"理论化。帕森斯在《结构》中的目标,不是简单地详细叙述——无论是历史的抑或是阐释学的——涂尔干、韦伯、帕雷托和马歇尔的"真实意义"。他想做的是展示他们已确立了一个新的概念主题。发人深思的是,在他开始论述这些作者之前,他花了一百多页的篇幅来揭示这个主题。他指出了以下三点: 94

1. 社会学是关于秩序问题的科学 帕森斯所说的霍布斯的问题可以这样来理解:是什么使社会整合在一起?武力还是欺诈,抑或两者都是?这两者都是对某些价值的共同信奉。但在欺诈的例子中,霍布斯的问题就被避免了。

2. 对秩序问题的任何解释都包括对行动的分析方法。如果要避免霍布斯的两难困境,那么必须保持行动的基本自由,也即帕森斯所说的"唯意志论"。而要保持这一点,就必须让行动的解释性(非理性)特点,即行动者为意义而奋斗为大家所接受。

3. 帕森斯的第三点把他的前两点结合了起来。如果行动者为意义而奋斗,他们就使自己趋向于那些提供价值标准的规范。由于这些价值标准得到了共同的承认,它们才可以被称为价值。通过价值的内在化,它们以反霍布斯的方式解决了秩序的问题。

① 有关社会科学学科如何通过话语建构起来的分析,参见亚历山大(1987b)。这种话语是有关那些得到了经典地位的人物的著作及随后的阐释的。

帕森斯继续有独创性地、杰出地但常常也是十分错误地表明，涂尔干、韦伯、帕雷托和马歇尔每个人发现和提倡的也正是这几点。

在《结构》出版后的半个世纪中，帕森斯对这三个中心问题的回答成为经验和理论社会学中三个最主要的也是争议最多的观点。对这些概念出现的领域，也即所谓的社会学史来说，这些概念与古典社会学的关系是重要的，也是令人困惑的。关于这一点，我还要回过头来进行论述。在这里，我首先谈谈这些概念的内部以及由这些概念本身所产生的论点。

对这个概念主题日益广泛的一种理解是，《结构》提出这些观点的方式创造了两种重要的二分法。

其一是冲突对秩序。帕森斯在撰写《结构》之前，没有这种"冲突理论"的洪水猛兽。当然，确实有些理论家强调冲突，如马克思；而另一些强调秩序与共识，如涂尔干。但这个问题从未以"某某理论"的名义提出。尽管实际上这并不涉及帕森斯自己如何提出这个问题，但在他的主张中，有一种强有力的亚文本许可了利用秩序与共识之间的二分法。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之间，达伦道夫、洛克伍德、雷克斯、古尔德纳、米尔斯写道，既有冲突理论也有秩序理论，而在它们二者之间的选择将界定宏观社会学的未来。[②] 按照他们的观点，

② 古尔德纳(1960)在他早期的文章中，试图划分一条微妙的界限，发展出"左倾的功能主义"。后来，他(1970)采用了传统的界线。洛克伍德的发展理论方向与之相反，他最早的著作(1956)中，强有力地断言冲突与秩序之间的二分法过于简单，后来又在系统和社会整合间作出区分，并以一种更为细致、复杂的方式批评了帕森斯对秩序的分析。这实际上是站在了帕森斯早期著作的基础之上(洛克伍德，1964)。而科塞(1956)则指责帕森斯只是个秩序理论家，他认为一种更为一般的功能主义能够成功地解决社会冲突的问题(具体参见科塞，1967)。

秩序理论完全只论及非理性的行动、价值与均衡;冲突理论则相 95 反,强调工具性行动、权力和无序。后一代的宏观社会学者,如曼、科林斯、蒂里和斯科克波尔所阐发的冲突和"结构"社会学,就力求建立在这种反唯意志论和反文化的基础上。他们的结论允许争论。在我自己的著作中(1998a),我主张在正在消失的文化和主观性方面,这些理论家犯了严重的错误。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意识到"结构主义"这种在当代宏观社会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源泉就直接地、辩证地与帕森斯1937年出版的著作有关。

《结构》在行动与秩序之间确立了二分法。尽管帕森斯提出了价值内在化的观点,他还是把个体努力和秩序化的社会结构权力联系起来了。他的批评者怀疑,在他那里,是否还存在真正的个体行动。按照我的观点,再一次地,这绝不是帕森斯的真正目的。那些想保留客观性而把帕森斯的著作称为"行动理论"的理论家们并不想排除个体行动本身。当然,用这种方式来看待《结构》仍然很有可能,而且整整一代的微观社会学家就是这么做的。[③] 对布鲁默、霍曼斯、早期的戈夫曼、后期的加芬克尔、R.特纳和西考莱尔来说,强调个体的、偶然行动的惟一方式就是使价值的影响和以前的社会结构本身中立化。结果是一项出色的研究工作,它详尽地阐发了个体行动者的互动策略、理性和

③ 有关帕森斯的行动理论和他的微观批评者同他的宏观冲突论的批评者之间的对话的深入分析,参见《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亚历山大,1987a)。我主张,尽管帕森斯著作中的关键性问题使这些批评部分地具有合理性,也使他们提供的反对方案部分地具有进步性,这些批评家还是把帕森斯当成了假想的对手,而随之提出了各执一词的理论。我认为,社会学理论以后的进步,必须超越这些批评家和帕森斯本身。当代的宏观社会学理论化在战后第二阶段所做的,正是要尝试发展出新的综合(见亚历山大,1988b)。

解释目标以及创造结构的能力。这项研究明确地表明了整个的经验领域，但它是通过把社会学一分为二做到这一点的。因为他们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理解《结构》的，这些有关个体互动的研究有力地深化、加强了微观—宏观的区分。当然，在目前情况下，他们是否误解了帕森斯并不重要，如果没有《结构》的框架，他们就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形成任何变革性的观点。④

我已指出，当代宏观和微观社会学的理论化和研究方案都产生于帕森斯基础性著作的规范。这种二分法——理论化正是围绕着它的——继续去激励、去困扰今日新的理论尝试。比如说，文化社会学这个新的子学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确立起来的。96 如果这个领域中的社会学家想要强调偶然行为和社会冲突，他们会不会觉得他们必须放弃对于价值和文化结构的关注呢？遵循这个已确立的宏观与微观社会学的颇具争议性的二分法，许多人主张（如斯威德勒，1986）放弃是必须的，而且事实确实如此。

如果宏观和微观理论化之间错误的二分法部分地是由于对帕森斯著作的错误阐释造成的，那么试图超越它们的努力也就

---

④ 加芬克尔坚持了这种论点（1988），主张在《结构》中，帕森斯忽视了"具体的"个体，他评价社会学只关注于分析性的、抽象的"单位行动"。在我看来，帕森斯主张的完全不同。他的观点是，当"具体的"个体——活的、生动可感的、不可挽回的等等——作为经验分析的论题时，它就不能以与各自独立的、自私的个体相等同的方式来设想。而后者，这种各自独立的、自私的个体，就是帕森斯所谓的"分析性个体"，只有这个才是他所要避免的。换言之，帕森斯采用分析性个人主义这种说法，是要使具体个体——真正的社会行动者具有更深的深度。然而，无论是在《结构》中还是在他后来的任何著作中，帕森斯都从未考察过真正的社会行动者行动的方式。在《微观—宏观之链》（亚历山大，1987；亚历山大和吉森，1987；亚历山大，1988c）一书的序言和文章中，我探讨了这个悖论。这个悖论给加芬克尔的批评某些凭证，但也避免了他的破坏性的简化论。关于加芬克尔著作趋向于简化论的深入探讨，参见亚历山大（1987a，第 238—80 页）。

将继续依赖于对帕森斯创建性工作的批评与修正。在反对否认价值的中心性时，阿切尔(1988)为文化社会学所构造的理论框架回到了帕森斯对文化与社会系统所做的根本区分，就一点也不令人奇怪了(参见艾森斯塔德，1986；亚历山大，1984)。[⑤]

在前文我曾指出，帕森斯对以前的思想的概念性转换并不是《结构》获得经典地位的惟一原因。另一个原因在于，在这部巨著中，帕森斯选择并阐释了后来成为社会学经典的众神殿中的各位先贤。但这里需要解释的是，帕森斯并没有把《结构》作为一种阐释，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经验性的发现。对于把它称作一种阐释的观点，我持反对意见：帕森斯对经典理论家的描绘是建构性的，并不是发现性的。这样，他对这些理论家的理论建构随之也必须被解构。

帕森斯在写此书之前，至少在说英语的社会学界中，这些作为《结构》的主要议题的理论家们并没有取得经典地位。帕森斯给了他们这种地位，并以一种创造性的但却充满了偶然性而又高度变化的方式解读了他们。社会科学学科是阐释学，而不仅仅是发现性的事业。他们的解释性、发现性理论植根于对关键文本传统的理解。换言之，社会科学发现以经典著作为文本媒介得以传承。随之而来的论争就是经典人物是谁，以及对甚至最具经验性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来说，他们的著作有什么重要意义。

在《结构》出版之后的几十年里，它逐渐被看做最为详尽的社会学史。这意味着任何其他版本的社会学理论和研究必须挑

⑤ 武特诺为文化社会学确立一个理论框架的努力明显属于第二种方法。因为尽管武特诺强调文化结构的意义，但是，他还主张建构与之互动的相对自主的文化模式(具体参见武特诺，1988，第66—90页)。

战它的阐释性观点。而这些挑战恰恰是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进行的(亚历山大,1987b)。如德里达所说,这场战斗不仅针对帕森斯文本中存在的东西,也针对那些不存在的东西(参见第六章)。

在战后立即推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和齐美尔的社会学变97 得很困难,部分地因为《结构》明显地忽略了马克思和齐美尔。理论家们分成了两个阵营,一边是古尔德纳、吉登斯和蔡特林,另一边是莱文、沃尔夫和科塞。但是,他们的目的都在于通过重新确立马克思和齐美尔的经典范例的合法性而使实践其社会学成为可能。在对马克思和齐美尔的著作进行阐释的漫长的几十年中,攻击和反攻击一直此起彼伏(参见第五章)。最终,说不可能把他们排除在众神殿的核心之外就足够了。比如,我自己关于马克思的著作(亚历山大,1982)就是从这个"反帕森斯"的前提出发的,尽管我补充了我所认为的《结构》的核心关注点,从而批评了马克思的成熟的社会学。

比尝试克服《结构》中不存在的观点更为有趣的,则是对已存在的观点所做的重新阐释。尽管涂尔干和韦伯在他们自己的民族传统中已失去了中心地位,帕森斯还是在学科的意义上成功地确立了他们在社会学中的核心地位。帕森斯后来的挑战者并不是寻求把这些理论家逐出万神殿,而是要重新阐释他们。反帕森斯社会学的每一个主要理论传统都通过用某种反帕森斯的方式来重新解释韦伯和涂尔干,并以此来证实自己,甚至那些彻底拒绝阐释科学合法性的实证主义传统也不例外。

一般来说,这些新的阐释表现为没有个人企图的解释。他们追求把其合法性确立于"更为客观"的解释之上,而不是奠基于被不同的理论利益所驱使的解释之上。他们通过强调自己更合于新的文本和学术事实的积累,以及更合于阐释方法论的发

展来做到这一点。但要解构这些阐释性的讨论并不十分困难。当我们进行解构时，我们可以发现，在实证主义术语"中立"或客观的意义上，这些阐释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客观的。实际上，他们离这些理想的距离，和帕森斯自己发起的阐释离这些理想的距离一样都很遥远。而且事实上，这些遭遇经典的人，从未真正面对"经典"本身，他们自己也要依靠文本的媒介，而这个文本就是帕森斯的《结构》。

帕森斯的"韦伯"(1937，第473—694页)是通过杰出的选择性解读建构起来的。韦伯被认为是专注于价值的，他的《经济与社会》在帕森斯那里只得到了草率的对待。帕森斯更进一步认为，韦伯的"卡里斯马"、"合法性"等概念与涂尔干著作中的"神圣性"和"道德权威"等概念相类似。希尔斯(1982)后来的宏观 98 社会学理论方案的核心就是这些有趣但相当牵强的观点，尽管他对韦伯的阐释不比帕森斯本人有更多的文本的实体化。艾森斯塔德继续在这种"韦伯派"的辩护中理论化，主张韦伯著作中的制度建构有一个神圣的"卡里斯马"基础(艾森斯塔德，1968)。

本迪克斯从事并组织了对韦伯更具策略和强调冲突的解读。认为本迪克斯(1962)的韦伯的"思想自传"是他反帕森斯立场的一个大纲，一点也不有损于其"思想自传"的伟大。后来，罗思(1968)挑起了这副学术重担，他为《经济与社会》所做的序言和解释标志着其评注的顶点。科林斯(1968)早期的政治社会学就基于本迪克斯和罗思的阐释。当印第安纳的一帮人在七十年代初解构帕森斯化的韦伯时(科恩等，1975)，他们只不过使这些主张中最广泛的共识定型化罢了。

帕森斯(1937，第301—450页)对涂尔干的阐释如同他对韦伯的解读一样，对确立战后社会学规范的功能框架十分重要。对这种阐释的挑战有两种形式。像本迪克斯(1971)、蒂里

(1981)和科林斯之类的学者，接受了帕森斯描述的要旨，认为涂尔干的方法对任何有效的宏观社会学都是致命的。另一方面，像古尔德纳(1958)、吉登斯(1972)和特劳戈特(1978)这样的阐释者，则认为帕森斯忽视了真正的、制度性的涂尔干，他们认为涂尔干接受了和马克思没什么两样的唯物主义冲突论。印第安纳的一帮人(波普，1973)再一次代表了这种解构"帕森斯化"的涂尔干的阐释的顶点。

我以为，战后对韦伯和涂尔干的阐释是一种与《结构》低声的但又不那么低声的对话。如果我说得不错，那就不应对近来重新确立宏观社会学的文化方面的努力变得更为肯定帕森斯最初的论断感到吃惊。在结构冲突理论目前的衰落中，韦伯具有不同的性质。近来德国人对韦伯的阐释——由施卢赫特、蒙克和哈贝马斯所做的——深深地受益于帕森斯，不仅仅受益于他《结构》中的框架，而且也受益于他后来勾勒出的演进史。现在"晚期涂尔干"的复兴作为文化社会学的一个范例(如亚历山大，1988d)，其出发点也是基于帕森斯对涂尔干后期著作中日益增多的象征方法的深入洞察。例如科林斯(1988)就非常肯定涂尔干的这些后期著作，并有条件地赞同了帕森斯关于由涂尔干所引发的政治社会学中的一些关键要素。

《社会行动的结构》是二十世纪社会理论中真正具有范式性的著作之一。事实上，和本世纪所有力图创新的社会思想家一样，帕森斯是带着一种时代的危机感开始他的研究的。怀着对十九世纪那种肤浅的、认为思想是循序渐进的理论的幻灭之感，他怀疑狭隘的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理性，也怀疑唯心主义幼稚的有机论的形式。他的目标是在一个更具实在论色彩的基础上确立理性的可能性。[⑥]凯恩斯的目标也基本相同，他的《就业、利息

⑥ 帕森斯(1937，第5页)写道："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已陷入越来越大的烈火

和货币通论》比《结构》早一年出版，在许多方面都和帕森斯的著作十分相似。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也基本上写于同一时期，他从非常相似的视角质疑了理性理论，而其提出的习俗化阐释替代物则显示出与帕森斯不同的侧面。胡塞尔的《笛卡尔的沉思录：现象学导论》代表了两次大战之间另一种分析理性的方法。这与《结构》在关键的方面很相像，尽管在其他方面，它也明显地背离了《结构》。所有这些巨著都认为，只要放弃前一框架——唯物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唯心主义的，那么自由和理性就可以被理论化地解释，并在社会上得以维持。如果说导致这些著作的创造的焦虑已经减少了，那么，它也决不是消失了。他们呼吁一种新的社会理论，直到今天，这还是十分有意义的。这也是社会学家们还要继续去阅读、赞美帕森斯的第一本巨著，并与之争辩的原因所在。 100

中，[而]理性的角色、科学知识的地位……又受到一而再、再而三的攻击："来自右边的威胁是纳粹主义——"我们已被反对智力的理论所吞噬"；而左边，是共产主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有机体的理论"。

参考文献

Alexander, J. C. 1982, *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 vol. 2: *The Antinomies of Classical Thought: Max and Durkhei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4, Three models of culture and society relations: toward an analysis of Watergate. *Sociological Theory*, 2, pp. 290—314.

—— 1985, Habermas' new critical theory: its promise and problem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pp. 400—25.

—— 1987a, *Twenty Lectures: 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87b, On the centrality of the classics. In A. Giddens and J. Turner (eds), *Social Theory Toda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1—57.

—— 1987c, Action and its environments. In J. C. Alexander, B. Giessen, R. Munch, and N. J. Smelser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89—318.

—— 1988a, Social structural analysis: presuppositions, ideologies, empirical debates. In J. C. Alexander, *Action and its Environments: Toward a New Synthe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11—35.

—— 1988b, The new theoretical movement. In N. J. Smelser (ed.), *The Handbook of Sociology*. Los Angeles: Sage, pp. 77—101.

—— 1988c, *Action and its Environments: Towards a New Synthe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lexander, J. C., and Giessen, B. 1987, From reduction to linkage: the long view of the micro-macro link. In J. C. Alexander et al.,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44.

Archer, M. 1988, *Culture and Agenc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ndix, R. 1962, *Max Weber*. New York: Doubleday.

—— 1971, Two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In R. Bendix and G. Roth, *Scholarship and Partisanship: Essays on Max Webe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82—98.

Cohen, J. Hazelrigg. L. E., and Pope, W. 1975, De-Parsonizing Weber: a critique of Parson's interpretation of Weber's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0, pp. 229—241.

Collins, R. 1968,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political sociology. In R. Bendix et al., *State and Socie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42—67.

—— 1988, The conflict tradition in Durkheimian sociology. In J. C. Alexander (ed.), *Durkheimian Sociology: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07—28.

Coser, L. 1956,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 New York: Free Press.

—— 1967, Introduction. In L. Coser, *Continuities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onflict*, New York: Free Press, pp. 1—14.

Eisenstadt, S. N. 1968 (ed.), *Max Weber on Charisma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6, Cul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 pp. 278—320.

Garfinkel, H. 1988, Evidence for locally produced, naturally accountable phenomena of order, logic, reason, meaning, method, etc., in and as of the essential quiddity of immortal ordinary society (I of IV): an announce-

ment of studies. *Sociological Theory*, 6 (no.1), pp. 103—9.

Giddens, A. 1972,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uldner, A. 1958, Introduction. In E. Durkheim, *Socialism and Saint-Simon*, Yellow Springs, Ohio: Antioch, pp. v—xxix.

—— 1960, The norm of reciproc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 161—78.

——1970,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Equinox.

Lockwood, D. 1956, Some remarks on "the social system."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7, pp. 134—46.

——1964, Social integration and system integration. In G. K. Zollschen and W. Hirsch(eds), *Explorations in Social Change*, Boston: Little, Brown, pp. 244—57.

Parsons, T. 1937,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Pope, W. 1973, Classic on classic: Parsons' interpretation of Durkhei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 pp. 399—415.

Roth, G. 1968, Introduction. In G. Roth and C. Wittich (eds),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pp. xxxiii—cx.

Sciulli, D. 1985, The practical groundwork of critical theory: bringing Parsons to Habermas (and vice versa). In J. C. Alexander (ed.), *Neofunctionalism*, Beverly Hills and London: Sage, pp. 21—50.

Shils, E. 1982,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widler, A. 1986, Culture in a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pp. 273—86.

Tilly, C. 1981, Useless Durkheim. In C. Tilly, *As Sociology Meets Hist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95—108.

Traugott, M. 1978 (ed.), *Emile Durkheim o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urner, J. 1988.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Intera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uthnow, R. 1988, *Meaning and Moral Orde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5

“形式社会学”并非多维度的：帕森斯有关齐美尔的片断“解码”

在任何有关社会学经典的争论中，致力于对帕森斯的阐释就要涉及到当代社会的性质。尽管肯定是文本的而不是经验的，在社会学发展中，这种普遍性话语的重要性不亚于研究方案（参见第二章）。换言之，文本的论争是发展社会学理论的主要方式。

在经历多年常常是极度歪曲的阐释之后——既有来自朋友的也有来自敌人的——第一流的帕森斯研究正在出现，它们本身就是阐释理论的贡献（霍尔顿和特纳，1986；罗伯特森和特纳，1991；沃恩，1989；温策尔，1990）。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在寻找的帕森斯早期手稿《社会行动的结构》中“丢失的片断”：《乔治·齐美尔和费迪南德·滕尼斯：社会关系和行动的因素》，终于在《社会学原理》上发表了，这为我们提供了结束早期阶段最为持久的一场论争的机会，而且可以补充近来的研究工作。

众所周知，帕森斯并不满足于他在《结构》中发展出的理论——“行动理论”，仅仅在话语的或分析的或阐释学的领域具有合法地位，他也致力于提供他所描绘的“经验性证据”。他主张，当时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们的理论都“统一”在同样的行动要素上。这个雄心勃勃的历史性主张为帕森斯的批评家们敞开了大门。他们只要证明，在帕森斯所探讨的理论家之外，也有伟

大的理论家，其著作并没有统一在他展示的分析要素上就可以了。[1] 一个突出的挑战其经典地位的人就是马克思，不过他和帕森斯1937年的著作中高度评价的思想家——韦伯、涂尔干、马歇尔和帕雷托——并不属于同一代人。更好的候选人则是齐美尔。他也是同一时代一位伟大的理论家，但他被遗漏了。这正是我们研究的起点。 104

从五十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帕森斯理论的批评家认为，遗漏齐美尔实际上意义重大。他们主张，齐美尔在《结构》中的缺席，使帕森斯与世纪之交的一场重要的思想运动隔绝开来，而这场运动正是他综合的目标。由于帕森斯的著作中没有包括齐美尔，在很多方面，像齐美尔所揭示的许多重要因素，比如社会的结构和物质方面，冲突、交换和层级的现象，以及具体化乃至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相关的互动等方面，他就不能展开讨论或至少谈论得不太正确。莱文(1980；比较亚历山大，1989)就是这种主张最著名的阐释者，而科塞(1956)影响极大的《社会冲突的功能》也基于类似的基础。本迪克斯和沃尔夫以前翻译了齐美尔的文章《冲突和群体联系网》(1955)，他们的译本也有相同的基础，除了莱文，对科塞、沃尔夫和本迪克斯来说，齐美尔为新产生的"冲突理论"提供了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版本，这是五十年代对帕森斯思想的第一个挑战。他们确信，齐美尔的冲突理论可以替代达伦道夫、洛克伍德和雷克斯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冲突理论。

这桩"丢失齐美尔"的重要性的公案在假设中探讨了三十多

[1] 他们当然也可以证明帕森斯所探讨的一位理论家实际上并未趋向统一。这也确实是波普和他的同事在七十年代向帕森斯发起的一种最为机械的挑战的策略，其目标是解构帕森斯化的韦伯和涂尔干。

年，这类讨论在社会思想史上还有很多。有时候，帕森斯的批评者认为他不知道齐美尔，有时候他们又认为帕森斯害怕提到齐美尔，因为那样做会证明他早期的理论是错误的。但是，接下来发生了非同寻常的事情。现在我们可以了解到帕森斯究竟如何看待齐美尔，而且帕森斯的思考已经十分接近出版的形式了。当然，手稿的存在如果不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丢失齐美尔"的重要性的讨论的话，它也使我们能够更为现实地检验这些主张。

首先，我指出这些批评的一个特点。尽管是帕森斯在《结构》中的探讨的批评者们首先发难的，但这些批评者们自己却接受了那种趋向统一的经验主义认识论，而这也许是这本巨著最大的弱点(亚历山大，1989)。实际上，他们认为，如果把齐美尔105 包括进来，帕森斯的材料库就会完全不同。新的材料将会改变帕森斯的归纳，从而产生新的理论。这种主张其实默认了帕森斯的自我表白：他正在进行的是经验实践而不是阐释学实践。首先，它假定帕森斯在写作《结构》之前，头脑中至少还没有"行动"理论的轮廓。其次，它假定"齐美尔"作为一个对象，其理论意涵对观察或阐释来说都是明确的。

手稿片断的发表表明这些假设都是错误的。如果帕森斯把齐美尔纳入了他雄心勃勃的阐释中，他的理论并不会发生变化。因为帕森斯并没有忽略齐美尔，他根本就不同意齐美尔的观点。这就是他把齐美尔排除在《结构》之外的原因。帕森斯坚信，只有以正确的方式"统一"的理论才能被包括进来，从而组织成统一的叙述。这是一个超越阐释之上的信念问题。其实，在本章的结尾我将指出，通过不同的阐释，齐美尔可以很容易被帕森斯统一的大磨磨成粉末。

原创性的理论家写作和思考的时候会使用他们自己发明的符号。如果不熟悉他们的著作，这些著作简直就像神秘的天书。

帕森斯不仅发明了艰深的代码,而且作为天生的体系性思想家,他有一种可悲的倾向,要在代码中用表面客观的因素来揭示他的理论趣味。在这种情况下,代码可能表达了他自己不敢说出的意涵与判断。

帕森斯有关齐美尔的片断弥漫着这种伪装的客观化策略。因此,帕森斯看上去把大部分的精力花在了齐美尔相对不太重视的领域,而忽视了齐美尔理论主题中最好的靶子。帕森斯的理论基调含糊而中庸,他本人则隐藏在他的代码之后。但是,如果我们理解他的语言就会发现,帕森斯所传达的信号实际上已经指出,齐美尔犯了最根本的理论错误。

帕森斯对齐美尔形式社会学的批评,看上去瞄准的是那些有关科学方法论和维持学科界限这类抽象的、相对较为局限的论题。他认为齐美尔误解了科学中"突变论"的性质。[②] 由于这种错误,齐美尔不能发展出解释性理论,并随之导致形式社会学仅仅是一种描述。由于这些原因,齐美尔的理论不能帮助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抗衡。 106

这些主张是形式主义的而不是实质性的,而且它们也有一定的倾向性。我们将会看到,在某些地方,帕森斯本人也承认了齐美尔"形式"的突变性,这种性质在解释的意义上达到了一种新的因果关系的水平。由于形式社会学是以这种方式建构的,因此它几乎不可能仅仅是一种描述。更进一步地,虽然帕森斯通过与自然科学实践相类比来使社会学合法化的尝试极其精致,但对我们今天来说,它已完全落伍了。他尝试以这种类比为基础,来捍卫该领域独特的科学地位则更是不合时宜的。

虽然这些有关科学和社会学的话语本身并不令人信服,但

---

② 所有对帕森斯的引用均出自帕森斯论齐美尔的文章(1993)。

在帕森斯早期著作中发展形成的那套复杂代码里，它们却是重要的因素。它们既遮掩又暗示着帕森斯对齐美尔形式社会所持的更为根本的、实质性的有所保留的态度。

在帕森斯的代码中，方法论和理论、形式和内容方面的论题是小心翼翼地缠绕在一起的，这种缠绕的方式可以用帕森斯在《结构》中使用的一些词汇很好地展示出来。这是一些他用来总结他不喜欢的理论对手的词汇："后实证主义的功利主义"。正如语词的组合所暗示的，帕森斯把实证主义看成是行动和秩序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分析方法的必要组成部分，而这种方法正是他与之论战的。至于实证主义，帕森斯坚信，它诱使理论家接受表面现象，而不能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论优先的原则，重新分析性地建构那些理论原因。正是这种在分析性的重新建构方面的失误，导致人们接受理性主义的个人主义，而功利主义正是基于这种个人主义之上。

在观察和理论建构的关系上，帕森斯采取了不太有反映性的经验主义观点来反对个体主义社会理论，认为理论家不应被外表所迷惑，而相信"具体的"或"经验的"行动者在分析意义上才是事实上的个体。确切地说，经验性个体必须被理解为在偶然行动和人格层面上具有突变性的社会建构，这种建构则是由社会价值因素提供的基石所构成的。帕森斯也以同样的方式反对理性主义理论。像经济交换这种行动，如果看上去完全是功利主义的，这仅仅是因为理论家以经验主义的方式从外部来看待它们。如果以更具分析性的观点来看，每一个"单位行动"都由许多不同的因素构成，其中不仅仅是理性因素。规范、价值、工具、目的和努力这些因素都是存在的，此外还包括彼此之间的张力以及与各种物理和非物理环境之间的张力。

107

帕森斯提出这些批评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建构一种更科

学、实证主义色彩不太强的人文研究，其成果当然也能帮助社会学抵御经济帝国主义。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同样十分明显的是，他使用这些方法论的证据，就像他使用历史的证据一样，是要构筑一个研究个案来反对理性主义、唯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这都是他出于更为实质性和预先假设的原因所要反对的思想。用分析性的术语来说，帕森斯并不相信在那个时代具支配地位的理论对客观与主观、个体与集体基本上二分的看法，虽然他也承认存在着强有力的社会力量推动着这些术语的经验性指代物进一步分离。在规范领域中，帕森斯还相信，理性主义、唯物主义和个人主义理论扮演了危险的社会角色，它们不仅削弱了社会理论，而且还削弱了工业社会本身的学习能力和思考反省的能力。

换言之，最终一切都很清楚，在帕森斯的理论代码中，方法论和学科的论题是能指而不是所指。类似地（有时并不是全然有逻辑地），它们也与令人信服的实质性论题和终极价值相关联，帕森斯和他的对手争论的术语是理论、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对他来说，综合性的社会理论不仅是创造一个更具整合性的社会学的手段，也是创造一个更具整合性的社会的手段。

这样，关于帕森斯对齐美尔的批判，我们就不仅仅要从这些批评性意见内部获得信息，而且要根据它们在帕森斯的元符码中的象征性所指来理解。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意识到，帕森斯之所以反对齐美尔的方法论假设和理论建构的方法，是因为他相信它们是实质性约定的源泉，而这些约定和他整个早期著作一直在批评的十分相似。实际上，帕森斯对韦伯的方法也有非常类似的批评（主要指这个片断中的）。因为尽管帕森斯对"其他"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深怀敬意，他还是放弃了韦伯现代社会理论中的客观化和工具性要素。帕森斯不仅把这些要素上溯到

108 了实质性的理论约定或预先假设，而且上溯到了方法论论题，甚至上升到了韦伯在其解释性建构单位中所使用的“类型”而不是“分析性”的概念(参见帕森斯，1947，第22—29，58—60页)。他指责韦伯是描述性地思考而不是分析性地思考，韦伯天才的历史卓识只有按照非经验性的指代物——行动变量——来改造，才有可能保留下来，而这种行动变量就存在于组成日常生活的可见的互动单位的类型化之下。从实质上讲，帕森斯所反对的是韦伯关于现代社会是个“铁笼”的概念，但他只从形式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认为这是韦伯的方法论错误的结果，是他对社会学理论建构的误解所导致的。

在这个手稿片断中，帕森斯在探讨齐美尔著作的开始部分，其实承认了其形式探索确实包含着从“具体的存在”也即仅仅是经验性的现象而来的抽象。但他接着论证道，这些早期的讨论并不是真正抽象的，因为齐美尔是从“具体动机”的种类开始分析的。这种经验主义意味着齐美尔只能提出“具体行动的种类”的概念。对于这种方法，帕森斯含蓄地批评它加强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等领域之间的传统的二分性学科界线。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其实帕森斯早就认识到了，这并不是齐美尔形式社会学的旨趣所在。齐美尔的目的实际上是要把社会学创造成一种后实质性的跨学科方法来避免学科间的冲突。然而，当帕森斯真的接受了齐美尔著作的实际要旨时，他也坚持用同样的符号化术语来重述他的批评。

帕森斯现在承认，齐美尔形式社会学的对象，“社会关系”，实际上确实意味着突变性，而“形式”则似乎与他自己提出的社会学理论的分析重心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但是他还是从这种乍看起来相当罕见的批评转向了对它的放弃。帕森斯指责齐美尔的形式“不是别的……只是社会关系的结构方面”。他接着声

称，由于突变性的存在，结构只有通过其各部分来解释，因为结构本身并不构成因果关系，它们不能发挥独立变量的作用或为"解释理论"提供基础。帕森斯把齐美尔的形式结构比作瀑布，认为"没有哪个科学家会把[这样的]形式看成独立的要素"。这 109 是由于结构形式的变化可归因于其内部组成部分的变化，而不能归因于它自己的突变性。帕森斯因此坚持齐美尔的"形式"只是"附带的"。

这种论证当然是错误的。其文本的错误在于它前后矛盾。它否认了开始曾承认的突变论，但后来又承认社会结构其实具有突变性。其经验的错误在于，正如齐美尔有力地表明的，社会关系的形式确实存在结构，此结构不仅规模一定，而且在对社会生活的解释中构成一种独特的原因。

为什么帕森斯的论证如此漏洞百出？这是因为齐美尔的理论唤起了他更为广泛的理论代码中的核心术语。当帕森斯试图论述齐美尔的结构形式主义并不是分析性的，而只是描述性的时，这种广泛性就表现得更为明显。"确实，"帕森斯承认，"'关系的形式'不是一个具体的描述范畴……但它并不是我们意义上的分析要素。"这就是帕森斯的问题所在。他承认了齐美尔形式的分析性，但是他也承认，这并不符合他所主张的分析性理论所意指的理论范畴的标准。当他坚持齐美尔的范畴在"我们"的意义上是分析性的时候，他其实是指出了此前或此后他都从未承认过的一种不同的分析性理论的可能性。实际上，他很快就摒弃了这种可能性，而认为如果齐美尔的形式不是描述性的，至少(也许因为它不是"我们"意义上的分析性)它们也有"描述性的方面"。这种有保留的范畴表明，帕森斯正与某种向他自己的理论代码的形式主义提出挑战的东西作斗争。帕森斯的问题在于，尽管齐美尔的社会学在哲学意义上是分析性的，它也没有揭

示出帕森斯认为的反经验主义立场所意指的更具实质性的预先假设的性质。齐美尔强调冲突和交换。难道这就意味着"反实证主义的功利主义"是可能的吗？事实上，帕森斯坦率地承认了"尽管它（齐美尔的形式理论）具有抽象性，它的抽象模式直接穿越了分析的界线而进入了行动要素，而行动正是我们的主要关注点"。帕森斯把"行动要素"理论化是为了超越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理论。如果我们理解此处更为广泛的代码，就能明白帕森斯在这里真正要抱怨的，是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没有向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发起挑战，至少没有像他本人一样发起挑110 战。

当帕森斯把齐美尔的形式和"普通经济理论"中的结构性概念"劳动分工"和"交换"联系起来时，被帕森斯的批判所掩盖的东西开始显露出来。他认为这些概念是抽象的，或是更小的部分相互作用的一种"结果"，或者是"互动"。换句话说，根据帕森斯经济行动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因素的综合的理论，这些形式结构必须被看做经济行动。事实上，他接着坚持说，由于互动可能会包含行动要素中不同的加权，齐美尔形式社会学中的主要概念如劳动分工、交换和契约关系等过程根本没有任何一贯的经验形式。换言之，它们没有恒定的社会形式。帕森斯引用了涂尔干对契约中非契约因素的强调作为证据，并以此来指责齐美尔认为契约和冲突可以仅仅根据其形式去分析。另外，他还含蓄地指出了非理性的因素："如果在大规模的个体关系中存在着契约要素，那么在同一个社会系统中，就必然存在其他因素，它们依照不同的秩序而不依据契约关系来组织。"当帕森斯坚持仅按契约来思考就是"按契约各方特定的利益"来思考时，他把齐美尔的形式理论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在这些个体利益之"上"，必然存在一个要素，而对此他在其他著

作中已有过相当深入的论述。而帕森斯在《结构》和其他著作中(1990[1934]；亚历山大，1990)，认为与行动中的规范要素一致的是"制度性"要素。这样，帕森斯所说的"我们意义上的分析性"就完全清楚了，它指的是区分行动的经验要素，如工具、情境，以及非经济要素，如目的、规范的能力。

既然我们已解开了代码，我们就能明确地知道帕森斯究竟在哪些方面反对齐美尔。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正是由于它的形式特性不能阐明那些重要的过程，如冲突、交换和契约签订等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工具性的，是内在冲突的抑或是由媒介所规范的，乃至可能是综合的。正如我下文将要指出的，尽管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实际上强调规范性要素，但他选择了形式其实就意味着相反的方面，这一点可以从其对当代社会学的影响上看出来。科塞用齐美尔来证明事实上每一个重要的过程都可以理解为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敌对策略。霍曼斯则用齐美尔来作为只关注功利主义交换和个体互动而不关注群体团结或制度的依据。 111

这些齐美尔派的方法与非齐美尔式的冲突和交换理论一起，确实受到了帕森斯所说的问题的困扰。它们抽取了现实行动的形式，但拒绝深入到冲突或交换片面的外表之下去发现那里的规范性和集体因素，因为每一种冲突都受到了社会整合的媒介的重要影响。正如伊凯(1974)在二十多年前所说的，这也恰恰是为什么除了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传统之外，社会交换理论从莫斯开始一直到列维-斯特劳斯也发展出另一个传统的原因所在。换句话说，交换的经验过程可以用不同的独立的理论来阐释。帕森斯对齐美尔的最终回答是："原则上，行动的所有要素都与理解任何特定的'社会形式'有关。"这样看来，帕森斯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发展出他自己的"普遍性的交换媒介"来推

翻简单交换的理性概念，并阐发了超个体控制的复杂性，就一点也不偶然。

在这篇高度符号化的文章中帕森斯曾赞扬齐美尔，以为他“出色”的文章在“所谓的特定的社会形式方面”“充满了启发和卓识”。[③] 而在另外的地方，他则指出，甚至齐美尔也被迫在这些实质性的文章中去参考非形式的要素，特别是历史的特殊因素和动机。帕森斯最后得出结论说，齐美尔的这些文章“对我们的目的来说，能起的作用相对很小”，因此几乎完全没有去讨论它们。这真是个耻辱，因为实际上帕森斯所说的比他所意识到的还要深刻。这是由于尽管齐美尔的理论具有明显的形式性质，但在交换和冲突理论中，齐美尔还是被迫超越了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要素，而这正是由于这些过程的“形式”引起的。

例如，虽然齐美尔能够区分出冲突的类型，用形式的术语来表达它们不同的结构，但如果他不参考随历史变化的文化限制的不同影响，他就不能解释这些冲突为什么具有这种不同的形式。在这样的讨论中，齐美尔确实发展出了一套原创性的理论，来分析高度概括的、普遍性的文化因素的媒介作用。他把这些称为“观念”(concept)，而把它们描绘为像“人”、“女人”、“权利”、“工人”之类的概念(notion)。齐美尔认为，其实正是这些广泛承认、非常普遍的观念(idea)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导致了整合与竞争而不是分化与演化。从经验角度看，齐美尔无疑对这些文化限制的影响过分乐观了。但是，按照他的思路，他指出的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系统的相互渗透，而这恰恰是帕森斯反二元

③ “所谓的”极为发人深省。对帕森斯来说，齐美尔的文章不可能同时既是有关社会组织的形式主义的，又是杰出的、富有启发的，只有避免了形式主义，才可能得到正面评价，因此这形式主义只能是“所谓的”。

论的行动理论所希望提供的。

有必要指出的是,"形式社会学"并没有穷尽齐美尔的学术雄心,他还曾提出过文化研究的建议。但是,因为他认为制度分析可以不依赖于对特定历史意义的形式关注而进行,这个遗漏对随后的社会学思想造成了否定性影响。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说,虽然他的主张是专断的,但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却与他的"文化社会学"彼此高度渗透。如果帕森斯更仔细地、少带学术偏见地去解读齐美尔,他也许能意识到这种渗透。如果他意识到了,他也许会发动一场更为紧迫、也持更多赞同的评论。因为事实上,齐美尔肯定是作为众神殿的奠基人之一而卷入帕森斯在世纪末社会学中所发现的那种统一之中的。但是帕森斯却满脑子想着为"形式社会学"一派提供一种替代物(帕森斯,1979)。这样,除了派别的界线,他在齐美尔身上就不可能看到别的东西了。

在这概要性的一章的开始,我曾断言,要阐释帕森斯同时也就是探究当代社会。我已说过帕森斯与"齐美尔"的论战是一种整合、丰富社会,乃至使社会复杂化的努力。在这个手稿片断的结尾处,帕森斯认为滕尼斯对社会和社区的区分代表了二分性的、"类型化理论"的一个主要例子,而这正是他尖锐地批评齐美尔的地方。在《结构》一书有关滕尼斯的部分中,帕森斯表明了这对著名的自相矛盾的概念如何削弱了现代人对现代"全社会"(如社区)生活中规范性整合的一贯作用的理解力。帕森斯有关职业和现代共同掌权的理论中充满了这种一贯性。在这些理论中,帕森斯指出理性权威如何为非理性的团结契约形成参照,而正是这些契约导致了现代反权威的合法标准。在六七十年代,这种思想方式在帕森斯"社会共同体"的概念中定形下来。当然,这个概念是否是他对当代宏观社会学惟一的重要贡献仍然

113 可以讨论。

帕森斯所说的社会共同体指的是当代社会中的一种活动场所，它在终极价值与金钱、权力、个人化和偶然冲突等实际现实之间充当媒介。正是团结领域为社会共同体提供了规范的标准，以至于它们可以从其他空间和先天的纽带(ascriptive ties)中分化出来而成为社会生活中一种解放和民主的力量。[1] 帕森斯用这个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歇尔那种相当狭隘的公民资格的概念，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少数民族和种族冲突、宗教宽容以及法律的作用的研究。我坚信，正是在这里，帕森斯在学术生涯初期批

114 评齐美尔的那种深奥的、令人费解的语言得到了实际的体现。

---

[1] 在科恩和阿拉托(1992)极为有趣和雄心勃勃的近著中，他们令人信服地论证道，对伴随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而出现的思想方法来说，帕森斯"社会共同体"的理论可以说具有独特的贡献，在今日拉丁美洲和东欧的社会民主运动中，这种市民社会理论已得到了具体体现。的确可以这样说，帕森斯的社会共同体为今天市民社会的社会学理论提供了惟一可行的出发点。这些年来，新功能主义者实际上已通过一系列松散关联的理论、历史和当代的社会学研究做出了这一论证。梅休(1992)已在英国清教主义和现代早期自由主义中重新发现了这种社会共同体的起源。苏果(1992)按照过程论(procedeuralism)重新界定了社会共同体，并发展出"社会立宪政体"的理论，希望能对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权威主义问题做出解释与评价。在我自己的著作中，以前我用社会共同体的概念发展出了新功能主义分析新闻媒体(1988a)和排斥少数民族问题的方法。最近(亚历山大，1992；亚历山大和史密斯，1993)，为了发展出一种更具文化性、制度性和论战性的市民社会理论，我试图拓宽这一概念，参见下面第九章，特别是第221—8页。

参考文献

Alexander, J. C. 1988a, The mass news media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J. C. Alexander, *Action and its Environmen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108—52.

——1988b, Core group, ethnic outgroup, and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n J. C. Alexander, *Action and its Environmen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78—106.

——1989, Against historicism/for theory: reply to Levine. *Sociological Theory*, 7, pp. 118—21.

——1990, Commentary: structure, value, and action: on Parsons' "Prolegome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 pp. 339—45.

——1992, Citizen and enemy as symbolic classification: on the polarizing discourse of civil society. In M. Fournier and M. Lamont (eds), *Where Culture Talk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89—308.

Alexander, J. C., and Colomy, P. 1992, Traditions and competition: preface to a postpositivist approach to knowledge cumulation. In G. Ritzer (ed.), *Metatheorizing*. London and Los Angeles: Sage, pp. 27—52.

Alexander, J. C. and Smith, P. 1993, The discourse of American civil society: a new proposal for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Society*, 22, pp. 151—207.

Cohen, J., and Arato, A. 1992,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Boston: Beacon Press.

Coser, L. 1956,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 New York: Free Press

Ekeh, P. 1974, *Social Exchange Theory: The Two Tradi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lton, R., and Turner, B.S. 1986, *Talcott Parsons on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evine, D. N 1980, Introduction to the Arno Press Edition. In D. N. Levine, *Simmel and Parsons*, New York: Arno Press, pp. iii—lxix.

Mayhew, L. 1992, Political rhetoric and the contemporary public. In P. Colomy (ed.), *The Dynamics of Social Systems*, London and Los Angeles: Sage, pp. 190—214.

Parsons, T. 1947, Introduction. In M.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pp. 3—86.

——1979, Letter to Jeff Alexander. Unpublished manuscript, January 19.

——1990[1934], 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social institu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 pp. 319—33.

—— 1993, George Simmel and Ferdinand Tonnies: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elements of action. *Teoria Sociologica*. no. 1, pp. 45—71.

Sciulli, D. 1992, *Theory of Societal Constitutionalism: Foundations of a Non-Marxist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bertson, R., and Turner, B.S. (eds) 1992, *Talcott Parsons: Theories of Modernity*. London and Los Angeles: Sage.

Simmel, G. 1955, *Conflict and the Web of Group Affiliations* (translated by and introduced by Kurt and Wolff and Reinhard Bendix. Introduced by Everett Hughes.) Glencoe, IL: Free Press.

Wearne, B. 1989, *The Theory and Scholarship of Talcott Parsons to 1951*.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nzel, H. 1990, *Die Ordnung des Handelns: Talcott Parsons' Theorie des allgemeinen Handlungssyste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6

论个人对学术先驱的选择：为什么卡米克误解了帕森斯的早期作品？（与肖尔蒂诺合著）

1992年，对《社会行动的结构》的学术地位，卡米克在《美国社会学评论》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并且可能是很重要的观点。他拓展和提炼了一系列有关帕森斯的重要论述，并指出帕森斯在这部富有开创性的著作中之所以选择这些思想家——马歇尔、帕雷托、涂尔干和韦伯——来对话，不是因为他们的理论跟帕森斯的研究有内在的关联，而只不过是“名气”使然。他宣称，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美国的制度经济学家——在内在理路上才跟帕森斯相关，但是帕森斯对他们视而不见，因为在美国，特别是在帕森斯“置身其中”的哈佛大学的权威人物当中，这些人的声望已是昨日黄花。卡米克断言，帕森斯选择欧洲人作为他的学术先驱——也可以补充说，作为他的论辩对象——是因为这些人在那些控制着他命运的人中间备受推崇

这个分析如若正确，那现行的很多关于帕森斯行动理论的著述就不得不重写。但是，卡米克的观点的意义超越了帕森斯研究者这个相对较小的群体。如果说他对帕森斯所持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社会思想史和知识社会学的一些核心立场也不得不被抛弃。卡米克的研究是一项理论性研究：帕森斯的著作被视作一个经验的范例，来说明不仅是社会学理论所心仪的谱系 117 需要重新定位，而且社会学学科本身的意义和特性也需要如此。

因此，卡米克的研究就意味着不只是对帕森斯的生平和学术论著做一种独特的解释。它还意味着，在方法论层面上，他以带有浓厚历史主义的方法对待科学观念的诉求；在理论层面上，他以一种精妙新颖的工具主义方式进入知识社会学。

我们认为，这样一个复杂而深思熟虑的研究计划应该得到比迄今更多的关注；并且主张，卡米克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有缺陷的。缺陷不仅存在于它提出的关于帕森斯的历史解释，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存在于它所依赖并力图表达的整个学术形成理论当中。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们将批评性地概括卡米克的研究，讨论选择学术先驱这个问题在社会学中的重要性，并总结卡米克对帕森斯思想的早期发展的历史重构。然后，我们将深入分析卡米克本人提出的帕森斯为什么会那样选择其学术前辈的原因。我们怀疑——主要是以奥卡姆剃刀的方式——卡米克对帕森斯生平和著作所做的历史解释，但是我们也揭示了在这种经验研究之下经常暗藏着的理论假定。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分析，到最后说明对经典论著的读解互有争论，通常并不是——我们这个个案肯定不是——因为历史真相的不同，而是因为研究社会理论各自所用的方法不同。

卡米克的研究：一个批评性的总结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起，卡米克就围绕帕森斯的生活、著作和理论遗产开始了这项雄心勃勃的研究。他重点关注的是以《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下文简称《结构》)为顶点的早期阶段，他将帕森斯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论立场放入历史的脉络(卡米克，1987，1989)，编辑了以前未出版的一些资料(卡米克，1991)，把鲜为人知的文章系统地整理成册(卡米克，1991)；而且最重要

的是,他在这些材料中探究了促使帕森斯的理论走向成熟的知识来源(卡米克,1979,1992)。 118

总的来说,在目前非常积极地重新评价帕森斯对社会学和社会思想所做贡献的那些著作中,这些材料构成了一个最富革新性的框架。卡米克的研究不是门生们通常表现出来的那种英雄崇拜,也不是试图批评性地重新建构帕森斯的理论,以把它当做当代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再次提出。卡米克并不赞同帕森斯的观点;事实上,他一清二楚地指出他认为帕森斯著作中的一些关键部分具有根本性的错误。① 与此同时,他所采取的研究方法跟早期试图用社会学理解帕森斯之社会学的方式(比如,米尔斯,1959;古尔德纳,1970)极为不同。他不倾向于公开介入当代的学科政治,其不偏不倚和学院的态度很明显。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正确性并不是他研究直接关注的内容;他手中的帕森斯文献及其生平丰富和详细得令人咋舌,而且他的理论模型符合这些可获得材料的有根有据的概括。卡米克声明他的意图是把帕森斯的生平和著作当做经验研究资料,并且像所有严谨的研究者关注其研究目标那样来仔细思考这些资料。

卡米克研究的基本目标是什么呢?他试图对帕森斯的学术脉络(heritage)做一个批判性的评价,并对建构该脉络的过程做社会学的分析(卡米克,1989,第39页)。他以尽可能清楚的语言表达了他对现在有关帕森斯的论述的不满:这些论述"在讨论《结构》的时候,对社会学在做什么所给予的更开阔的解释是如此之少"(卡米克,1989,第39页)。卡米克认为,帕森斯的早期

① 见卡米克,1997,第434—436页;1989,第95页,其中讨论《社会行动的结构》的内容。卡米克断言"只有当其原初的意义被有意地忽视之后,它在今天才有最大的实用性"(卡米克,1989,第40页)。

贡献不是被忽视了，就是遭到了肤浅的对待。解读者用看待其后来更成熟的作品的目的论眼光来看待其早期的思想发展（卡米克，1991）；他们没有依照当代的史学标准，把作品放到其产生的背景中去，因此他们极大地误解了帕森斯的早期作品（卡米克，1987）；由于实际可供帕森斯选择的所有理论资源被描述得面目全非，对他早期学术选择的重新建构早已因此而遭到曲解（卡米克，1979，1992）。简而言之，当代对帕森斯早期思想发展的评价不过是一种“集体忘却社会学的真实过去”的结果（卡米克，1987，第 434 页）。

但是，卡米克并不只是想纠正或增加我们关于帕森斯作品和生平的历史知识。相反，他把自己的研究视作一个经验案例，119 以此来说明在关于经典著作的意义和地位的学科争论中，历史主义立场是有效的（参见亚历山大，1987b）。利用社会学经典著作的惟一合理的方式就是把它们放入“各种群体的知识在历史中的浩荡之流以及它们多样的价值、兴趣、关系和环境中去”（卡米克，1987，第 436 页）。实际上，目标不在于历史重构本身，而在于以“社会学的方式”② 理解社会学著作的能力。

卡米克首要关注的是知识社会学。他把自己的目标确定为进行多个个案研究，在其中关心“影响一个理论家形成其独特的方法论立场（卡米克，1987，第 421 页）以及阐释理论家的关怀是

---

② 有批评指出卡米克界定的“社会学的方式”含糊不清（蒂尔亚基扬，1990，第 452 页）。不幸的是，卡米克并未对此批评做出恰当的回应：“他［蒂尔亚基扬］质问我社会学的方式是什么意思，认为（就像帕森斯本人那样）急切所需之事是给出一个合适的概念，用它来规定什么是应该包括的，什么是不该包括的……社会学史展出的是（引用莱文的话）‘社会学的画廊’，社会学的方式的定义是依赖于情境的”（卡米克，1990b，第 458 页）。然而，我们将会看到，在其 1992 年那篇论文的讨论中，我们的问题与其说是他对“社会学的方式”的界定是模糊的，还不如说是这样的提法是一种简化论。

怎样被'他们的社会角色所结构化'（卡米克，1979，第517页）的那些特殊社会过程"。卡米克将历史分析当作工具来探求这种更为一般的知识社会学，他认为这种知识社会学是最富工具性、受权力引导并且被冲突所建构。他主张，理论著作只能放入其社会制度的背景才可以被理解，而后者则在不懈地追求学术定位、学术地位以及学术认可中被结构化。[3]

最后，卡米克的研究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它虽然没有那么明显，却意义重大。他想倡导一种社会学之本质的观念，而且它跟帕森斯本人的理解截然不同。确切地说，卡米克并不想论说帕森斯对此问题的理解的不足；他也不想——像更早期的那些批评一样——用自己的理论观点取代帕森斯。不过，除了对帕森斯理论的零星批评之外，卡米克费尽心思反对他试图建立一套普适的社会学词汇的努力。帕森斯对其学术发展的表述以及他在当代学术中的表述的问题在于，它们成功地强加了一种"方法论立场、学术传统、行动、社会结构与人格的概念、对秩序问题的原因及解决方式的研究路径、对人类的唯意志论的立场等的先占权"（卡米克，1989，第95页）。通过遮盖这个世界基本的"社会多样性"（卡米克，1987，第95页），帕森斯使得他的理论具有了"一种独特的以自我为参照的特点，这种倾向就是把他个人在局部环境中遇到的观念视作是最值得注入和授以时代意义的观念"（卡米克，1991，第xii页）。卡米克解析了帕森斯的作品，指明他的学术选择实际上具有怎样的社会偶然性和怎样受到历史的限制，并借此提出了他的新观点。他认为，我们应该放弃把社

[3] 在卡米克的文章中有些句子的意思确实在有些时候是相背离的。不过，我们在下面将会指出，这种论述上的模棱两可与其说是实际的理论开端，还不如说是试图求助剩余范畴以克服简化论的内在不足。

120 会学当做一个核心牢不可破(即使是有关键性的分歧)的学科的观点,而把它看做是一种检索的目录。我们不是要试图发展出一套普遍化的理论逻辑,而是要退而去寻求重新建构依赖于历史的那些概念,并且学会不仅承认而且还要倡导在理论上相互不能协调的论述构架具有同等的有效性。

这些观点是卡米克研究帕森斯早期学术生涯和著作的主要框架。它们也构成了其1992年讨论选择学术先驱之机制的论文的基础;在一些重要方面,该文可被视作卡米克研究中最为系统的一篇论述。因此,我们分析这篇特殊的、讨论选择学术先驱的文章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关注特定文章的细节跟关注卡米克更多的研究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学术先驱选择过程的重要性

选择学术先驱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几乎很难被忽视。所有的重要著作都跟一些作者和问题、跟不严格地被称为"传统"的东西有纷繁复杂的关系。任何一部出色的著作都由过去的贡献孕育而成,每一个研究者都坐在"巨人的肩膀上",希望看得更远,更准确。[1] 不过,这种联系过程实际的各种方式跟实证主义所推崇的累积机制大相径庭。默顿之后的科学社会学和更为一般的学术史早已证明与学术先驱们的关系是创造性的关系:跟一个学术传统相关联就意味着要不断地对它进行阐释。站在新的问题立场之上(Problemstellung),对早期的作者及其问题的解读经常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以前被认为观点相对的作者被发现

---

[1] 默顿(1965)已经用大量生动详实的材料证明这个比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几个世纪中是怎样被不断地重新建构、并在此过程中获得新的意义的。

存在着相同之处，而同样，在曾被认为是学术伙伴的作者之间也可以看到差异。就是在同一个文集里面，相异的线索——或“阶段”和“作品”——也在互唱反调。这种富有创造性的利用会产生重要的后果，因为吸纳一部有影响的学术作品可以极大地改变现有传统所建造的学术空间，它可以最大限度地拓展当代学者和正在成长的学术队伍可利用的新的理论资源。

因此，指出需要更好地理解学术先驱的选择过程，卡米克无疑是很正确的。他坚信忽视先驱的选择就等于是忽视了理解学 121 科建设和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这一点当然也对。但是，他是否为这些因他而为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准确的答案，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研究的开始，卡米克分析了他称之为“学术影响”的研究与他界定得相当模糊的“先驱选择”之间的差异。[⑤] 前者是使作者社会化的经验和观念的综合环境，后者很显然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作者认定一些前代的作者为明确的参照对象。卡米克重点关注的就是这个过程；他认为，虽然理论家确认他的学术先驱只不过就是对当前社会学理论的著述加以关注，但是这种确认过程通常都建立在对同时发生的社会过程的狭隘理解之上。卡米克相信，大多数当代学者在判断学术先驱的时候，都只是看他所研究的学者的思想观念——最典型的就是“学

---

⑤ 卡米克的定义之所以是模糊的，是因为虽然“选择”好像意味着一个有意识的动机(intention)，但是我们在后面将看到，意识和动机等问题却是卡米克在遮掩的一些基本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动机这个概念在琼斯和凯比(1993)的那篇深刻且非常有洞见的学术史文章中得到很好的说明，该文可以被认为是以前构成琼斯著作特色的、将动机狭隘地理解为侧重于有意识的目的(conscious intent)这样一种观点的自我批评，而在今天这种观点在卡米克的著作中依然存在。

者本人的论述"(卡米克,1992,第423页)[⑥]——跟他引用过和参考过的其他学者的观点有什么联系。

卡米克把这种模式,即学者跟先驱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基于学术内容而得以建立的模式,称作"内容相符模式"(content-fit model)。在他看来,虽然这种模式呈压倒之势,但是从观点本身和方法论来看,它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它忽视了"历史的和社会制度的环境"的多变性,割裂了"从社会制度的背景中选择先驱的可能性",而且否认了"主要并非依据内容来选择先驱的可能"(第423页)。从方法论角度讲,内容相符模式只能将学者自己的陈述当做"主要的或惟一的佐证",并且没有"正确地探究先驱选择的阴暗面";卡米克提到后面这种情况,是认为这就意味着可能存在学者没有选择的其他潜在的先驱(第423—424页)。

因为内容相符模式存在的这些缺点,卡米克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模式,它关注的不是观念内容,而是"社会制度的各种环境"[⑦];这些环境凸显出各类声望机制(reputational mechanisms)的意义和作用。卡米克认为,这些机制的运作实际上被内容相符模式的使用而掩盖,因为后者更加关注作者自己表述出来的明确而自成(self-established)的联系。学者从文字上接受了这些观点,就不会去正确地解释是否"在[该作者]生产其观点期间,出版的作品要比刊物、未出版的文章、课程资料和信件等都重要"(第422页)。这些明确的观点"模糊地在言说[作者]做出这些选择并决定把其他人从其学术先驱中剔除出去的基础"(第422页,注释2),因此,它们掩盖了在社会学中——至少是在"其

122

⑥ 除注明了引用出处的外,页码都是指卡米克1992年的著作。

⑦ 参见第423页。这种立场在其他地方被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第439页);或者更简单,"社会的"(第433页)。

历史发展的绝大部分时期"——选择学术先驱的真实原因,即声望因素。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卡米克对帕森斯做了历史性的个案研究。

帕森斯、制度主义者和选择先驱的机制

在他个案研究的开始,卡米克参照他早期的一篇探讨《结构》的方法论观点的文章,概括了《结构》的"核心理论观点"(卡米克,1987)。他把《结构》的核心理论观点分解为两个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破(批评功利主义)和立(人格、终极价值等社会要素的相关性、把社会定义成自成一体的现实、约束性伦理规则的重要意义等)[8]。进而,卡米克提出,对这个众所周知的理论观点的所有解释几乎都与帕森斯确立其地位的过程的历史描述联系在一起;这些历史描述认为帕森斯跟《结构》书中认定的在世纪转折时期欧洲的四位学术先驱的联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第426页)。在卡米克看来,这些解释包含两个基本的错误:即要么假定《结构》是前辈们不同理论立场的一个综合,要么则假定前辈们的问题跟帕森斯自己的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帕森斯早已被引入这些早期的立场之上。在此基础上,这些理解都认定"帕森斯没有再参考"——"在他所知范围内的"——其他早期著作,因为这些"著作在内容上并不相符,因而跟他的研究是无关的"(第426页)。但是,卡米克声称这样的假定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学者们接受了《结构》的字面观点以及后来帕森斯自己所做的回顾性解释,他们就无法再去探究帕森斯在写《结

---

[8] 在本章中,我们不可能来恰当地处理卡米克解读《结构》的独特性。对卡米克的观点详细而有力的质疑可以在古尔德的文章(1989,1991)中找到。

构》的时候所做的真正选择。卡米克相信，如果仔细研究足够多的文献资料，那么，选择学术先驱的故事将会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说法。

123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众所周知，有人揭示当帕森斯在阿姆赫斯特念本科的时候，受到两位老师，汉密尔顿和艾尔斯的影响。两人都是制度经济学的第二次浪潮中的杰出人物。这个发端于凡勃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的浪潮，强调功利主义的局限性，批评求助于生物心理力量的研究方式，认识到非商业刺激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赋予文化因素其应有之义，并侧重于相信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是任何社会解释有价值的要素（第429页）。简言之，卡米克认为，在"反对功利主义的行动观"立场上，制度主义的理论在一些关键层面上跟《结构》一书的一般取向是相互一致的（第430页）。卡米克进一步强调帕森斯在本科阶段深受制度主义观点的影响，并在其后的学术生涯中承认汉密尔顿和艾尔斯是使他转向社会科学的最重要的引路人（比如，帕森斯，1976）。但是，卡米克并没有停留在简单地说明制度主义的理论非常适合于《结构》的思路。他认为，制度主义理论事实上甚至比帕森斯实际选择的四位欧洲思想家的观点都更适合《结构》的思路（第431页）。[1] 那么，为什么帕森斯在其更为成熟的专著中从未讨论过制度主义，相反，他只是给予它们以零星的关注呢？

卡米克于是提出他的替代模式：这不是一个内容的问题，而是一个声望的问题。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制度主义学者

---

[1] 在这个问题上，卡米克好像专门指帕雷托（第438页，也见卡米克，1987）。或许正是由于他不愿意认真地面对分析理论，所以他不能理解帕森斯确实发现了帕雷托的意义所在。

在学术界的声誉逐渐遭到否定,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在跟新古典经济学所进行的论战中是落败的一方。而且,新古典理论跟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它牢牢地扎根于享有更高声誉的学术机构和处于领先地位的院系。帕森斯于1927年作为一名经济学讲师进入哈佛大学;在哈佛的空气中更加强烈地弥漫着这些看法。哈佛的领导人物就对制度主义持极为批评的态度。卡米克认为,在哈佛,"一个人的思想接近制度主义理论就等于是公开地跟一项正在败落的事业结盟"(第435页)。而且,同样是哈佛的这个学术圈,马歇尔、帕雷托、涂尔干和韦伯——这四位后来成为《结构》之核心的思想家——却得到了正面的评价,或者至少没有遭受否定的对待。当然,马歇尔和帕雷托本身就是重要的新古典思想家。涂尔干正成为主要兴趣的关注对象,而韦伯早已被高度重视。简单地说,在这里,卡米克更详细地概述了他的替代性模式,帕森斯是"一个边界清楚的(well-signposted)学术圈的一部分,它告诫他一些理论架构的缺陷与无用,而同时宣扬其他一些理论架构的伟大、辉煌和成果丰饶"(第437页)。卡米克进一步略为详细地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这样的标定已经在理论上被误导了,并且他坚信制度主义依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第438页)。不过,卡米克在文章中并没有为制度主义多做辩护,他花了更多的笔墨来证明他用更开放的工具论方法研究声望结构在知识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有效性。在下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研究知识社会学的简化论路径、并带着适当的保留,他最终得以完成他的个案研究 124

卡米克的知识社会学:熟悉主题的变奏

虽然在围绕着社会思想史尤其是帕森斯思想的诸多争论

中，卡米克建构了选择学术先驱的两种模式并把它当做新观点表述出来，但是其中的对比无非是给内因论者(internalists)与外因论者(externalists)之间的古老争论安了一个新名称。至少在上半个世纪，该争论一直居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讨论的核心。稚朴的内因论者以思想家的观点来看待他；他们假定他或者她对其学术先驱的建构是正确而合理的，因此他们就主要关注重新建构和解释思想家本人的理论逻辑(rationales)。外因论者则通常会犯相反的错误。他们假定著作的观念内容是正确的，而把注意力放在揭示所谓的社会——组织的、经济的或者政治的——因素上；是这些因素"促使"思想家采纳那些观念。

很显然，卡米克是站在外因论的立场上来论述帕森斯是如何选择其学术先驱的，因为他的论述重点在这几个方面，亦即比较帕森斯的学术参照群体的不同声望，其著作的市场前景，以及在哈佛大学他所处组织环境的地位结构。我们相信他将因此不能很好理解帕森斯著作中论述的转变。外在因素从来不能单独解释理论的选择。理论选择肯定要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策略性的；但是，从更广的意义上说，理论选择也总是包含着动机，这些动机是建立在主观性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必须要探讨这种更广意义上的理论主观性。在思考学者是怎样选择他们的先驱、他们的同伴甚或他们的对手时，我们就会把主观性理解为过滤外在因素的"选择标准"。一个人研究选择怎么能不研究这些标准？不过，我们看到，这正是卡米克试图想做的。

卡米克的观点及其自我矛盾

任何批评都可以靠系统的论述（比如，见亚历山大，

1983），或者靠讨论在我们看来对于经典学者的富有新意且更为成功的研究方法（比如沃恩在1989年对早期帕森斯的研究，泰勒在1975年对早期黑格尔的研究），或者靠严谨地质疑手头的经验研究个案来得到证明。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将利用这些方式来进行批评，但是我们首先要寻求一种不同的、更为文本化的批评方式。我们指出外因论的局限怎样给卡米克自己的观点带来了削弱其说服力的矛盾。令人尴尬的事实是，卡米克自己并不能维系其声望模式的完整性。在他最关键的论述中，他放弃了这个模式，而采用了他在文章中力图驳斥的那种模式。

尽管有时候语焉不详，卡米克论述的核心观点是，帕森斯在《结构》中忽视美国的制度经济学而转向欧洲学者，其中只有一个原因：即前者的声望太糟而有损于帕森斯在早期为其学术生涯付出的努力，或者至少无助于建立“一种可靠的理论观点”（第437页）。我们把这个核心观点称为假设1（H1），在讨论的最后我们将回到这个假设。但是，这个核心观点建立在一个次一级观点的基础之上；我们把这个观点称为假设2（H2）：即制度主义理论早应该像帕森斯实际利用的欧洲思想那样，为帕森斯在《结构》中建构的理论提供一个可实施的、有效的和补充性的理论平台。正是在这个次一级观点（H2）的基础上，卡米克的声望模式（H1）才得以成立。如果H2被驳倒了，那么H1就会彻底站不住脚，哪怕对声望因素的考虑在本质上依然还很有必要。因此，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就是卡米克的这个次一级观点。

反驳H2，我们的第一个观点就是要证明，卡米克在试图证明H2成立的过程中，却使用了他正竭力批驳的那种方法，也就

126 是内容相符的方法。[19] 他把他的个案研究纳入宽泛的、高度内因化的解释之中，探究《结构》的理论观点跟制度经济学的相似性。实际上，在这篇文章的导言中，他就已经承认"在审视帕森斯的选择的时候，不能将内容因素排除在外，[因为]那些因其著作而牢固确立声望的学者，如果他们的作品明显不切题，那么也将被排斥在帕森斯选择先驱的范围之外"（第436页）。花了大量篇幅让读者相信内容相符的确存在之后，卡米克才开始讨论在帕森斯的先驱选择中声望因素的影响。

如果从这样一种以效用来遣词的行动（perlocutionary actions）而不是从语词内隐含的正式目的（formal illocutionary aims）来做判断，只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卡米克认为，正是观念的契合——内容相符——使选择学术先驱的特性作为问题而被纳入讨论的议程。他似乎是在情不自禁地提示，分析者应该从研究相符的内容入手。这样，声望的各种因素也必然从首要因素被降格为次要因素。它们不能在普遍范围内解释先驱的选择，但是可以在一个有高度限制的范围内解释为什么是这位而不是另外一位可选择的前辈被挑中。对这个观点，又是卡米克自己表达了很精彩的看法。他声称，只有"在讨论符合这个开放的[内容相符]标准的著作时"，对早期的帕森斯来说，"声望……才具有决定性的差异"（第436页）。

卡米克这种观点的主旨怎么跟它公然表明的目标相矛盾呢？实际上，在理论论述中类似的自我矛盾并不少。它们经常凸显出尚未解决和不可解决的理论观点所造成的紧张。出现这

[19] 卡米克自己对作为H2的基础的经验个案研究做了如下的描述："[这个]个案要回顾《结构》一书的内容，并且检验其内容跟美国的制度经济学是否相符"（第424页）。

样的自我矛盾,不应把它归于卡米克个人的失败,而应归因于他力图倡导的外因论的不足。事实上,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卡米克允许公开暴露出矛盾对他来说是一种验证。他对自己发掘出来的历史材料的投入,以及他对帕森斯早期研究的完善性所做的相互极为抵触然而具有实质意义的解释,都使他坚持认为这样一种内容的观念性一致能够而且也应该被找到。

剩余的范畴

解释者如果要说某个文本是自相矛盾的——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说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去找作者自己意识到这些矛盾的 127 论述。从这个角度说,卡米克的文章是很好的。卡米克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给自己挖的陷阱。他力图用两种手段从里面跳出来。首先,紧跟内容相符这部分论述的导论——我们在前面引用过——之后,他立即指出他想避免的一个过失(mea culpa):"这里对内容相符的讨论不应该被看做跟刚提出的、反对内容相符模式在目前的应用的观点相冲突"(第 424 页)。然而,"不应该"的意思却很难理解;因为,在这句声明之后的该文的核心部分中,卡米克自己跟他刚做出的反对内容相符模式的观点又自相矛盾。毫无疑问,他"不应该"这样做,但他这样做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就主张必须要做内容上的参照。

卡米克为说明这个"过失"举的例子暴露出他带来的种种难题。"试图挑战以阶级来解释教育成就的研究,需要在阶级因素的作用被确认之前认真考察这些因素,与之同理,"他写道(第 424 页),"我在这里审视内容相符因素,以此从经验上证明内容相符模式存在缺陷,并且需要用一个替代性的模式来补充它。"我们首先就注意到这句话在语言上是不通的。很难想见,一个

跟替代模式完全冲突的模式怎么可能被替代模式所补充。不过，比语言失误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推论在逻辑上包含的错误。卡米克不只是在"审视"这个被替代者，即内容相符模式；他是在把它吸纳进来，使之成为其解释的一个核心部分。而挑战以阶级为基础对教育做解释，并不是要从论述阶级因素实际上成为解释教育的最重要的、也就是架构性的因素开始！

这样一种不得已的开始预示了卡米克为跳出陷阱所做的第二步，而他的努力只不过使他越陷越深。在文章的结论部分讨论这两个模式的时候，他开始不把两者视为对方的替代者，也就是说以一个对而另一个错，而是把他们它们都当做是很有必要的经验策略来讨论，怎么利用它们仅仅依赖于掌握的事实的性质。他引入了"相互依赖"这个概念，并提出这样的观点：从经验而言，是声望相关还是内容相关要因学科的组织特征而定。他认为，如果一门学科的组织很松散，那么一本原创性的著作就无

128 须"内容相符"，声望因素的重要性更大一些。而在一门组织更严密的学科里，契合于前辈论著的内容则犹为重要，声望的重要性则要小得多。

无疑，这个观点在有些时候是正确的。然而，卡米克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研究所证明的却与此截然不同。在描述一个对学科只是有轻微依赖感的时期时，他就展示了声望分析必须从属于内容相符模式——也就是说必须把后者当做基本的分析框架。[1] 无论如何，这些立场——互相依赖、经验性选择、从属关

[1] 当然，仍然可以争论的是，虽然卡米克对帕森斯的分析强调内容相符的首要性，但是帕森斯本人却没有用这种方式来选择他的先驱。不过，难以置信的是，卡米克在论述伟大的社会理论家本人都不能或者没有根据内容来选择时，自己却如此严重地依赖于此。就卡米克把这些方法当做科学的方法论而言，他是在主张，这些方法符合学术行动者本人选择的策略。

系——中的任何一个都跟其文章开篇处特别重视声望和雄心勃勃地要以重视声望因素为基础来建立其广泛的新知识社会学相抵牾。

很难解释卡米克文章的核心观点为何能够在如此短小的篇幅内发生了意义的根本性转变。我们的理解是，他起初的观点在理论逻辑上难以为续。立场不稳而产生的紧张，使得卡米克的声望模式摇摆于富有理论意义的主张和更为谨慎地暗示它的实用性之间。前者声明声望模式可以用于学术先驱的选择，而后者只是暗示声望模式可用来解释先根据完全与声望不同的因素选出学术先驱之后，再在这些人中间进行选择的过程。

选择标准：缺乏的因素

H2 相信制度主义理论可以为帕森斯的奠基之作提供一个可借鉴的理论参考。我们提出的第一个反对意见是间接的；我们指出，为了证明 H2 成立卡米克使用了他在整篇文章中都想力图批评的方法，即内容相符的方法。为反对 H2，我们提出的第二个论点则要更直接一些。我们认为，卡米克根本就没有证明内容是真的相符。在我们看来，卡米克的解释方法还够不上目前讨论的解释学要解决的任务。他在研究工具的使用上张冠李戴了。

事实上，就算"内容相符"是比较文化分析的一个确切的目标，它也难以成为一种合适的手段和方法；它太笼统、太模糊了。只有最草率的学术史研究者会说，与诸如"人类行为之共有的道德基础"或者"立基于利己主义的理论的局限性"等宽泛的范畴（卡米克在第 424—30 页提及的短语）相契合可以作为评价学术 129

影响的基础。[14] 因此，明确认知选择的中间因素（intervening factor）就很有必要了。但是，这个因素恰恰就是卡米克在解释中所缺乏的。

社会科学家和理论家都是能动者。他们拥有、呵护并培养着一种主观性；它使得他们可以在其所处环境的内外压力中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做出选择，无论这些压力是其他科学家的声望还是宽宏文化传统中的那些习语。只需简单地做一些思维的实验，我们就会明白这样的选择标准有多么重要。比如，只有当一个人有很多同仁，在当地有，在别处也有，这些人的声望显赫、引人注目，那他才会有范围广泛并与其非常相投的"观念内容"可供选择。因此，关键的问题就不在于选择本身，而在于一个人所持的参照标准。想要理解真正的先驱选择过程，后者是必须要问的一个基本问题。

粗略来看，又有谁会否认帕森斯的理论跟制度主义理论之间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呢？而且，在帕森斯和其他很多重要的思想家，譬如孔德、黑格尔、托克维尔和特勒尔奇的思想之间，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卡米克自己还把霍布豪斯和拉斯基当成有同等机会的候选人，因为他们跟落选的先驱存在着相似之处（第439页）；他甚至还认为，帕森斯很熟悉这两位思想家的观点，因此他们不应该被忽略！

这样的游戏人人能玩。蔡特林（1968）和古尔德纳（1970，第

14　这样的声明让人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想起尼斯贝特的欺骗性观点。尼斯贝特一次又一次地（比如，1966）提出涂尔干著作的保守起源的观点。他证明这些观点的方式是说，诸如"道德"与"整合"等概念不仅在德·迈斯特的保守作品中出现过，也在涂尔干的著作中出现。以这种一以概之的方式来看，他还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这些概念在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也出现过。这恰好是塞德曼早期重要研究的观点。他更为准确地强调了社会理论家本身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意图。

150页，第185—9页）就曾以愤怒的口气诘问帕森斯的理论经典为什么不是马克思，就像莱文一直追问为什么不是齐美尔一样。[33] 这游戏实在太容易了，不仅每个人都能玩，而且，每个人实际上都已经玩过了。[34] 所以，对于卡米克在大量相似性的基础上来讨论内容相符，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强调差异的重要性。齐美尔在一些根本的方面跟帕森斯的研究架构毕竟相去甚远（亚历山大，1993，肖尔蒂诺，1993）。为什么美国人（指帕森斯——译注）一定要参照着德国思想家（指齐美尔——译注）的论著来建立他的理论基础，或者说使之合法化呢？

我们的第二个反应要更为深入，而且直接切入选择标准这个问题本身。没有人能够证明这样的可能性，即在解释性地（重新）建构先驱时，仅仅根据这一点或那一点的内容相符就接受某位思想家而排斥另一位。每部著作跟其他任何一部著作都存在 130 相似与不同。牛肉汤和菜汤除了肉以外，颇为相似。但对于那些口味讲究的人来说，没有肉就是不一样。因此，关键并不在于著作所属的大的范畴，而在于选择的标准。我们必须严密而详细地分析一下学者的思想发展过程，以期理解成果斐然的理论旨趣。

---

[33] 见莱文[（1957）1980]。实际上，莱文和卡米克持有相似的观点。他们两人认为帕森斯的《结构》要对他们所推崇的早期理论家的声望下降负责（肖尔蒂诺，1993）。他们指出，帕森斯把这些理论家从他1937年那本富有创见的著作中排斥出去，使得他们不能得到后来的社会学者的重视（见前面第五章）。但是，卡米克和莱文也都同意，他们推崇的那些早于帕森斯的思想家的影响在《结构》写成之前就一直在下滑，并且都承认——实际上，是坚持认为——《结构》和帕森斯本人在1937年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在社会学家中产生很大影响。

[34] 实际上，这并不是卡米克第一次玩这样的游戏。他第一篇发表的评帕森斯的《结构》文章就在使劲地问，为什么不是真正的功利主义者（卡米克，1979）。他认为亚当·斯密也符合帕森斯提出的选择标准，这就犯了我们正在讨论的他后来这篇更具历史主义倾向的论著所犯的错误——忽视了帕森斯的分析性意图。

《结构》一书本来就没有打算穷尽欧洲和美国近代的社会理论著作，事实上也没有这样来写。在帕森斯看来，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作者对他的理论目的最重要，因此《结构》也被表述为他参照这几位作者的著述而提出的理论原理的一个精确阐释。被积极讨论的正是这一点。卡米克认为，只要“该思想家清楚相关的前人论述的脉络，而且该著作的质量达到了当代出版的标准”（第 423 页），那么它就可以被当成是先驱性的作品。但是，这是一个宽泛得近乎荒谬的标准。要想搞清楚跟以前作品的作者的相关性，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更应该像这样：帕森斯在什么时候着手准备《结构》的，他认为他当时在做些什么，为什么他会这样想？

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去探究帕森斯在《结构》之前的文章当中、在《结构》当中和后来的各个阶段里究竟是怎样在谈论制度主义者的——换句话说，就是去检视卡米克也有意忽略或者低估的那些论述。首先最为关键的是，帕森斯认为，制度主义立场之所以站不住脚，是因为它混淆了对待社会事实的分析论方法和实体论方法（1937，第 122、125 页）[15] 这个区别对

---

[15] 举一些例子来说：“虽然我如此钦佩帕雷托和韦伯，但是我并不认为制度主义可以真正解决马歇尔的困境[……]，在他们都不拒绝理论的前提下（这一点很重要），他们倾向于退回到‘心理主义’和‘遗存主义’，而这正是马歇尔成功规避了的”[帕森斯，(1932)1991，第 87 页]；“制度经济学家对正统经济学理论的概念工具的批判是这种「分析论与实体论相互混淆」的绝佳例子。虽然用这些概念得到的结论在经验上经常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依然在理论层面上极其错误，他们没有看到在一个不同的概念框架中使用同样的概念工具就可以避免这些结果的可能性”（帕森斯，1937，第 125 页）。三十几年之后，在杰出的制度主义者艾尔斯的纪念文集中，帕森斯提出了完全相同的观点：“回想起来，我认为我在理论上有两点提出来反对制度主义的观点。第一点就是，它以综合的、彻底的经验主义为名，否认分析性抽象——我发现在我（1937）的书中提到的那些主要思想家都使用了这个概念——的合法性”（帕森斯，1967，第 178 页）。

他来说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在帕森斯思想发展的这个时期，他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关注于为理论分析提供一个分析性的、结构化的和半先验的(quasi-a priori)构架。这个任务，就像卡米克自己(1987)清楚地认识到的那样，事实上比《结构》的任务要大得多。

这样的选择是好是坏不是我们在这里关注的主题。或许帕森斯可以对实用主义和历史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对经验主义抱有更宽容的态度，并从中更多受益。可事实上，他并没有这样做。从某些关键的方面来说，他的选择标准很不同。

看一下帕森斯究竟是怎么样谈论制度主义者的，也证明卡米克的下述观点，即帕森斯"从未承认他的研究方法跟他在阿姆赫斯特的两位老师有任何实质性的相似"是错误的。实际上，帕森斯曾多次强调制度主义者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批评是有道理的[36]，而且他不断承认制度主义理论与他的思想形成是相关的(帕森斯，1959，1970，1976)。不过，他在某些场合也曾强调，制度主义在他看来是走错了路子。制度主义以经验论的方式跟功利主义论战，而帕森斯在《结构》中则决定做一种分析性的批评。虽然制度主义赞同社会学是一门关于整体现象的百科全书式的科学，然而《结构》的每个部分实际上都意图证明这种观念的局限性，反而认为需要分析性而不是经验性地将社会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相区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主义者是持错误的 131

---

[36] 举例来说："这些[批评]当然不等于说制度主义者对正统的、尤其是更墨守成规的[新古典经济学者的]批评不能被很好地利用"[帕森斯，(1932)1991，第87页]；"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非正统的理论在经验上是正确的"[帕森斯，(1935)1991，第217页]；"因此，在实证主义的背景下，'制度主义者'批评正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它们在逻辑上陷入享乐主义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帕森斯，1937，第122页)。

理由却做了正确的事情，而这些理由正是《结构》整本书都在论说的。

事实上，卡米克可能很清楚这样区分会有哪些可能的后果；倘若如此，那在他文章中多处出现的特别声明就是在力图掩盖这些后果。我们看到，在关于帕森斯写《结构》之意图的论述的一开始，他就提及了"实质性理论"和"方法论观点"的区别，在后者中包括了帕森斯关于"分析性"问题的论述。对此问题，他在另一篇发表的文章中已作过讨论，因此他写道，他将不在这篇文章中再讨论，除非"这些方法论的问题……会直接对分析产生影响"(第424页)。这样的安排，虽然好像可以被理解成为了理论的精练和纯粹篇幅的考虑，但是问题重重。首先，它掩饰了帕森斯和制度主义者之间基本和关键的差别；无论如何，这样的差别恰是卡米克论文的主要症结(experimentum crucis)所在。其次，这样的掩饰，使得被卡米克称之为《结构》的方法论观点的内容不为人所知，这就搅乱了制度主义者的立场和真正成为帕森斯著作理论支柱的思想的关系。在帕森斯看来，"分析"不仅意味着是一个认识论立场，而且是一面旗帜，它代表着在他看来在那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一切。深受德国和法国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其在精神和经验侧重点两方面都跟美国的实用主义有根本的差异，因而帕森斯早已在反对那种激发出美国最重要的社会理论的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显然"纯粹的"认识论问题跟实质性的理论分析有深刻的关联。对帕森斯而言，认识论问题不仅意味着德行之独特和立场之坚定的重要性，而且意味着全部可选择的方法论工具和理论工具，它们使得学者能够在比较和历史的理论构架里对现象做经验的解释，而不必放弃科学建构严格

132

与积累的特点。[37] 不管这样过度强调认识论观点会产生什么样的理论问题，恰是这种概念上的夸大表明，忽视帕森斯对"分析"的利用，在解释其早期著作的基本原理和其中的先驱选择时就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这些就是帕森斯的部分理论旨趣之所在，是他在理论相关性上为自己选择将与之紧密结合的学术前辈的标准。如果我们的头脑中有这些预设，那就可以很明确地指出制度主义不可能像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及其关于自杀的研究那样为帕森斯的那些问题提供同等的学术来源，跟韦伯的世界宗教比较研究相比，更是相差甚远。[38] 不过，即使不同意这个判断——而且卡米克很特别，他对此既同意又不同意——只要对帕森斯看待世界的更一般的取向做了认真理解，也就会明白为什么帕森斯会仅仅在学术考虑的基础上以一种非常同情的(emphatic)方式拒绝制度主义者的贡献：他拒绝的不是他们的声望，而是他们的理论。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这节将看得更清楚。

---

[37] 实际上，就理论逻辑来说，帕森斯经常公开地使用"分析"这个概念(亚历山大 1983)。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在他早期的著作中，他经常以一种寻求庇护的态度将康德的元方法论约定(metamethodological commitment)跟科学统一体的其它层次合并在一起。比如，韦伯把后期现代性理解为过度理性化，而帕森斯认为他之所以这样理解是因为他以理想型的方式而不是以分析的方式来研究科层制度。

[38] 当然，在他们各自的环境中，涂尔干和韦伯都是新康德主义复兴的杰出代表人物。有趣的是，帕森斯在1976年扼要地回忆艾尔斯时，他坚持认为制度主义在两个不同的方面没有为他理解涂尔干的宗教论述打下基础。他指出，实际上在他还是本科生的时候，艾尔斯就分配给了他阅读涂尔干的任务："我想到我第一次读涂尔干的著作几乎不理解他想做什么时，不禁发抖[……]。于是在哈佛读书的早期阶段，我大量阅读了……涂尔干的著作，这些都是艾尔斯原先介绍给我的，但是理解涂尔干所需要下的功夫要比我本科期间对他的研读多得多"(帕森斯，1976，第175、178页)。

从片段性证据去思考：对帕森斯学术生涯的歪曲

到此应该很清楚了，帕森斯对制度主义不满的证据——在他思想形成初期的观念和制度主义者的观念之间不存在内容相符——打击了是声望而不是理论促使帕森斯接近他最终选择的欧洲学术先驱的观点(H1)。实际上，在对H1做更直接的反思之前，我们可以审视最后一份卡米克用来证明H2的证据。它关心的是帕森斯在其本科阶段吸收制度主义观点所带来的影响。沿着这条路去思考，我们最终将会导入关于声望的这个核心假设本身。

卡米克强调，帕森斯深受汉密尔顿和艾尔斯的课程的影响，并且这段经历最终使得帕森斯决定从生物科学转向社会科学。133 基于这些早期的联系和影响——这些帕森斯本人都自愿承认过(比如，1959、1970、1976)——卡米克就认为，从帕森斯在阿姆赫斯特到写成《结构》这些年，制度主义肯定不断地在影响着帕森斯的思想。[13]

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帕森斯在二十岁时无疑是非常成熟了，但我们难道非要坚持说，他在那个尚幼的年纪所使用的选择标准会在此后十年当中完好无缺？很多社会科学家在他们最初的大学课程中"发现"了社会科学。他们兴许还一直承认这些课程中的普遍性观点，但除此之外，又有多少人会感到他们必须一辈子根据从中学到的方法去评价哪些理论

---

⑬ 一方面，卡米克承认"质疑选择韦伯和涂尔干是很荒谬的，后来的学科史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第438页)。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从学术内容相符的立场上来说，欧洲思想家，例如涂尔干和韦伯，绝不是[帕森斯]的惟一选择"(第438页)。这两个观点都不可能是正确的。

是重要的呢? 这样一种观点也就是在说,在洛伦兹* 从他对鹅的研究中获得的所有要素中,印刻效应是最为重要的。

事实上,卡米克引用的证据,比如现在可以见到的帕森斯详细的生平资料(对此卡米克本人也有一定贡献),以及帕森斯在《结构》之前出版的论文(卡米克使我们轻松地就能看到这些文章),却告诉了我们截然不同的事情,它们讲述的故事并不离奇。刚开始,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沉浸在一种引人入胜的社会理论流派当中,很快他就发现还有其他吸引人的理论,于是一些年之后,他决定选择他现在认为更合理的那种理论。在此情况下,这个不断成熟的学生有可能不会放弃跟他早年的理论有关的一些普遍性论述;他也可能保留并提炼出一种学术旨趣,关心一些跟早期的研究方式相关的问题。进而,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他先是承认对他感兴趣的"讨论的发展而言,正统理论和制度主义的争论已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而后他断言,"现在需要讨论的,不是去警示说哪些方式是错误的,而是去关注那些令人满意的摆脱错误的方法"(帕森斯,1932,第 87 页)。这个明显的证据告诉我们,这样的重新建构似乎更能够留住奥卡姆剃刀,而不是卡米克的声望因素。

实际上,在这篇文章中,卡米克甚至连帕森斯离开阿姆赫斯特后曾热情地支持制度主义的观点的证据都没有提供。相反,他断言,帕森斯在构想《结构》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对制度主义的观点存有根本的疑惧:帕森斯"于 1927 年去哈佛……跟从"(第 434 页)新古典经济学家学习,他们是他以前在阿姆赫斯特

---

* 洛伦兹——奥地利社会生物学家、习性学之父,根据海因罗特对小鹅的研究,于 1937 年提出"印刻效应"的概念,并把它用于人的行为的研究。这个概念对应的基本现象是,一只刚出生的小鹅会本能性地跟在它首先看到的那个较大动物的后面。——译注

134 的老师的理论对手。换句话说，在去哈佛之前，帕森斯就被劝说过：他以前的经济学训练是不恰当的，“偏离了主流思想”（帕森斯，1959，第5页）。

现在我们可以来审视卡米克的核心论点（H2）了。这些由他自己提出的生平方面的证据难道不是直接推翻了他的关键性论点：是哈佛和哈佛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声望促使帕森斯背离了制度主义？甚至可以说，卡米克自己选择性地建构了帕森斯的思想发展，而就连他这样的建构都清楚地表明年轻的理论家是在进入哈佛那个声誉在外的圈子开始学习生活之前，而不是之后，就已经对制度主义持否定的判断了。[9] 实际上，有充足的理由可以猜测帕森斯是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选择了那个圈子，而不是靠这个圈子为自己塑造了判断重要性的标准。卡米克写道，“在帕森斯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的论著中，甚至没有论述汉密尔顿、艾尔斯和其他年轻一些的制度主义学者”（第430页），似乎我们应该为此而感到震惊。恰恰相反，如果他们真的被加以论述了，那我们才会感到震惊。如果我们考虑了帕森斯的个性形成的经历——这是卡米克在重新建构帕森斯的生平时不明不白地全然不顾及的——那么我们的猜测，即帕森斯在那样年轻的时候就可能有了独立的学术选择能力（见沃恩，1989），就更接近于事实了。我们在这里当然指的是帕森斯作为学生在

---

[9] 因为卡米克对这种早期影响及其意义的论述显然是基于对帕森斯在大学期间发表的文章和早期的论文而得出的，所以需要指出的是他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事实，也就是另外一位学者（沃恩，1989，第26—38页）利用帕森斯同样的已刊和未刊论文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帕森斯在本科的最后阶段就已经跟制度主义的传统分道扬镳了。比如：“从这两篇［本科］论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凡勃伦和萨姆纳的影响。但是帕森斯是不是同意他们的观点呢？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证明，即使是在早期的这些年当中，帕森斯也在力图脱离他们的思想模式”（沃恩，1989，第36页）。

1924年10月离开阿姆赫斯特之后，受一笔旅游和学习的奖学金资助，先到英国，然后到德国，在欧洲的大学里度过的那两年。这个时期意义重大，毕竟：它是帕森斯曾经受过的惟一的研究生训练。而且，虽然帕森斯毫不客气地说他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那一年是在学术上失望的一年（跟霍布豪斯、拉斯基，而马林诺夫斯基则一定程度上例外），不过他在1925到1926年在德国海德堡的那一年却给他留下了深刻而难以磨灭的印象（帕森斯，1970，1980），那时候“马克斯·韦伯的幽灵”仍然浓重地笼罩着海德堡。

卡米克不仅没有考虑这段学术训练的后果，也丝毫没有提到正是这个年轻的帕森斯于1927年夏天就开始计划翻译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年之后该书出版。我们可以确信，韦伯除了用一些制度主义的方式表达他的观点外——内容相符——他不属于制度主义者。正好相反的是，韦伯承认边际效用理论的重要性，这对他的社会学理论有根本性的意义（霍尔顿和特纳，1985）；他自认为，或者至少是在其学术生涯的后一个阶段自认为他在为推动一种以分析性分化为基础的社会科学贡献力量。读了帕森斯为韦伯的这本重要著作的第一个英译本写的流畅而充满钦佩之情的导论，我们都很难再怀疑这个年轻美国学者的兴趣指向。他无需受哈佛新古典思想的名气的引导而误入歧途，也不用因跟它们发生联系所昭示出的大好前景而失去方向。他正在成为一名“韦伯学者”，构成《结构》之核心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旨趣。[9]

135

[9] 卡米克没有提到韦伯的相关性可能是因为他认为帕森斯并不是真正理解了韦伯（卡米克，1987，第434—6页）。但不管他的这个理由是否正确，只要是研究帕森斯的理论建构，那么应该论述的就是帕森斯理解的韦伯而不是卡米克理解的韦伯。

为什么不对年轻的帕森斯有能力自我选择、从他的学术环境中加以筛选并引导自己的学术道路表示尊敬呢？正是因为作为一名本科生他就对制度主义有了很深的研究，我们由此可以想见帕森斯对它的位置了解得非常清楚。就算事实是卡米克所说的那样，他的哈佛同仁给他传递了很多关于制度主义的错误信号（第437页），帕森斯难道就不能认识到他们的错误了吗？事实上，是卡米克自己认为这些信号是错误的，并声称帕森斯的同仁被“误导”了（第439页）。很明显，帕森斯并不这样认为，而且他的立场肯定是自己给自己作判断。㉒

帕森斯刚被指责把行动者描述为文化的黑箱（dopes）（加芬克尔，1967）后不久，卡米克又指责他是一个声望的黑箱，不能够依据自己判断重要性的标准来估价信息，机械而不假思索地接受当时在他所处的学术环境中每个最有名的学者的观点。

像行为主义一样用声望来简化

在弱化了帕森斯作为能动者的能力，他的判断和理解能力，并对他的经历加以处理之后，卡米克得出他的核心观点，即帕森斯是依据声望而不是学术内容选择了他的学术先驱。这样一种制度因素影响学术创造的行为主义式的含蓄解释显示出一种准理性主义交换理论（quasi-rationalistic exchange theory）的立场，这种立场充斥于卡米克对声望是如何影响选择的解释，也毁了这种解释。卡米克利用了古德的观点，即“想公开对‘错误的’人

㉒ 与此相关的，是明显地观察到一方面在汉密尔顿和艾尔斯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在熊彼特、奈特和亨德森（我们还应该加上怀特海）之间的差异，也不仅仅是声望和学术上的不同。后面这些人是地位和水平完全不同的学术导师。

或成就表示尊敬而上司对持这种想法的人又不加赞赏，那么这样去做就将付出极高的代价”（第435页，注释15），借此说明帕森斯如果“想选择像制度主义者那样在他所处的环境中名声不好的人作为学术前辈”（第435页），那他就是不理性的。

最后，卡米克坚持了在他对帕森斯的简化论解释中一直是作为核心的观点（比如，卡米克，1987，1989）。他注意到“从体制上讲有若干因素”，使得跟制度主义者“避免联系显得特别重要”（第435页），于是他强调帕森斯在等级体系中的地位具有不可小觑的意义。在一些关键的要素上——工作保障、职业声望、院系实力——帕森斯的地位都很低；与此相反，在这些因素上，分析经济学跟制度经济学相比就占优势。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社会学学科地位的不安全使得帕森斯认为有必要跟在反制度学派控制下的经济学学科结成可靠的联盟；而据说在哈佛社会学系低下的地位也促使帕森斯迈向同样的方向；“在社会学系得到提升的前景无法明确”（第435页），使得帕森斯选择了跟外系结盟。

如果我们的假设是行为者的内在动机和外在环境中的等级，那么，上面这样的“证据”就似乎是很明显地证明了H1。这是因为帕森斯无助到了“需要得到经济学家和其他当地名流的支持”（第435页），迫使他竟背离了制度主义！那么，欧洲人又怎么解释呢？帕森斯为什么要转向他们？对此问题，卡米克也经常拿出一个工具论的解释，“因为他们不是‘阻碍’（liabilities）”（第435页）。他真是一个经济人（Homo economicus theo-

---

㉝ 以一种熟悉不过的举动，卡米克对他通过否认一种立场而确立这种立场的做法暴露出他的疑虑。对帕森斯转向欧洲学者，他的解释是“这并不等于说他选择四位欧洲学者是一种工具论的想法，这种想法把内容因素撇到一边，而力图去逢迎当地人的观点”（第436页）。不，绝不是这样。卡米克告诉我们，他实际是想说“帕

reticus)。这些论述并不是说声望不重要,也不是说知识分子不会受他们生活环境的影响。它只是想说明声望的流动,包括它的起源和影响都不能简单地用交换来理解。进行交换的是有知识的行动者,是以主观确立其意图的行动者,这些意图确定了选择的标准。知识分子都尽其努力以跟这些标准相一致的方式从他们的环境中做出选择,虽然毫无疑问,他们不总是会成功。这些观点不是要否认学术研究经常是政治和有约束的行为,也不是要忘记论文的写作经常是在建立联盟和偿还债务,而是想说,学术著作与其他著作之间的相关性不应该主要依据这些因素来判断。137

哈格斯特罗姆在其早期论述科学共同体的著作(1965)中认为,科学家是为了获得承认而相互交换信息。不过,他所用的是莫斯的交换理论,不是霍曼斯或者古德的理论。依据涂尔干的传统,对获得承认的追求,不管是什么在跟它交换,都要受到早先对道德力量的理解的约束。卡米克声称他借鉴了哈格斯特罗姆的研究,但他却不能理解它,这真该他感到脸红。

结论:对经典的解构与破坏

卡米克认为他对帕森斯选择学术先驱的关注极富有原创性。他写道:"直到今天,在理论领域内的研究都只考虑选中了哪些学术先驱,而不管对其他学者的排斥"(第424页)。什么是"理论领域内的研究"这个令人不解的问题我们先不管,难道对

森斯对欧洲学者的严肃的学术诉求"不过是被"制度因素给拔高了"(第436页)。当然,如果这是一个准确的自我描述,那么卡米克就必须要解释这种占优势地位的学术诉求是从哪里来的;由于他不能将它们之于声望因素,因此他不得不承认学术内容的因素!这就跟他实际想做的相矛盾了。

马克思的学术先驱长达一个世纪的研究不算是研究，或者不算是理论研究？但是，我们坚信，就算这个论述针对的仅仅是关于帕森斯的理论争论这个小范围，它也是错误的。

从《结构》一问世开始，那些反对其核心宗旨的人使用的一条基本策略——卡米克毫不隐瞒自己的异议——就是强调帕森斯在选择其学术先驱时用了为己牟利和排他主义的做法。从科塞（1956）愤怒于帕森斯排斥了早期的美国社会学，到辛克尔对此的响应（1961），到不绝于耳的抱怨，说帕森斯把马克思排除在外（雷克斯，1963），再到莱文（［1957］1980）坚持认为齐美尔也应该入选帕森斯的学术先驱，对帕森斯的批评一直都在不断争论他对学术先驱的选择。他们使用的手段跟卡米克很接近，攻击帕森斯摈弃了那些在他们看来其作品具有同等相关性的学者，或者指责帕森斯忽视了那些在他们看来可能在理论上威胁他的观点的学者。这些观点只要稍微再拓展一点，就成为另外一些阐释者的观点；他们认为，帕森斯实际上并不是在《结构》中摈弃了某个理论家，而是忽视了该理论家的著作的某些部分——当然总是最重要的部分。本迪克斯和罗斯就用这种方式对帕森斯跟韦伯的关系作过严厉的讨论。之后，大量"倒帕森斯理论"的 138 文章（波普，1973；科恩等，1975）继续沿着这条路子在论述，只不过在语调上有根本性的缓和

所有这类文章都在说，除了帕森斯本人以及早期和最热烈的拥护者之外，再也没有人描述帕森斯是一个"公允的修补匠，探知并吸取任何相关的学术源泉"（第 432 页）。不过，这个想像中易被击败的对手所做的，比刺激卡米克产生富有原创性的错误印象要多得多。卡米克还用他的原创性来说明，他提供的这样一种强调声望的行为主义和简化论式的理解，是解释排斥一些学术前辈——"阴暗的那一面"（第 424 页）——的惟一方式。

但是，很多最严厉的对帕森斯摈弃某些前辈的批评都从未认为需要拿声望来论述；他们只是在学术的基础上，或者根据更开放地理解社会在一般意义上对帕森斯造成的影响来解释这种排斥。甚至更直白地说，一些因关注"内容相符"而最经常地遭卡米克批评的解释者，以及一些在近年努力对帕森斯提出一种更复杂并且更赞赏的理解的阐释者（比如，古尔德，1981；亚历山大，1983，1988），也曾详尽地讨论过帕森斯在选择先驱时存在的阴暗和排斥的黑洞。古尔德就大篇幅地讨论并批评帕森斯排除了马克思。而亚历山大（参见 1987a）也把帕森斯对马克思、唯物主义者的韦伯、实用主义和现象学，以及涂尔干后期在宗教研究上的转向的排斥放到他对经典理论之后的整个社会学传统的读解的中心位置之上。

由于卡米克是那样持续不懈地力图把帕森斯的第一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本著作中的理论观点当做作者的个人抱负和制度的雄心来理解，因此不失公平地说，卡米克在研究《结构》一书的理论框架时带有某种破坏的意图。我们已经论证了，卡米克对帕森斯选择学术先驱的研究并非是原创性的，而且他的关键性论点也是错误的。不过，需要牢牢记住的是，对一部经典的每一次讨论都远非只有一个经验的目标。它以别的称呼在进行着理论的建构（亚历山大，1987b）。

卡米克力图破坏《结构》的整体性，也许是因为从根本上他不同意道德约束的核心性、道德选择独立的完整性、理论综合的需要以及以分析的方式建构理论等要点。在他自己的解释中，139 他必然主张以行为主义对动机的理解、工具论式地解释体制生活的外在压力，以及只要作品达到"现代的出版标准"（第 423 页）则琐事也美同诗歌的相对主义观点来替代这些要点。而我们，则因为自己对社会理论的研究方式，以及对行动和秩序的理

解方式都跟卡米克有截然的差别，因此在经验性地评价卡米克关于经典著作的讨论时在理论上也有不同的目标。

对我们学科经典的重新建构没有必要带着破坏性的目标。今天的社会学已经足够成熟，要挑战学科的奠基者也无需去幻想他们的不足及其私密的意图。更合理的观点和更漂亮的概念框架才可以推动和强化理论的争论。"前期出版的论述、未出版的文章、课程资料和信件等等"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重要思想家的理论遗产和我们学科的历史肯定有很大帮助，但是，它们不能被用来代替真正的理论讨论，而且它们永远都不应该被用来掩盖这些讨论。 140

参考文献

Alexander, J. C. 1983, *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 vol. 4: *The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Classical Thought: Talcott Pars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a, *Twenty Lectures: 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b, On the centrality of the classics. In A. Giddens and J. Turner (eds), *Social Theory Today*, New York and London: Basil Blackwell, pp. 1—60.

——1988, Parsons' "Structure" in American Sociology. *Sociological Theory*, 6, pp. 96—102.

——1993, Formal sociology is not multidimensional: breaking the code in Parsons' fragment on Simmel. *Theoria Sociologica*, 1, pp. 101—14.

Camic, C. 1979, The utilitarians revisit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 pp. 516—50.

——1987, The making of a method: a historical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early Pars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pp. 421—39.

——1989, *Structure* after 50 years: the anatomy of a chart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 pp. 38—107.

——1990a, Interpreting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a note on Tiryaki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 pp. 445—50.

——1990b, An historical prologu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 pp.

313—45.

——1991, Introduction. In C. Camic (ed.), *The Early Essays*, by Talcott Pars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ix—lxix.

—1992, Reputation and predecessor selection: Parsons and the institutionalis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pp. 421—45.

Cohen, J., Hazelrigg, L., and Pope, W. 1975, De-parsonizing Weber: a critique of Parsons' interpretation of Weber's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 pp. 229—41.

Coser, L. A. 1956,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 New York: Free Press.

Garfinkel, H.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Gould, M. 1981, Parsons versus Marx: "An Earnest Warning." *Sociological Inquiry*, 51, pp. 197—218.

—— 1989, Voluntarism versus utilitarianism: a critique of Camic's history of idea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6, pp. 637—54.

——1991,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at least 60 years ahead of its time. In R. Robertson and B. S. Burner (eds), *Talcott Parsons: Theorist of Modernity*, Los Angeles: Sage, pp. 85—107.

Gouldner, A. W. 1970,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Equinox.

Hagstrom, W. O. 1965,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Holton, R., and Turner, B. 1985, *Max Weber on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Hinkle, R. 1963, Antecedents of the action orientation in American sociology before 1935.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8, pp. 705—15.

Jones, R. Alun, and Kibbee, D. A. 1993, Durkheim, language, and history: a pragmatist perspective. *Sociological Theory*, 11, pp. 152—70.

Levine, D. N. [1957] 1980, *Simmel and Parsons*. New York: Arno Press.

Merton, R. K. 1965,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New York: Free Press.

Mills, C. W.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isbet, R. 1966,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Parsons, T. [1932] 1991,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Marshall in relation to the thought of his time. In C. Camic (ed.), *The Early Essay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69—94.

——[1935] 1991, Sociological elements in economic thought. In C. Camic (ed.), *The Early Essay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81—230.

——1937,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59, A short account of my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Alpha Kappa Delta*, 29, pp. 3—12.

——1970, On building social system theory: a personal history. *Daedalus*, 99, pp. 828—81.

——1976, Clarence Ayres's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In W. Breit (ed.), *Science and Ceremon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pp. 175—9.

——1980, The circumstances of my encounter with Max Weber. In R. K. Merton and M. W. Riley (eds), *Sociological Traditi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Norwood, NJ: Ablex, pp. 37—43.

Pope, W. 1973, Classic on classic: Parsons' interpretation of Durkhei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 pp. 399—415.

Rex, J. 1961, *Key Problem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Sciortino, G. 1993, Un capitolo inedito de *La Strutura dell'azione sociale*. *Teoria Sociologica*, 1, pp. 13—41.

Seidman, S. 1983, *Liber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Social The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aylor, C. 1975, *Hege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iryakian, E. A. 1990, Exegesis or synthesis? Comments on 50 years of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6, pp. 425—55.

Wearne, B. D. 1989, *The Theory and Scholarship of Talcott Parsons to 195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eitlin, I. 1968, *Ide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logical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7

结构、价值、行动：早期帕森斯说了什么和应该说什么？[①]

每个学者都有未出版的手稿。而只有经典学者的未刊手稿才能最终获得出版。对历史的兴趣经常是一个托词。也许这篇一度被尘封或者遗忘的文章最后将告诉我们，这个重要的人物在那紧要的时刻正在想些什么，还有为什么他会这样想。但是，在我们的学科里，对历史的兴趣总是扮演着特洛伊木马的角色。它是一个伪装，其实关注于当代——在理论、经验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说到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一些思想家视为经典的缘故(亚历山大，1989)。我们相信他们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困境。通过理解他们的作品，我们发现他们"实际所说的"规定了我们自身在今天会说什么或者不会说什么(见前面的第2章)。因此，找到一本早期的未版著作也许就是一条让我们能够说出点新东西的途径。

当然，这并不是要否认其中包括的历史的或者准确地说是解释学的问题。我们不是简单地从今天的理论问题去读早期的文本。对一位思想家写作其作品的历史过程的争论，对他/她作品的这个部分或那个部分的特点的争论，还往往影响着当代的

① 本章作为帕森斯首次出版的题为"社会制度理论绪论"的手稿的评论于1990年发表，他写此手稿时尚在哈佛大学任讲师。

问题。出于这些原因，我在评论帕森斯的"绪论"（帕森斯，1990）时，一开始就关注它对于帕森斯的著作在历史上所受争议有何意义。接下来，我把目光落在文本上，来看它与目前解释它的观点是怎样相契合或相抵触的。由于这些论述在当代理论和经验层面上的意义将会一目了然，我只是在本章的第三节才陈述我自己的基本旨趣，即这是一个对今天的社会学理论有贡献的文本。

147

历史主义的观点

当研究经典著作的各种历史方法要划分"早期"阶段的时候，它们要么是拿该经典人物的"早期"作品跟其"后期"作品做令人厌烦的比较，要么就是指出这个初期的种子使得其后期的作品生发出重重问题或者孕育出种种成就。

第一种策略可以以下面的观点——它已从斯科特（1963）经由孟席斯（1976）延伸到哈贝马斯（1988）——为例，即跟其后期强调社会化和制度控制的著作中的功能主义和系统论的侧重点相比，帕森斯早期的作品更强调个人的自律与互动。这个观点不仅想在帕森斯的全部论著中创造出这两种解释模式的隔阂，而且也想在关于现实本身的概念建构中制造出这样的隔阂。可是，这种历史解释并没有意识到，"行动单位"在帕森斯的早期著作中是一个分析的框架，而不是对真实的个人行动的经验概括。比如，在"绪论"当中，帕森斯就把行动当做一个分析性概念来使用，把它描述成包含了现实的不同层面的过程。正由于此，帕森斯就能够对财富、权力和声望的各种"手段—目标关联"体系——在理想型当中，它又是靠意义的价值体系来约束的一个体系——进行描述。承认了"行动"是一个纯粹的分析性概念，那

么他这部早期的作品中已有系统与功能等概念，甚至我们还能在文中找到三十年之后重新出现在控制论中的终极目标和终极条件等词汇，就不应让我们感到惊奇。“绪论”一出版，我们很难相信帕森斯的著作中存在着一根行动/系统之轴这样的历史观点还能站住脚。

第二种划分早期阶段的策略可以被称为“原罪”的观点，它在卡米克(1987，1989)的异议中得以体现。他认为帕森斯理论的特质——譬如没有强调冲突与权力、缺乏对制度性力量的关注等——可以被追溯到他在哈佛的经济学同事所倡导的分析和反历史主义的视角对他产生的决定性影响(见前面第六章)。不过，“绪论”表明卡米克也许只是强调了实体的关系，而忽视了更为基本的学术影响。不管怎么说，帕森斯在受到哈佛经济学家的影响之前，他就翻译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并在一篇介绍性文章中强调该书的反经济学特征，称赞韦伯洞察到了人类动机的非理性——精神的和情感的——特质。在“绪论”中，最令人震动的一个侧重点就是帕森斯坚称人具有“先验性的”旨趣，也就是说存在着动机的物质性和工具性解释所忽视的非经验的和不可见的目的(第321页)。[2] 保留人的行为的先验和形而上的特征，并把对这一特征中所包含的价值与意义体系的信仰进行理论化，正是他试图提出的制度理论的观点。帕森斯就算确实接受了分析论的路径，那他这样做也不是要在社会理论的建构中扩展经济学的风格，而是要从根本上排除关于社会的经济理论(参见古尔德，1989)。

148

② 文中所有的参考页码都指的是帕森斯1990年的著作。

解释的争端

虽然历史主义的观点力图通过考察社会和知识背景来解决解释上的争端，但是大多数学者还是试图进入错综复杂的解释本身来理解一部经典著作的意义。在关于帕森斯的争论中，有两个问题长期争执不下。

第一个就是“功能主义”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的批评者当中，最有影响的是哈贝马斯(1988)。他认为帕森斯对系统与功能的论述展示了一种机械的取向，它跟帕森斯所自称的要关注意义、自主行动以及文化规则在物质与组织结构中的渗透相矛盾。“绪论”则提供了直接反驳这种解释的证据。在其中，帕森斯直接而清楚地论述了“系统”。帕森斯引入这个概念，是想强调个人行为的主观目标是以一种确定的社会性方式组织起来的。在帕森斯看来，一个目标系统就是一种价值模式。进一步，帕森斯还认为系统概念需要保留自由选择的道德，而并非包含机械与强制之意。他坚持认为，只有在个人可以构想“一个经过组织的目的系统”时，“确定一个目标才具有指向性(involved)”(第 323 页)。而如果有些系统不进行目标的组织化，那么目标就将是随意的。它跟理性而谨慎的选择的观念相冲突。

在“绪论”中，虽然关于功能的论述有相互矛盾之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讨论就是帕森斯想证明功能的路径比他所谓的结构或关系的研究更适合研究制度的分类。帕森斯相信，功能的路径是惟一跟“主观的”观点相契合的方法——它使得社会学家不只是简单地把不同类型的制度与具体行动精致地区分开来，而且还“在具体行动的若干不同要素间”(第 331 页)做出细致的区分。在行动内做出这样的区分之后，帕森斯提出，任何具体的 149

行动既包括提高效率和实用性的要素，比如手段和条件，也包括其他一些更具主观性的要素，比如目标和规范。在比喻性地运用这种区分时，帕森斯认为制度具有四种不同的功能：技术—经济—政治的功能、象征的功能、审美和表意的功能以及教育的功能（第330页）。因此，在这部早期著作中，对"功能主义"的应用并没有表现出一种机械论的取向。

第二个主要的解释争端——帕森斯的理想型（idealism）——在"绪论"中也可以得以澄清。在长达四十年对帕森斯著作的争论中，他的支持者普遍都在维护其作品的反理想型的特点或者综合性的特点，即便是从达伦道夫（1959）到古尔德纳（1970）的绝大多数批评都在指责在他们看来帕森斯所重点关注的仅仅是规范性控制。"绪论"表明前面一种解释是对的。总的来说，这是一篇关于制度化而不是关于价值或观念之本质的文章。事实上，帕森斯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详细地讨论纯粹规范意义上的"目的系统"与技术逻辑意义上的"手段系统"之间的"中间层"（第323页）。这个中间层是一种手段—目标的相互关联——一个容纳了技术、经济和权力的范围，在其中观念持续不断受到实际考虑的调节。虽然理想型的研究路径会否认这个中间层的存在，但是帕森斯却把它看做是对社会组织的一个主要挑战。此世的具体目标跟一个社会的"目标系统"理想化的、超越的价值相距甚远，正是这使得帕森斯所谓的制度化成为必要。帕森斯相信，个体行动直接包含的终极目的并不能保证中间层跟更理想化的目的系统融合到一起。他不接受这样的"解决方式"或许是因为这将导致一种韦伯所说的纯粹实用主义的"目标理性"和绝对价值之极端理想化的理性之间的二元对立。

韦伯在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基础上认为在现代社会的世俗行动中鲜有价值的涉入；在他看来，世俗行为采取的都是纯粹目

150

的性和工具性的形式。帕森斯对日常生活却以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加以思考，特别是他认为存在着一个中间带，在其中对权力、技术和声望的追逐既不完全是为了个人利益，也不仅仅是为了有利于他人。在对这个灰色带进行界定的时候，帕森斯提出了"规范约束的系统"。帕森斯坚持认为规范"以非目标的方式跟特定的行动……相联系"(第 324 页)。这是一个关键的论点，因为它表明帕森斯在给规范下定义的时候，并不认为它直接进入了行动者为他们自己确立利己的和个人化的目标的过程当中。规范只是提供种种"约束性"标准，它们确定了"在选择直接目的和实现它们的手段时所面临的限制"(第 324 页)。于是，规范成为了中间层——居于终极目的和具体的利益情境之间。帕森斯选择了在这个中间层里面来定义制度。

最早的这样一种研究制度化的路径可被称为嵌套理论(a nesting theory)；它来源于规范这个概念，它在垂直方向上一方面跟终极价值相整合，另一方面又跟即刻的情境利益相整合。

然而，在为制度找到这个中间层而大费笔墨之后，接下来帕森斯却否定了它。首先，他在他所谓的首要("情感中立")动机和次要("利益计算")动机之间给制度性服从引入了一种不平衡，这种差别赋予文化动机以高于实际动机的优先性(第 326 页)。而且，帕森斯还认为规范不仅是向上跟更普遍的价值、向下跟更具体的利益相整合，而且它们还跟横向的大多数其他行动者的规范相整合。因此，这就不仅存在嵌套，而且还有交织。不过，如果可以说社会冲突的存在是因为制度规范没有在水平层次上得到共同遵守的话，那么按照被整个共同体共享来对规范进行界定则完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大多数冲突群体的目标在被嵌套时，它们就不再会有交织。它们按照实际和理想的利益在规范调节下被结构化——也就是说，它们很大程度上是垂

直意义上的整合——但它们不是共享的。这就只能说明，帕森斯用多维度的视角而不是用理想型的路径表明，社会冲突经常是高度制度化的。

“绪论”又一次证明，在解释帕森斯的理想型的时候，他热心的支持者和他最激烈的反对者都说得不对。实际上，将帕森斯151 的理论，或者是其他任何一部经典著作的“理论”当做高度内部一致的都是一种错误。帕森斯阐明了一种多维度的立场，同时也是一种理想型的立场。解释性批评面临的挑战是把这些脉络梳理开。这一步如果更全面地得以实现，那么当代理论就能更好地坚持多维度的视角。我们下面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考虑具有当代意义的问题。

当今的理论

在追述关于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和理想型的解释的争论中，我们显然已经接近了当代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因为要理解帕森斯是如何阐述这些问题的，我们就必须澄清和说明这些问题所引发的我们自己在观念上的理解。而且，这样的理解也仅仅是在今天对社会理论的争论才存在。因此，说这些争论是“解释性的”，不是说它们缺乏当代的理论意义，而是说这样的意义要对照一些经典著作去寻找。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有人进入到解释的争论当中，那他就可以更直接地把文本的理论意义理所当然地看做是具有当代理论的意义

那么，在今天我们从“绪论”中可以参照出什么呢？虽然我可以列出一大堆相关的论题，但现在我将只关注两个问题：第一，人类行为的道德；第二，它对制度化行动的任何一种社会学理论意味着什么，以及在社会行动当中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复杂

的交互关系。

在"绪论"的开篇，帕森斯就提出"行为的模式和关系的形式并不是简单地存在着，而是被所关联到的个人当做应然的存在而拥有——在这里包含着规范的要素"(第 320 页)。帕森斯的理论核心是一种深刻的道德主义原则。他论述的行动者充满了为善的愿望，并被理解为是在尽力服从体现这种道德期望的原则。道德原则成为了人类行为的参考依据，因此人类希望他们的制度跟他们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在这里，人类做出选择这个事实就相当重要。正是因为他们具有选择的能力，所以规范性的评价标准就变得很关键。在社会理论家逐渐地把他们的侧 152 重点放在乏味的行动的工具性(比如，科莱曼，1990)或者放到同等世俗的前话语意识(prediscursive consciousness)的实践性(比如，吉登斯)的学术圈里，我极其欣喜地发现了这种对道德之核心性的强调，以及这中间所蕴涵的对于人类尊严的尊重。在我看来，它同样也是一个对经验世界更准确的描述。

道德标准是一个关键——在行动过程中它们要不断地被参照。由于这个原因，行动者向共有规范做出的承诺的效力——我已经称之为横向整合的问题——成为了研究社会冲突和整合的中心问题。其实，在"绪论"中有一个跟帕森斯更具理想型立场的著作相呼应的重要讨论，即帕森斯承认依靠制度性规范的控制总是不完善的。组织性的和物质上的惩罚和奖励——次一级类型的社会控制——处处存在，就是因为"总存在着……价值观念上的抵触"(第 326 页)。结果就出现了帕森斯所谓的"利益的连环"，它使得就算是在"道德的忠诚消亡了"(第 327 页)的时候，模式化的奖励和惩罚依旧可以维持下去。

承认了这一点，就使得帕森斯以后的论述变得非常有趣，因为帕森斯并不认为脱离了道德和物质上的惩罚，权力可以简单

地依靠强制和支配得到惯例性的维持。帕森斯坚信"在系统不被打破的情况下，权力维系的发展过程是有限制的"（第327页），并相当仔细地概述了这个限制。惯例和不可质疑的强制受到限制有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基础，即就算是在一个系统之内，系统的奖励与制度化的价值实际上已经没有联系了，而个人尊敬，如果不说是社会地位的话，也还是将被授予那些按照那些大家都强烈尊奉的价值与规范行动的个人。帕森斯认为，"可以想像，一个团体的成员为了个人利益遵守团体的制度性规范，不能说明这些规范主要或者仅仅是依靠利益和惩罚在保障它们的有效实施"（第326页）。反过来说，"基本的个人奖励，尤其是社会尊重，将倾向于授予那些遵守规范的人"（第326页）。③

虽然分配个人尊敬的延续性代表着一种服从得以强制性维持的永久性推动力，帕森斯还是提供了更富动态和系统性的限制。他认为，即使是强制性的权威都不可能持续地维持一种非道德的或者不合法的秩序，这是因为行动确实包含着一个道德153 的层面。帕森斯对此没有提供明显的证据。即使是服从了强制的人也仍然保持着道德价值的忠诚，因此当这些价值不能够控制社会的合法力量的运作时，这些人就将起来造反，并力图将这些价值制度化。帕森斯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那些掌握了强制性制裁的人最终也将服从于道德的限制。帕森斯认为，"制裁的力量和运用它们的意愿即使不完全是，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是道

---

③ 虽然我认为我在这里的叙述跟我在文中尚算系统的论述相一致，但是我在理解上仍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谨慎。帕森斯本人并没有做出这样明确的区分，即一方面是尊重，即个人对体现价值的行为的认识，另一方面是主观的奖励，即那些更为制度化的服从——也就是地位。他也没有直接说尊重过程的连贯性可以制止惯常性地强制施加控制。在提出前述观点的时候，我的分析主要依赖于雅各布和博沙蒂的重要论文（1985）

德观念的一种表达"(第327页)。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制裁主要依赖于组织"(第327页)。帕森斯怀疑，组织如果没有组织化的价值，那么组织就不能有效地维持下去。[4]

现在，我转向在"绪论"中提出的第二个理论问题。令人吃惊的是，它似乎是当代的术语——行动的相对理性与非理性。在近来的社会科学发展中有一个递增的趋势，也就是将社会行动描述为"理性选择"。交换理论被网络分析(network analysis)所用，并似乎逐渐在成为社会心理学的支配性范式。政治理论家和阶级分析者强调结构性行动者和群体的理性。社会运动被以利益最大化在进行描述。甚至原经济模型被用来分析诸如婚姻这样的亲密和私人化的领域。

帕森斯在他早期的这篇"绪论"中提出，理性选择经常被等同于行动者的推理过程本身所具有的合乎逻辑的、"原科学的"特征。他指出，不管这个推理过程从经验上说有多么合理，它都只是一种手段。诸如此类的行动是不是理性，只能从该推理过

④ 这样的经验观察，以及帕森斯赋予它的民主道德的渴望，跟杜威在论述社会控制与自愿的、合乎规范的行动之间的关系时采用的实用主义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契合的：

"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避免'控制'这个概念中的一个含义。在有的时候，它明确地或者是无意识地假定，个人的取向纯粹是个体主义的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此也是反社会的。因此，控制就是使个人的自然驱动力服从于公共或者共有的目标的过程。由于个人本身的特性跟这个过程特别不同，而且与之相对，无助于它的实施，因此从这一点说控制就带有强制和逼迫的味道。政府体系与关于国家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上，它也深深地影响了教育的理念与实践。但是，这样一种观念是没有根据的。个人在有些时候是醉心于按自己的方式行动，而他们自己的行动方式也有可能跟其他人的方式相悖。但是，他们也热心于甚或可以说主要是热心于参加进别人的行动，并加入共同和相互合作的活动。否则，就不会有共同体的存在……事实上，控制仅仅意味着一种权力指向的强化形式，既包括个人通过其自身努力而获得的约束权，也包括别人掌握权力时产生的约束。"(杜威，1996[1916]，第24—5页)

程与欲图实现的目标相比较才能判断。因为，只有当目标的实现确实是理性和"有效"的，选择目标的过程才能被看做是理性的，行动本身当然就更不用说了。如果不能审视行动者所选择的目标，则无法做出这样的判断。可是，问题就在于行动者可能选择的那些目标只有一些是可观察的，还有很多目标是不可以观察的。帕森斯把这些目标称为超越性目标（transcendent ends），因为它们代表着行动者力图达到思想的特定内在状态或者跟终极价值实现某种关联。

理性行动如果被界定为选择有效的手段而达到了目标的实现，那么，研究者就可以将理性仅仅认为是使用理性手段去实现经验的目标。只是由于没有一种固有的方式可以确认那些不可观察的目标是否得到了实现，所以还无法去评价大范围内的那些可被称做是"理性推理的"行动。

154

最后，不仅是目标不能全部被观察，而且手段也并非全都是理性的。帕森斯指出思维过程可能是不合逻辑也非实用性的。他举了一个语言学的例子来证明推理也可以是象征性的、武断的和服从常规的。这个观点带有根本的重要性。

我们最后得到四种行动的理想类型，它们被放在图1的目标类型和手段类型的交叉表格之中。

帕森斯认为，"理性选择"的概念只适合于单元格1，并不是可以普遍地适用。帕森斯把这类行动称为内在理性行动。帕森斯把宗教行为放在单元格4，它们包含了超越性的目标和固定的、仪式化的手段。在这一格里面，他还放进了传统的影响。他把巫术放在单元格3，巫术是使用象征手段以实现实际目标的行动的典范。

	目标类型	
手段类型	经验的	超越性的
逻辑的/实践的	1 **理性行动**	2 经济消费、政治运动、组织互动
符号的	3 **巫术、对话**	4 **宗教、传统**
	世俗仪式	

图 1 行动的理想型

注：帕森斯举的例子用粗体。

这些论述表明理性选择理论的意义相对而言并不大，并且让我们关注其他重要的行动类型。不过，我认为帕森斯在每个方面都没有足够的深入。他低估了实践理性中符号和习俗的渗透；反过来，他也低估了实践理性对符号的渗透。这种低估的最重要表现就是帕森斯提出的“类型”理论，而不是“分析的”理论。不过，就算我们使用理想型的理论，那么帕森斯也只确立了三种行动的典型；而即使是按照他的分类法，也应该有四种类型。帕森斯没有关注到单元格 2，亦即以合乎逻辑和实践的推理去实现超越性的目标的行动。即便行动的手段不是习俗化的——用索绪尔或者符号论的话来说，是“任意性的”(arbitrary)——但行动的目标却很有可能是。因此，习俗或符号不应被限制于明显的“非理性”现象，比如巫术和宗教，而是应该拓展到政治和经济现象中去。如果消费品是被符号性地而不是实用性地建构

（比如泽利泽，1985），如果政治家和各种组织所追求的不是简单的世俗性目标，而是被神话、故事或者符码所规定（比如迪马乔和鲍威尔，1983），那么经济行动和政治动员都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理性行动"。

但是，即使是来看帕森斯提出的跟理性有很大偏离的行动模式，他的理解——从我们当代的观点出发——也是很有局限并且相当刻板的。难道只有是巫术才是传统的手段和实际的目标相结合的行为的典范，语言就不是了吗？在语言调节下的行动并非如哈贝马斯描述的那样是通向更高理性的"黄砖路"。正相反，它很明确地表明，任何一种人类互动的要素中都包含着任意的形式。帕森斯也不应该限制单元格 4 为以大写字母"R"打头的宗教和仪式。使用习俗化手段而试图实现超越性目标的行动者并非仅仅是伏都教的首领、祭司或先知。最世俗的行动者也常常实施同样的双重习俗化的行为。涂尔干后期的"宗教社会学"就开始提出了一种以仪式的世俗形式来研究它们的理论（亚历山大，1988c）。

上述分析表明，在这篇早期的论文中帕森斯用来解决理性问题的理想型路径是会产生误导的。比如，帕森斯的分析给人一种很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在单元格 1 中的行动是十分普通的：理性的手段和经验的目标。当然，帕森斯并不是想把这种内在理性的手段—目标的结合弃之不顾，而是坚持认为，这类行动很受规范性规则的约束；一个理性的行动者在选择其手段和目标的时候就面临这些规则所确立的道德上的限制。但是，这种"拼凑"的方式带有机械论的色彩。它轻松地假设了实际推理是完整无缺的，还认为目标的可观察性的经验主义观念是非常合理的。但是，现象学（原文是 phenomology，疑是 phenomenology 之误——译注）已经使得我们可以去理解诸如象征那样的产生于

行动之内的规范性评价。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则使我们知道，行动者的目标很少有可能会逃出依照习俗建立的规范。行动并非是一个被文化、人格和结构中的位置所包围的手段—目标的黑箱。它是一种象征化的活动，因此它充满了符号的编码，而不仅仅是被后者所约制。它总是在策略性地衡量成本与收益，因此客观条件也遍布于它，而不是它仅仅依赖于客观条件在进行计算。而且，如果行动总是象征化的和策略性的，那么它也将一直是富于创造性的。正是通过这些象征、创造和策略化的过程，人格、社会结构和文化才得以在行动中体现和客观化（亚历山大，1988a）。

通过展示目标和手段之间远比理性行动者的模式要复杂得多的关系，帕森斯在"绪论"中为这种多维度的视角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案例。而当他提出规范和条件制约着手段—目标理性的时候，他则是在探求一种能够从经验上证明这种视角的行动模式及其发生的环境。

结　论

在本章简短的讨论中，我虽然谈到了"绪论"在解释上的意义和与当代理论的相关性，但在这篇早期未发表的文章中还有大量的内容显得极其陈旧。文章的后半部分则离题去讨论梅因提出的法律和概念的问题。而且，在帕森斯更成熟一些的作品中，他也纠正了"绪论"中的一些最为明显的缺陷。他彻底抛弃了类型学的研究路径，并在他论述交换之一般媒介的文章中竭力运用语言学的类比

不过，我认为，这篇早期的、还算是意趣横生的作品所揭示的问题一直是帕森斯思考的核心问题。他的理想主义的张力、

文化与观念一致的结合都激发出一种提倡冲突社会学的反动。157 他难以对行动过程进行界定，新的微观社会学由此对他进行批评。他把文化界定为约束性规范的倾向也引起了不满，这推动了更具有解释学色彩的文化社会学。在跟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的统治地位相抗争的过程中，这些新的运动形成了战后社会学的第二个阶段。不过，当这些运动从挑战变为占有一种合法的统治地位时，它们就变得常规化了，并且影响渐弱。现在，我们正在发起战后社会学的第三个阶段。这个新的理论运动（亚历山大，1988b）强调综合和重新整合。正是这个新气候促进了帕森斯早期著作的“发现”和出版。158

参考文献

Alexander, J. C. 1988a, Action and its environments. In J. C. Alexander, *Action and its Environments: Towards a New Synthe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301—33.

——1988b, The new theoretical movement. In N. J. Smelser (ed.), *Handbook of Sociology*. Los Angeles: Sage, pp. 77—102.

——1988c (ed.), *Durkheimian Sociology: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Sociology and discourse: on the centrality of the classics. In J. C. Alexander, *Structure and Meaning: Retinking Classical Soci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8—67.

Camic, C. 1987, The making of a method: a historical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early Pars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pp. 421—39.

——1989, *Structure* after 50 years: the anatomy of a chart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 pp. 38—107.

Coleman, J.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ahrendorf, R. 1959,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ewey, J. 1996 [1916],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DiMaggio, P. J., and Powell, W. W.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c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pp. 147—60.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ies*. London: Macmillan.

Gould, M. 1989, Voluntarism versus utilitarianism: a critique of Canac s history of idea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6, pp. 637—54.

Gouldner, A. 1970,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Avon.

Habermas, J. 1988, *Theory of Commnicative Action*, vol. 2: *Gritique of Functionalsit Reason*. Boston: Beacon.

Jacobs, J. A., and Bershady, H. A. 1985, Moral evaluations in the social hierarchy: esteem as an independent dimension of social evaluations of inequality. *Staus Inconsistency in Modern Societies: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on "New Differentiations of Status Structures"*. Verlag der Sozialwissenschaftlichen Kooperative. Duisberg: FRG.

Menzies, K. 1976, *Talcott Parsons and the Social Image of Ma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arsons, T. 1990, 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social institu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 (no. 3), pp. 319—34.

Scott, J. F. 1936, The changing foundations of the Parsonian action schem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8, pp. 716—35

Zelizer, V. 1985, *Pricing the Priceless Child*. New York: Basic Books.

三

新功能主义之后：它对今日理论创造之贡献

8
社会学理论的新运动

社会学理论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曾经挑战过功能主义理论的年轻一代正步入中年。他们论战的经验已被很好学习过；不过，当它们被确立为传统之后，其理论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在后功能主义者诞生的年代，对社会学陷于危机的失望成为其标志。现在，这个后功能主义阶段本身也走到尽头，我们意识到被急切期盼的是一个十字路口、一个转折点，而不是一场危机。

为挑战战后占统治地位的功能主义兴起了两场革命。其一是彻底且争议丛生的微观理论学派，它强调社会秩序的偶然性，强调个人协商(negotiation)的核心意义。另一场革命，则是富有生机的宏观理论学派，它强调强制性结构在决定集体和个人行动时所发挥的作用。这些运动改变了一般性的理论争辩，并且在中间层内渗透进经验行动当中。但是，这些理论路径就算是曾取得过成功，它们的自信和动力现在也业已开始减弱。

它们衰败的原因在于其片面性使得自身无法继续发展。本章核心的观点也在于此。我将证明，片面性在微观和宏观的理论传统中都产生了削弱自身的矛盾。我将提出，一直以来，正是为了回避这些障碍，年轻一代的社会理论家开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研究程序。在这新一代的理论家当中依然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不过，他们都承认一个基本的原则，即微观和宏观理论都

不令人满意，行动和结构现在应该被并置在一起。七十年代中163期是亟需激进和片面的理论构架的年代，而十年之后，人们在此只能听到建立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的急切呼声。综观西方社会学的各个重镇——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综合性的理论建构已成为主流，而不再是争辩性的理论。

我在本章的目的，就是对普遍性理论发展过程中这种极为令人惊讶的新转变做一种分析性的重新建构。不过，我首先必须为普遍性理论本身做一些辩护。在普遍层次上建构理论——不必涉及到特别的经验问题或特定的领域——是重要而关键的尝试。对我来说，它的重要性已无需争辩。比如，我上面所说的那些发展正是在普遍性的理论建构中得以表述和维系的。而且，这些发展通过广泛的理论争辩积聚而成，不再孤立地存在于一些抽象的理论领域内；不仅如此，它们还渗透进了社会学的各个经验的分支领域。但是，美国社会学界对于普遍性理论的意义和合法性仍然争论不休。这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经验主义的偏见，由此而来的疑问也导致要理解更广阔的发展并以理性和规范的方式探讨社会学的发展方向变得越来越困难。显而易见，作为任何实质性理论建构的铺垫，普遍性理论必须得到捍卫，它具有独特理论意义的原因也必须得到解释。

我将在阐述社会科学之特殊性质的背景下来捍卫普遍性理论。我将指出社会科学的目标不仅仅在于预测和解释，理论争论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普遍性话语模式也很重要。而且，我将坚持认为，在这些话语中存在着内在的评价标准，而不是经验主义的标准。论述到这一步，我将阐明话语"预设"层次的真理标准。只有到了这个地方，我才将返回我的实际目标，亦即本章的核心关怀。我将重新建构微观和宏观理论对功能主义传统的回应，并运用我已提出的合法性标准来衡量这些话语。在讨论了

由这些微观和宏观的理论传统的失败而激起的理论论述之后，我将勾勒出关于行动与结构的新的、综合的互动模式的架构。 164

作为话语和解释的社会学

要捍卫普遍性理论，就必须承认社会学的理论无须具有一种直接的解释效应，从而产生科学的意义。社会科学家能否接受这个观点，首先取决于他们是否把社会学看做是自然科学的一个萌芽状态，其次则取决于他们所设想的自然科学是什么样子。那些反对普遍化观点的人不仅把社会学等同于自然科学，而且把后者看做是反哲学的、观测性的、命题性的以及纯粹解释性的活动。不过，希望接受普遍性社会学观点的那些人可能也把它等同于自然科学；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却包含着库恩的范式革命的意图，主张非经验的和哲学的切入是自然科学活动的特征，并且经常对它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我在我的第一本书（《实证主义、预设和时下的论争》（1982a）中，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维护普遍化观点的。

这种以反对狭隘的解释性实证主义的观点来维护普遍化理论已被证明是很有限的。我认为，在回应这样一种观点的过程中，社会科学的从业者们肯定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更为成熟的对于科学的理解。因此，事实上一些经验主义阵营的研究者业已产生了对普遍性理论建构更大的宽容心。不过，由于后实证主义者强调自然科学中个人和主观的层面，他们已经无法解释科学的相对客观性及其在解释上令人惊叹的成功。这种失败使得后实证主义对社会科学的普遍化观点的捍卫遭到质疑。自然科学有它自身的诠释性，这一点无可非议。但是，如果这种主观性阻碍了强有力的普遍规律的建立以及实际知识的总的积累，

那么即使是一种后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它仍然还是要处于经验主义标准的单独衡量之下。不过，这个结论不一定可靠。在社会科学的争辩中，在深层次起作用的是标准而不是解释上的成功。跟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并非直接着眼于事实或者解释的论述俯拾皆是。因此，结论只能是，把社会科学等同于解释性的自然科学会产生误导。所以，捍卫社会科学中的普遍性观点不能完全依赖库恩对自然科学的重新界定。[①]我们必须在关键的层次上将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相区分。两者共享同一种解释性的认识论只是问题的开始，而并非结束。

165

所以，现在必须认识到科学的诠释可以在截然不同的科学活动中发挥效用。只有以这样一种与自然科学相对照的方式，社会科学中普遍性思维的重大意义才能够被真正理解，被承认为一种合理性的行动则更无须赘言了。而且，只有在认识到其重要性之后，这样一种普遍性观点中所潜藏的真理标准才可以被表述出来，并且会得到公开而理性的争论。毕竟，放弃经验主义并不等于以非理性的方式去接受相对主义的立场。[②]

科学可以被理解成一种诠释活动，我的意思是说，这不会导

---

① 当然，库恩本人可能会首先坚持认为，他对自然科学的重新界定并没有否定它的客观性和积累性的特征，而且社会科学基本上没有达到这样一种状态。

② 非理性主义的一种形式就是罗蒂已经提出警告的极端"反基础主义者"(anti-foundationalist)立场所存在的危险。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一书中(1979)，罗蒂对西方哲学史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性评论。他指出，几个世纪以来为客观评价建立认识论基础的努力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因此，应该抛弃这样一种普遍性的推论工作。到了这一步，下面马上就可以呼吁，社会科学应该放弃普遍性理论的建构，无论是关于社会的，还是关于理论的普遍性理论。因此，立基于罗蒂的观点，哲学家们(比如，赖赫曼，1985)赞成把哲学简化为文学理论，社会学家(比如，参见沃尔德尔和特纳，1986)则赞成从普遍性理论转向道德推理。在本章中，我的主张将直接应对着这些观点，目的是想在实证主义和个人风格化的诠释学之间开辟出一些中间区域。从直

致任何科学学科内的科学活动被固着在特定的主题上。然而，恰恰是对科学活动的分配使一门学科具有了经验或理论上的相对"感觉"。甚至连直言不讳的后实证主义者都承认，当代自然科学有能力根据其研究对象除去其主观的驻足石，以此与其它类型的人类研究活动相区别。比如，霍尔顿(1973)尽管费尽心思地证明主观性很强的、超经验的"主题"(themata)深深地影响了当代物理学，但是他坚持认为他从来没有主张关于研究主题的争论应该被纳入到"科学本身的实践当中"(1973 第330—1页)。相反，他认为"只有在这些问题都被清理出实验室之后，科学才开始出现极快的进步"。甚至连地地道道的唯心论哲学家科林伍德(1940，第33页)，虽然坚持认为科学活动依赖于形而上学的假说，但是也同意"科学家的任务不是提出它们，而是仅仅把它们当做预设"。

既然自然科学家的知识具有主观的层面，为什么他们却能把它排斥在外？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社会科学家不能这样做。其原因，并非是因为自然科学家要更多地接近理性的规范和研究程序。实际上，科学活动

拔的、反思的和"映照"的意义上讲，放弃从方法论上进入"真实"的研究是可以的。但是，放弃寻求共识性的、普遍的和非个人化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放弃理性本身的投入则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就是把具有说服力的理性的范例本身跟庸俗经验主义相等同，犹如西卡(1986，第155页)把哈贝马斯的理论的特点归结为"无意义的僵化，以庇护他热衷的科学主义"一样。虽然这些观点是从诠释学中吸取了灵感，但是真正以后者为基础的理解其实无须放弃建构认知真理的努力；它只是简单地弃绝了这样一种乌托邦式的希望，即能够确立一种单一的非历史的真理标准。因此，是对社会科学歪曲的自我理解必须被搁置一旁，而不是该社会科学本身。在下面的论述中，我的目标是证明这个学科——是以实证主义重新建构的术语来实践，而不是以之来做概念界定——既不是经验主义的，也并非缺乏为客观知识建立普遍性标准的努力，而且这种努力经常是极其明显的。我在1995年出版的书中更详细地确认了这个立场。

的分配取决于理性的从业者把什么当做知识上的问题域。自然科学家经常就表明其职业特点的普遍性承诺达成一致，以至于他们总是明确地关注更多界限清楚的经验问题，这就是问题的答案。从库恩的角度来说(1970)，正是这种状况使得常规科学可以作为经验性的消除疑惑和解决特定问题的方式而得以发展。哈贝马斯对经验特殊性与普遍化共性之间的这种关系也特别敏感。他把常规科学看做是自然科学的特征，并说"当代科学的真正成就并不主要在于真理的发现，(而在于)找到实现自愿和永久性一致的方法"。

只有当一门科学背后的假设不能被一致地接受时，超经验的问题才明显地暴露出来，库恩把这称为范式危机。他认为，正是陷于这些危机之中，人们才"求助于哲学以及对理论基本原则的争论"。这些非经验性的层面在科学的常规阶段被掩盖起来；因此，利用相对容易找到的经验材料，或者是参照特征跟这些材料有非常明显相关性的理论就可以确定研究的假设。但这种方式却不适合社会科学，因为科学在社会研究中应用会产生更多的分歧。由于存在着持久并且广泛的争议，因此隐藏在自然科学中并相对来说不为人所见的背后假设却在社会科学中活灵活现地发挥着作用。库恩为自然科学界定的范式危机的条件在社会科学中却是惯常的事。③

强调跟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内观点纷争比较突出，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从根本上接受相对主义。即使经验主义的客观性概念被抛弃了，在社会科学中仍然有产生理性知识的可能。认

③ 这就是为什么早期那么多社会学者对库恩理论的应用(比如，弗里德里克斯，1970)都成为过去并且偃旗息鼓的原因。他们是在一门总是或多或少地有尖锐分歧或者理论波动的学科里面宣称要进行革命性的改造。

识到这一点，就是承认有可能为社会过程建构普遍性的法则，甚至可能做出具有一定实现可能性的预测。① 在互不相同且争论不休的观点中也有可能获得关于世界的累积性知识(参照瓦格纳，1984)。而且，也有可能在大相径庭的基本研究方向上维系具有一定预测性的普遍法则。

不过我想说的是，社会科学的状况，使得要对经验知识的确切性质——遑论解释性的普遍法则——达成长期的一致，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基本立场之间的争论频仍，所以社会科学背后的假设通常是摆在台面上的。普遍性争论所关注的就是基本分歧的原因及其结果。由于背后的假设显露无遗，所以普遍性争论成为了社会科学争论的中心，其中心性跟(自然科学的)解释活动本身是一样的。因此，在社会科学中，对合法性的争论就不能只限于更多的经验关怀，而是贯穿在整个非经验研究之中。这些非经验研究使相互攻击的观点得以续存。 167

对这个观点，坚持实证主义立场的人会做出这样的回应，即处处凸显的分歧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异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他们得出结论说(比如，华莱士，1983)，只要社会学家更忠实于自然科学的严密与谨慎，那么社会科学争论的普遍化和理论化的特点就将会削弱，分歧最终也会由此消失。然而，这种观点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误解。出于认识知识和评价知识这两方面的原因，社会科学内出现广泛的分歧是必然的。

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如果被限定在人类思维之外的物质世界，那么从原则上说，人际交流可以把它的经验对象更清楚地加

① 在这个方面，瓦格纳和贝格尔(1984)，以及瓦格纳(1984)在论述硬科学和软科学的科学发展之间的相同点的时候，无疑是很正确的。不过，由于他们把解释性研究跟他们所谓的“定向策略”截然相分离，他们忽视了社会科学论述的话语性和普遍性特点，并因此忽视了内在于社会科学的每一步“发展”中的相对主义。

以说明。但是,对社会科学来说,它调查的对象要么是思维的各种状态、要么则是表现这些思维状态的条件。因此,科学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思维状态相互混淆的可能性是很普遍的。这也是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在社会科学中的翻版。

反对就经验对象达成简单的一致,也来源于社会科学具有独特的评价取向。跟自然科学相对,社会科学中描述和评价之间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对研究对象的描述就带有意识形态的含义。社会被称为"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工业社会"可行吗?"无产阶级化"、"个体化"或者"原子化"是否存在过?每一次概括都是在做吉登斯(1976)所谓的双重诠释,即一种对现实的解释具备了进入社会生活并反过来对解释者本人造成影响的潜力。而且,出于认知和评价两方面的原因,就社会科学简单的经验对象都难以达成共识,对它们进行抽象更是如此;这两个方面构成了社会科学的实质内容。由于这些原因,今后达到共识的可能性也只会更小。

最后一点,正是经验和理论上的普遍分歧使得社会科学形成了不同的传统和派别(见前面第二章)。这些富有凝聚力的群168 体不只是简单地反映了科学的分歧,他们还延续并加深了这些分歧。实际上,大多社会科学理论家(比如,瑞泽尔,1975)并不认为分歧以及伴随它而来的沟通扭曲是无可避免的灾难,他们其实都倡导学派间的冲突,并把它视为学科健康的表现。

基于上述这些原因,话语(discourse)——而不仅仅是解释(explanation)——成为了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主要特征。这里所说的话语,我指的是那些比常规的科学争论一向都要更加普遍化和更具思辨性的论述模式。前者以更具有学科性的态度为指导,以此来面对特定的经验事实、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普遍法则下的解释、证实或证伪这些法则的方法。与之相较,话语则

是推理性的(ratiocinative)。它注重推论的过程，而不注重直接经验的结果；在真理并非一眼可见的地方，它变得很重要。话语通过论证而不是预测来获得说服力。它的说服力建立在下面这些属性的基础上：逻辑的一致性、视野的开阔、解释的洞见、价值的涉入、修辞的效力、审美以及论述的条理等等。

福科(1970)把知识、科学与政治的实践活动都看做是"话语"，以此反对它们只具有经验和归纳的性质。在此基础之上，他坚持认为实践活动是历史性建构起来的，并被可以作为整个时代之定义的抽象理解所形塑。社会学也是一个话语的场域。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少能在其中找到的福科赋予这些领域的同质性；在社会科学中存在着很多种话语，而不是一种。而且，这些话语并不是像福科在其后期的作品中不断声称的那样，跟权力的合法化紧密相关。科学的社会话语的目标是成为真理，它们不断受到如何能达到真理以及这样的真理会是什么等因素的理性约束。

下面我说一下哈贝马斯(比如，1984)对话语的理解。在他看来，话语是说话者为使沟通顺畅而付出的努力的一部分。如果哈贝马斯不重视沟通的非理性因素——更不用说行动的非理性了——那他无疑就是提供一种使沟通的理性动机概念化的方式。他试图系统地确立论述模式，并为有说服力的解释建立标准，这些都表明理性的关怀与对超经验理论的认识是可以相互结合的。在他的理性化话语(rationalizing discourse)和福科的强制性话语(arbitrary discourse)之间，就是社会科学话语的实际领域惴惴不安地所处的位置。

正是话语居于社会科学的核心使得社会科学的理论表现出多义性；也正因为如此，强迫性地遵从自然科学的逻辑(比如，华 169

莱士,1983)具有很大的误导性。[5] 实证主义立场的拥护者感到这样一种多义性概念与他们的经验主义观点之间存在着张力,为了缓解这种张力,他们更为看重的是"理论",而不是被他们不屑的所谓"元理论"(metatheory)(J.特纳,1986);实际上,为了狭隘理解中的"解释",他们经常连理论都一并抛弃(斯廷奇库姆,1968)。但是,这些特点更像是从社会科学中做乌托邦式的逃逸,而不是试图去理解它。普遍性话语是核心,理论具有内在的多义性,如果社会科学真的是仅仅应用解释的策略就已足够的话,那为什么像斯廷奇库姆这样公开的经验主义者仍然被迫投身于以话语性的论述来维护经验主义的任务中呢?斯廷奇库姆论述(1968,1978)的实质是推理性的;他的目标是强制使用普遍性逻辑来达到说服的目的。

---

⑤ 并不能简单地说华莱士(1983)——近来最清楚地提出这种观点的人——要求社会科学理论接受自然科学的模式是错误的。应该说他搞错了一种逻辑的重新建构,即自然科学"应该"怎样做下去,才能勾画出一幅如何制造美妙科学的图景。这种重新建构的策略一开始就利用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立场,力图将理论性和非经验的观点从哲学思维中驱除出去。不管这种逻辑从哲学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特点——即使它们从根本上说是有局限的,但也是真实的——它都不应该被认为提供了科学实践的基础。从事实践的科学家从来不能以这种方式——或者以波普尔的方式——理解他们自己的著作,这也是后实证主义者对自然科学的理解不断增长的一个最强烈的动因。这一章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而行文的,它试图理解社会科学理论究竟是什么,而不是社会科学的一些批评者所想像的它应该实现什么样的目标。任何对社会学理论的批评方案都必须置于对其独特性所作的理解之内。用近来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争论来说(比如威廉斯1985;沃尔泽1987),这代表了一种内在主义的立场,与之相对,社会学的经验主义者、"科学逻辑"的批评者则采用更为有抽象的、外在主义的立场。

对理论的侧重与对事实的忽视

话语的普遍存在以及生成话语的条件都促使社会科学偏重于理论，而被认为是事实的东西却遭到了忽视。而对社会科学的诸要素——定义、概念、模式或者“事实”——的使用却很不明确，也颇多争议。因为这样，不同层次的普遍性之间不存在纯粹的可转换性。就是说，在某一层次上的论述不能够直接推演到科学研究中的其他层次。举例来说，虽然两个变量的相关性有时候可以在经验上做精确的测量，但这种相关性几乎不可能证明或者证伪以更抽象的方式表述出来的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命题。其原因在于，经验的分歧与观念形态的差异使得不同的社会科学家可以采取很多不同的方式使命题具有可操作性。[⑥]

下面，以两个最谨慎的从资料上升为更一般的理论的尝试来说明问题。布劳为检测自己刚提出的结构理论，一开始就提出一个他称之为规模定律的命题——这是一个纯粹生态变量的观念——群体规模决定了群际关系（布劳等，1982，第46页）。利用一组既能确认一个群体规模又能说明该群体的通婚率的数据，他认为（第47页）他在通婚率和群体规模之间找到的关系证实了他的规模定律。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数据证明“群体规模的大小跟群外婚的比率成反比”。但是，群外婚实际上并非是一个使“群际关系”变得可操作化的数据。它只是若干群际关系中的一类，恰如布劳本人在其论述中承认的那样，这种类型的关系跟其他因素也有关，而并非只是群体规模。换句话说，群际关系 170

⑥ 关于经验遭低估之必然性的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明，可见S.P.特纳（1987），它跟对当代定量传统之起源的历史控诉是联系在一起的。

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指标。所以，在被当做其指标的事实与群体规模之间的相关性并不能证明群际关系与群体规模之间相关性的一般性命题。因此，布劳的经验数据跟他的理论是相互脱节的，尽管他力图以理论建构理论的方式把它们联接起来。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利伯森(1980)的研究中。他雄心勃勃地对自1880年以来美国的黑人和白人移民进行了研究。在研究的开始，他提出一个并非很正式的命题，"奴隶制的遗留"应该对黑人移民和欧洲移民取得的成就差距承担责任。为使这个命题可操作化，利伯森采取了两个步骤。首先，他不是从文化层次上界定遗留，而是把它界定为黑人奴隶"缺乏机会"；而后，他用已提出的受教育的不同比率和居住的不同隔离程度等资料来说明机会。不过，这两个操作化步骤都是极易导致争议的。其他社会科学家不仅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界定奴隶制的遗存——譬如，从文化的角度——也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设想机会，而不管教育和居住的问题。因此，在利伯森业已确认的教育比例和机会差异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因而他的材料也并不一定能凿实地证明成就与遗存之间相互关系更具一般性的命题。当然，对这种相互关系的测量本身也算是一个经验上的贡献。但是，在这里更广阔的理论效应并没有能得以实现，因为相关性并不能验证它期望验证的理论。

要找到这个对比性问题的实例，亦即过度侧重从经验"事实"上升到理论的实例，是易如反掌，因为其实在每个受到广泛争论的理论研究中，经验材料都备受争议。譬如，韦伯(1958/1904—05)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引用的十七和十八世纪英国企业主的资本主义精神就曾饱受争论。假如意大利早期的近代城市国家中的资本家也被当做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比如，特雷弗-罗珀，1965)，那么韦伯所谓的资本家和清教徒之

171

间的相互关系就是建立在有局限的材料的基础上,并不能佐证他的理论。如果这样说成立的话,那么韦伯正是因在理论上借鉴了新教伦理,所以他才偏重于选择这类经验材料。

在斯梅尔塞的名著《工业革命中的社会变迁》(1959)中也存在类似的普遍性理论与经验指标之间的差距。在他的理论中,斯梅尔塞认为是家庭角色分工的变化,而不是工业革命本身,使得英国工人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展了激烈的抵抗活动。在他的历史叙事中,斯梅尔塞认为家庭结构的基本转变发生在他早已提到的过程中。但是,他技术性呈现出来的档案材料却表明(斯梅尔塞,1959,第188—99页),家庭的混乱是在很重要的产业纠纷开始出现十年或者二十年后才逐渐加剧的。斯梅尔塞在理论上对家庭的侧重决定了他在历史叙事中对材料的呈现,而他技术性的档案材料反过来又削弱了他的普遍性理论。[7]

在斯科克波尔(1979)近期的研究中,她试图证明一种历史和比较理论,而这样一种截然不同的理论也表现出类似的理论对材料的决定。斯科克波尔(第18页)提出要用一种"非个人的和非主观的观点"来看待革命,这种立场把因果推导的范围限制于"由制度决定的情境和群际关系"。她收集了革命的经验材料,她惟一接受的推论方式(a priori)就是她所应用的比较方法(第33—40页)。但是,斯科克波尔在多处论述中承认地方性的政治文化和传统权利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第62,138页),而且政治领导能力和意识形态也是必须(不管是多么简短地)接受检验的(第161—73页)。在这样进行论述的时候,她的

⑦ 这也展示了斯梅尔塞作为历史研究者的谨慎,他本人呈现了那些似乎是超出了他自己理论的材料(见沃尔比,1986)。这并不是一件常事,因为理论过度决定资料通常使得相反的资料不为人所见,这不仅仅针对社会科学家而言,对于他们的批评者来说也同样是如此。

材料受理论的过度约束表现得非常明显。她的结构性预设使得她对相关材料的叙述忽视了革命的整个知识和文化背景。[8] 由于反对其理论的材料不存在，使斯科克波尔得以进一步解释她以彻底的结构主义方式简要论及的主观性因素。

理论在经验上得不到证明与过度把材料上升为理论形影相随，而且这两种现象比比皆是。结果，从最专门的事实陈述到最抽象的概括，社会科学从本质上说都成为有待验证的。每一个经验性结论都要在超经验观念中进行争论，而每一个普遍性观点都要从尚未被解释的"经验事实"那里去证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社会科学的观点都要按照普遍性原则的要求来获得其合理性。[9] 要反对布劳的论述，并不一定非要用经验来证明，即阐明结构因素只不过是决定群外婚的若干因素之一；相反，我们可以证明要建立纯粹生态学因果关系的规则依赖于这样的预设，即行动完全是工具性的。对利伯森的著作，我们可以照样提出教育与客观机会之关系的经验问题。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话语的论述来表明，利伯森仅仅关注于奴隶制的遗存以及他纯粹以结构的方式将它操作化，这反映的不仅是一种演绎的观念程式，而且还应用了狭义的社会冲突模式。对斯梅尔塞的论述则可质疑其逻辑的正确性，或者指责他以早期的功能主义模式对家庭价值的内化过度强调，以此来对他进行话语性的批评。同样，对斯科克波尔的观点也可以不用任何关于革命的经验材料来对之做出评价。比如，我们可以证明她误解了"关于革命的唯意理论"(voluntaristic theories of revolu-

---

[8] 休厄尔(1985)曾有力地证明了斯科克波尔在论述法国革命时材料上的欠缺。

[9] 这可以被看做是主题化(thematization)在社会科学中的翻版，哈贝马斯(1984)对此有过论述。这种主题化必须放在每种理性论述之上。

tion)——这是她彻底质疑的目标——而把它当做个体主义的理论，认为它包含了判断行动之结果的理性知识。

做这样的论述是在创造话语，而不是在解释。就像塞德曼(1983)强调的那样，话语并不意味着放弃对真理的追求。追求真理无须局限于为可检验的经验有效性设立标准。各种话语内在地就蕴涵了其特有的真理标准。这些标准超越了经验的有效性，着眼于预设的性质与结果、模型的限制与有效性、观念形态的后果、方法的衍生意义(meta-implications)以及定义的内涵。一旦这些内容得以明确，它们就可以被理解成这样的成果，也就是使平常只凭直觉感知的社会分析与社会生活的复合体变得理性化和系统化。时行的解释方法论与因果方法论、功利主义的行动概念与受规范制约的行动概念、社会的平衡模式和冲突模式、激进的和保守的变迁理论之间的争论首先都是话语性的争论，而不是解释性的争论。它们反映了社会学家试图为衡量不同非经验领域的"真理"而确立标准。

173

无疑，学科对重要著作的回应很少与"科学逻辑"的支持者简洁而有局限的回应有相似之处。举例来说，斯科克波尔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已经在社会学连续统的各个层次被加以评价。该书的预设、观念、模式、方法、定义、概念——当然，还有事实——都被一一澄清、争论并赞扬过了。而有问题的却是斯科克波尔用来支撑她在这些层次上所持立场的真理标准。学科对这本书的回应很少讨论到要对其假设进行控制性检验或者对其材料进行重新分析。斯科克波尔用结构的方式研究革命的有效性当然也就无法从这些因素来加以判断了。[10]

---

[10] 这种社会科学的话语观具有深远的意义，在此我无法一一赘述，只谈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经典著作一直是社会科学结构和论述中的核心。非纯粹事实性的话语不能够依据学科内普遍适用的标准来判断，也不能依据通

在下一节，我将说明我上面提出的视角可以用来解释广义的当代社会学史。我力图阐明，这些近期的发展所蕴涵的真理价值必须首先以话语的方式来考虑。

战后时期话语的形成

由于它是话语性的，因此社会学可以在狭隘经验意义上发展，而在更多的普遍性理论上却没有取得任何明显的进展。话语的论述与这些论述所蕴涵的理性标准仅从主观意义上讲是有诱人之处的，它们被接受，是因为它们跟传统的经验检测毫不相关。这种说法，仅仅说明了社会科学是在各个学派和学术传统内部往复流动的。这种流动更像是一场对话在移动，而不是一项理性的检测取得了进展。它在都有局限并且根深蒂固的看问题的方式之间往返不居。它看上去更像是一个钟摆而并非一条直线。[1]

如果我们反思一下自二战以来的社会学理论，我们就可以看

常以非正规的方式确立的标准来判断。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学科选择性地把一些著作定为"经典"。但是，经典著作可选择的范围要依赖于学术的成就。一个人离自然科学越远——话语的真理标准越来越多地成为争论的明确主题——理性标准形成的关键就越来越依靠并非在经验主义的意义上会有进展的学术素质（个人天赋、敏感性等等）。默顿正是因为接受了自然科学的模式，他才否认经典具有核心意义。但是，从社会科学的话语立场来看，他对历史和社会学的分类法是站不住脚的。我在其他的论述中已经讨论过关于经典著作的意义（亚历山大，1987a），并直接借用到这一节当中。

① 罗蒂也用了这个对话的比喻："我们如果不把求知（knowing）看做具有一个核心实质，将由科学家或者哲学家来加以描述，而是依据现行的标准把它看做是相信的权利，那么我们也就是在把对话当做应该理解知识的终极情境。"（1979，第389页）但是，罗蒂的特点是，他借用这个比喻否认追求经验事实和普遍性理论的意义，相反，他想要倡导一类哲学史："我们关注的对象从人类与他们需求的物体之间的关系，转移到可相互替代的合理性标准之间的关系，再从这些关系转移到在学术史中占一席之地的那些标准的实际变化。"

到存在着这样一种钟摆模式。行动理论与结构理论之间的分裂(大略)是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以来这些年的标志;它并不是在历史的真空中行进的,钟摆上的每一点都对应着先前的摆动。

在反对帕森斯结构—功能著述的过程中,出现了与结构相对的关于行动的话语。帕森斯曾试图一举终结"学派之争"。他在其系统化理论中力图合并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在关于个体的理论中力图融合自主行动和结构控制。但是,虽然从某些重 174 要的方面来说,帕森斯的著作到目前是构思得最成熟、影响也最深远的普遍性理论,但它仍然没有实现它的目标。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学术性的,因为帕森斯在他的综合当中实际上并没有采取不偏不倚的方式(亚历山大,1983b)。他虽然承认偶然性的行动,但是事实上他对社会化了的个体性更有兴趣;他虽然正式地把物质结构考虑在内,但是他却在规范控制的理论上花了更多时间。另外,帕森斯的失败也有社会的原因。实际上,就跟被韦伯称作历史的扳道工的那种观念一样,帕森斯著作的那种学术紧张留下了各种轨迹,使得那些根基已深的学派和传统能够沿着它们推动其观念和素材上的旨趣。个体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思维已深深植根于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要撬动它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复杂的理论表述——需要的或许应是一种能更始终如一地坚持其综合性的理论。

所以,虽然帕森斯的功能主义观点为战后一段时期的理论和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但是钟摆注定还是要摆回去。强有力的理论出现了,并打开了偶发性秩序的黑箱。实用主义、经济学和现象学思想做了精彩的重新表述。另外一个新的宏观取向则反对帕森斯对行动采取的理想类型的论述。"结构"理论回到马克思的思想以及韦伯思想中的工具论潮流,并发展出了新的、有说服力的宏观社会学理论。

我不想否认这些后功能主义运动经常以一种彻底的经验形式出现，也不想否认我的这些同代人对他们新揭示的事实和他们提供的更有说服力的解释经常确信不疑。符号互动论和常人方法学在失范、集体行为和社会角色等方面做出了突破性的研究。而且，跟这些研究相关的方法论问题让很多社会学家相信越是使用个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路径，就越是接近于现实。结构理论的运动也使得诸如分层、现代化和社会变迁等领域和更具有实体性、历史性和比较性取向的方法论在经验上的诉求更具有说服力。

不过我想强调的是，这些后结构主义者在学科上的成功并非主要是依靠这些经验的诉求。第一，它们本质上并非简单的经验性诉求。它们被置于更具普遍性的超经验诉求中，并由此成为了后者重要的表现方式。而且，这种强烈的理论关怀不是潜藏着的，而是彰显出来的；于是，它们本身成为后功能主义运动的首要关注点。换句话说，后功能主义的挑战者们不仅在从事经验研究，而且在进行各式各样具有高度普遍性的理论争论。这些争论无处不在，它们渗透进大多数表面上看来属于经验研究的著述。总之，后功能主义运动既立基于话语，也立基于解释；跟帕森斯的理论对话，并彼此对话，每种立场都不是简单地通过经验的证明或证伪过程，而是通过争论才得以确立的。

在下一节，我将关注这些立场中的每一个对个人行动和集体秩序之本源都有什么样的预设。我将力图说明我的同代人在这些预设中发现了哪些特别诱人之处，尽管事实上每种传统都以一种很明显的片面且有限的方式来界定行动。因此，我不仅是在审视话语的争论，而且加入了争论。我力图说明这些片面性的局限究竟是什么，我还将指出，在一个更综合的模式中这些片面从原则上说都可以被克服。

175

预设和理论的困境

预设(presuppositions)(亚历山大,1982a,1987b),我指的是当社会学家在遭遇现实时做出的最一般的假设。每一种社会理论和每一项经验研究都采取演绎的立场(a priori positions),即它可以让研究者以最简单的范畴组织经由他们的感觉上升到他们的意识的那些材料。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够更有意识地控制,形成理性的或科学的思维。预设是话语的对象,有的时候它们甚至是以话语来说明其正当性的。不过,大多数预设出现在推理本身开始之前的那个过程中。

或许,在跟社会现实相遇时,社会生活的研究者必须预设的事情显然就是行动的性质。在当代,一想到行动,就会想它是不是理性的。在此,我并不是指在常识意义上理性等于好的、聪明的,而非理性等于坏的、愚蠢的。我是想说,在当代社会科学中这对二元对立指的是人是自私的(理性)还是理想化的(非理性),是合乎规范的和道德的(非理性)还是工具性的和策略性的 176 (理性),是效率最大化地在行动(理性)还是被情感和无意识的欲望所控制(非理性)。当然,在经验取向上,我上面的这些描述——关于理性行为与非理性行为的描述——又有各自特别的差异。不过,在理论实践上,这些取向其实形成了两种理想类型。在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历史中,这些理性和非理性的理想类型已经区划出独特的理论传统,以及最富论辩性的话语性观点。[12]

---

[12] 实际上,下面这种说法,即在社会思想发展史中理性和非理性代表了具有各种不同特征的理论传统,已经被大量作者做了进一步的深化,比如帕森斯(1937)、休斯(1958)以及哈贝马斯(1971)。

怎样才能以一种取代但不侵犯更精细的序级区别的方式来界定这些传统呢？各个理论传统实际上都是立基于这样的序级差别，比如道德主义理论和情感主义理论可能都被看做是"非理性主义"传统的一部分。问题的答案比想像中要简单，即把二元对立看做是行动的内在指向与外在指向的对立（见亚历山大，1982a，第17—79页）。理性的或者工具性的观点把行动者描述为从外在于他们自身的力量中获取意义，而非理性的观点则认为行动是受内在激发。从原则上说，完全可以预设行动既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不过，令人吃惊的是在社会理论史当中，这种相互渗透的观点事实上很少被提出。

不过，要想回答关于行动的核心问题，这还不够。第二个关键问题也需要预设。这里我所指的就是人人皆知的"秩序问题"，虽然我对它的界定跟典型的界定方式有所不同。社会学家之所以是社会学家，是因为他们相信存在着属于社会的模式，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与构成社会的行动者相分离的那些结构。不过，虽然所有的社会学家都相信这种模式的存在，但他们经常就这样一种秩序如何被真实地制造出来争论不休。我再次用二元对立的理想型来看待这些分歧，因为社会思想的经验与话语的历史正是以这样一种不断累积的相互憎恶为特征（见伊凯，1974；刘易斯和史密斯，1980）。这种二元对立就是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立场之间的抵牾。

如果思想家预设了一个集体主义的立场，那么他们就将把社会模式看做高于任何特定个体行动的存在，并从某种意义上说把它看做是历史的产物。在新生的个体面前，社会秩序是一个外在于他们并早已确立的事实。如果想避免涂尔干（1937/177 1895）早期对此立场进行论述时制造出的混乱，同时又想避免从反面提出同等片面的话语性理由来"纠正"涂尔干的错误，那么

就必须立即给这个集体主义的定义做一些补充。[13] 如果集体主义者讨论的是成年人，他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社会秩序既内在于个人，也外在于个人；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将要回头审视的一个重要限定。不过，不管集体主义立场是被界定为内在于行动者，还是外在于行动者，它都没有把秩序当做是纯粹的即时即刻思虑的产物。依据集体主义理论，每个个体行动者都被推向预先存在的结构；朝向结构只是可能性的一种，还是注定的命运取决于下文我指出的对集体主义立场的提炼。

个体主义的理论经常承认社会中确实存在这类超个体的结构，他们当然也认识到存在着可被理解的模式。但是，他们坚持认为这些模式是个人商榷的结果。他们不仅相信个人"携带着"结构，而且结构实际上是携带者在他们个体的互动中生产出来的。这就是假定个人能在历史时段的每个连续时点上改变秩序的基础。依据这样的观点，个人并没有把秩序放人他们的内在。相反，他们依据个人自己的意愿去顺从或者抵制社会秩序——甚至是他们内心坚守的价值。

是否可以把这种偶发性立场的若干要素，跟更强调集体主义取向的立场结合起来，再次成为我随后就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这一点，我试图强调的是行动和秩序的问题并非是可随意选择的。每种理论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两种立场。这些预设的逻辑转换造就了社会学的几个基本传统。正因为如此，它们也成为社会科学话语所环绕的最重要的轴心。

预设在话语中具有如此的核心地位，是因为它们缩涵的意

[13] 吉登斯的立场就是特别激烈地反对涂尔干的立场所遭到的标准化误读（比如，吉登斯，1976）。这样的过激反应使他在秩序问题上已经公然地采取个体主义立场。

义超越了我已界定过的解释性关怀。社会研究围绕着自由与秩序这两个问题，每种理论都在这两极间摇摆。现时代的男性与女性都相信个人具有自由意志，并且因为具备这样一种能力，个人可以被信任为是以一种负责的方式在行事。在西方各社会当中，这种信仰已经或多或少地被制度化了。个人被分化为有特178殊利益的政治和文化单位。严密的法律已经被制订出来保护个人免受群体、国家以及主流教会等其他强制性机构的伤害。

社会学理论家，不管是个体主义者还是集体主义者，都跟其他人一样倾向同意个体的自主性。事实上，社会学既是一门学科，同时也是社会中个体分化的结果，因为正是个人的独立性以及他或她独立思考社会的能力的增长使得社会本身被设想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正是个人的独立性使得秩序出现问题，而正是让秩序成为问题的过程才使得社会学成为可能。与此同时，社会学家也意识到个人的日常生活带有一种模式化的特征。正是这种自由与秩序之间的紧张为社会学提供了知识和道德上的理论基础。社会学家探求社会秩序的性质，并合理地说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因为他们非常关心这对个人自由会产生什么样的意义。

个体主义理论之所以有吸引力和说服力，是因为它们公开、明确并且彻底地保留了个人的自由。他们推论的基本条件是理性的或者道德的个人的完美性，认为个人当然地具有按照他所处环境自由行动的能力，这些环境要么以物质的术语，要么以文化的术语来界定。正是因为观念形态的话语和解释性话语这种自然而然的汇聚，使得个体主义成为当代思想极其重要的一个分支。

社会理论是在长期世俗化和反对等级制的传统社会中出现的。在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就重视理性君主的自治以改

造他掌握的世界。英国的契约理论家，比如霍布斯和洛克，提出一种理论，认为社会秩序是通过个人的讨价还价，并从根本上说是通过社会契约建立起来的，他们借此来打破传统的约束以实现自由。法国启蒙运动的一些重要思想家追随着这条路。这些个体主义的传统都带有强烈的理性主义色彩。虽然它们强调的个人需要各有不同——权力、幸福、快乐、安全——但它们都认为社会是从理性行动者的选择中发端而成。在这些理论传统与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之间搭起桥梁的关键概念是功利主义，尤其是古典经济学。它那看不见的市场调节理论为个体的选择怎样被集合起来并形成了社会提供了一个精彩的经验性解释。[14] 今天，用来证明个体主义理论化的理性主义模式的核心证据主要就是得自准经济学话语。 179

当然，个体主义理论也有一种非理性的形式。在对启蒙运动的逆转以及对功利主义的嫌恶中，浪漫主义推动了从冯特到弗洛伊德关于富有情感的行动者的理论（比如，见阿布拉姆斯，1971）。这种非理性主义传统在诠释学上的论述，发端于黑格尔（泰勒，1975）并延伸到胡塞尔和存在主义（斯皮格尔贝格，1971），表现为一种道德的并经常是认知的形式。

因此，个体主义立场表体现出来的优势是很大的。可是，要

---

[14] 在赫西曼（1977）关于现代经济学起源的精妙论文中，他指出，强调市场交换的契约理论部分是起源于反对暴君和国王的专制权力的斗争。不过，他同时也指出，在早期阶段——比如，在孟德斯鸠的著作中——契约理论呈现出一种相对社会性的，常常是规范性和情感性的倾向，因为这样一种为个人利益的交换被认为使强烈的而且经常是毁灭性的人类本能得以驯化。因此，这种个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理论原型最初的基本原则很明显就是文化的和集体性的。不过，随着市场理论的发展，它在取向上变得越来越像是一种纯粹的唯利论，而契约交换与主观动机具有联系的观念则被抛弃。这种解释为我在下面提出的理论批评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证据：也就是说，是理性主义和个体主义理论将意志和意愿问题整个清除了出去。

采取这种立场，在理论上的代价同样也很大。这些代价的产生，是因为这些个体主义理论都是从社会中的唯意志论那完全非现实的视角中产生出来的。由于过激地否定社会结构的力量，个体主义理论到最后使得自由失去了真实的意义。它支持这样一种幻想，即个人不被他人或者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所需要。它还忽视了社会结构可以使自由得以长期维系。正是认识到这些代价，反对个体主义理论的话语确立了它们的目标。

通过承认各种社会控制的存在，集体主义理论可以明晰地对它们进行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体主义思想从道德层次和理论层次都真正超过了个体主义立场。现在的问题是采用集体主义是否要付出不可接受的代价？这样一种集体主义理论究竟失去了什么？它所假定的集体力量跟个人意志、跟保留唯意志论和自我控制的可能性到底是什么关系？要想回答这些关键的问题，就必须把一直隐含在我的话语中的观点明确表达出来。对秩序做出假设并不包含任何特定的关于行动的假设。由于这种非决定性，集体主义理论就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

采取集体主义理论跟为之付出的代价相比值不值，取决于它是否预设了道德或表意行动，也就是非理性行动的存在。很多集体主义理论都认为行动是被狭隘的、技术性效率的理性所促动。如果这样假设，那么集体性结构就必然会被描述成外在于个人并且对他们的意愿没有任何回应。比如，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被认为是从外部控制了行动者，而不管他们愿意与否。180 它们的控制就是通过惩罚性的制裁和肯定性的奖赏，而行动者都被简化成——不管他们个人目标的特殊性质是什么——快乐和痛苦的计算器。因为这样的行动者被认为是在理性地应对外在的环境，动机就从理论关怀中被抹去了。这种理论假定，仅仅分析外在环境就可以预测行动者的反应。因此，理性—集体主

义理论就靠完全牺牲主体来分析秩序。结果，它们把自主性自我的观念抛在一边。在经典的社会学理论中，马克思主义代表了这种立场中最令人敬畏的例子，其理论所体现出的强制性色彩——比如，就像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历史规律"中体现的那样——已经引来了激烈的批评性回应（比如，凡·登·伯格，1988）。这种对没有主体的理论加以证明的取向充斥于带有集体主义旨趣的各种新古典理论中，也在韦伯的社会学中随处可见，这一点，韦伯文集中关于"支配"的重要性的争论就是明证。

相反，如果集体主义理论承认行动可以是非理性的，那它就把行动者理解为受观念和情感的引导。毫无疑问，主观性这个内在领域一开始是在跟外在对象的遭遇中被结构化的——跟父母、老师、兄弟姐妹以及书籍等。但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这些超个体的结构变成内在自我的一部分。只有接受了这种内化的现象，那么主观性才有可能成为集体主义理论的一个主题。依据这种观点，个人互动成为了两个"社会性自我"的协商。这种理论面临的危险跟更为理性化的集体主义理论面临的危险相反。这种理论倾向于道德主义的修辞和唯心主义的证明。于是，它就常常忽视了在社会化了的个人与他或她的社会环境之间经常出现的紧张。当然，当理论家不得不考虑环境是物质性的形式，不得不考虑如果以单方面的规范形式来构建集体主义理论就无法使一种可能性概念化时，这种紧张就最为明显了。

在下面关于近期的理论话语的争论中，我将把目光集中在预设的立场是如何形塑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学争论的。当然，它们已经发挥了它们的影响，就算是没有出现任何企图以话语的方式说明它们的尝试。其实，类似的话语性证明早已被这些争论中的关键人物提出过。实际上，这也是使他们成为有影响的理论家的原因。凭借他们的话语，这些理论家已经

181 提出了关于其理论范围和意义的主张，即要在超经验的层次上建立“真理的标准”。在这节中我已表明了对这些标准应该怎样理解。我把这些标准应用于理论争论时，就会常常反对这些争论的主要参与者的真理诉求。当然，这也正是社会科学话语得以产生的原料。

对微观和宏观理论的再思考

也许正是由于学科的方法论和经验关注点的原因，在社会学中对个体主义理论大规模地修正已被看成是“微观社会学”的一种复兴。[15] 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微观和宏观完全是相对主义的词汇，指的是社会组织各个层次上部分/整体的关系。但是，在近来的社会科学语言当中，它们已经被等同于这样的区别，即将个人的互动当做一方面的经验关注对象，而把整个社会体系当做另一方面的经验关注对象。

当霍曼斯(1958,1961)引入交换理论时，他是在对功利主义的立场，也就是构成了帕森斯(1937)最早也是最有说服力的批评基础的立场进行修正。霍曼斯不仅拒绝经典和当代社会学中的集体主义理论，还拒绝个体主义理论的阐释脉络。他坚持认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不是符号体系这样的超个体的因素，而是只具有理性主义倾向的个体行动者。他关注被他称为次制度层次的行为(sub-institutional behavior)，即“真正的行动者”的行为，他相信这些行为完全独立于社会特定的规范。个人计算的

---

[15] 关于以历史视角来看待微观与宏观之间关联的理论化的转变，以及对相关的分析性问题的更详细更系统的解释，参见亚历山大和吉森(1987)。在随后的多处论述中，我都是从该文汲取了灵感。

程序成为霍曼斯关注的中心。因此，行动者外部环境中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同样也属于他关心的范围。在霍曼斯的理性主义观点当中，刺激着行动者的社会力量只能以一种客体化和外在化的方式来构想。

交换理论在对微观理论的复兴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简洁而精致的模型有利于进行预测；它对个体的关注使它在经验上可以被操作。它也提供了一种基本的洞见，这是帕森斯乃至各种集体主义理论流派都忽视了的：是通过个体行动者对偶然性交换的成本做出判断，"客观的社会条件"才跟个人、制度和群体的日常生活相关联。[16] 不过，甚至是对于这个范式内的理论家来说，得到这样的洞见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比如，霍曼斯就不能用别的方式，而只能用一种循环论证的方式界定物品的"价值"（1961，第 40 页，第 54—5 页）；他不得不认为物品的"价值"是来自于强化一种业已存在的取向。他关于分配正义的概念表现出同样的紧张（1961，第 12 章）；他被迫参考"非理性"团结来决定如何给公平的"理性"交换下定义。 182

微观理论的其他一些主要分支采取的是解释论立场。布鲁默（1969）在复兴米德的理论中是贡献最大的普遍性理论家，虽然他（1937）命名为符号互动论的传统只运用实用主义基本的偶

---

[16] 在解释交换理论的成功时，不会有人想贬低霍曼斯的话语性解释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和夸张的雄辩性。他先以纯粹话语性的方式阐述了交换理论（霍曼斯，1958），那是在他在美国社会学学会做备受关注的主席致词时所说的。在他论文集的主要介绍中，他提出传记性和观念性话语的新模式来说明交换理论的合理性。他对交换理论做进一步话语解释的突出贡献出现在他的自传中（霍曼斯，1984），我在其他文章中讨论过这本书（亚历山大，1987c），它创造性地提出了并非完全正确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交换的视角被表述为从心理、道德、科学和历史的角度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

发性状态。[17] 布鲁默坚持认为意义是在个体间的协商中被决定的——实际上，就是在他人对行动者行动的反应中被决定。行动者不被视作是携带着早已规定好的集体秩序在参与行动。态度的界定也取决于直接情境下的相关性，而不是内化。通过"自我暗示"，行动者对客体的理解甚至超越了它们本身。正是行动者即时即刻的"主我"，而不是更受社会控制的"客我"决定了布鲁默作品中描述的社会秩序的模式。

布鲁默的观点虽然很有说服力，但他最有影响的论述却几乎全是话语性的；而且，当他的观点还是一种纲领性意见的时候，它似乎更倾向于改善直接观察的方法论，而不是使理论概念更精致。符号互动论运动中最重要的经验理论家应该是戈夫曼。在大多数同时代人的眼里，戈夫曼的著作似乎仅仅是将互动理论朝更具有问题针对性和戏剧性的方向上做了引导。他的早期著作是具有这样的特点。但是，在他后期的理论中则明显地暴露出集体主义的紧张，他(比如，1959)强调个人有反对社会结构规定的角色而呈现自我的欲望，他(1963)还力图将制度行为解释为面对面的互动。

常人方法学和现象学的著作普遍都要复杂得多。加芬克尔是舒茨的学生，也是帕森斯的学生，在他最早的作品(1963)中，他接受了内化论的核心思想。在这部早期的著作中，加芬克尔力图探究的是行动者自己怎么样确立社会规范；也就是说，他想183 探究他们"常人性的"方法论。他强调行为被建构的特征，描述了个体怎么样通过"特长"(ad hocing)等认知技巧把偶然的或者

[17] 刘易斯和史密斯在他们对实用主义社会理论在美国的历史的精彩重释中，有力和系统地论证了这个观点(1980)。在我看来，该书一出版，立刻因危及了对布鲁默模式下的符号互动理论所做的话语性证明而成为众多争论的焦点。

特定的事件理解为社会性构建的规则的表现或者"索引"。在此过程中，他证明了在现实中，规则并不简单地是给定的，而是被修正和更改的。

常人方法学成为一场主要的理论运动时，它被迫要以普遍性和话语性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在这个过程中，它使用的那些概念变得越来越片面。常人方法学把自己视作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学理论，强调"行动者自己的实践"，认为它高于结构，并跟结构相对立。它现在认为，诸如索引这样的基本技术处处存在，应该可以证明秩序完全是权宜性的；而且在有秩序的行动中，无穷无尽的策略性实践应被等同于(加芬克尔等，1981)社会秩序本身。不过，这种现象学的研究方式必然带有的个体主义的简化被常人方法学学派暴露出来的其他紧张所掩盖了。譬如，对话分析(萨克斯等，1974)就认为言语受到了强烈的结构性限制，尽管它经常不会对这些限制做系统的界定。

在微观理论这样复兴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运动朝向同样具有片面性的宏观和集体主义的论述，当然这是对社会学缺乏线性积累的一个讽刺性证明。这场运动始于"冲突理论家"把帕森斯的著作界定为"秩序理论"之时。跟新的微观社会学家一样，这些理论家不接受内化具有核心意义，也不接受此概念所蕴涵的行动与文化的关系。不过，冲突理论不强调个体意识是集体秩序的基础，把意识与结构过程的关系也切断了。达伦道夫(1959)认为行政权力机构的职位是建立秩序的核心力量。雷克斯(1961)则强调经济的分配过程把权力赋予了统治阶级。

虽然冲突理论在其初期阶段为结构理论提供了最有力的说明，但是在后期却是阿尔都塞及其学生理解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和巴利巴尔，1970；戈德利耶，1967)构成了最成熟和最有影

响的话语。从斯宾诺莎，同时也从现代语言学和人类学那里汲184取养分，这个所谓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将历史的发展分析为基本的结构原则的特殊变异、转化和具体化。这些结构马克思主义者不像当代的微观理论家建议的那样，从社会行动和生活世界在经验上和现象上的不同着手，而是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更重视"整体性"。虽然个体行为可能背离结构性强制，但是这些行动的客观后果却是由超出行动者控制范围的结构所决定的。

虽然是决定论的，但这种结构马克思主义却比其他变型更少直接具有经济学的意义。它强调生产力由政治层面来调节，而不强调它们可以产生直接的控制（比如，普兰查斯，1972）。这种关于调节与结构性"过度决定"的话语为带有明显韦伯色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下了基础。像奥菲（1984/1972）和奥康纳（1978）等批判政治经济学家关注国家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功能，并力主"无可避免的"国家干预是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的源头。

虽然为新结构理论辩护的最重要的话语是来自于欧洲，但它在美国的影响有赖于一系列有影响的中间理论。穆尔（1966）关于国家形成过程中阶级的起源的主要论著为这类作品提供了主要的动力，虽然紧跟其后的更多的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新韦伯式的结构主义的论著。斯科克波尔（1979）的书是在穆尔之后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单本著述。她不仅提出一种似乎很有说服力的新的普遍法则来解释革命，而且还就反对主观的和唯意志主义的革命理论拿出一套很令人信服的论争（她称之为结构理论）。赖特（1978）的阶级分析具有相同的反微观的主旨，他认为群体阶级意识的模糊性来自于"冲突性的阶级定位"。特赖曼（1977）同样提出了他所谓的"关于声望的结构理论"，该理论把文化的控制转变为组织的控制，并拒绝相信主观上对分层的理解具有任何独立的因果意义。在另外一本也有一

定影响的著作中，利伯森（1980）用这样具有高度说服力的话语来解释种族的不平等。他把"机会结构"等同于物质性环境，并把对主观意志的关注当做保守或者理想主义加以否定，以此来证明他对机会结构的界定。

理论的新动向

把社会学视做专门关注行动或者具有结构取向的学科而加以重新建构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回应功能主义著作没有兑现其承诺的挫败感，第二则是回应由这些承诺所导致的根本分歧。在六十年代，这些对功能主义的挑战使学科产生了一种危机感。到七十年代末期，这些挑战者取得了胜利，社会学似乎再次安稳下来，步入一个安全的但似乎更碎片化的中年。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社会学写作中弥散。在美国，关于国家关系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建立，并迅速超过其他有深厚根基的理论赢得更多的支持者。跟在其后的是政治、历史和比较社会学的理论，他们主要采取的结构主义路径使他们获得了相同的回应。微观理论也赢得了巨大的号召力。在常人方法学刚出现的时候，它遇到的是质疑其根本合理性的话语，并被当做异端或者退化而摈弃（比如，科莱曼，1968；科塞，1975；以及戈德索普，1973）。到了七十年代末，它为自己辩护的话语得到了很多一流理论家（比如，科林斯，1981；吉登斯，1976）的认可，并且被其他人慎重地加以对待。戈夫曼的论著还要快，它已从被争论的对象上升为经典著作。 185

然而，就是在这些富有进取心的挑战者成为新的典则（establishment），也正当"多重范式"的社会学从大胆的预言（比如，弗里德里克斯，1970）成为传统的知识（比如，瑞泽尔，1975）的时

候，这些理论运动的关键阶段也是最有创造性的阶段却走到了尽头。到了八十年代，一个特别不一样的理论时期开始成形。受微观和宏观传统不成熟的理论终点的启发，这个阶段的标志就是将关于行动的理论和关于结构的理论再次联接起来。在微观—宏观之大分野的两派理论中，在每个新成为支配性传统的理论中都存在着这样的努力。

这个理论上的新发展有社会原因、体制原因，也有学术的原因。其中一个必然的原因是美国和欧洲政治气氛的变化。大多数激进的社会运动都已偃旗息鼓，在很多批判性知识分子的眼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道德上丧失了权威。在美国激起过帕森斯之后的微观和宏观理论、在欧洲大陆证明过结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冲击也失去了效用。在美国，一度走红的结构主义者现在在寻找如何利用文化分析的途径，先前的常人方法学拥护者也在力图融合建构主义者和传统的宏观理论。在德国、186 英国和法国，新的后马克思主义一代已受到了现象学和美国的微观理论的影响。帕森斯的观点转移到德国（亚历山大，1984），并没有恢复起现在看来已经过时的争论，而是激发了重新进行理论整合的新研究。

学术时代也存在着过渡期，这种过渡受理论逻辑危机而不是受社会逻辑危机的制约。片面的理论易引发争论，在某些联结点上它们又产生丰硕的成果。但是，理论的争论一旦尘埃落定，其理论的认知内容就难以为续。理论上的不满最明显的一个信号就是修正论（revisionism）。[18] 那些极力想坚持某种传统

---

[18] 在其他文章中，我已把修正论的概念用于经典和帕森斯的传统（亚历山大，1982a，1983a，1983b）以及库恩的著作（亚历山大，1982c）。我已经更为详尽地阐述了当代理论传统中的修正论（1987b）。也可参见上面的第二章。

的人对于它的弱点是极度敏感的，因为正是他们必须面对不断加强的要求，要在话语上说明其合理性。为了应对这样一些内在的紧张，有能力的学者及其跟随者就在原初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特定的修正，并提出新的、经常是矛盾的话语模式。问题在于，除非整个传统被颠覆了，否则这些修正最后全都是遗留问题。不过，批评和重新定位产生的话语性论述带来了一种意料之外的结果。它们突现了原先那个传统的弱点。于是，它们就在一些已经稳定的传统之间开启了更有希望的通道和交叉点。[19] 正是靠研究微观和宏观传统中出现的修正论，社会学新的理论动向才得以揭示。

比如，符号互动论已经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戈夫曼虽然一定程度上是在布鲁默彻底的偶发性理论传统中开始他的学术研究的，但是在他后期的著作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即转向更关注于结构和文化。行动者的创造性策略仍然是戈夫曼研究的对象，但是他（比如，戈夫曼，1974）现在把它们当做是支持日常生活的文化结构和阶层结构的手段。同样，虽然贝克尔（1963）早期对失范理论的影响来自于他对偶然性和群体行动的强调，但是他近期的研究则对创造性及其效果采取了一种完全系统的观点（贝克尔，1984）。实际上，符号互动论中有大量的研究是在将个体与社会体系之间的联系系统化。比如，刘易斯和史密斯（1980）就论证说符号互动学派所谓的创始人米德，实际上是一个反唯名论者，他采取的是集体主义而并非个体主义的立场，以

---

[19] 最早对这些交叉点有存在可能性变得敏感的社会学家是艾森斯塔德（艾森斯塔德和库雷拉角 1976）。作为一位功能主义者，他自己在竭力想提出新的理论话语，他很快将提出类似于在其它传统中出现的观点。不过，由于他坚持一种社会科学的解释和基本的经验主义观念，因此他把这些通道视为社会学直线发展的一部分，而不是学科钟摆运动中的一个阶段；这种运动既是解释性的，也是话语性的。

此来挑战这个传统根本的话语性证明。斯特赖克(1980,第
187 52—54 页,57—76 页)则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在他的表述中,互动论从根本上说似乎已成为社会系统理论本身的一种修正(也可见亚历山大和科洛米,1985;汉德尔,1979;迈因斯,1977;斯特劳斯,1978)。

霍曼斯的交换理论重新唤起的理性行为模式也表现出类似的进展。理论家们感到需要证明这种易引起争论的研究路径能够应对宏观社会学提出的真理标准的问题。于是,他们把关注的问题逐渐从对个体行为的分析,转移到对从个体行为向集体性结果的转化的分析;并顺势再把问题转到无意识的而不是有目的的行动。因此,维普勒和林登贝格(1987)以及科莱曼(1987a)现在都拒绝接受这样的观念,即个体行动和结构现象之间的关系可以被理解为不连续的经验事件的一种因果联系。相反,因为存在着共时性,所以微观和宏观之间的关系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分析性的关系,并在更大体系的不可见的过程中得到维系。就像投票程序那样,这种分析性的联系可以通过把“转化规则”应用于个体行为而实现。

理论家们已经受到了对这种转换的关注的影响,即不是把个体行为理解为分析的对象,而是把它们看做结构机制运作的初始条件。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当中,结构性解释——关于宪法的章程(比如,科莱曼,1987b)、组织和群际关系的动力(布劳,1977)、声望分配体系(古德,1979)——都已经开始在理性主义的微观传统中取代效用论了。还有一些理论的开拓,关注个体行动的无意识结果(布东,1982,1987),有的甚至还关注集体道德的起源(伊凯,1974;凯杜欣,1978;林登贝格,1983)。

虽然常人方法学的创立者加芬克尔一直在倡导一种彻底的微观研究方式(加芬克尔等,1981),虽然超越了片面性理论的修

正论运动在常人方法学中的进展比在其他的微观传统中要更小,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现象学社会学中弥漫着同样的不安和出现了类似的运动。比如,西考莱尔,这位早期阶段当仁不让的关键人物,就已经提出了一种更具相互依赖性和更为综合的路径(克诺尔-塞蒂纳和西考莱尔,1981)。立基于现象学之上的"科学的社会研究"运动,虽然赞同为实现科学采取一种新的也更具情境化的特定研究方式,但是仍然习惯性地偏向于社会结构的建构效果(克诺尔-塞蒂纳和穆尔基,1983;平奇和科林斯,1984)。史密斯(1984)和莫洛托奇(莫洛托奇和博登,1985)两人虽然都坚持构成性实践(constitutive practices)必然具有自主性,但是他们已经做出重要的研究证明了这些实践如何被组织环境与权力分配结构化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现象学的新尝试并不是简单地包括了经过修正的解释框架,它们被深深地纳入了新的话语证明的模式中,亦即将更具结构主义色彩的著述的真理标准统合起来的尝试之中(比如谢格洛夫,1987)。 188

与此相似的修正论研究标示了一个超出理性—集体主义或者结构立场的限制的新运动。这样的理论中总存在着大量的内在矛盾。这些矛盾,如果真有的话,已在杰出理论家的著作中得到了更多的阐述。比如,雷克斯(1961,第113—28页)就提出,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最终可能达成一种缓和的局势,这将带来一段和平时期,并有产生新的、更为团结的社会化的可能性。雷克斯断言这种局势一遇到新的"不可避免"的阶级冲突时就会消失殆尽,而为什么会这样,他却没有能够很好地解释。无论何时,只要阿尔都塞想让他的读者确信相对于政治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的相对独立性,经济决定性"到最后"总是存在(阿尔都塞和巴利巴尔,1970),那么他平常的精确理论就消失在一层如纱一般的玄雾当中。斯科克波尔从来没有从话语上证明过

她所坚持的观点，即非结构主义解释都是个体主义的；她将革命的意识形态降低为紧急时刻的策略，而并非社会学的原因（斯科克波尔，1979，第164—73页），这反映了她论述中的弱点，即使这样让其论述表面的一致性得到了维护。

但是，只是到了最近，通过公开的修正以及明显想把不同的话语模式整合在一起的研究才使这些理论逻辑上的紧张彰显出来。在美国的结构主义学派中，穆尔开始讨论工人阶级处于劣势的主观原因，而不谈其结构上的原因（穆尔，1978）；他还讨论了无产阶级对于不公平的意识，而不是客观的不公平本身。因为斯科克波尔论述的主旨变化极快，而且有理论上的自主性，所以这种变化还更具启发性地阐明了新的理论运动。在她试图解释伊朗革命的研究中，斯科克波尔（1982）首先提出宗教原因与189 经济和政治原因等量齐观的可能性。近来为了反对文化批评的话语性观点（休厄尔，1985）以证明她的立场，她放弃了重要的话语基础，不过她仍然坚持（斯科克波尔，1985）文化解释应该具有一种现实主义的和原结构（protostructural）的形式。

实际上，到近期为止仍然是安稳的结构主义者所控制的社会史领域从八十年代早期开始就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文化论的转向。曾经专注于梯里的冲突社会学的休厄尔和亨特现在则反对结构论的历史社会学。他们的论述成了主要的替代性观点，也是更具有文化特质的话语（亨特，1988；休厄尔，1985），他们在解释法国社会的革命变迁时直接向结构模式和因果性设想提出挑战（亨特，1984；休厄尔，1980）[20]。达恩顿（1984）曾是美国的

[20] 关于新社会史与旧社会史之间的对话，另外一个具有启发性的例子可以在贝伦森与尤金·韦伯对十九世纪法国农民的行为的记述中看到。韦伯，除开他温和的政治立场，长期以来是一位社会史的干将。他出版的一本主要著作（1976）认为，由于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法国农民的落后和保守的观念在十九世纪的后半期都得到了转变。贝伦森在政治上更倾向于自由，与最新的学术发展联系得更紧密，他评述

"物质文化"编年史倡导者，现在试图为历史事实提供解释的标准，并把大众神话当做历史在文化中重新建构。这种"新社会史"是在与新的结构社会学的关联中产生出来的。对于很多更年轻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样的历史现在似乎都已过时，而且它对"社会"的界定也有太多限制。

历史学家不断从人类学而不是社会学当中汲取养分。[21]在这个近邻的研究领域中，文化和意义逐渐占据了核心的地位，这一点，格尔茨(1973)、特纳(1969)和道格拉斯(1966)影响深远的重要性可以证明。当然，在人类学这种变化的背后，是更为普遍的文化研究的广泛复兴(比如，参见亚历山大和塞德曼，1990)。诠释哲学更新后的理论旨趣、雨后春笋般的符号论和后结构主义著作，以及对涂尔干社会学更具象征性的新解释的引入，都为人类学的这种发展提供了支持(比如，亚历山大，1988a；武特诺等，1984；泽利泽，1985)。

知识环境的这种变化刚刚开始对社会学产生重大的影响。

厂韦伯的书，并批评它是唯物主义(贝伦森，1979)。相反，贝伦森自己关于1848年革命起源的著作(1984)强调农民的关键性角色以及他们的意识怎样在参与激进的基督教运动中得到了转变。这些运动在十九世纪早期盛行于大多数法国的农村。

[21] 这种对人类学理论的新偏爱反映在一整期的《美国历史评论》中，由拉伯和洛特博格负责，讨论"历史中的国家"(1982)。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探究人类学——特别从文化角度界定的人类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见下列人的文章，Bernard S. Cohen, John N. Adams, Natalie Z. Davis 以及 Carlo Ginsberg，第227—91页)。这种关系的核心是格尔茨，他的著作对美国的欧洲史和美国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休厄尔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呆了五年，格尔茨是该研究所的负责人。达恩顿曾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的一员，与格尔茨合作组织研讨班长达多年。维伦茨这位年轻的美国史学家在戴维斯中心研讨班上(也在普林斯顿)承认格尔茨具有核心的意义，并在那个研讨班上(维伦茨，1985)编成了关于仪式和权力的历史论文集。当然，格尔茨受过帕森斯的训练，虽然他的著作后来明显地更具有文化主义的色彩，但是他在当代的意义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社会科学的话语已经在回归帕森斯曾极力表述过的综合取向。

斯科克波尔著作中的新取向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暗示，它表明知识环境的变化正在被觉察到。历史社会学中出现的一些引起争论的反结构著作（卡尔霍恩，1982；普拉格，1986）为推进这种变化赋予了希望。实际上，因为这样的著作，在美国社会学会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社会学派别，重要的宏观文化社会学的著作正在出现（比如，阿切尔，1988；艾森斯塔德，1986；武特诺，1987）。虽然美国宏观社会学在文化上的发展跟古尔德纳后期著作中的反唯物主义取向没有直接关系，但也是对他的一个明确并富有启发的补充。古尔德纳（1982）在他临终前持续不断地批评"客观马克思主义"，在此过程中他呼吁改造性地理解美国社会学的唯意志论传统。他相信，只有这种反结构的传统能够为市民社会提供一种反对国家和经济的理论。

190

文化主义者的革命，即梅耶和斯科特（1983）对组织社会学已经产生了影响，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为了反对工具主义理论，即反对把组织结构与外部必备技术条件的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发起的争论中，他们赞同"减弱"行政安排和实际的生产活动。因为组织被充分灌输了跟社会相同的意义，因此它们的行动应该更倾向于被看做这些文化观念的仪式化再生产，而不是有效干预下的理性行动。从这种文化的视角，当代西方国家很难再是压迫市民社会的铁笼；相反，它必须被看做是一种控制性的表征系统，使得更广泛的文化理性的主题得到详尽的表述。在利用这种已被称为"制度主义"方法的研究文集中，朱克尔（1988，第24页）将正式组织叫做"当代社会系统的文化引擎"，迪马乔（1988，第5页）出于争论，比较了制度论者和"功利主义和冲突论者，后者把组织以及其中的人假想为比他们平常要更有弹性、更会计算和更有支配能力"。

美国宏观社会学中针对结构主义的理论和解释做出的这种

不均衡但却是不懈的斗争，跟欧洲反对结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话语精妙地结合在一起。在“理论的贫困”中，汤普森(1978)以唯意志论与文化中心的批判理论为名，对阿尔都塞发动了一场激烈的论争。汤普森认为，只有在这样一种经过修正的理论基础上，对激进的政治行为承担的道德责任才有可能维系下去。这篇文章成为了理论敏感性根本颠倒的一把保护伞。比如，在米歇尔·曼早期而且现在仍被广泛引用的文章里，他指责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的共识理论，认为它们过分看重意识形态，他主张用一种社会结构的路径研究工人阶级的观念一致性的问题。在其后的作品中，他继续关注组织的问题，比如劳动力市场(曼和布莱克本，1979)与国家财政(曼，1979)。在他后期的著作里——对组织化社会权力的起源和模式做了大量的反思——标志着他彻底地跟这种视角相背离。他不仅以多元的方式重新界定了权力，而且认为意识形态的关联也许具有最重要的历史作用。比如，在讨论基督教的影响时，曼(1986，第 507 页)认为“我已经挑出了一个体系，其他所有体系都必须惟其马首是瞻”。在安德森(1986，第 1406 页)看来，作为《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论员以及英国结构运动早期领袖的曼，他的这种朝文化的转向并不够彻底。从安德森现在的旨趣出发，曼仍然“跟当代很突出的一种混乱靠得很近，即简单地把权力等同于结构”，而且他主张应用一种更加“自主”的方式来思考文化。霍尔(1985)的《权力与自由》一书也坚持认为宗教精英的自主性是文明进程之比较中的关键问题，该书为近来历史社会学的这种文化取向提供了又一个案例。由于安德森批评曼没有足够彻底，因此哈尔、曼，还包括安德森，就被艾森斯塔德借鉴来构思宗教和政治制度，认为它们是“本体论意义上相互孤立”的实体。艾森斯塔德主张一种分析性的研究方式，这种方式将会证明“文化观……是社会秩

191

序和制度的动力的构成性要素”。[22] 同样，对结构主义大厦的颠覆也在英国之外出现了。在东欧（比较一下斯托姆普卡，1974；和斯托姆普卡，1984，1986，1993）、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艾尔曼，1982，1984）、法国（图伦，1977）和意大利（阿尔贝罗尼，1984），曾经赞成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理论家都纷纷转移关注点，他们不再注意激起社会运动而同时又把行为限制在社会运动中的那些矛盾。埃尔斯特（1985）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性选择被当做是这一类避免决定论的努力，但他对行动的狭隘理性主义解释遭到了尖锐的批评（比如，拉什和厄里，1984；沃尔泽，1986），因为它无法将重大社会运动的道德抗争包容在内。

这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已经被定名为后结构主义运动，它起源于法国。虽然从原则上说，符号结构主义跟马克思主义同样受到批判，但后结构主义对社会科学造成的冲击已经并还将减少马克思主义对批判思想的影响。在福科的理论中（比如1970），话语的构造取代了生产的模式。在布迪厄那里（比如1986），文化资本取代了传统经济类型的资本。在利奥塔看来，关于理性与反叛的文化叙事的历史贡献取代了利用理性以及仅

192

[22] 艾森斯塔德使这一分析方法带有韦伯的原型，但是汤普森、哈尔、曼以及安德森等都至少跟他一样打起了这面保护伞。无论怎样，韦伯的文集是制度的、观念的以及真正简化论著述的烦杂的堆砌（亚历山大，1983a）。根据这样的观点，艾森斯塔德坚持把以分析的方式研究文化的“制度化”作为帕森斯的独特贡献，而且他以新功能主义的方式从事宏大的比较文明史的研究（比如，参见艾森斯塔德，1986）也似乎更加具有合理性。这种向帕森斯早期的综合性著作的回归，无论是表现为一种雄心，还是有些时候确实是从真实的概念入手，都是我在此描述的新理论运动的一个重要而可见的特征（见注释24）。譬如，曼（1986）非常仔细地引用了帕森斯研究组织能力的非简化论的方式。当梅耶（1987）把他的制度理论扩展到文明史当中，并批评比较研究“是一种简化论，在其中我们一定程度上把西方情境下的力量与关系视为自然而然和具有普遍性的，忽视了它们社会文化的构造”时，艾森斯塔德与帕森斯要以分析的方式研究文化的回声就特别地清晰可闻。

仅将反叛与统治联系在一起的解释。[23] 当然，在德国也出现了一个同样重要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它已经在社会学实践更广泛的领域中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影响。我说的就是哈贝马斯的巨大转变，即从马克思主义观念转向他所谓的“交往理论”。我将把哈贝马斯的理论放在普遍性理论本身发生转变的更大的背景之下来讨论。我对社会学新理论运动的陈述也将随该讨论而结束。

从宏观视角来建构普遍性理论在社会科学中一直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正是这种相对抽象并经常是非常玄奥的模式触及了学科的偏僻角落和裂缝，就算没有使得社会学开始自我反思，也使它开始反思它的期望，并以此来为社会学定向。最近几年，受到最广泛讨论的普遍性理论家的论著已经展示出一个关键性的转变，即背离一种片面的结构取向。吉登斯的早期著作(1971)尚在延续着冲突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惯性，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后期，他的路线就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他确信需要一个补充的行动理论。从现象学对人类行为反思性的强调入手，他发展出一套“结构化”理论(1985)，其理论的意图就是想把偶然性、物质性结构和规范性规则交织起来。科林斯的理论也表现出相同的轨迹。他虽然在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比吉登斯更偏爱现象学，但是他早期的著作(1975)却主要是一个结构冲突社会学的读本。与此相对，他在最近几年接受了彻底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即现象学和戈夫曼的理论。他也在朝“后期的涂尔干”转变。如今，科林斯(比如1981，1988)认为互动仪式的链条调节着社会结构和偶发性的行动。

[23] 这种后结构主义的思潮也已经开始深深地传播到英国社会学中，如汤普森(1984，1986)和拉什最近的著作所表明的那样。

同样，哈贝马斯也是从关于社会动力的典型的宏观结构模式进入其学术生涯的(1973，1989[1962])。虽然在那部早期论著中，他明显关注道德的诉求和不同的行为类型，但是这些都只是他所偏重的制度生活的政治经济模型的残留物。但是，在他近期的作品中，哈贝马斯(1984)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在社会体系的宏观结构之下并且有时还反对它的规范且微观的过程的理193 论。他用个体道德的发展和认知的进步来支撑他所描述的世界历史的“社会学习”阶段，讨论政治合法性的语言行为，以及立基于个人互动之上并证明了他对社会反抗和社会紧张所做的经验解释的生活世界。

这些宏观的理论论述所遗漏的是一个强大的文化概念。哈贝马斯避开文化系统，是因为这个观念给历史生活的每一个可理解的阶段注入一种任意性和非理性的因素。而吉登斯和科林斯不接受它是因为他们受到微观社会学的过分影响，因而以一种高度断裂的、总的说来也就是过于具有反思性的方式来界定行动者。[4] 跟这些成就相比，我自己的研究则是以倾向于宏观的文化立场开始。我认为(1982b)，马克思因为缺乏涂尔干看到象征体系的洞察力，因此他激进的理论内在地有一种强制的特质。我提出这样的设想(1983a)，韦伯的政治社会学之所以沿用马克思的这个脉络，是因为韦伯关于当代社会的观念不承认存在一致的文化整体的可能。要以这种方式来支持文化的意义，就要意识到帕森斯的理论贡献的关键意义，尤其是他在文化、人格和社会之间做的分化。不过，对于这部早期著作，我也想从他对个体意义上的秩序的忽视做自己的研究。因此我从那时起就

---

[4] 就跟阿切尔(1985b)观察到的那样，吉登斯过分夸大行动者跟他们的环境的分离是他经常过分强调社会结构强制的物质性的另一面。

径直转向在微观传统中建构理论(亚历山大,1985a,1988b;亚历山大和科洛米,1985;亚历山大和吉森,1987)。我已勾画出一个模型,将行动构想为行为(behavior)的偶然性要素,而后者只能分析性地从再生产中被区分出来。这种行动可以被设想为符号的、社会的和心理环境中的"流程"。这些环境渗透进实体的经验行动者,他或她不再像微观理论的传统那样被等同于纯粹偶然性的行动。

社会学的新理论运动正在很多领域以不同的名义在发展。它将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学科钟摆眼下的运动能量被消耗殆尽。在我看来,使这个运动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关键在于更直接地接受集体建构的意义或者文化具有核心的重要性。普遍性理论中新起的综合性旨趣跟朝文化理论的转向之间存在着大的裂缝。后者才是具有实质意义的新的宏观理论的特征。只有当这些普遍性理论家愿意进入"文化研究"的领域——当然,也带着他们的社会学装备——这个鸿沟才将会渐渐弥合。不过,在此期间,关于文化的理论不能退化成唯心论的假面具。它也不能被赋予一种客观性的色彩,凌驾于个体创造性与对规范的抗争之上。[25]如果这些错误得以避免,社会学的新运动则将有可能演 194

---

[25] 当然,这些正好是帕森斯在两代人以前试图综合社会学中纷争的派别时所犯的错误。但是,年轻一代的理论家正在从事的也是相同类型的研究——综合行动与结构、文化与物质力量。因此,这场新的理论运动采取的一种伪装是广泛地修正和恢复帕森斯的理论,就不应该让人感到惊奇;我把这场运动称为新功能主义,比如,参见亚历山大(1985b)编的论文,以及亚历山大和科洛米(1988)。在阿切尔倡导在宏观社会学中以一种崭新的观点看待文化的著作中(1985a),也可以看到她以不太正式的方式朝帕森斯的研究方法在回归。她认为,要想恢复文化,只能先避免把文化模式与社会平衡相合并。这个观点在她的《文化与能动者》一书中得到了精细的阐述,它代表了把文化捕回普遍性社会理论的主要的尝试。

甚至是在这种复兴更正统的支脉中,也可以看到新运动的影响。虽然卢曼(1979)把"系统"这个基本的宏观概念提升到了一个新的而且是凌驾于一切的高度,

进成真正的多维度的理论。这将是对社会思想永远的贡献，哪
195 怕它不能防止钟摆最终又再度回摆。

但是不应忘记的是，他是参照基本的微观过程来解释系统的存在的，他把微观过程认定为个体减少复杂性的外在需要。而且，在最近关于自组织系统(autopoietic systems)的论著中，他把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辩证关系归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质。这个重要的观点对蒙克(1987)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对重塑帕森斯的系统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虽然从一般意义上说，他对彻底的微观传统持批评态度，并以此追随帕森斯对集体的重视，但是他还是把偶发性包容在经他修正后的四层次模式当中，这种方式是帕森斯从未认真思考过的。

参考文献

Abrams, M. H. 1971, *Natural Supernaturalism*. New York: Norton.

Alberoni, F. 1984, *Movement and Instit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lexander, J. C. 1982a, *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 vol. 1: *Positivism, Presuppositions, and Current Controvers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b, *The Antinomies of Classical Thought: Marx and Durkhei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c, Kuhn's unsuccessful revisionism: a rejoinder to Selby. *Canadian Sociological Review*, 7, pp. 66—71.

Alexander, J. C. 1983a, *The Classical Attempt at Synthesis: Max Weber*. *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 vol. 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b, *The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Classical Thought: Talcott Parsons*. *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 vol. 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The Parsons revival in German sociology. In R. Collins (ed.), *Sociological Theor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p. 394—412.

——1985a, The individualist dilemma in phenomenology and interaction. In S. N. Eisenstadt and D. Halle (eds), *Macrosociological Theo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pp. 25—57.

——(ed.) 1985b, *Neofunctionalism*.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7a, On the centrality of the classics. In A. Giddens and J. Turner (eds), *Social Theory Today*, London: Macmillan, pp. 11—57.

——1987b, *Twenty Lectures: 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c, Science, sense, and sensibility. *Theory and Society*, 15, pp. 443—63.

——(ed.) 1988a, *Durkheimian Sociology: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b, *Action and its Environments: Towards a New Synthe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lexander, J. C., and Colomy, P. 1985, Towards neofunctionalism: Eisenstadt's change theory and symbolic interac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3, pp. 11—32.

——(eds) 1988,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Approach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lexander, J. C., and Giesen, B. 1987, From reduction to linkage: the long view of the micro-macro link. In S. C. Alexander et al.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42.

Alexander, J. C., and Seidman, S. (eds) 1990, *Culture and Society: Contemporary Deb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thusser, L., and Balibar, E. 1970, *Reading Capital*. London: New Left Books.

Anderson, P. 1986, "Those in authority," a review of *The Origins of Social Power*, vol. I by Michael Mann.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December 12, pp. 1405—6.

Archer, M. 1985a, The myth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6, pp. 333—53.

——1985b, Structuration versus morphogenesis. In S. N. Eisenstadt and D.

Halle (eds), *Macrosociological Theo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pp. 58—88.

——1988, *Culture and Agenc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cker, H. 1963, *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Glencoe, IL: Free Press.

Becker, H. 1984, *Art Worl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enson, E. 1979,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The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8(1), pp. 209—15.

——1984, *Populist Religion and Left Wing Politics in France, 1830—1852*.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lau, P. 1977, *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New York: Free Press.

Blau, P., Blum, T. C. and Schwartz, J. E 1982, Heterogeneity and intermarria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 pp. 45—62.

Blumer, H. 1937, Social psychology. In E. D. Schmidt (ed.), *Man and Socie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pp. 144—98.

——(ed.) 1969, The methodological position of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In H.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pp, 1—60.

Boudon, R. 1982,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1987, The individualistic tradition in sociology. In J. C. Alexander et al.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45—70.

Bourdieu, P. 1986, *Distin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lhoun, C. 1982, *The Question of Class Struggle*: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pular Radic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oleman, J. 1968, Review symposium on Harold Garfinkel's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3, pp. 126—300

——1987a, Microfoundations and macrosocial behavior. In J. C. Alexander et al.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53—75.

——1987b, Toward a social theory of constitution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ollingwood, C. 1940, *Metaphysics*. Oxford: Clarendon.

Collins, R. 1975, *Conflict Soci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pp. 984—1014.

——1988, The conflict tradition in Durkheimian sociology. In J. C. Alexander (ed.), *Durkheimian Sociology: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07—28.

Coser, L. 1975, Presidential address: Two methods in search of a subst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0, pp. 691—700.

Dahrendorf, R. 1959,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arnton, R. 1984,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Di Maggio, P. 1988, Interest and agency in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L. G. Zucker (ed.), *Institutional Patterns and Organizations: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Cambridge, MA: Ballinger, pp. 3—21.

Douglas, M. 1966, *Purity and Danger*. London: Penguin.

Durkheim, E. 1937 [1895],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New York: Free Press.

Eisenstadt, S. N. 1986, Cul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3), pp. 297—20.

——1987, Macro-sociology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some new directions (review essa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6(5), pp. 602—10.

Eisenstandt, S. N. and Curelaru, M. 1976, *The Forms of Sociology*:

Paradigms and Crises. New York: John Wiley.

Ekeh, P. K. 1974, *Social Exchange Theory: The Two Tradi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lster, J. 1985, *Making Sense of Marx*.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yerman, R. 1982, Some recent studies of class consciousness. *Theory and Society*, 11, pp. 541—53.

——1984, Social movements and social theory. *Sociology*, 18, pp. 71—81.

Foucault, M. 1970, *The Order of Things*. London: Tavistock.

Friedrichs, R. 1970, *A Sociology of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Garfinkel, H. 1963, A conception of and experiments with trust as a condition of concerted stable actions. In O. J. Harvey (ed.), *Motiv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New York: Ronald Press, pp. 187—238.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Garfinkel, H., Lynch, M., and Livingston, E. 1981, The work of discovering science construed with materials from the optically discovered pulsar.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11, pp. 131—58.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oks.

Giddens, A. 1971,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5,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ies*. London: Macmillan.

Godelier, M. 1967, System,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Capital." In R. Miliband and J. Saville (eds), *The Socialist Regi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pp. 91—119.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day Lif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3,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4, *Frame Analysis*. New York: Harper & Row.

Goldthorpe, J. 1973, A revolution in sociology? *Sociology*,7(3), pp. 449—62.

Goode, W. J. 1979, *The Celebration of Heros: Prestige as a Social Control Syst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ouldner, A. 1982, *The Two Marxisms*. New York: Seabury.

Habermas, J. 1971,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Boston: Beacon Press.

Habermas, J. 1973, *Theory and Practice*.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Boston: Beacon.

——1989[1962],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Hall, J. 1985, *Powers and Liberti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Handel, J. 1979, Normative expectations and the emergence of meaning as solutions to problems: convergence of structural and interactionist view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84, pp. 855—81.

Hirschman, A. 1977,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ohon, G. 1973, *Thematic Origins of Scientific Thought: Kepler to Einste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mans, G. 1958, Social behavior as ex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62, pp. 597—606.

—1961, *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ed.) 1962, Introduction. In G. Homans, *Sentiments and Activiti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4, *Coming to My Sense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Hughes, H. S. 1958,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Hunt, L. 1984,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The sacred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J. C. Alexander (ed.), *Durkheimian Sociology: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5—43.

Kadushin, C. 1978, Cast thy Bread upon the waters... Graduate Center.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Unpublished manuscript.

Knorr-Cetina, K., and Cicourel, A. (eds) 1981, *Advances in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Towards and Integration of Micro and Macro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Knorr-Cetina, K., and Mulkay, M. (eds) 1983, *Science Observe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Study of Science*. Beverly Hills, CA: Sage.

Kreps, G. 1985, Disaster and the social order: definition and taxonomy. *Sociological Theory*. 3, pp. 49—64.

——1987, Classical themes, structural Sociology, and disaster research. In R. R. Dynes and C. Pellanda (eds), *Sociology of Disasters*. Goprizia, Italy: Franco Angell.

Kunn, T.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sh, S. 1985, Postmodernity and desire. *Theory and Society*, 14, pp. 1—34.

Lash, S., and Urry, J. 1984, The new Marxism of collective ac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Sociology*, 18(1), pp. 33—50

Lewis, J. D., and Smith, R. L. 1980, *American Sociology and Pragmatism: Mead, Chicago Sociology and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ieberson, S. 1980, *A Piece of the Pi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indenberg, Z. 1983,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its potential and limitation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in general and sociology in particular. In W. Sedsur (ed.), *Oknonomische Erklarung sozialen Verhalt*, Duisberg, West Germany: Sozial wissen schaftlicke kooperative, pp. 7—66.

Luhmann, N. 1979, *Trust and Power*. New York: John Wiley.

——1987, The evolutionary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ety and interaction. In J. C. Alexander et al. (eds), *The Micro Macro Lin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12—3.

Lyotard, J. F.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aines, D. 1977,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though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 pp. 235—60.

Mann, M. 1970, The social cohesion of liberal democra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5, pp. 423—39.

——1979, State and society, 1730—1815: an analysis of English state finances. In M. Zeitlin (ed.),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vol. 1, Greenwich, CT: JAI Press, pp. 165—208.

——1986, *The Origins of Social Power*, vol. 1: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nn, M., and Blackburn, R. M. 1979, *The Working Class in the Labor Market*. London: Macmillan.

Merton, R. K. (ed.) 1967, On the history and systematics of sociology. In R.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pp. 1—38.

Meyer, J. W. 1987, Conceptions of Christendom: notes on the distinctiveness of the Wes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Chicago, August.

Meyer, J. W., and Scott, J. 1983,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 Ritual and Rationality*. Beverly Hills, CA: Sage.

Molotch, H., and Boden, D. 1985, Talking social structure: discourse, domination, and the Watergate hearing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 pp. 273—87.

Moore, B. 1966, *Th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 *Injustice: The Social Base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 Boston: Beacon Press.

Munch, R. 1981, Talcott Parsons and the Theory of Action, Parts Ⅰ and Ⅱ.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87, pp. 709—49, 771—826.

O'Connor, J. 1978,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Offe, C. 1984[1972].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arsons, T. 1937,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Pinch, T. J., and Collins, H. M. 1984, Private science and public knowledge. *Social Studies in Science*, 14, pp. 521—46.

Poulantzas, N. 1972,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Prager, J. 1986, *Building Democracy in Ireland: Political Order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a Newly Independent N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abb, T. K., and Rotberg, R. I. (eds) 1982, *The New History: The 1980's and Beyon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ajchman, J. 1985, Philosophy in America. In J. Rajchman and C. West (eds), *Post-Analytic Philoso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ix—xxvii.

Rex, J. 1961, *Key Problem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Ritzer, G. 1975, *Sociology: A Multi Paradigm Science*. Boston: Allen & Bacon.

Rorty, R. 1979,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The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y: four genres. In R. Rorty, J. B. Schneewind, and Q. Skinner (eds), *Philosophy in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9—76.

Sacks, H., Schegloff, E. A., and Jefferson, G. 1974, 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 *Language*, 50, pp. 696—735.

Schegloff, E. 1987, Between macro and micro: contexts and other connections. In J. C. Alexander et al.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07—35.

Seidman, S. 1983, Beyond presentism and historicism: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social science. *Sociological Inquiry*, 53, pp. 79—94.

Sewell, W. 1980,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Ideologi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cas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7, pp. 57—85.

Sica, A. 1986, Hermeneutics and axiology: the ethical content of interpretation. In M. L. Nardell and S. J. Turner (eds), *Sociological Theory in Transition*. Boston: Allen and Unwin, pp. 141—57.

Skocpol, T.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Rentier state and Shi'a Islam in the Iranian revolution. *Theory and Society*, 11, pp. 265—84.

Skocpol, T. 1985, Cultural idioms and political ideologies in the revolutionary reconstruction of state power: a rejoinder to Sewell.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7, pp. 86—96.

Smelser, N. 1959, *Social Chang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mith, D. 1984, Textually mediated social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36, pp. 59—75.

Spiegelberg, H. 1971,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Stinchcombe, A. 1968, *Constructing Social Theorie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Theoretical Methods in Social Hist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Strauss, A. 1978, *Negotiations: Contexts, Processes and Social Order*.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Stryker, S. 1980,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 Social Structural Version*. Menlo Park, CA: Cummings.

Sztompaka, P. 1974, *System and Func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4, The global crisis and the reflexiveness of the social 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25(1—2), pp. 45—58.

——1986, The renaissance of historical orientation in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 pp. 321—37.

——1993, *The Sociology of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Taylor, C. 1975, *Hege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ompson, E. P. 1978, The poverty of theory of an orrery of errors. In E. P. Thompson (ed.),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pp. 1—210.

Thompson, J. B. 1984,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d.) 1986,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C. Leford, *The Political Forms of Modern Society: Bureaucracy, Democracy, Totalitariani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p. 1—27.

Tourraine, A. 1977, *The Self-Production of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revor-Roper, H. R. 1965, Religion, the Re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 *Historical Studies*, 4, pp. 18—45.

Treiman, D. 1977,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John Wiley.

Turner, J. 1986. Review: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pp. 969—77.

Turner, S. P. 1987, Underdetermination and the promise of statistical sociology. *Sociological Theory*, 5(2), pp. 172—84.

Turner, V. 1969, *The Ritual Process*. Chicago: Aldine.

Van den Berg, A. 1988, *The Immanent Utopia: From Marxism on the State to the State of Marx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agner, D. G. 1984, *The Growth of Sociological Theori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Wagner, D. G., and Berger, J. 1984, Do sociological theories grow?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 pp. 697—728.

Walby, S. 1986, *Patriarchy at Work*. London: Macmillan.

Waldell, M. L. and Turner, S. P. (eds) 1986, *Sociological Theory in Transition*. Boston: Allen & Unwin.

Wallace, W. 1983,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ology*. Chicago: Aldine.

Walzer, M. 1986, Review of Jan Elster, *Making Sense of Marx*.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2, pp. 43—6.

——1987, *Interpretation and Social Critic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eber, E. 1976,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eber, M. 1958[1904/5],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Scribner's.

Wilentz, S. (ed.) 1985, *The Rites of Powe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Williams, B. 1985,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ippler, R. and S. Lindenberg. 1987, Collective phenomena and rational choice. In J. C. Alexander et al. (eds),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35—52.

Wright, E. O. 1978,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Wuthnow, R. 1987, *Meaning and Moral Order: Explorations in Cultural Analy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uthnow, R., Kurzweil, E., Hunter, J., and Bergesen, A. 1984, *Cultural Analysis*. Routledge & Kegan Paul.

Zelizer, V. 1985, *Pricing the Priceless Child*. New York: Basic Books.

Zucker, L. G. (ed.) 1988, Where do institutional patterns come from? Organizations as actors in social system. In L. G. Zucker (ed.), *Institutional Patterns and Organization: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Cambridge, MA: Ballinger, pp. 23--49.

9

新功能主义之后：行动、文化和市民社会

在本书的第一章，我描述了从正统的功能主义向改造之后的新功能主义的转变，而且我提出，后者已经在当代社会理论界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在前面几章已经证明，到如今，在理论和研究程序两方面，新功能主义的著作已经大量涌现，它们对社会学领域内涉猎相当广泛的专题研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不过，我在第一章里也提到过，这里面有一个悖论。恰恰是因为这样的成功，使得新功能主义运动丧失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基础。现在，帕森斯成了一个"经典"理论家，也就是说，虽然他的理论可以继续充当传统的基础，但是它们却变得能以更加综合、折中和投机取巧的方式来使用。受帕森斯原创性理论的视域和雄心的激励，新功能主义一直专注于吸纳相互冲突的理论传统并发展出新的、更为综合的理论模式。虽然在这种努力中，"帕森斯的理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源泉，但实际上，他的理论并不比其他经典理论大师的主要贡献更为重要，同样它也不能遮蔽一些当代思想家的真知灼见。也许，正是现在，在"帕森斯"理论恢复了其地位之后，才有可能把他的理论跟其他的理论传统建设性地联接起来。在此过程中，超越理论的重建而走向理论的创新成为了要旨。在我自己的著作里面，有三个相互关

联的领域，在其中这种超越新功能主义的动向正在出现。 210

行　　动

帕森斯的理论贡献之一就在于打破了行动者的实体意义。他并没有把个体描述为外在于他们自身的"社会"的参与者，而是采取了一种分析的视角，认为行动者和社会跟我们肉眼所见的具体形象大不相同。它们实际上是由不同的层次、模式化的意义（文化系统）、心理需求（人格系统）以及对互动与制度的迫切要求（社会系统）组成的综合体。在早期，帕森斯就是利用这个三系统的模式，把研究重点放在了现已为人熟知的微观与宏观的联系上。他相信，行动者并非个体本身，而是形式多样的经过社会化而进入角色关系并取得身份的文化模式的具体体现。同样，组织也跟韦伯所说的反主体性的"铁笼"截然不同，它们是社会化的动机和文化模式交互作用并形成依情境而定的特殊规范的场所，这些规范使得功能上不可或缺的角色能够彼此相互满足。

在我看来，这个"三系统模式"是对社会思想的一个永久性贡献。帕森斯恰当地用这种方式消解了实体的行动者。这种解构为主体性和客体性、自我和社会、文化和需求之间的相互贯通提供了渠道。实际上，在今天的社会科学议程中，这些洞见仍然有重要的意义。比如，当代女权主义对性别歧视总是要么解释成男性家长制权力的结果，要么解释为一种心理的扭曲，而很少提到在两性之间无疑都存在着的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在文化上的解释（参见布洛克 1993 年的评论，以及拉腊 1998 年的著作）。宏观社会学，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当代的，都总是把政治的、经济的甚至是文化的结构简单地视为权力的网络，把它们视为既非

由意义也非由动机建构起来的组织，而是由于身体的接近和资源的充备而形成的组织（参见艾森斯塔德 1989 年的评论）。就文化研究来说，它也总是要么把文化当作在一定意义上"外在于"实体行动者的强制力，要么就依照福科的观点，把制度性权力的结构等同于文化知识的结构，并把作为独立力量的行动者排斥出去。[1]

不过，现在已经很明显，这种解构并不能在微观和宏观之间创造出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关联。尽管帕森斯提出了一个可信的贯通文化、社会和心理的一般模式，但他却没有给出此类行动的说明，亦即，他没有对具体、生动和鲜活的、在时间和空间中实践的行动者做出说明。帕森斯所创立的是一个解释行动之微观基础的强制性的宏观社会学理论；不过，在建构其理论的时候，他忽略了其中的互动所演化出来的秩序（罗尔斯，1987）。帕森斯建立其三系统理论，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这个时候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微观"革命尚在襁褓之中。因此，当革命在五十年代末发生的时候，他也没有修改他的理论。

微观理论家强调社会化的自我是行动理论必然的起点，而不是其结果。比如，布鲁默认为，行动者总是把他们自己当做一个客体。戈夫曼指出对价值的遵从不仅是社会化的结果，也是一种表意性选择：理想化为行动者赢得了信任和空间去建构他们需要的行动轨迹。同样，加芬克尔也关注内化的价值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的问题，他相信由于行动者接受价值的存在并知道如何在实践中展现它们，因此价值变成了可操作的，并且变得很重要。霍曼斯也认为价值是一个常量，而变量只是交换的条件。个体正是把这些不同的资源带入了相互讨价还价的情境

① 布迪厄试图一举完成这一种简化论（参见亚历山大，1995）

之中，突现的社会生活就是在这些情境中得以表现的。

对这些观点，帕森斯不会接受。他既不欣赏这些深刻的洞见，也不承认它们潜在的深远意义。这种抵触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在微观革命之后，宏大的社会理论就不得不有所改变。新的微观理论促进了宏观社会学理论新的重要发展。科林斯和吉登斯后期的观点就深受常人方法学和戈夫曼的影响。受语言行为理论的影响并吸收了生活世界（Lebenswelt）哲学，哈贝马斯的观点也发生了转变。图伦对后工业社会的社会运动的性质的解释则是受行动理论的启发，布迪厄的理论得益于现象学，科莱曼和埃尔斯特则是从理性选择理论汲取了养分。事实上，正是这种理论的交叉决定了社会学新的理论发展运动。

我自己对微观与宏观相关联的构思（如亚历山大等，1987）要归功于近来一般理论所取得的进展。不过，我仍然对它们极为不满。它们避开了帕森斯解构的企图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但是它们却没有吸取他的理论贡献。[2] 在关注行动的时候，他们只是以一种实体的方式构想行动者。而现在，行动理论的挑战 212 是超越这一立场：即去解释本身被分析性构思出来的行动者之间的具体的、经验的互动可能性。

如果翻阅一下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以来阐述一般社会学理论新运动的文章和著作，我们会发现一种强烈的倾向，即把行动者（actors，行动的人）等同于能动性（agency，人的自由、自由意志）和能动者（agents，按自由意志行动的人）。我主张，这

[2] 莫泽利斯在最近重新思考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联系时——他把它描述为"制度和形态结构的关联"——做了几乎相同的抱怨。他认为，"我们应该把今天的理论社会学发生的一切跟帕森斯的'基础性'贡献联系起来"，"因此应该同意，目前最流行的趋势是不能够准确理解帕森斯的所有著述什么是正面的、有用的"。

是混淆了"能动性"和"行动者"的结果。[③] 这是一种并合，它为那些其研究已经为我所称道的反帕森斯的微观社会学家提供了研究的起点。不过，如果要争辩，人们可以说对这些战后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中的理论家而言，把能动性和行动者合二为一是必然而且有价值的错误；无疑，这是一个促成了一些最有成就的作品得以产生的错误。可问题是，这种实体的研究路径已经被用于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那些力图在微观和宏观之间建立关联的宏观社会学理论家，不再进行反对宏观和分析性理论的争辩，而是在继续这种实体研究。

从新马克思主义到理性选择理论，从新建构的冲突模式到社会运动和实践理论，都可以看到行动者和能动性的这种既能带来高产但在根本上又具有误导性的合并的危险痕迹。一方面，无论是存在于个体(霍曼斯)还是集体(图伦)，能动性都被等同于英雄般控制一切的行动者；而另一方面，面对这个行动者，我们看到的是社会的形象，是宏观的秩序，像一个自我再生的、"不客气的用户"的系统，亦即一个既没有行动者也没有能动性的秩序。

吉登斯在声称"行动者依靠结构元素"的时候，背后所蕴涵的恰是这样的含义。换句话说，行动者本身不是社会结构，而是能动者。在他们的行动过程中，这些被假定为非结构性的能动者要以外在于他们本身的客体、社会结构为参照。为明确起见，吉登斯把后者界定为"规则"，而不是简单地认为它们是资源，也就是说，把它们当做从本体论上是主观而非仅仅物质性的结构。但是，吉登斯把规则本身当做是客观化的、非个人化的。比如，

③ 在这里我借用了自己1992年和1993年的两本著作，而这两本著作又是在发展我1987年提出的观点。

他只把规则表述为"技术或者可一般化的程序"(1984，第21页)，而不是主观经验意义的投射。难怪吉登斯把能动性跟"策略性行为"相等同，也就是说，能动性成了心理认同或者意义模式都不能约束的自由意志的展现。

当代其他有影响的一般社会理论家大多数都有类似的问题。因为他们假设行动者和社会都只有一个"实体的"形式，所以他们只能把能动性——行动中独立于内在或者外在约束的层面——跟整个人、跟这样行动着的个体等同起来。比如，科林斯就把宏观的或者超个体的参照物跟譬如财富、权力和物理空间等物质的、非个人的资源等同起来。在他的解释中，能动性产生于对这些外在于行动者的环境做出的内在的、情感的和策略的反应。哈贝马斯则把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等同于对生活世界的主观行动施加外在影响的理性系统组织，而把能动性看做实用的语言行动。尽管他参考了帕森斯发展的文化逻辑以及皮亚杰的心理学逻辑，但是他所说的语言行为跟文化行动和心理需求之类的东西无一点瓜葛。[4]卢曼的"自组织"(autopoetic)系统，不管指的是自我还是制度，都是遮蔽有意义的行动以及文化所规定的集体行动的一个比喻，要不然，它们就是过分的具体化，拒 213

---

[4] 在他最近的写作中，哈贝马斯不仅回应了来自女权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研究黑格尔的哲学家越来越猛烈的批评，回应了他自己的追随者，如本哈比比和奥内斯的著作，而且回应了他长期跟帕森斯和韦伯的文化研究的遭遇，他开始意识到进入康德的"道德"领域的行动者——被哈贝马斯理性化的公共生活——只有在被黑格尔称为合乎伦理的(Sittlichkeit)"道德"和特殊主义的世界里形成的需要和认同的基础上，才可以真正进入。他的早期著作的英文版所受批评汇编成集，他对此公开做出了回应，"我认为在同时我业已改变了我自己的论述框架，因此文化发展永久性的自主性应该被更经常地纳入论述当中"(哈贝马斯，1992b，第464页)。在阐述他的新方法时，他精准地利用文化论述对行动做了分析性的解释，这正是我在本文中所倡导的。

"交往行为的社会整合力量主要存在于那些特殊化的生活形式和生活世界中，

斥了这两种行动的过程。琼斯和奥内斯(参见亚历山大和拉腊,1966)把创造性放入与此类似的"哲学人类学"当中,把创造性跟行动者的内在特性联系起来,而不是把它跟在构造行动者本身的能力和认同当中非常关键的资源,即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层面联系起来。

我反对上面这些行动者和能动性的等同,因为他们都把实体性摆错了地方。虽然在其中,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和社会行动者得以避免,同时,把行动者舒服地放入社会整体的微观/宏观宇宙观也得以避免,但是这样的等同非但没有重新考察或重新理解我们熟知的行动者和结构之间的二元对立,并以一种新的方式调和主观/客观之间的二元对立,实际还以一种新的方式再生产了该二元对立。他们没有构造出一个等级体系,但在构思中,行动者和结构水平相处,并肩而置,它们可以相互理解进而创造出新的、特别的社会形式的可能被忽略了。这样的结果是一种混合,而非解谜;是一种妥协,而非革新。那种结构控制行动者,而反过来行动者同时又建构结构的观念——最早由布迪厄发明,后来又被吉登斯吸收的咒语——描述的是一连串的关系,而不是一种交互的联系。行动者和结构被构想为经验性的

而后两者在"伦理的"(Sittlichkeit)层面上——如果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跟具体的传统和利益的集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发挥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需要的不仅仅是宪法国家的制度性保证;它还需要文化传统的精神支持,社会化、政治文化的模式以及习惯于自由的大众。"(同上书,第444页)

对具有公共取向的行动之内在环境的承认使得哈贝马斯的话语出现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重新建构——以伦理的方式对民主社会中集体秩序的性质进行研究。它指出,需要超越抽象的普遍主义和程序化的最低原则,以对普遍主义何以能够在浓厚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有实质性的理解。我将在下文讨论市民社会的时候论述这一点。

差异,而不是分析性的不同。这样的结果就成了一种魔术,把行动和结构的球同时放在空中。而一种在根本上不同的行动者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并没有产生。 214

把分析论的视角和实体论视角综合起来,需要一个更加复杂的立场。行动者并不是简单的能动者(那些拥有自由意志的人),结构也不必然就是跟行动者实施自我控制和自主的环境相矛盾。这种自我控制和自主跟能动性或者自由意志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我们把行动界定为一个人在时间和空间内的活动,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不管是反制度和独立的行动,还是服从和依赖性的行动都包含了一个自由意志,或者说能动性的层面。我们甚至可以走得更远,认为能动性就是让行动者在时间和空间中活动的东西。但是,从本质上说,行动者跟"能动者"或多或少有不同。

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表述两者的区别。在我自己的书里面,我认为能动性是在三个结构化的环境中出现自由的时刻;三个结构化环境中的两个——文化和人格——在本体论意义上存在于行动者当中,而行动者则被认为是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上被固定的人。根据这种模式,行动者必须掌握知识,但错误的是——像布迪厄和吉登斯那样,在加芬克尔之后认为——行动者是"见多识广的能动者"。我说这是一个错误,是因为行动者拥有的知识并不来自于他们的能动性,而是来自于这些知识存在于其中并把它们化为一致的文化环境。而且,这些主观的知识来自于早期跟他人的互动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只被当做能动者的"实践"经验或在实用意义上的"实践"的结果。当然,一些知识确实是起源于带有个人偏好的学习过程,并且所有的知识都必然在时间和空间的脉络中,以一种特定的属于真实个体的方式得以运用。但是,如果把这些知识的大部分当成是行动者本人的,那

就错了。相反，它们是社会的知识，虽然任一特定的社会意义能否被广泛地分享并不确定。不过，即使在它没有被广泛分享的时候，它也不是从一系列特定的经验中概括出来的，而是从在这些连续的遭遇中必然会呈现出来的心理整体(gestalts)中习得的。

因此，行动是个人能动性的实施。对这种说法的两个方面，我们都必须注意。一方面，行动只能在跟高度结构化的内在环境的关系中发生。行动受文化系统的规范，由人格来激发。另外一方面，人格和文化规范并不能穷尽个人之主体性的内容。215 在这个地方就保留了非常有意义的能动性这个层面。哲学家理解的能动性或者自由意志可能是属于存在主义的范畴，对社会学家来说，能动性却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包括了发明、类型化和策略化的过程。这三个过程给自由意志的实施赋予了实用主义的形象，并把跟行动相关的结构化的、内在的环境纳入其中，让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中展现。因此，"行动者"的构成不仅仅包括由这三个基本过程来表述的能动性，还包括对这些内在环境的一种能动表述。

这样的立场还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些关于"社会结构"的重要内容。如果行动者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能动者，那么结构也不会只是——从本质上不是，甚至也不主要是——外在地跟行动者相遭遇的强制性力量。文化和人格本身就是社会结构，是内在地跟能动性相联系并以一种"自愿"的方式融入行动当中的力量。只有当我们关注能动性的第三个环境，亦即社会系统的时候，结构才可以被描述为在行动者之外。我所指的社会系统是经济的、政治的、社会团体的和生态的关系和网络。这些关系和网络是人们在时间和空间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但是，由于它们形成于具体的、经验的互动——事实上，因为它们是更早的行

动本身的凝结——所以，就算是认为这些"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可以不依赖赋予它们生命力者的模式化的内在环境而独立存在，那也是绝无可能的。[5] 说上面这些的目的是想表明，虽然经验互动的偶然性只能以其实体的形式来理解，但是行动的内在和外在的环境都必须用分析的方式来加以考虑。

文　化

对行动理论的上述重构使我们对行动的文化环境更为重视。文化环境必须在一种实体的意义中被想像成内在于行动者的组织化结构。不过，在新理论运动的一般理论家当中，实际上没有人认识到文化是一个从分析意义上说可以跟能动性分开的结构。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他讨论了规则和程式，但是他从来没有考虑过符号生活的结构化模式。在哈贝马斯关于正义的交往理论中，他只把文化认为是已经被"语言化"进一种普遍道德的东西，而这种普遍道德的前提可以以一种理性和有意识的方式来加以讨论。在科林斯的宏观社会学向微观的转化中，他把意义主要理解为互动仪式中情感的积淀。布迪厄的实践理 216 论虽把文化当成一种结构，但是他把文化化约为制度结构的等式意味着文化对能动性的作用不是启迪，而是否定。（参见亚历山大，1995）。

这些一般理论家没有把文化当成内在于行动的一个结构，这并不让人特别惊奇；毕竟，这反映了我在前面所描述的对待行

[5] 如想了解在此立场上更富洞见的论述，特别是关于网络理论和文化社会学之间的关系，请参见埃米尔巴耶尔和古德温(1984)。也可参见凯恩(1990)早期很有力的论述。

动的实体和经验主义方式。可是，甚至是文化社会学的专家——一般理论家在讨论文化的时候都有可能被期待去依赖他们——都倾向于用相同的实体方式来对待文化。在伯明翰学派和像阿切尔和斯威德勒等文化社会学家的研究中，行动都被理解成一个时常甚至是很突出地把自身摆在文化之上并且跟文化作对的过程，处于模式化符号规则之外。[⑥] 换句话说，文化理论者常常犯一般理论家那样的错误。他们把行动等同于富于创造性的、反思的或者是反叛的能动性，于是就把文化仅仅认为是存在于行动者自身之外的模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一点变得很清楚，也就是在这里涉及到的不仅仅是理论的问题。这种把文化跟能动性分离也反映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敏感性。一般理论家和文化理论家都广泛地具有这样的敏感性，因为他们对待能动性的方式不仅是一种合并，而且是赞美性的，甚至是英雄式的。根据其中的一个传统（交换理论），行动者是理性的、自主的、自足的、精明而聪慧的。换一个传统（常人方法学），行动者则成了知识渊博的、善于反思的、自我监控的和有能力的。用第三种方式（符号互动论）来修饰，行动者又成了特别富有创造力的、极具表达能力的、能制造意义的。如果把这些描述性的词汇视作描述能动性的分析性特征的词汇，那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有效性；毕竟，在西方民主生活的传统中，核心就是获得自由的能力。但是，如果拿这些词汇来描述具体的行动，亦即描述行动者的特征，那么这些描述就必须受到质疑。然而，它们却正是通常隐含在背后的意义。

如果我们没有把行动者跟能动者合二为一，那我们就不得

⑥ 伯明翰学派由此提出的批评，请参见舍武德等的合著（1993）；对阿切尔、斯威德勒以及武特诺的讨论，请参见兰博与尚（1990）。

不承认行动者并不是像这些描述所说的那样英雄。他们经常是混乱的、消极的、自欺的、轻率的、不端的。如果能动性本身是以正面的方式来描述，那么行动者何以会如此？答案是，能动性只能通过其文化和心理的环境来表现自身，而这些力量有时是以极端有害的方式去建构能动性的。忽视或者简单处理行动的消 217 极因素，那么，关于能动性的重要理论有时就会对行动进行道德评价，而不是以冷静的态度去描述它。图伦的"行动理论"便是如此。他反对决定论和结构理论，并已正确地突出了自愿的主动性和自由的意志在建构宏观社会学生活中的重要性。但是，在他看来，此分析要点的基础——他以经验性的方式论证——是后工业社会中的社会运动所发挥的正面的、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他的疏漏在于他没有看到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一些最典型和最危险的"行动"。

当代的行动理论，与其说是对反思性的理论概括——一般理论和文化理论都是如此——还不如说更像是对天赋人权的道德传统和政治传统的重塑。他们不是想建立行动与其内在环境之关系的理论，而是对支持民主主义本身的规范性话语做了令人鼓舞、满怀憧憬的细致阐释。但是，我们应该对这种话语有清楚的认识，而不是去再生产它。第一步，就是要认识到它是一种话语；我们必须把它当做规束行动的一种意识形态来解构，而不能把它阐释成对行动的解释。这样，我们就知道良知并不必然跟行动联系在一起；而它之所以可以归为行动的属性，只是因为能动性的展现也有特定类型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环境。

一旦认识到具体行动的内在环境，我们就可以理解行动必须被当做一个不是跟文化作对，而是在文化中实践能动性的持续不断的过程。这就意味着象征——再生产社会表述和社会规则的一个能动过程——是每个行动的接续的层面，它不是"取代

了"创造和发明这两个层面,而是与它们"相伴"[⑦]。能动性跟文化有内在的关联,而不是一个位于文化之外的过程。因为能动性是"自由的",所以行动从不是简单的模仿,它也从不简单地再生产内化的象征环境。行动包括一个外显化(externalization)的过程,或者是一个重新展示的过程:能动性跟表达能力和象征能力有内在的联系。因为行动者是有能动性的,所以他们可以展现他们的表达能力,并以外显化的方式表述他们的外在环境。这跟文化的结构地位并不冲突,而不像列维-斯特劳斯的"修理工"(bricoleur)否认了神话的力量,也不像涂尔干所坚持的"宗218 教幻想"消解了仪式。

不过,帕森斯的三系统划分即使能让我们理解文化是一个相对独立并表述了行动和组织的结构,它也没有把文化描述成具体意义上的行动的内在环境。帕森斯之所以没有能够把文化跟具体的行动者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他在理解意义的时候,没有意识到文化分析者必须从社会情境里行动者的真实话语——语言行动——中建构"价值"。这种价值并不说明、激起或者约束具体的行动;它们是分析者本人的分析性(再)建构,这些(再)建构是通过抽象,远离价值评判的真正表达形式而精确地产生出来的。这让我们理解了帕森斯为什么在极力强调文化的重要意义之外,还给了我们一个苍白无力的象征过程内在结构化理论。

问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帕森斯没有看到第二种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科学的知识革命。在二十世纪

---

⑦ 在约阿斯(1996)值得称道的研究中,他试图在行动理论的核心中加入创造性,但是他没有把象征当做跟行动同时并存的层面,是跟创造和策略化并列展开的一个层面。

七十年代早期，关于文化在社会中的角色在理论上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个变化有的时候——当然是不准确地——被称为语言学或者是话语的"转向"。在美国的争论中，这个转折表现为克利福德·格尔茨向帕森斯（和马克思）发起的一系列根本挑战。譬如，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文学转喻（literary tropes）要比功能性的需要更重要（格尔茨，1964），意义的深描要比因果解释中价值和方法的归纳更重要（格尔茨，1973）。在法国和英国，语言学的转向表现为符号论和结构主义不断加强的冲击，这些理论研究日常的语言和惯例，公开的文本，从其中重新建构起结构秩序复杂并且似乎能够对充满意义的社会生活的详细图景做解释的象征规则和描述。这些变化进而激发了一些人进行新的象征人类学的写作，比如维克多·特纳、玛丽·道格拉斯和格尔茨本人。最后还出现了福科影响巨大的后结构主义，它非常有说服力地宣称高度结构化的文化话语的场域是社会的权力。在德国，解释学哲学也重新获得生命力，它的主张是理解社会行动必须参照行动者的意义体验，而且并正如利科（1971）说过的那样，这种充满意义的行动可以也必须被当做一个文本来解释。 219

帕森斯形成他对文化最初的理解是在这些理论的发展起步之前，因此他没能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当然可以用生平来解释。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他的知识准备的开端来看。帕森斯非常不同意文化主义者的主张。这一点可以从他早期回应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做出的宗教研究的转折时就可以看出。帕森斯虽然赞赏涂尔干对象征的认识，但批评他的"宗教社会学"的唯心论研究方式。他没有把涂尔干的"神圣"看做是象征的内在结构或象征经验的持续增加，而是把它简化为韦伯的"卡里斯马"，也就是一种对社会危机和紧张的片段性回应。他还以同样的方式描述了涂尔干对仪式的理解。

帕森斯没有顺从涂尔干的主张，广泛地去关注象征模式，他选择的关注点是“价值”[8]。他把价值界定为从功能性的需要衍生出来的并在特定的角色中制度化的象征的子集。不过，实际上如我前面所说，帕森斯对意义的理解，与其说是通过对行动者的意义或者话语的解释性分析来实现的，不如说是通过对社会世界中的实际行为模式加以概括而得到的。而这正是涂尔干在其后期的作品中竭力想避免的一种方式。涂尔干一心想创造一门特别与众不同的社会学，它将永远不会把对社会功能的分析跟行动者本人的模式化理解混淆起来。跟帕森斯所推崇的但毫无说服力的价值的文化理论——这让他非常明确地把社会学跟人类学区分开——相反，涂尔干在后期摆出了一种坚定的理论立场，他反对这样一种学科的分割，同时也反对任何认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存在着绝对断裂的观点。

这样一个文化社会学的宏大计划——是涂尔干后期提出的（亚历山大，1990；亚历山大等，1993；并参见埃米尔巴耶尔，1996）——使得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知我在前面倡导的研究行动及其环境的方法的最重要的意涵。它使得我们可以更紧密地把行动跟行动者本人的经历的意义联系起来，也可以更紧密地把它跟文化形式联系起来，后者建构着意义，并让行动在制度化的压力和系统的紧迫性中具有更大的自由度，而相比之下，帕森斯的价值理论赋予行动的自由度要小得多。实际上，行动者是在积极而无穷无尽地展示着加芬克尔所说的“索引性”。不过，在

220 行动者把意外之事转变为期待之事时——使用已有的理解模

---

⑧ 从这个角度来看，帕森斯（1968）后来对格尔茨的文章“作为一个文化系统的宗教”的批评性回应也很有启发。

式——他们不是简单地公然承认与有效地约束着社会关系的那些价值相契合。也就是说,他们不只是像戈夫曼理解的那样进行着“理想化”。

行动者代表的不仅是被制度化的意义结构。这里所说的制度化是指是由社会系统组织、惩罚与奖赏,或为了社会系统而组织、惩罚与奖赏。当然,在一些地方(例如,帕森斯和希尔斯,1951),帕森斯确实谈到了文化的“模式”整合约束了系统整合或者功能整合,也谈到了由此产生“文化约束”的可能性。但是,在大多数时间里,他认为约束来自于社会系统,而不是文化系统。虽然他的“完全制度化的原理”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理想模型,而并非真实地在描述一种毫无争执的社会生活,但是这个概念却清楚地表明帕森斯赋予社会体系以高于文化的优先性,认为制度机制是从文化模式中选择的,而文化却主要是一种进行制度性约束和控制的机制。他极少关注文化自身的内在规则和叙事。不应该这样认为,即虽然文化具有广泛的规则和表述形式,但它却跟社会具有相关性;而应该说,是因为文化具有广泛的规则和表述形式,所以它才跟社会具有了相关性。它在每个行动和制度中制造了“意义的增量”(利科,1977),这种增量跟每一种制度化的实体行动之间产生了紧张与距离。[9]

---

[9] 当然,这是艾森斯塔德论述在文明的过渡年代,张力与紧张具有核心重要性的观点(参见亚历山大,1992b)。正是意识到意义增量的存在,艾森斯塔德直接转向了制度化理论,认为实际上是制度化产生了紧张,而不是解决了它们。同样也坚持认为文化规范允许一种超越性的经验,它有利于促成非制度性行动的论述,请参见迪贝(1994)。

市民社会

这种关于行动与文化的新观点对分析社会系统及其组成部分有一定意义。对这些意义，我不打算在各种各样的制度领域中以一种普遍的方式来加以探究。我想关注市民的领域，亦即“市民社会”的世界；在最近几年中它可能已成为被讨论得最为广泛的社会现象了（比如科恩和阿拉托，1992；卡尔霍恩，1992）。

如果从宏观社会学的立场来看战后理论化第二个浪潮中的微观理论，就可以看到这些关于互动的具体形式的描述暗示了一种非正式的社会秩序，也就是一种并非由大规模的、强制性的结构所控制，而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沟通与互惠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理性选择的理论家重视竞争，他们认为尽管存在着权力的不平等，但总是可以实现平衡。布鲁默（参见苏里，1988）认为，行动者成功地建构了联系自我与他者的一致性行为框架。戈夫曼尽管经常强调行动者为了获得控制和成功而隐藏他们的动机，但他笔下描述的行动者仍然付出巨大努力以气质优雅的行为呈现他们自身；他还描述了各种各样的遵从，以及非个体而又具有约束力的团结形式，公共行为依赖于这种团结并反过来促成了它。加芬克尔将人际间的相互信任视作理解的核心；他解释道，行动者应当假定存在着达成共识的原则以及大家共同分享的价值，哪怕没有铁定的证据表明它们的确存在着。这种假定以及由此产生的互动形式使得这种非正规的信任机制真正出现的可能性大为提高。

但是，当战后理论运动的第三个阶段——社会学新的理论运动——的革新者将微观理论的这些洞见包容进来的时候，他们对作为微观理论论述之基础的这种关于非正式约制的“市民”

221

社会的理论几乎视而不见。他们吸纳了实体的行动者彼此参照并自我反思的描述性模式,并立足于这些"机制"发展出宏观社会学的理论,这些理论强调沟通、分类、自我参照、交换,以及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持续性行为的必要性。但是,他们忽略了这些过程所蕴涵的更大的社会意义,亦即道德秩序具有真实性,而且它可以作为一种回归非正式社会控制模式的资源。比如,布迪厄在其论著中指出,受习惯制约的生活受等级和场域性控制的支配,并且转化成各种策略性的互动,行动者在此互动过程中寻求实现各种资本的最大化。哈贝马斯的言语行为理论、共有的经验以及互动的生活世界模式很大程度上是想为当代社会建构替代性的规范,而不是描述生活世界过程本身;实际上,哈贝马斯坚信,在当代世界中,非正式关系与信任已被政治体系和金钱的"殖民化"碾为齑粉。[11] 在吉登斯的眼里,晚期现代世界是风险和危机四伏的世界,自我在其中总有被吞噬的危险,信任也经常在其中被砸得粉碎。科林斯笔下的世界则充满了竞争与冲突,情感和道德在这个世界中通过仪式在进行交换,并倾向于强化金钱、声望和社会权力的等级体系。

新理论运动中的这些学者所做的一切,是力图综合微观社会学的互动模式和冲突论的结构主义观点;后者占据了战后第二个理论发展时期的一半空间。由于他们都是用韦伯派学者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物主义线条勾画其宏观秩序的蓝图,因此他们应用了一种绘制宏大过程的方法,而它却不能触及自我的世界、动机性选择、信任、规范性以及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

222

---

[11] 在哈贝马斯最近一部有关法律的著作中(1996),这个问题只是部分地得到了解决。实际上,这部著作虽然明显地把法律界定为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经济和国家的道德领域,但它仍然没有充分地讨论市民社会中非正式的象征性话语,哈贝马斯在本章注释4所讨论的作品中说明了这个领域的存在。

等。这种无能为力正是古尔德纳直到生命快结束的时候都还在尖锐批评的。在《即将到来的危机》(1970)一书中,他激烈地反对美国的微观和宏观社会学理论,强调制度的强制性权力以及阶级的支配。但是,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一直在跟宏观社会学中的决定论和权威论取向进行斗争,他的思想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在《两种马克思主义》(1980)一书的后记中,他赞扬了美国传统微观社会学对主观和地方性层次的强调,认为它们为理解外在于市场与国家并遭结构理论忽视的市民社会指出了一种方式;它们不仅突显了结构理论在科学上的弱点,也点明了它们在道德上存在的危险。甚至在他去世前不久,在追悼帕森斯的悼词中,古尔德纳(1979)仍只对帕森斯本人在宏观社会学中强调道德与规范的观点表示了轻微的赞同

实际上,这正是帕森斯的宏观秩序理论所力图强调的。恰恰是因为其理论具有分析性的特点,帕森斯从未失去这样的视角,即更大的结构性过程是被镶嵌在主观性期望和社会控制非正式的、文化的形式之中的。他在其三系统模型中,可以主张"总存在着"规范化的参考和主观的、有责任能力的自我;在制度化理论中,可以指出存在着某些价值观念,它们能在组织内部营造出信任与尊敬;在对规范化和自愿秩序的强调中,可以突现当代社会生活共识性和互惠性等组成要素。在帕森斯学术生涯的最后十五年,这些一般取向的观点在宏观社会学中表现得最为有趣。立基于韦伯所理解的受法律约束并具有普遍性的共同体、涂尔干的有机团结的观点、马歇尔的公民权模型,以及最重要或许是立基于他自己对美国民主的唯意志基础的理解与同情,帕森斯开始对被他称为社会共同体(societal community)这个居间的主观领域进行理论化。平心而论,社会共同体代表了帕森斯对宏观社会学所做的最重要贡献。它为其他宏观模型的

两个或者三个组成部分增设了第四个“层次”，指出一个既包括 223
主观性同时又包括了高度理性化的系统层次的世界。作为一个个体的认知层次和一个整合的世界，社会共同体提供了一种“民有”的感觉，帕森斯坚持认为这是公民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他把“被包容”当做当代世界一个根本的世俗趋势。

然而，社会共同体这个概念只是出现在帕森斯的后期著作中。在这段时期，他对紧张与冲突的敏感性以及他所主张的自由主义的批判性都几乎消失殆尽；他夸大平衡与整合的普遍理论趋势正最大程度地得到宣扬；他实质论性质的社会学观点正越来越多地以形式主义的术语得以表达。这些趋势，尤其是在面对这一时期兴起的关于规范性和权力的激烈论争时，实际上埋没了帕森斯的社会共同体这个概念的意义。微观理论家从未想过把帕森斯著述的某个着重点与更大社会的唯意志特征相勾连，而帕森斯自己也没有表示过在他的社会共同体概念跟微观理论家的更偏向于以行动者为中心的观点之间有任何联系。而理论发展第二时期的宏观理论家则毫不犹豫地否定了帕森斯对此领域的重视。根据这些早期的动态，我们现在可以一点都不惊奇地发现，主观性和道德这个中间层的活力在理论发展第三个阶段的综合理论中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不过，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对中间层的这类思考似乎成为了特别紧迫的需要。自我约束的新型社会运动在反抗专制统治的斗争中兴起，它们获得了革命的成功，但不是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为获得民主、团结以及个人权利之私人空间的独立性。这些政治实践首先在行动者本人当中复兴了十八世纪的市民社会的概念，然后拓展到了政治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当中。以社会学的方式研究公共性、信任、团结和责任于是开始登上舞台的中心。

帕森斯早期的社会共同体的研究方式有助于澄清新近出现的市民社会的概念，而我并不是第一个观察到这一点的学者（见224 科恩和阿拉托，1992；梅休，1990）。尽管在九十年代争论蜂起，市民社会这个概念仍然混淆不清，甚至还保留着它的神秘性。事实上，帕森斯使用这个概念，是试图解释一个整合的领域怎样能跟市场和国家区分开，又是怎样跟诸如宗教、科学和家庭等专门的观念或情感领域区分开。帕森斯在关于市民社会的著作中对这些问题所持的一般取向对我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我目前就在评述这些著作（比如，亚历山大，1991，1992c，1996，1997a，1997b；亚历山大和史密斯，1993）。不过，帕森斯对社会共同体的理解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早就被新功能主义指出来过，只不过现在才可以也有必要以更具有批评性和系统性的方式来审视。这些问题肇始于帕森斯的文化理论存在不足，这一点我已论述过。这些不足又跟他不够重视社会共同体与其他社会层次之间的张力有关，跟他不能够理解市民社会具体的互动形式的重要性有关，当然更不用说市民社会的心理现象了。

一个社会共同体是否能够制度化取决于对普遍主义价值观的信奉。在帕森斯看来，这就是说要在约束着角色关系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变量中选择普遍主义的一面，而不是特殊主义；这是一个专门的"文化"层面的问题。以这种方式对普遍主义进行制度化，还包含着权力和利益的规范化控制是经由法律控制的模式而得以确立的。帕森斯相信，这些文化选择和新的控制模式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现代性程度最高的社会中，价值高度普遍化了：这是对涂尔干的集体意识的进一步抽象，不是对个体和集体行为进行精细的象征结构化，而是为类型截然不同的具体行为创建普遍化的指导规则。在社会共同体的法律秩序中，这就意味着程序规范将越来越重要。特殊的身份和不同的主张并不

重要；相反，组织和权威受到委托，将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看待所有的行动者，而不管他们个人的观点。

帕森斯对这种普遍的生活方式的制度化很有信心，而他对于大众教育的推广怎样影响了社会化的见解又巩固了他的信心。[10] 帕森斯将"教育革命"描述为一种实践的启蒙。不过，这种观点产生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它使帕森斯在现代反对"语言学"的意义观获得了合理性，因为它主张在成年人的象征动机中神秘和随意的那些成分正在渐渐地消失。就像帕森斯观察到的那样，未成年人基本社会化的那段时间使现代公民权的价值观具有了一种推论的性质；而与此同时，由于社会化教育期限的不断延长，出现了这样一种发育的过程，即认知、情感和道德彼此逐渐分离，使它们变得越来越"合理"。在帕森斯看来，这些受过很高教育并具有反思能力的行动者，构成了宽容与融合在当代不断扩展的普遍性基础。控制了有侵犯性的心理冲动，约束了彼此冲突的互动，对受过教育的人不断明晰的规范可以使现代制度必然以一种开放而不是狭隘的方式回应行动。排斥将成为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的遗迹。归属感与特殊主义，连带着它们反现代的内涵，都正在成为过去。 225

但是，如果与社会有关联的文化模式不能被认为仅仅是甚或主要是出于专门的危机和系统的需要而加以确定和选择的"价值"，那么市民社会的文化就不能简单地用帕森斯认可的方式来加以抽象与概括。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普遍化的文化指向渐渐地越来越多，但这种普遍主义在新的规则和叙述构架——即我所谓的"市民社会的话语"——和处处存在的抽象规则中得

[10] 参见特纳(1993)的探索性文章，它把帕森斯的教育革命理论放入关于社会变迁的当代争论中。

到了同样的表述。而且，象征结构的这些模式使得无法再把普遍主义想像成仅仅是设置好公平的规范或者确定下程序性的法律规则。实际上，市民社会的话语永不可能以如此方式实现制度化，也正是这个原因，它为市民社会的约束和非市民社会的滥用提供了一面相互反观、并经常是开放性的镜子。[12]

不过，造成紧张的不仅仅是普遍主义的超越和无所拘束的特性，象征分类本身的二重性也产生了紧张。普遍主义并非一个可以从社会生活中排除特殊主义的选择；它是动机、关系和制度等范畴规则性的定义，只有在跟它们的对立面发生关系时才具有了意义，也就是说，在跟“被排除的”以及“特殊主义”等范畴相关联时才会有意义。换句话说，构建了普遍主义的神圣性象征范畴只能通过公开地把自身跟其他类型的个体、制度和群体所具有的世俗动机、关系和制度相对照，才能得到界定。由于这

226 个原因，在市民社会中，被排除的“他者”往往跟那些被接纳的人并相存在。这种理解的任意性成分还包括了因教育而产生的反思性，在意义制造过程当中，它们是必然会存在的。

如果这样一种“有力的”文化理论能够突现出市民社会中的紧张感——它在帕森斯更抽象更扭曲地趋向理性的理论中被忽

[12] 在此问题上，我觉得苏里（1992）在社会构成理论上的反文化立场值得商榷，虽然从别的方面来看，这部著作代表了新功能主义著作的很高水准。苏里认为，如果行动者被描述为为了特定的文化观念而在社会正义和平等之间建立起联系，那么市民社会的独立权力——他特意把它跟法律领域的制度自主性联系在一起——就会出现妥协。正义只能有一个正式的、程式化的基础。相反，我认为，制度过程虽然肯定不能化约为特殊的象征规则和叙事，却总跟它们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虽然苏里批评帕森斯在五十年代执迷于社会化、价值和家庭的心理动力，我却在此批评他没有足够彻底地探究这些旨趣。反文化的观念，即公平和包容只能在程序的基础上运作，一定程度上是来自于苏里跟哈贝马斯的接触，后者所说的话语伦理和法律程序为这样一种立场提供了最为持久的个案。这个立场还对科恩和阿拉托的市民社会理论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参见亚历山大，1994）

视了——那么同样地，一种更为实体性的研究方式可以让我们加深对亚系统、互动和心理动机的理解。帕森斯研究制度性亚系统之间的关系的方式中削弱自身的最大问题是，他把其概念框架(AGIL)分析性的分化等同于经验的实体性划分。帕森斯不仅相信，各亚系统因为逐渐分化开来并且彼此失去关联而应该相互交换，而且认为在现代社会当中，这些交换将会是对称的、互惠的以及相互满足的。就像普遍主义色彩更浓的文化的出现将有利于社会共同体的产生，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交叉的道德义务、政治的邦联主义、宗教的宗派制度以及家庭生活的性别角色分化也会有助于社会共同体。

这种对制度性互惠的信心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帕森斯坚持以他的方式对文化实现制度化，因为这样的制度化表明普遍主义将特别地扮演一种约束的角色。然而，就像市民社会的话语既是乌托邦式的又是不稳定的，既要求提高包容度而又要确认哪些人"应该被"排除出去一样，市民社会的边界关系也是这样相互矛盾地在运作着。市民社会无疑是从外在于自身的制度中接收有益的资源，但与此同时它也会遭到破坏性的侵犯。由经济生活产生的阶级划分、由政治和组织权力产生的寡头政治、家庭中的性别和年龄分层、由宗教制度不断予以合法化的鬼神学，以及由于市民化民族国家的建立而产生的民族、地域和种族间的的统治——这些入侵使市民社会分崩离析，即使它的存在允诺社会政体的参与和恢复。

一种更为具体、经验的研究行动的方式推进了为市民社会提出新理论的努力。比如，它指明了面对面互动的重要性。并非仅仅是诸如戈夫曼的"市民的粗心"(inattention)和"面子工作"等观念成为了民主的社会结构的关键性要素，而且在常人方法学的谈话分析中彰显出来的"次序选择"，现在也被以更具有 227

历史性的宏观社会学的立场来看待。齐美尔把交换与冲突理解为整合的形式，米德对一般化的他人如何接受自然而然的合作的解释，布东坚持认为行动者似乎总是被迫拿出“合适的理由”等等，现在都可以被理解成对市民秩序中特有的互动层次的关键性描述。对于能动性，这样一种实体性的研究方式也指出，社会运动在接受市民社会的构架时会有这样的作用，即根据话语性紧张、制度性冲突以及日常生活的心理和互动的动力所产生的张力做出回应，并在此过程中被建构或者被重新建构。

在这里，我既讨论了帕森斯的分析性路径对于综合的社会理论具有基本的意义，与此同时也认为亟需超越他的路径。从六十年代以来，已经有两场革命使当代的社会理论发生了转变，它们都没有渗透到帕森斯最基本的解释中。微观社会学理论看到了行动与互动的实体性质；结构主义理论开启了把文化当做语言的分析模式，并关注更具有实质性的文本和言语实际的话语模式。帕森斯的三系统模型对分析的强调提倡在这些方法中做重大的修正，而它们反过来要重新思考帕森斯的模型。在讨论市民社会的时候，我利用了这些新的思维方式的制度论分支，它也认为制度性的亚系统大多数应该以不那么强调平衡的方式去理解。

以上这些讨论也许可以被认为是新的综合社会理论的绪论。黑格尔认为要想真正超越一个观点，就必须以某种新的方式把它兼容在内。我指的是一个理论创造的新浪潮，它超越了新功能主义目前的重要成就。如果最终它获得了成功，那么一个基本的原因将是它出现在新功能主义之后，而不是之前。

参考文献

Alexander, J. C. 1987. Action and its environments. In J. C. Alexander, et al. (eds), *The Micro Macro Link*.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89—318.

——1990. Introduction: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ve Autonomy of Culture". In J. C. Alexander and S. Sidman (eds), *Culture and Society: Contemporary Deb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5—39.

——1991. Bringing democracy back in: universalistic solidarity and the civil sphere. In C. Lemert (ed.),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Social Theory in a Changing World*, Beverly Hills: Sage, pp. 157—76.

——1992a. Recent sociological theory between agency and social structure. *Revue suisse de sociologie*, 18(1), pp. 7—11.

——1992b. The fragility of progres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turn toward meaning in Eisenstadt's later work. *Acta Sociologica*, 35, pp. 85—94.

——1992c. Citizen and enemy as symbolic classification: on the polarizing discourse of civil society. In M. Fournier and M. Lamont (eds), *Where Culture Talks: Exclusion and the Making of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289—308.

——1993. More notes on the problem of agency: a reply. *Revue suisse de sociologie*, 19, pp. 501—6.

——1994.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7, pp. 797—803

——1995, The reality of reduction: the failed synthesis of Pierre Bourdieu. In J. C. Alexander, *Fin-de-Siècle Social Theory*. London: Verso, pp. 128—217.

——1996, Collective action, culture and civil society: secularizing, updating, inverting, revising and displacing the classical model of social movements. In M. Diani and J. Clarke (eds), *Alain Touraine*, London: Falmer Press, pp. 205—34.

——1997a, The paradoxes of civil society.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2(1), pp. 115—33.

——1997b, in J. C. Alexander (ed.), *Real Civil Societies: Dilemma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London: Sage.

Alexander, J. C., Giesen, B., Munch, R., and Smelser, N. (eds) 1987,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lexander, J. C., and Lara, M. P. 1996, Honneth's new critical theory of recognition. *New Left Review*, 220, pp. 126—36.

Alexander, J. C., and Smith, P. 1993, The discourse of American civil society: a new proposal for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Society*, 22, pp. 151—207.

Alexander, J. C., Sherwood, S. J., and Smith, P. 1993, Risking enchantment: 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cultural analysis. *Culture*, 8(1), pp. 10—14.

Bloch, R. 1993, A culturalist critique of trends in feminist theory. *Contention*, 2, pp. 79—106.

Calhoun, C. C. (ed.) 1992,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hen, J., and Arato, A. 1992,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Boston: MIT Press

Dubet, F. 1994, *Sociologie de l'experience*. Paris: Seuil.

Eisenstadt, S. N. 1989, Macrosociology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some new dimensions.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6, pp. 602—9.

Emirbayer, M. 1996, Useful Durkheim. *Sociological Theory*, 14(2), pp. 109—30.

Emirbayer, M., and Goodwin, J. 1994, Network analysis, culture, and the problem of agen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6), pp. 1411—54.

Geertz, C. 1964, Ideology as a cultural system. In D. Apter (ed.),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New York: Free Press, pp. 47—76.

——1973, Thick Description, in C.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pp. 3—30.

Giddens, A.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ies*. London: Polity.

Gouldner, A. J. 1970,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Equinox.

——1979, Talcott Parsons. *Theory and Society*, 8, pp. 299—301.

——1980, *The Two Marxisms*. New York: Seabury.

Habermas, J. 1992a,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public sphere. In C. Calhoun (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p. 421—61.

——1992b, Concluding remarks. In C. Calhoun (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p. 462—79.

——1996,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Joas H. 1996, *The Creativity of Action*. London: Polity.

Kane, A. 1990, Cultural analysis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 analytic and concrete forms of the autonomy of culture. *Sociological Theory*, 9(1), pp. 53—69.

Lara, M. P. 1998, *Moral Textures: Feminist Narratives as an Illocution-*

ary Force in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Mayhew, L. 1990,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solidary public. In J. Alexander and P. Colomy (eds),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294—322.

Mouzelis, N. 1995, *Sociological Theory: What Went Wrong? Diagnoses and Remedies*. London: Routledge.

Parsons, T. 1937,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Commentary on "Religion as a Cultural System." In D. R. Cutler (ed.), *The Religious Situation: 1968*. Boston: Beacon Press, pp. 688—94.

Parsons, T., and Shils, E. A. 1951, Values, motives, and systems of action. In T. Parsons and E. A. Shils (eds), *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p. 47—275.

Rambo, E. and Chan, E. 1990, Text, structure, and action in cultural analysis: a commentary on "Positive Objectivity" in Wuthnow and Archer, *Sociological Theory*, 19, pp. 635—48.

Rawls, A. 1987, The interaction order sui generis: Goffman's contribution to soci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5, pp. 136—49.

Ricoeur, P. 1971, The model of a text: meaningful action considered as a text. *Social Research*, 38 (3), pp. 529—62.

——1977, *The Rule of Metaphor*.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Sciulli, D. 1988, Reconsidering Blumer's corrective against the excesses of functionalism.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11, pp. 69—84.

——1992, *Theory of Societal Constitu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erwood, S. J., Smith, P., and Alexander, J. C. 1993, The British are coming...again! The hidden agenda of "Cultural Stuides."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2 (3), pp. 101—14.

Turner, B. S. 1993, Talcott Parsons, universalism and the educational revo-

lution: democracy versus professionalism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4 (1), pp. 1- 24.

索　引

（条目后的页码指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

人文与社会译丛

第一批书目

1.《政治自由主义》,[美]J.罗尔斯著,万俊人译　　28.80元
2.《文化的解释》,[美]C.格尔茨著,韩莉译　　24.50元
3.《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法]B.斯蒂格勒著,裴程译　　16.60元
4.《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德]A.G.弗兰克著,高铦等译　13.60元
5.《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波]F.兹纳涅茨基、[美]W.I.托马斯著,张友云译　　9.20元
6.《现代性的后果》,[英]A.吉登斯著,田禾译　　10.00元
7.《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美]M.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　　14.20元
8.《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下册),[英]E.P.汤普森著,钱乘旦等译　　54.50元
9.《知识人的社会角色》,[波]F.兹纳涅茨基著,郏斌祥译　11.50元

第二批书目

10.《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美]D.克兰著,赵国新译　　13.00元
11.《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美]R.M.昂格尔著,吴玉章等译　　15.20元
12.《后形而上学思想》,[德]J.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　15.00元

13.《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美]M.桑德尔著,万俊人等译
15.00元
14.《临床医学的诞生》,[法]M.福柯著,刘北成译 12.20元
15.《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英]J.C.斯科特著,程立显等译 15.80元
16.《俄国思想家》,[英]I.伯林著,彭淮栋译 18.50元
17.《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加]C.泰勒著,韩震等译
34.50元
18.《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美]L.斯特劳斯著,申彤译 11.80元
19.《现代性与大屠杀》,[英]Z.鲍曼著,杨渝东等译 14.30元
20.《新功能主义及其后》,[英]J.亚历山大著,彭牧等译 15.80元

第三批书目

21.《自由史论》,[英]J.阿克顿著,胡传胜等译 27.00元
22.《伯林谈话录》,[英]I.伯林等著,杨祯钦译 13.50元
23.《阶级斗争》,[法]雷蒙·阿隆著,周以光译 13.50元
24.《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美]M.沃尔泽著,褚松燕等译 24.80元
25.《大萧条的孩子们》,[美]G.埃尔德著,田禾等译 27.30元
26.《黑格尔》,[加]C.泰勒著,张国清等译 43.00元
27.《反潮流》,[英]I.伯林著,冯克利译 26.60元
28.《统治阶级》,[意]莫斯卡著,贾鹤鹏译 30.80元
29.《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德]J.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即出)
30.《知识分子的鸦片》,[法]雷蒙·阿隆著,吕一民等译(即出)

第四批书目

31.《自由论》(《自由四论》扩充版),[英]I.伯林著,胡传胜译(即出)
32.《保守主义》,[德]K.曼海姆著,李朝晖 牟建君译 16.00元

33.《科学的反革命》,[英]L.哈耶克著,冯克利译　　15.20元
34.《实践感》,[法]P.布尔迪厄著,蒋梓骅译(即出)
35.《风险社会》,[德]U.贝克著,何博闻译(即出)
36.《社会行动的结构》,[美]T.帕森斯著,彭刚等译(即出)
37.《个体的社会》,[德]N.埃里亚斯著,翟三江 陆兴华译(即出)
38.《传统的发明》,[英]E.霍布斯鲍姆著,顾杭 庞冠群译(即出)
39.《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美]L.斯特劳斯著,申彤译(即出)
40.《话语伦理学阐释》,[德]J.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即出)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新功能主义及其后
作者＝
页数＝２９５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